民國叢書

第二編

·72·

歷史·地理類

中國歷史散論　曉風著

中國歷史論集　呂振羽　翦伯贊　華岡　吳澤　哲夫等著

中國史論集　翦伯贊著

中國史論集（第二輯）　翦伯贊著

上海書店

中國史論集

第二輯

翦伯贊著

序

我在一九四〇到四二年所撰的歷史論文，已用中國史論集的名字出版。以後，從一九四三到四五年間，續有撰著，因復纂輯，再爲一集，仍用前名，爲第二輯。

本書共輯論文十八篇，都是以前在雜誌上陸續發表過的。在發表的當時，政府正嚴申文字之禁，文化的審查制度，雷厲風行，任何著作，非經審查官批准，不許發表，本書中的論文，自然也不能例外。

當時的文化審查官，不但有權任意刪削，而且有權禁止用任何記號標示被刪削的地方如×，點，或空白之類，其意抑若不令後人知道中國史上曾經有過文化審查制度。此外，如果認爲必要，並有權禁止發表。本書中所有的論文，都經過審查官的刪削。其中南明史上的弘光時代及永曆時代兩文，並爲當時禁止發表之文。前文屢經自己刪削始允發表後文則直至審查制度取消以後才發表出來。

現在文禁稍弛，自然可以照原稿補正，但我的文章，皆未留複稿，原稿交給雜誌，卽行喪失，其僅存者惟有被禁止發表之兩文及杜甫研究一文，前者因禁止發表，由雜誌社退回，以後卽將原稿保存；後者因被刪太多，向雜誌社索回原稿校對。因此，這三篇論文，得以照原稿補正，其中杜甫研究一文，因有人從刪削的缺口中發現「笑話」，所以特別注明被刪削的地方，惟原稿所附「杜甫年表」則刪去未錄。

此外皆係根據雜誌上刊出之文亦卽刪餘之文付印。關於這一點，我只好引用某作家自序其書的幾句話：「本書原稿擱置書架甚久，蟲蝕鼠嚙，頗有殘缺不全乃致上下文氣不接之處，歷時旣久，不復記憶已無法補苴。幸讀者以意會之。」

翦伯贊四月七日，一九四七年於上海。

目錄

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

我很早就想寫一篇關於史料的論文，但總是沒有着筆，月前復旦大學文學院約我作一次學術講演，我就講「史料與歷史科學」這個問題；惟講演時，爲時間所限，不能作較詳之發揮。近因書店之約，要我寫一本關于歷史科學方面的小冊子，我就開始把這次的講演稿加以整理，計有三篇，一、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二、中國攷古學上的史料，三、與收集整理史料有關的各種學問。現在我還只寫成「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一篇，其餘兩篇，假如我的生活不發生變動，也想繼續寫出來。

伯贊。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

一 導言

中國文獻上的史料，眞是浩如煙海，學者往往窮畢生之力，而莫測涯際。即以一部廿四史而論，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二卷，其卷帙之浩繁，已足令人望洋興嘆。而況廿四史尚不過是史部（註一）諸史中之所謂正史。在史部中，除正史

（註一）文字的紀錄，始於記事，故中國古代，文史不分，舉凡一切文字的紀錄，皆可稱之曰史。直至漢代，尚無史部之別，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雖將富於史實紀錄之文獻，併入春秋之屬，但並未獨立。史部諸書從文獻中分別出來而爲一個獨立部門，始於晉代，

以外，尚有編年史，紀事本末，別史，雜史，實錄，典制，方志，譜諜，及筆記等，其數量更百倍千倍於所謂正史。（註二）

又況用歷史學的眼光看，不僅史部諸書才是史料，一切史部以外的文獻，都含有史料。章實齋曰：「六經皆史」，此說甚是，但仍不足以概括史料的範圍。我們若更廣義地說，則何只「六經皆史」，「諸子亦史」，「諸詩集文集，詞選，曲錄，傳奇，小說，亦史」，乃至政府檔案，私人信札，碑銘，墓誌，道書，佛典，契約，賬簿，雜誌，報紙，傳單，廣告，以及一切文字的紀錄，無一不是史料。若並此等史料而合計之，其數量又百倍千倍於史部的文獻。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獻上的史料之豐富，正如一座無盡藏的鑛山，其中蘊藏着不可以數計的實物。這座「史料的鑛山」，在過去，雖曾有不少的人開採過，但都是用的手工業方法，器械不利，發掘不深，因而並沒有觸到史料之

晉荀勗撰中經簿，始分中國文獻爲甲乙丙丁四部，而史爲丙部。至李充重分四部，經爲甲部，史爲乙部，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而中國的文獻遂別爲經史子集四部。以後歷代因之，至於今日。

（註二）諸史經籍志或藝文志，對於史部分類，各不相同，少者分十類，多者分十五類。而其最初的範本，則爲阮孝緒七錄，阮錄分史部爲十二類，卽國史，注歷，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僞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是爲史部最初之分類。隋志因之，分爲十三類，曰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分十三類，其目相同，曰正史，編年，僞史，雜史，起居注，故事，職官，雜傳，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宋史藝文志亦分爲十三類，曰正史，編年，別史，史鈔，故事，職官，傳記，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霸史。明史藝文志則分十類，曰正史，雜史，史鈔，故事，職官，儀注，刑法，傳記，地理，譜牒。清四庫全書總目則增爲十五類，曰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此外尚有許多別錄，其分類有多至三十七類者，不及備舉。

主要的鑛脈。例如史部以外之羣書上的史料，特別是歷代以來文藝作品中的史料，並沒有有系統地發掘出來，應用於歷史的說明。至於四部以外的文字紀錄，則更不曾把他們當作史料而引用。

但是，就史料的價值而論，則史部以外之羣書上的史料，其可靠性高於史部諸史上的史料。因爲史部諸史，是有意當作史料而寫的，其寫作的動機，卽抱着一種主觀的目的，例如對某一史實或人物執行褒貶，所謂春秋書法，就是主觀意識之發揮。這種主觀意識之滲入，當然要使史實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塗改，以致減少史料的眞實性。（註三）至於史部以外的羣書，則並非有意爲了保存某種史料而寫的，而是無意中保留了或反映出若干的史實，這樣無意中保留着或反映出的史實，當然要比較眞切。固然，在史部以外的羣書中，其行文記事也夾雜着主觀的意識，特別是各種文藝作品，如詩詞歌賦小說之類，甚至還具有比史部諸書更多的主觀意識。但是在這一類書籍中所表現的主觀意識之本身，就是客觀現實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壞史料的眞實，反而可以從側面反映出更眞實的史料。

再就史部諸書而論，則正史上的史料，較之正史以外之諸史，如別史雜史等上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少。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則因爲所謂正史，都是官撰的史書。中國之設史官由來已久，（註四）但自東漢以前，史書撰著，皆

（註三）例如左宣二年傳載，趙穿攻殺晉靈公於桃園，當時晉國的太史董狐，在晉史上記載此事，不曰「趙穿弑其君」而曰「趙盾弑其君」。趙盾提出質問，董狐曰：「子身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註四）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卽有專司史實紀錄之人，殷契周金之鏤刻，皆非具有專門技術之人才不可。自春秋以至戰國，各國皆有史官，如趙鞅，不過晉之一大夫，而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不過齊之一公子，而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

出自一家，如司馬遷之著史記，班固之著漢書，雖以史官而著史，尚屬一家之言。自東漢開東觀，大集羣儒，遂開集體官撰之始。自唐以降，歷代政府皆設置史館，派貴臣爲監修，史官記注，皆取稟監修，始能着筆。自是以後，修史者在政治的制限之下，完全喪失了紀錄史實的自由，而所謂正史，幾乎都是在歷代政府監督之下寫成的，至少也是經過政府的審查，認爲合法的。雖然大部分正史，都是後代編前代之事，但其資爲根據的史料，則係前代的實錄及官書，此種實錄及官書，皆成於當代人之手。以當代之人紀錄當代之事，當然不允許暴露當時社會的黑暗，特別是統治階級的罪惡。否則就要遇到危險，如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仇貴族；而吳之韋曜，魏之崔浩，且以觸犯時諱而喪失生命。所以歷代史官，大抵變亂是非，曲筆阿時。見皇帝則曰神聖，見反對皇帝者則曰盜賊，簡直變成了統治階級的紀功錄。像這樣專捧統治階級而以人民爲敵的歷史，當然不可信。至於正史以外之別史雜史等則皆係私家著述，這一類的著述，並不向政府送審，他能盡量地寫出所見所聞，所以較爲眞實。

總之，就史料的價値而論，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諸史，正史以外之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羣書。爲了要使中國的歷史獲得更具體更正確之說明，我們就必須從中國的文獻中，進行史料之廣泛地搜求，從正史中，從正史以外之諸史中，從史部以外之羣書中，去發掘史料，提鍊史料。只有掌握了更豐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國的歷史在史料的總和中，顯出他的大勢，在史料的分析中，顯出他的細節，在史料的昇華中，顯出他的發展法則。

會盟澠池，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左昭二年傳，謂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是魯亦有史官。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是秦亦有史官。漢興，武帝又置太史公，以司馬談及其子遷爲之，以後歷代皆置史官。

二 正史

首先說到廿四史，即中國史部羣書中之所謂正史。

這部書，既非成於一時，更非出於一人之手，而是歷代積累起來的一部官史。其中成於漢者二，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是也。成於晉者一，陳壽三國志是也。成於南北朝者四，宋范曄後漢書，梁沈約宋書，梁蕭子顯南齊書，北齊魏收魏書是也。成於唐者八，唐太宗晉書，姚思廉梁書陳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李延壽南史北史是也。成於五代者一，後晉劉昫舊唐書是也。成於宋者三，薛居正舊五代史，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是也。成於元者三，脫脫宋史，遼史金史是也。成於明者一，宋濂元史是也。成於清者一，張廷玉明史是也。

以成書的年代而論，大抵皆係後代撰前代之史，但其中亦有例外，如劉宋撰後漢書，唐撰晉書，則朝代隔越。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上溯殷周，遠至傳說時代之五帝，更係以後代之人而追溯遠古。

即因這部書是歷代積累起來的，所以在唐代只有三史，即史記漢書三國志，而成於南北朝的諸史，尚未列入正史。到宋代，始將宋及其以前所成的諸史列於正史，合爲十七史，而舊唐書舊五代史，尙不在正史之內。至於明，又加入宋遼金元四史，而有廿一史。到清代，再加入明史及舊唐書舊五代史，始足成今日之所謂廿四史。晚近又以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增爲廿五史。他日再加入清史，就有廿六史了。

廿四史，中國歷來皆稱爲正史，但在我看來，與其稱之曰史，不如稱之曰「史料集成」。

第一、以體裁而論，雖皆爲紀傳體，而且其中最大多數皆係紀傳體的斷代史，但其中亦有紀傳體的通史。如司馬遷的史記，則上起五帝，下迄漢武；李延壽的南史，則係宋齊梁陳四朝的通史；北史則係北魏北齊北周隋代四朝的通史。通史與斷代史雜湊，以致體裁不一。

第二、即以紀傳體而論，亦不盡合於規律。所謂紀傳體，即以本紀，世家，列傳，書志，年表合而成書。但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皆無書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幷撰者。而後漢，三國，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史，北史，舊唐書，新舊五代史，皆無表。

第三、以史實的系列而論，則重複互見。其中有全部重複者，如南史之於宋齊梁陳書，北史之於魏齊周隋書，新唐書之於舊唐書，新五代史之於舊五代史是也。亦有局部重複者，如漢書紀漢武以前的史實，完全抄錄史記原文是也。又如於朝代交替之間的史實，前史已書，而後史必錄，如東漢末羣雄，後漢書有列傳，三國志亦有列傳。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之事蹟，已見於魏志，而晉書又重爲之紀。此外，當據割或偏安之際，同時並世的諸王朝各有史書，而同一史實，既見此史，又出彼史。如宋齊梁陳書之於魏齊周隋書，南史之於北史，宋史之於遼金元史，其中重出互見之史實，不可勝舉。至於論夷狄，則必追其本系，於是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勾驪以鱉橋復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等語，前史已載，後史再抄，重床疊被，千篇一律。因而以時間系列而論，亦未能前後緊密相含。

第四、因爲廿四史都是用紀傳體的歷史方法寫的，所謂紀傳體，即以事系人的體裁，這種體裁，用以保存史料，不失爲

方法之一，若用以寫著歷史，則紀一史實，必至前後隔越，彼此錯陳。因爲一人不僅作一事，一事又非一人所作，若以事系人，勢必將一個史實分列於與此事有關之諸人的傳紀中，這樣所有的史實都要被切爲碎片。所以我們在廿四史中只能看到許多孤立的歷史人物，看不到人與人的聯系，只能看到無數歷史的碎片，看不到一個史實的發展過程。既無時間的系列，又無相互的關聯，所以我說廿四史不能稱爲歷史，只是一部史料的集成。

當作歷史，則班馬之書，亦不敢妄許，即當作史料，而廿四史中有一部分史料，也只能當作代數學上的 x，是否正確，尚有待於新史料的證明。其不可靠的原因，一般地說來，不外如次的幾點：

第一、循環論的觀點。這種觀點，在史記中已經彰明其義。曆書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高帝紀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天官書曰「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又說天變則依五星周轉，應於世變，則爲五行輪迴，所謂五行者即土木金火水，亦曰五德，中國的歷史，就是三五往復，五德終始，循環古今。所以歷代受命之君，必於五德中有其一德而王，如某也以土德王，某也以木德王等等。五行又配以五色，如蒼赤黃白黑，故以某德王者則必尚某色。如漢以火德王，色尚赤。像這一類循環論的說法，充滿廿四史，並以此而演化爲天命論。如歷史家以秦爲金德，色尚白，漢爲火德，色尚赤，於是把漢高祖斬白蛇之事，附會爲赤帝子斬白帝子。又如劉秀繼西漢而王，其德不改，其色亦不改，故當其即位之際，有赤伏符自天而降。又如公孫述，他根據王莽的新五德系統（五行相生）以爲土生金，王莽自謂以土德王，色尚黃，他繼王莽之後，應爲金德，金德王者色尚白，故自稱白帝，改成都曰白帝城。這一類的鬼話，當然不可信。

第二、正統主義的立場。廿四史，是以帝王爲中心的歷史，帝王本紀，是全部歷史的綱領。所以在任何時代，都必須要找到一個皇帝，而尊之曰「神聖」，替這個皇帝作本紀，替屬於這個皇帝的貴族、世家、官僚地主商人作列傳。任何人，不管他的理由如何，只要反對這個「神聖」，他就被指爲叛逆，爲盜賊。神聖可以反道敗德，荒淫無恥，乃至殺人放火，史書上不過說他略有遜德，甚至美之曰爲民除暴。反之，反對神聖的人民，如果殺了幾個貪官汚吏，史書上便大書特書，說他們不僅是殺人魔王，而且是吃人大王。但是他們有時也自相矛盾，即當他們找不到神聖的時候，則他們認爲是盜賊，叛逆，乃至夷狄，皆可以奉之爲神聖。如朱温在唐書爲盜賊，在五代史遂爲神聖。燕王棣在同一明史，前爲叛逆而後爲神聖。北魏北齊北周之君，南史指爲索虜，而北史則尊爲神聖。五代之李成勗，石晉塘，劉智遠，皆沙陀之裔，在五代史上，皆尊爲神聖。遼，金，元初，諸帝，宋史稱之曰賊、曰虜、曰寇，而在遼，金，元史中，則皆爲某祖某宗某皇帝了。趙汝遜主撰之清史，對於滿清諸帝，亦無不稱爲祖宗，尊爲神聖，對於太平天國，則曰髮匪，對於幫助滿淸屠殺中國人民的漢奸曾國藩，反而恭維備至。至於某一時代神聖太多，則於諸神聖中擇一神聖，而曰此乃正統之神聖，其餘則指爲僭僞。如三國志以魏爲正統，而以吳蜀爲僭僞；（註五）新舊五代史以梁唐晉漢周爲正統，而以其餘爲僭僞。（註六）像這樣今日叛逆，

（註五）關於三國的正僞，史家看法不同，在晉，則陳壽正魏，習鑿齒正蜀；在宋，則司馬光正魏，朱熹正蜀。陳壽生於西晉，司馬光生於北宋，西晉與北宋，皆據中原，與魏相同，苟不以地望爲據，則晉宋爲僭，故其所以正魏者，即所以正晉正宋也。習鑿齒生於東晉，朱熹生於南宋，東晉與南宋，皆偏安江左，若不以血統爲據，則東晉南宋爲僭，故其所以正蜀者，亦所以正東晉南宋也。

（註六）宋人之所以正梁唐晉漢周者，以宋之天下篡自周，由周而漢而晉而唐而梁，實爲一貫篡奪系統，因正宋而遂不能不正周，因

明日帝王今日盜賊，明日神聖今日夷狄，明日祖宗以及甲爲正乙爲僭僞的糊說，充滿廿四史。而且由此而展開成王敗寇的書法。如楚漢之際，項羽實曾分裂天下而王諸侯，但以結局失敗，而史家遂謂司馬遷不應紀項羽。如西漢之末，劉玄實曾爲更始皇帝，亦以結局失敗，而後漢書遂不列劉玄於本紀。此外，如李世民之與竇建德王世充，朱元璋之與張士誠、陳友諒，清順治之與李自成、張獻忠，其相去實不可以寸計，徒以成敗之故，而或爲太祖太宗，或爲盜賊流寇，按之史實，豈爲正論？所以我以爲讀廿四史者，萬勿爲正統主義以及由此而演繹的成王敗寇的書法所迷惑，我們應該從假神聖中去找眞盜賊，從假盜賊中去找眞神聖。

第三、大漢族主義的傳統。「內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以來發生的一種狹義的種族思想，這種思想，也充滿了廿四史。一部廿四史，都是以大漢族爲中心，對於國內其他諸種族的歷史活動，或列於四夷列傳，或完全沒有紀錄，如三國志之蜀志吳志以及陳書北齊書，皆無四夷列傳。其有四夷列傳者，紀錄亦極疏略，必其種族與中國發生戰爭或重大交涉，始能一現。至對於各種族之淵源，及其自己的發展，則無有系統之紀載；有之，則不是把各種族拉扯爲漢族的支裔，以圖否定其種族，便是對其他種族加以侮辱。前者如謂匈奴爲夏桀之後，朝鮮爲箕子之裔；後者如謂北狄爲犬羊之族，南蠻爲虫豸之屬。又如述漢族之侵略四國，則曰王化廣被，聲教遠播；反之若其他種族向中原發展，如匈奴只要越過長城，西羌只要轉入甘肅，東胡只要西向遼東，南蠻只要走出崇山峻嶺，便指爲叛變，爲入寇。又如漢族明明向外族獻美女，納歲貢，乃至稱臣稱侄，而美其名曰懷柔；反之其他諸種族，明明是來至中原進行貿易，而必曰四夷來王。諸如此類的偏見

正周而遂不能不正周之所自出，由此上溯，以至於梁，遂上繼唐代。故五代史之正梁唐晉漢周，亦所以正宋也。

不可勝擧。假使眞能堅持到底也好，但又不然，只要其他種族，一旦走進黃河流域或入主中國，如北魏北齊北周，及遼金元等，則又歌德頌聖，充分表現其媚外求榮之奴性。當清順治三年，議歷代帝王祀典，而禮部上言，謂遼則宋曾納貢，金則宋曾稱侄，均應廟祀，侵侵乎幾欲正遼金而僞宋，其所以尊遼金者，卽所以逢迎滿清。結果不但遼金諸帝與宋代諸帝並坐祭壇，而元魏諸帝亦同享廟祀。這種入主出奴的心理應用於歷史的紀錄必然要混淆事實。或曰，廿四史中，有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中關於魏齊周的部分及遼金元史，皆係紀錄外族或以外族爲中心之史書，故廿四史，不能說是以大漢族主義爲中心。但是這些史書雖不以漢族爲中心，而仍以某一支配種族爲中心，因而仍是狹義的種族主義。我們之所以反對大漢族主義，就是因爲他是一種狹義的種族主義，他把漢族當作中國這塊領域內的天生的支配種族，而敵視其鄰人，以致使歷史的中心偏向一個支配種族，而其他中國境內諸種族的歷史，遂疏漏簡略，歪曲不明。同樣，以任何一個支配種族爲中心的歷史，都是大種族主義，其作用，同於大漢族主義。

第四、主觀主義的思想。一部廿四史充滿了主觀主義的成分，而其主要的表現方式，則在每篇終末的評語之中。這種評語的命名各書不同，如史記則曰「太史公曰」，漢書則曰「贊」，後漢書則曰「論」，三國志則曰「評」，其他或曰議，或曰述，或曰史臣，或自稱姓名，其名不一，其實皆史家發揮主觀主義之地盤。此外在史實敘述中亦夾雜批判。更有一種，則係委曲史實，以適應其主觀的觀念，只有這一種，最足以變亂史實的眞象，而又最難辨識。在廿四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任意褒貶之處，如漢書貶王莽，但我們讀王莽傳，觀其行事，雖亦有奸僞可貶之處，而其託古改制，知道當時的政治非變不可，倘不失爲一個開明的貴族。宋書南史貶范曄，但我們讀陳澧讀書雜誌中的申范篇，而後知范曄之被誣。宋

史貶王安石，但我們讀陸象山王荊公祠堂記，蔡元鳳王荊公年譜，梁啓超王荊公傳，而後知王安石之被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外曲筆阿時，以取媚權貴者，更顛倒是非，任意屈伸。他若貪汚者則更無論矣。劉知幾曰：「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班陳尙如此，等而下之，當更有甚焉。

最後，便是政治的制限嫉諱多端。卽因如此，對於皇帝的紀錄，特別是開國皇帝的紀錄，最不可信。例如劉邦本是一個好美姬貪財貨的流氓，而史記高帝紀謂其一入咸陽，便變成了「財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的聖人。漢成帝嘗白衣袒幘，從私奴婢，姦淫人民的妻女，而漢書成帝紀，謂其「臨朝淵嘿，尊嚴若神」。曹髦之死，實司馬昭派賈充刺殺，而魏書但書「高貴鄉公卒」。蒼梧王之死，實蕭道成派楊玉夫刺殺，而齊書但書「玉夫弑帝」。楊廣實弑其父，而隋書煬帝紀但書「高祖崩」。李世民實弑其兄，而唐書高祖紀反書建成元吉謀害其弟。趙光義實弑其兄，而宋史不書。燕王棣實逐其侄，而明史不罪。諸如此類，舉不勝舉。其他對於皇帝以及權貴之一切無恥的罪行，大抵皆因忌諱而不許紀錄，其間有紀錄者，則爲萬人皆知，不可隱蔽之史實。這種忌諱，當然要變亂並湮沒許多史實。不但如此，而且在忌諱的反面，又產生逢迎，如史書上替那些開國皇帝，大半都製造一些神話。這些神話，完全是憑空扯謊，決不可信。

此外或因後人竄亂，眞僞相雜，如史記自褚少孫始竄亂者不下十餘輩。或因根據不同，同一史實，而兩書互異。如漢史之於武帝以前的史實，南史與宋齊梁陳書之於南朝的史實，北史與魏齊周隋書之於北朝的史實，宋史與遼金史之於同時的史實，多有歧異。或因倉卒成書，謬誤不免，如沈約宋書紀志列傳共一百卷，而撰書時間不過數月。元撰宋遼金三史，不及三年，卽告完成。明撰元史，六月成書。或因文字不通，隨便照抄官書檔案。如元撰宋遼金史，明撰元史，其

中人名地名譯音不確，竟至一人化爲二人，二人幷爲一人，其於地名亦然。他若由於撰史者的疏忽，以至同一書中，前後自相矛盾者，各史皆有。以是之故，所以我說廿四史上的史料只能當作代數學上的 x。

雖然只要我們知道了他的毛病，廿四史中還是有很多寶貴的史料可以用於歷史的說明。例如人皆謂魏書爲穢史，但除去偏見，仍爲史料。人皆謂宋史繁蕪，但當作史料，則患其不繁。人皆謂元史猥雜，但其中所錄官牘鄙俚一仍原文，更爲實錄。反之，如陳壽三國志字字錘鍊，過求簡淨，若無裴松之的注解，史實幾至不明。如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下筆行文，褒貶隨之，同樣是滿紙偏見；而且由於過於模倣春秋，以至變亂史實，如新唐書本紀書安史之亂，必書逆首，但在事實上，有若干行動，並非逆首所爲，而爲逆黨所爲。故吾於唐書及五代史，寧取薛著之繁瑣直敍，而不取歐著之總核簡嚴。又如宇文氏本爲外族，文字言語生活習慣，異於中國，以中國文字記外族歷史已屬隔靴搔癢，而北周書又行文必尚書，出語必左傳，則史實眞象，一誤於翻譯，再誤於文字玩弄，結果，必然走樣。故吾於紀錄外族之史，寧取元史之猥雜存眞，而不取北周書之古雅失實。總之，當作史料看，則寧取其繁瑣存眞直敍，而不取其簡括典雅與褒貶之辭。明乎此，然後才能讀廿四史用廿四史。

三　正史以外的諸史

其次，說到正史以外的諸史。正史以外的諸史，種類繁多，如前所述，有編年史，紀事本末及通典通攷等。這些書，或

以事系年，通諸代而爲史或標事爲題，列諸事以名篇或以事爲類，分部類以成書。他們在寫作的方法上，都能自成一體，但在史料方面則並不多於正史，而且大半皆由正史中網羅搜括而來。因此我們如果爲尋找新的史料以補充和訂正正史，就必須求之於史流之雜著。

史流雜著，由來甚古，早在所謂正史出現之前，即已有之。如山海經、世本、國語、國策、吳越春秋、楚漢春秋之類的古史，論其體裁，皆係雜史，論其著書之時代，皆在史漢之前，且爲史漢之所取材。自漢魏以降，此類著作，仍與所謂正史，殊途並騖，平行發展。南北朝初已蔚爲大觀，僅就裴松之注三國志所引之雜史即有五十餘種。至於宋代，由於印刷術的發明和應用，私家著作得以刊行，而史部雜著亦日以繁富。降至明清，則此類著作，洋洋乎，浩如煙海了。

史部雜著，種類甚多，體裁不一，要之，皆與正史有別。論其體裁，既不一律皆爲紀傳體；論其性質，亦不如史記南北史通諸代而爲史，又不如前後漢書等斷一代以成書，而皆係各自爲體之隨手的紀錄，故其爲書，皆零碎斷爛，非如正史之有系統。關於史部雜著，劉知幾曾爲之別爲十類。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這樣的分類，雖過於瑣碎，但却可以顯出史部雜著的諸流別。徇此流別以觀史部雜著，則紛亂一團之史部雜著，亦能類聚族別而形成其自己的系統。

劉知幾所謂偏記，即其書所紀錄的史實，並非始終一代，換言之，非斷代的專史，只是紀錄某一朝代中的一個段落，或即當時耳聞目見之事。這種史實，或不見正史，或即見正史而紀載並不詳盡，於是有偏記之作。劉知幾曰：「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載記，（山陽公，即漢獻帝禪魏後之封號）王韶晉安帝紀，姚最梁昭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這一類的著

作，以後最爲發展，或截錄一時，或專紀一事。前者如五代王仁裕之開元天寶遺事，宋李綱之建炎時政記，靖康傳信錄，明李遜之三朝野記，錢軹甲申傳信錄之類皆是。後者如宋曹勳北狩見聞錄，蔡絛北狩行錄，洪皓松漠紀聞，辛棄疾南渡錄，明歸有光備倭紀略，吳應箕東林始末，清吳偉業復社紀略，王秀楚揚州十日記，佚名氏嘉定屠城紀略，李秉信庚子傳信錄，王炳耀中日甲午戰輯等不可勝舉。

小錄所以紀人物，但並不如正史總一代之人物而分別爲之紀傳，而是僅就作者自己所熟知的人物爲之傳記。小錄上傳記的人物，或不見正史，或即見正史而於其平生事蹟不詳，故有小錄之作。劉知幾曰：「若戴逵竹林名士（七賢論）王粲漢末英雄（記）蕭世誠（梁元帝）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這類著作，後來亦繼有撰著，如明朱國楨明遜國臣傳，張芹建文忠節錄，黃佐革朝遺臣錄，清陸心源元佑黨人傳，陳鼎東林列傳，李清臣東林同難錄，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彭孫貽甲申後亡臣表等皆是也。

逸事記事亦記言，但不是重複正史，而是補正史之所遺逸，故其所載之事或言，皆爲正史所無。劉知幾曰：「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這類著作，後來向三個方向發展，其一爲輯逸，即從現存的文獻中，搜集古書的逸文，輯而爲書。其二爲補逸，即根據其他書類增補史籍上的遺漏，或就原書注釋，或另爲史補一書。其三則爲存逸，即作者預知此事若不及時紀錄，後來必然湮沒，故因其見聞而隨時記錄之。輯逸與補逸，其性質已屬於逸史之收集與補充，惟存逸則屬於逸史之創造。此種存逸之書，明清之際最多，如明應喜臣青燐屑，史惇慟餘雜記，無名氏江南見聞錄，天南逸史，黃宗羲海外慟哭記，夏允彝幸存錄，夏完淳續幸存錄，清陳作安海濱外史，鄒漪明季遺聞，羅

諧也是錄，以及搜集於荊駝逸史及明季稗史中之各種野史，都可以列入逸史之類。

瑣言所以記言，但並不如正史所載皆係堂皇的詔令章奏及君臣對話，而是小說卮言，街談巷議，民間言語，流俗嘲謔。故其所記，亦非正史所無。劉知幾曰：「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此類著作，在宋代最爲發達，如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朱彧泙州可談，張知甫可書，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劉績霏雪錄，洪邁夷堅志，曾敏行獨醒雜志，張師正倦遊雜錄，無名氏續墨客揮犀，皆是也。在明代亦有之，如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張端義貴耳集，葉紹翁四朝見聞錄，羅大經鶴林玉露等是也。

郡書記人物，但並不如正史所載，網羅全國，而僅錄其鄉賢，故其所錄人物，或不見正史，或即見正史而不詳。劉知幾曰：「若圈稱陳留耆舊（傳），周斐汝南先賢（傳），陳壽益都耆舊（傳），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此種著作，後來亦續有撰述，如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宋句廷慶錦里耆舊傳，元劉一淸錢塘遺事，王鶚汝南遺事等皆是也。但更後則發展爲地方志，如省志，府志，縣志之類，史部中獨立出來，成爲方志之書。

家史記一家或一族之世系，但並不如正史上之世家，僅記貴族之世系，而是作者追溯其自己之家世，或任何不屬於貴族者之譜系。劉知幾曰：「若揚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這種著作，淵源甚古，如司馬遷作三代世表，所根據之五帝系諜，尚書集世記，就是紀錄氏族世系之書。自魏晉迄於六朝，學者多倣史記世家遺意，自爲家傳。齊梁之間，日益發展，郡譜州牒，並有專書。通志氏族序曰：「自隋唐而上，官有譜狀，家有譜系。官之選擧，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立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

家狀者，則上之官，爲攷訂詳實，藏於祕府，副於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若晉之賈弼，王宏，齊之王儉，梁之王僧孺等，各有百家譜，又如宋何承天撰姓苑，後魏河南官氏志，都是譜系之書。譜系之學，至於唐而極盛。唐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系錄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有韻略，張九齡有韻林，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自是以後，迄於今日，民間民族，大抵皆有其自己之譜牒。此外與族譜並行，尚有後人攷證古人家系之書，如羅振玉高昌麴氏年表，風沙曹氏年表，以及許多個人的年表，不可勝舉。這些，都是屬於家史之類。

別傳所以傳人物，但並不如正史列傳，僅錄其大事，而是委曲細事，詳其平生。亦不如小錄，僅傳其所熟知之人，而是認爲其人有作別傳之價值。也不如郡書，僅錄其鄉賢，而是就全部歷史人物中，選擇其別傳之主人。一言以蔽之，別傳是從全部歷史人物中選擇一種在歷史中佔重要地位的人物，爲之作專傳。這種人物，或不見正史列傳，或即見正史列傳而不詳，或已見於小錄郡書，或不見小錄郡書。劉知幾曰：「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這種著作，在史部雜流中也很發達。如唐鄭處誨明皇雜錄，李德裕明皇十七事，姚汝能安祿山事蹟，宋王偁張邦昌事略，無名氏劉豫事略，明楊學可明氏（明玉珍）紀錄，國倫陳（友諒）張（士誠）事略，王世德崇禎遺錄，邵遠平建文帝後紀，清錢名世吳耿尚孔四王合傳，以及美人林白克孫逸仙傳記等，皆屬於別傳之列。

雜記所以錄鬼怪神仙，但並不如正史五行志專載徵祥災異，符瑞圖讖，拉扯天變，附會人事；而是紀錄閭巷的異聞，民間的迷信。劉知幾曰：「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雜記之書，

後亦續有撰著，然以事涉荒唐，不被重視，故作者較少，然亦常散見於各種筆記野史之中。更後則發展爲神怪小說，如封神，西遊記，聊齋志異之類。

地理書所以志地理，但並不如正史地理志（或郡國，郡縣，州郡，地形，職方諸志）皆千篇一律，總述一代之疆宇，郡國州縣，人口物產，而是有各種各樣的體裁，其中有總述一代之疆域者，但其最大的特點，則在專志一地，其所志之地，或爲其本鄉，或爲其曾經遊歷之異域。而其內容，則側重於山川形勝，風俗習慣。劉知幾曰：「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山水記），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地理書，以後向三個方向發展，其一衍爲方志，如唐之元和郡縣志，宋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明清一統志之類是也。其二，遊記，如晉法顯佛國記，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元長春眞人西遊記，耶律楚材西遊錄，馬可波羅遊記，明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嚴從簡殊域周咨錄，黃衷海語，顧玠海槎餘談，朱孟震西南夷士風記，清徐宏祖霞客遊記，陳倫炯海國見聞錄，楊賓柳邊紀略，洪北江伊犂日記，天山客話，陸次雲峒谿纖志，魏祝亭荊南苗俗記，兩粵傜俗記等是也。此外，則爲地理之歷史的攷證，此類地理攷證之書，在清代著述最多，不及列舉。

都邑簿所以紀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按歷代都邑，正史無專志，故都邑簿是所以補正史之所不及。劉知幾曰：「若潘岳關中（記），陸機洛陽（記），三輔黃圖，建康宮殿，（魏羊衒之洛陽伽籃記，馬溫之鄴都故事）此之謂都邑簿者也。」此類著作，以後代亦有撰述，如宋周密故宮殿記，武林舊事，耐得翁都城記勝，吳自牧夢梁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清余懷板橋雜記，雪樵居士秦淮見聞錄，捧花生秦淮畫舫錄，許豫白門新柳記，蜀西樵也燕台花事錄等書，雖其目的，或非專爲紀述都邑，而皆能保存若干都邑狀况之史料。

總上所述，可知中國史部雜著之豐富，其中自記事、記言、記人、以至記山川物產，風俗習慣，宮闕陵廟，街廛郭邑，神仙鬼怪，無所不有。自一國之史以至一地之史，一家之史，一人之史，無所不備。以上十類，雖尚不足以概括史部之雜著，但大體上，已可由此而挈其要領。此等雜史，雖其寫作體裁，不及正史之有系統，行文用字，不及正史之雅典，但因雜史所記，多係耳聞目見之事，而且其所記之事又多係民間瑣事，故其所記，較之正史，皆爲眞切，而且皆足以補正史之遺逸缺略，乃至訂正正史之譌誤。特別是因爲雜史不向政府送審，沒有政治的制限，能夠盡量地暴露史實的眞象。所以有時在一本半通不通的雜史或筆記中，我們可以找到比正史更可靠的史料。

例如正史紀事，限於政治，不確；限於篇幅，不詳；而偏記之類的書，則能正其不確，補其不詳。如宋史載徽欽北狩，不詳，讀辛棄疾南渡錄等雜史，則徽欽二帝北狩的行程及其沿途所受的侮辱，歷歷如見。明史載倭寇之戰不確，讀采九德倭變事略等書，則知當時商人勾引倭寇，明代官兵望敵而逃之實情。滿清入關對中國人民的大屠殺，將來清史，未必全錄，但是有了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書，則知滿清入關，其屠殺之慘，並不減於今日之日寇。

正史記人，皆根據其政治地位，爲之紀傳，其於草野之士，雖亦間有別爲隱逸列傳者，但被錄者少而被遺者多。有了小錄，郡書，家史，別傳之類的書，或紀其熟知之人，或紀其鄉士之賢，或自敍其家族之世系，或詳記一人之平生，則正史所遺者因之而傳，正史所略者，因之而詳。例如三國志上的許多人物紀傳，大抵皆以此種雜史爲藍本而紀錄出來。如以小錄而論，則有魏文帝典論，魚氏典略，孫盛魏略，王隱蜀記，張勃吳錄等。以郡書而論，則有蔡邕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零陵先賢傳，楚國先賢傳，王隱益部耆舊傳，荀綽冀州記，襄陽記，虞溥江表傳等。以家史而論，則有孔氏譜，庾氏譜，孫氏譜，稽

氏譜，劉氏譜，諸葛氏譜等。以別傳而論，則有吳人曹瞞傳，陳思王傳，王朗家傳，趙雲別傳，華佗別傳等。三國志如此，其他各史大抵皆然。總之凡正史列傳中所不載或不詳的人物，我們有時可以從雜史上找到。例如宋史載宋江的暴動，合徽宗紀侯蒙傳張叔夜傳三處所載，不過百餘字，簡直看不出宋江是怎樣一個人，但我們讀宣和遺事，周密癸辛雜識，及龔聖與三十六人贊，則梁山泊上的三十六個英雄，有名有姓有來有歷了。

正史載言多錄詔令章奏，至於街談巷議，則很少收入，而詔令之類的文字，又最不可信。史通載言篇曰：「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詞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發璽書，下綸音，申惻隱之渥恩，敍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這就是說，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為歷代的統治者，都是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好話說盡，壞事做完。但是有了瑣言一類的雜史，則民間言語，亦獲紀錄，而此種民間言語，則最為可信。例如宋史載宋金戰爭，只記勝敗，讀周密齊東野語，其中載宣和中，童貫敗於燕薊，伶人飾一婢作三十六髻，另一伶人問之，對曰：「走為上計（髻）。」由此而知宋代官軍，只知向後轉進。又張知甫可書有云：「金人自侵中國，雅以敲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有伶人作雜劇戲云：「若欲勝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槍，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鎖子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由此又知當時中國政府對付金人，只有憑着天靈蓋去領略金人的敲棒。此外如曾敏行獨醒雜誌諷刺宋代政府濫發貨幣，洪邁夷堅志諷刺宋代宰相的貪汚，岳珂桯史諷刺南宋的統治階級把徽欽二帝拋在腦後等等，都是以瑣語而暴露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內容，而被暴露的事實，又都是正史上所沒有的。

正史記事，多有遺逸，逸事之類的書，卽所以補正史之遺逸。如武王伐紂，尚書史記只說武王伐罪吊民，讀逸周書克殷世俘諸篇，始知「血流漂杵」的內容。又如三國志紀諸葛亮南征只有二十字，讀華陽國志南中志（有七百餘字紀載此事）才知道這一戰爭的經過始末。此外若無夏允彝父子之幸存錄，續幸存錄，我們便不知亡國前夕的明代政府之貪污腐敗與荒淫無恥，若無鄧凱求野錄，羅謙也是錄，便不知明桂王亡國君臣在緬甸之流亡情形及其最後的下落。

正史敍四裔及外國皆甚簡略模糊，地理書卽可以補其不及。如晉書無外國志，但我們讀法顯佛國記，則自當時甘肅，新疆，中亞以至印度之山川形勢，氣候物產，藝術建築，風俗信仰，便如身歷其境；而且又知道當時自印度經海道至中國的航線和海船的大小。讀玄奘大唐西域記，則唐代的西域和印度的情形，卽瞭如指掌。讀宋范成大吳船錄，便知宋時印度之王舍城已有漢寺。讀馬可波羅遊記，便知自地中海以至中國之間這一廣大領域在元時的狀況。讀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等書，便知明代中國商人在南洋之活動，以及當時南洋各地之風土。此外，如淸人所著關於苗傜之書類，又爲研究西南少數種族風俗習慣之最好的參攷書。

正史對都市，特別是都市生活不詳，都邑簿之類的書，卽可補其不足。例如晉代的洛陽是怎樣的情形，從晉史上看不出來，我們讀洛陽伽藍記，便知當時的洛陽有多少城門，街道如何，而且城內城外有一千多個佛寺。宋代的汴梁是怎樣的情形，從宋書上也看不出來，但我們讀吳自牧夢粱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等書，不但宮殿的所在，街道的名稱，可以復按，而且當時的都市生活商店，茶樓酒館，書場妓院的地址，以及過年過節廟會等風俗，亦瑣細如見。明末的南京，是怎樣的情形，從明史上，也看不出來，但我們讀板橋雜記等書，則知亡國前夕的南京，「燈火樊樓似汴京」。莫愁湖上的茶社，

秦淮河中的遊艇，都擠滿了貧窮的妓女和腐化貪汚的官僚。

劉知幾曰：「蒭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欲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四　史部以外的羣書——經子集

再次，說到史部以外的羣書，即羣經諸子和集部諸書。這些書，雖不如史部諸書專記史實，但其中皆有意無意保存了一些史料，甚至比之史部諸書上所載更爲可靠的史料。

首先說到羣經。提起羣經，就會使人頭痛，今日流行的一部十三經，古往今來不知消磨了多少學者的精力，一直到現在，仍然是一種令人不能接近的怪物。

實際上，所謂羣經，並不是甚麼神奇的天書，只是幾部七拼八湊，殘缺不全的古書；固然，由於其中文字的古奧，譌誤，脫漏，致使義理不明，但這是一般古書的通病。這幾部古書之所以令人頭痛，一般的說來，是由於他們在經的尊稱之下，被神秘化了。

因爲一尊爲經，則其中一言一句，皆被認爲聖人垂世立教的微言大義，於是自漢以降，歷代的經師皆以「說三字至二十萬言」的著作來注釋這幾部古書。因而注疏之書，盈千累萬。即以一部十三經注疏而言，就有四百一十六卷，而

其中所收之注疏，每經尚僅一家，又唐宋以後之注疏，且不在內。

這些著作，或注釋名物，或訓詁音義，或疏通經說，其中固有不少佳作。但亦有若干著作，繁辭縟說，節外生枝，以致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甚至「飾經術以文奸言」者，亦往往而有。因之愈注愈疏，就愈繁重，愈玄妙，愈使人頭痛，此古人所以皓首窮經而至死不通也。

經書令人頭痛之最主要的原因尚不在此，而是今古文之爭。本來在漢初，中國的經書，只有一種用當時流行的文字寫定的本子，即所謂今文經。至哀平之際，又出現了一種所謂古文經。這種古文經，係當時學者劉歆等偽撰而託爲孔壁遺書。自是以後，今古文並行，以致眞僞相亂，時代不明。於是而門戶之見，流派之別，紛然雜起。今古文之爭，糾纏了兩千餘年，難解難分，直至清代，才算作了一個結束。

當作史料看，我們對于今古文問題，似乎可以不管，但這個問題攸關羣經的眞僞和他的時代，所以仍然不許我們逃避。在下面我們對於今日流行之所謂十三經，分別予以說明。

（一）易經，本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書，其著作年代，說者不一。顧頡剛氏謂在西周，郭沫若氏謂在春秋以後，孔子所不及見。這部書原來只有卦爻辭，後來儒家學者加入了易傳，於是變成了儒家宣傳教義的聖經。

在漢初，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是爲今文三派。其後又出現費氏（直）的古文，京（房）高（相）的別派，自魏王弼之注盛行江左，唐人因之以作正義，自是漢易諸家俱廢。今十三經注疏所收者，王弼之易。

易自漢儒即加入了燕齊方士之說。至王弼注易，易學遂與老莊之道家言混合。五代北宋間，道士陳摶又以道教

中丹鼎之術，附會易經。至邵康節、周濂溪，於是而有先天太極諸圖，易經至此，遂到了神祕的頂點。

自程伊川作傳，少談天道，多言人事，始稍淨化，其後朱熹綜周程之說，作易本義，明清宗之。首先反對道士易的是黃宗羲，他著易學象數論，攻擊周、邵，跟着其弟宗炎又著圖書辨惑，指出太極圖說出於道士陳摶的無極圖之祕密。同時，毛奇齡又著河圖洛書原舛，與二黃之說相應，道士易便開始動搖。至胡朏明著易圖明辨，於是蒙罩在易經上的神祕雲霧，遂一掃而空。

（二）尚書本是一部殘缺不完的殷周雜史，其產生的時代各篇不同，有殷代之文，有西周之文。相傳最古的尚書有三千餘篇，孔子刪為百篇，百篇尚書有序，其序見於史記，但僅傳二十八篇，其後河內女子獻泰誓一篇，為二十九篇，泰誓旋佚，仍為二十八篇，是為今文尚書，亦即漢初歐陽、大夏后（勝）小夏后（建）三派所傳之尚書。

平帝時，出現了偽古文尚書，比今文多十六篇，是為漢偽古文尚書。

東漢末，漢偽古文尚書亡佚。至晉初復出，但比漢古文多九篇，為二十五篇，還附有一部偽孔安國注，是為晉偽古文尚書。自是以後，偽孔傳流行，今日十三經中的尚書，就是東晉偽古文尚書。

東晉的偽古文尚書自宋以來就有人反對，朱熹就是第一個反對者，以後元吳澄，明梅鷟，清姚際恆，繼起響應。至清初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八卷，便宣告了東晉偽古文尚書的死刑。

（三）詩經是西周時代（或謂其中有春秋時代的作品）的一部民歌。漢初今文，只有魯（申培公）齊（轅固生）韓（嬰）三家，但漢末又出現了毛氏的古文。自鄭康成依毛詩作箋，以後毛詩孤行，而三家俱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

於西哲，韓詩僅存外傳）今十三經中之詩，即鄭箋之古文毛詩。

毛詩自唐中葉以後，即發生異議，韓愈對毛詩序即表示懷疑。至於宋，學者羣起反對，如鄭樵作詩辨妄，王質作詩總聞，朱熹作詩集傳，程大昌作詩論，王柏作詩疑，於是毛詩遂被攻擊得體無完膚。元明以降學者宗朱說而毛詩不行。到清代，姚際恆作詩經通論，崔述作讀風偶識，方玉潤作詩經原始，而毛詩遂受最後之清算。

（四）所謂禮經，在西漢初只有高堂生，徐生兩家，其後宣帝時，有后蒼氏，大戴氏（德）小戴氏（聖），慶氏（普）之禮，是爲禮經的今文。但以後又出現了儀禮周禮禮記，是爲「三禮」。「三禮」自鄭康成作注，唐人因以正義以後，亦儼然成爲聖經，而漢初禮經遂廢。

周禮，多數學者皆以爲劉歆僞作，爲西漢末之著作。但亦有謂爲晚周人所作者，如何休謂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郭沫若謂爲「趙人荀卿子之弟子所爲」。

禮記，漢書藝文志已經注明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鄭立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然則禮記即小戴禮也。但陸氏經典釋文云「後漢馬融盧植攷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敍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由此而知禮記之成，蓋在東漢時。

儀禮爲晚周之書，毛奇齡，顧棟高，崔述，牟庭皆有此說。姚際恆儀禮通論有云：「儀禮是春秋以後儒者所作，如聘禮皆述春秋時事，又多用左傳事，尤可見。」又云「祝詞多用詩語，便知儀禮爲春秋後人所作。」又云：「前後多覲章鄉黨之文，而有意別爲簡棟刻畫以異之。」

（五）春秋，可以說是一部編年的春秋史，但這部書，過于簡單，如果沒有傳，就令人看不懂，所以後來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傳，但這三傳並不是同時產生的，在西漢初只有公羊傳一種。不久穀梁出來，春秋遂有兩傳，是爲今文春秋。（一說穀梁亦係僞古文）漢末古文左傳出現，於是春秋才有三傳。東漢時，三傳同行，公羊爲盛，六朝後，公羊穀梁同廢，左傳孤行。至於唐代，啖助趙匡之徒，力詆三傳，於是「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以後學者多撰新傳，而宋人胡安國之傳，在明代立於學官，至是三傳皆廢。至清代學者始再復三傳，但以公羊爲盛，而左氏穀梁不振。今十三經中的春秋，今古文並錄。

公羊爲今文似無可疑，穀梁晚出，襲公羊，左氏，雜取周禮毛詩，義理乖戾，文辭不通，近人張西堂以此而疑其爲漢人僞作。至於左傳之爲西漢末的僞書，劉逢祿在其左氏春秋攷證一書中辨之甚詳。康有爲新學僞經攷亦謂左傳乃劉歆分新國語五十六篇之大半，再綴拾雜書而成。故國語之所略者，即左傳之所詳；反之左傳之所詳者，亦即國語之所略。此外，左傳中常雜有戰國時代的辭句，如「不更」「庶長」「臘祭」等戰國的官名或制度，由而知左傳之成書乃在西漢之末。

（六）論語，論語是孔門弟子所記之孔子的語錄，漢初有齊魯二家，齊論二十二篇，魯論二十篇，是爲今文。漢末，又出現古文論語，古文論語與今文沒有什麼分別，只是把魯論的二十篇變爲二十一篇，即將魯論之末一章「堯曰」分爲「堯曰」與「子張」二篇。自張禹合齊於魯而齊魯相混，鄭康成復合齊魯於古文論語，於是眞僞不辨。今十三經中之論語，即今古文混合以後的論語。

（七）孝經本是漢人所撰的一部修身教科書，但亦有古文。古文經與今文不同者，即今文爲十八章，古文則分爲二十二章。孝經之僞中出僞，不僅一次，而是至再至三：第一次，出於西漢末葉，第二次出於隋之劉炫，第三次出於日本之太宰純。（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一集中）鄭玄注孝經是用的今文本，但是唐注出而鄭注微，至宋初，鄭注遂亡。今十三經中的孝經，是唐注本。

（八）爾雅本是秦漢時代的一部名物辭典，與聖道並不相干。其出現在平帝時，又有與毛詩周禮訓詁相合者，故近人亦有謂此書爲劉歆僞撰者，但我以爲劉歆沒有理由僞撰此書。

總上所述，我們知道今日流行的十三經，其中除爾雅孟子以外，都有僞古文。此種僞古文經，大多數出於西漢之末，但亦有出於東晉者，如尚書；更有出於隋代者，如孝經。然而皆謂爲聖人的眞經，這樣就眞僞相亂，時代不明了。

以上我簡略地說明了羣經的今古文之分產生的時代及其演變的源流，從這裏我們知道在今日流行的十三經中，除爾雅、孟子外，其餘或全爲古文或今古文并出。我們既從羣經中辨別了今文和古文，是不是凡今文皆眞，古文皆僞呢？不然。這裏所謂眞僞，只是今文經對古文經而言，因爲古文經對今文經作僞，所以說古文經是假的，今文經是眞的。實際上今文經中也有僞文，古文經中也有眞史。

例如今日被證實爲今文經之詩三百零五篇，書二十九篇，禮十七篇，易十二篇，春秋十一篇，論語（魯論）二十篇，孝經一篇十八章，並非古人自己的紀錄，而皆爲周秦間學者所纂集，其中固有不少眞爲古代的實錄，亦有儒家托古的僞作。有西漢時加入之篇，如書之「泰誓」，易之「說卦」等。此外甚致有全爲漢人僞撰之書，如孝經。他如尚書中之「

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近人亦有疑「洪範」「梓材」「胤征」「康誥」者）論語中之後五篇，（「季氏，」「陽貨」「微子」「子張」）都是後人的僞作固不能因其爲今文而卽認爲眞史也。

古文經對今文經而言雖爲僞經，但亦並非憑空杜撰而爲西漢末許多學者根據今文經及其他古典文獻纂集而成。近來疑古學者往往站在今文家的立場，把古文經的纂集歸之于劉歆一人的僞造而且完全爲了一種政治目的卽辯護王莽改制。這種說法，未免過火假如劉歆眞能一手僞羣經，則他不僅可以稱聖人，而且可以稱爲超聖人了。

實際上，古文經中還是含有眞實的史料。例如，左傳雖爲春秋古文但其所記，則仍爲春秋史實而且糾正了今文公羊上的若干錯誤只要我們不爲它的八股式的「書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會的最好史料。毛詩是古文，但其所錄，則爲西周民歌。只要我們不爲那種武斷詩的時代歪曲詩的本義之毛詩序所蔽，則毛詩仍然是研究西周社會的最好史料。周禮雖僞，但其中有一部份仍可認爲戰國史料。孝經雖僞，但由此可以看出漢人的倫理觀念。古文尚書雖僞，但由此可以看出西漢末葉對古史的傳說；關於這些，我們又不能因其爲古文而遂認爲僞史也。

至於羣經中間關于沒有文字時代的紀錄，如虞夏之文，不論其爲今文爲古文，爲西漢人所僞，抑爲東晉人所僞，說是眞的，都是眞的，因爲都是紀錄傳說；說是假的，都是假的，因爲都不是古人自己留下來的紀錄。故關於虞夏之文，只要有攷古學做根據，無論今文和古文，都可以引爲旁證。

其次說到諸子。當作史料看，諸子之書，是研究先秦學術思想最主要的史料。而且其中亦有紀述前代史實及反

映或暗示當時社會內容的紀錄，故又爲研究先秦社會史最好的資料。

諸子和羣經相反，不但沒有被尊爲聖經，而且在儒家學說的教義獨裁之下，被指爲「異端」，爲「邪說」，爲「姦言」，」爲「愚誣之學」，「雜反之辭」，卽因如此，所以也就沒有蒙上神秘的雲霧。雖然如此，諸子之書派別紛歧，眞僞雜出，所以一提到諸子，也令人有目迷五色之感。

關於諸子的學術思想的流派，戰國時卽有著錄。

莊子「天下篇」所舉者有九家：曰墨翟、禽滑釐（附相里勤，五侯，苦獲，已齒，鄧陵子）曰宋鈃、尹文，曰彭蒙、田駢、愼到，曰關尹、老聃，曰莊周，曰惠施（附桓團，公孫龍）。

尸子「廣澤篇」所舉者有六家：曰墨子（卽墨翟），曰孔子，曰皇子，曰田子（卽田駢），曰列子，曰料子。

荀子「非十二子篇」所舉者十二家：曰它囂、魏牟，曰陳仲、史鰌，曰墨翟、宋鈃，曰愼到、田駢，曰惠施、鄧析，曰子思、孟軻。「天論篇」所舉者四家，曰愼子，曰老子，曰墨子，曰宋子。「解蔽篇」所舉者六家：曰墨子，曰宋子，曰愼子，曰申子，曰惠子，曰莊子。

韓非子「顯學篇」所舉者兩家：曰儒，曰墨，「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又於儒分八派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彫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於墨分爲三派，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此外並附有宋榮子曰：「夫是漆彫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彫之暴也。」

呂氏春秋「不二篇」所舉者十家：曰孔子，曰墨翟，曰關尹，曰子列子，曰陳駢（卽田駢），曰陽朱（卽楊朱），曰孫臏，曰王廖，曰兒寬。

以上諸書皆係戰國時代的著作，其所著錄，當係實有其人（惟皇子，料子，它囂無可考）實有其學。關於上述諸家，據近人考證，除孔子，史鰌，鄧析爲春秋末年人，餘均爲戰國時人。卽孔子的學說，經其門徒纂集，其成書，當亦在戰國時。在這裏，只有老子的時代，近來成爲問題。以前，皆以老子爲孔子的前輩，晚近梁啓超著論老子書成于戰國之末一文，辨證老子是戰國末年的著作，我同意這種說法。所以諸子之書，大概都是戰國時代的作品。

關於諸子的學術思想，在上述諸書中，我們只能看到個別的敍述，雖其中亦隱約可以見其流派，但幷無整然之劃分。自劉歆七略，創爲九流出於王官之議，班固因之以作漢書藝文志。於是諸子之書別爲十家：曰儒家，曰道家，曰陰陽家，曰法家，曰名家，曰墨家，曰縱橫家，曰雜家，曰農家，曰小說家。本爲十家，而又曰：「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蓋以此而符合於劉歆之所謂九流也。

按九流出於王官之說，顯係後起之義，不但在戰國諸子的著作中看不見此說之蹤影，卽漢初淮南要略論諸子的學說之起源，亦無此說，要略之言曰：

「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後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後管子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繆——而後申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後商鞅之法興焉。」

要略所論，雖不必盡對，但在原則上，他認爲諸子學說的興起，都是時代的產物，這是很正確的。

關於諸子學說的淵源，這裏不及多說，這裏要說的是諸子的著述之存佚和眞僞問題。

據漢志諸子略所錄諸子十家，凡作者一百八十九家，書四三二四篇，其著述之繁富，可以想見。惟漢志所錄，不限于先秦諸子，漢人的許多著作也著錄在內。而且其中僞托之書佔最大多數。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漢志中竟錄有黃帝，神農，風后，力牧等神話人物之著作，可以推知。

不論漢志所錄是眞是僞，而其所錄各書大都皆已亡佚，今所存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而且這十之一二的存書中，還有很多僞書，先秦的著作，實在屈指可數。

據梁啓超「漢志諸子略各書存佚眞僞表」所列，漢志所錄儒家之書五十三家，已佚者四十五，僅存者八家，即晏子，孟子，孫卿子，賈誼，董仲舒（即春秋繁露）鹽鐵論，劉向所序四種之三（新序，說苑，列女傳）楊雄所序四種之三，（太玄，法言，箴）道家之書三十七家，已佚者三十四，僅存者三家，即老子，莊子，管子。法家之書十家，已佚者八，僅存者二家，即韓非子，商君書。名家之書七家，已佚者五，僅存者二家，即公孫龍子，尹文子。墨家之書六家，已佚者五，僅存者一家，即墨子。雜家之書二十家，已佚者十八，僅存者二家，即呂氏春秋，淮南子。此外陰陽家之書二十一家，縱橫家之書十二家，農家之書九家，小說家之書十五家，皆已全佚，僅能於他書中見其遺說。

但是傳世的子書，却不僅此數，例如儒家中有陸賈新語，道家中有鬻子，文子，關尹子，列子，鶡冠子，法家有愼子，名家有鄧析子。此外並有漢志所無之書，如儒家中之孔叢子，六韜，道家中之陰符經，子華子，亢倉子，縱橫家之鬼谷子，雜家之於

陵子等這些書，近來已經證明是後人僞托的。

關於諸子中的僞書，姚際恆古今僞書攷曾列舉全僞之書三十七種。四庫提要，亦曾於諸子書目之下，一一注明「全僞」「疑僞」及「疑撰人」等字樣。據晚近學者研究諸子之書，已決定全書皆僞者有孔子家語，孔叢子，（現已公認爲魏王肅僞撰）陰符經，六韜，（漢以後人僞撰）鬻子，關尹子，子華子，文子，亢倉子，鶡冠子，鬼谷子，尉繚子，（魏晉至唐陸續僞撰）於陵子（明人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老子河上公注（晉以後人僞撰）吳子，司馬法，晏子春秋，（大約西漢人僞撰）列子，（疑爲晉張湛撰）。至於凡托名神話人物之著作，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風后握奇經等，其爲後人僞托，更無可疑。此外如申子，尸子，愼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原書皆佚，今傳者或由近人輯出，但原書是否爲本人所作，抑爲秦漢人依托，也是問題。

又如管子商子孫子，其書不僞，但決非管仲商鞅孫武所撰，而爲戰國末年人之書。

老子墨子莊子韓非子是眞書，但其中亦雜有僞篇。如老子中「佳兵者不祥」一節，墨子中「親士」「修身」「所染」三篇，莊子中之外篇及雜篇之一部，韓非子中「初見秦」一篇，都是後人竄亂之作。

總之，諸子之書，都是先秦古書，兩千年來，由于傳鈔傳寫而發生之譌誤，已屬不少，而又不斷有人僞託，竄亂，所以幾乎沒有一部完全的眞書。因而我們從諸子採用史料時，就要用一番工夫去判別他們的眞僞。但這不是說僞托之書，就完全沒有史料的價值，僞托之書，只要我們知道他們作僞的時代，他還是那個時代的史料。例如周髀算經，當作周公作則錯，當作周末漢初人作，則仍然是這一時代的古算書。素問難經，當作黃帝及秦越人作則錯，當作秦漢間人作，則仍然

是這一時代的古醫書。

再次說到集部諸書。集部諸書，在四部中問題最少。因爲他們既不如經書之被神化，亦不如子書之多僞托，又不如史書之有竄亂。如果說他們也有問題，那就只是間有傳刻的錯誤而已。

集部之書，並非專記史實之書，大抵皆係純文學的，至少亦爲含有文學性的著作，其爲研究文學史之主要的資料，盡人皆知。章實齋曰：「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其實，何只文集如此，詩詞歌賦，小說劇本，又何嘗不是歷史資料。而且又何只是一人之史，在任何時代的文學作品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作者對當時社會所塗繪的陰影，不過他們所塗繪的陰影，有濃有淡而已。所以我以爲集部之書，當作史料看，他們正是各時代的社會縮寫，正是各時代的人民呼聲，正是千眞萬確的歷史紀錄。而且其中的歷史紀錄，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來的。

例如楚辭，在集部中是最古的一種，其中「天問篇」紀錄着戰國末葉楚國流傳的許多神話傳說。在「離騷篇」中，紀錄着當時楚國的黨爭，其他各篇，描寫戰國末年楚國流行的風俗。這些在戰國時的史書中是找不到的。

又如在漢賦中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對於兩漢的都市宮室以及許多瑣碎的掌故之紀錄，是兩漢書中找不出來的。

在三國時的五言詩中，如王粲的「七哀詩」，描寫大混戰中之難民逃亡的情形，曹植的「名都篇」，描寫當時有閑階級的生活，而這些，又是三國志中找不出來的。

在唐詩中如杜甫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描寫安史亂中唐代政府綑綁壯丁的情形；「哀江頭」描寫淪陷以後的長安。白居易的「重賦」描寫唐代農民之被收奪；「輕肥」「歌舞」「買花」「傷宅」描寫唐代統治階級之驕奢淫逸「鹽商婦」描寫唐代商人之豪富。韋莊的「秦婦吟」描寫黃巢入長安的情形。此外，在唐詩中詩人之記述其所身歷的事變和目覩的社會狀況的詩歌，尚不知有多少其所暴露的事實又都不是唐史上所能找出來的。

在宋詞中歐陽修的「漁家傲」描寫北宋時一年十二月的節日。秦觀詠汴州，謂當時汴州充滿了「珠鈿翠蓋，玉轡紅纓」。王與之咏杭州，謂當時杭州「千門繡戶笑歌聲」柳永咏錢塘謂當時錢塘「參差十萬人家」。此外如辛棄疾陸游的作品都反映出故國山河之感。這些關於風俗都市和智識份子的情緒又都不是宋史上所能找到的。

在元曲中，如「竇娥冤」「鴛鴦被」描寫韃靼統治者的高利貸以人抵賬。「硃砂担」「馮玉蘭」描寫韃靼統治者之强姦殺人，「陳州放糧」描寫韃靼統治者的貪汚腐化。「凍蘇秦」「荐福碑」描寫在韃靼統治下中國智識分子之陷于飢餓。這些又都是元史上找不出來的。

在明代的傳奇中，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描寫南明福王政府之任用宦官黨，投降派，放逐忠良，排斥賢士大夫，貪汚無恥，內戰第一以及清兵南下時望風而逃的情形歷歷如在目前而這在將來的清史中對于這一段歷史也未必寫得這樣生動。

此外，在明清的章回小說中，也反映出不少的史實。雖然在小說中的人物事實，大半都是假設，但在作者當時，則必

有這一類型的人物和事實。例如水滸傳中寫史進，林冲，魯達，楊志，都是逼上梁山，不管有無史進等其人，而在明代政府的暴虐政治之下，人民之被迫而暴動則爲事實。又如儒林外史寫士大夫周進，范進那樣熱中可恥，寫戲子鮑文卿那樣忠厚可愛，不管有無周進鮑文卿其人，而明代士大夫的風格，不如戲子，則爲事實。同書寫一個秀才倪老爹後來竟至修補樂器爲生，而且賣了自己的四個兒子，不管有無倪老爹其人，而明代智識分子窮到賣兒賣女的，一定不少，則爲事實。又如金瓶梅寫西門慶的荒淫無恥，武斷鄉曲姦淫人民的婦女，不管有無西門慶其人，而明代有這樣的豪紳則是事實。又如紅樓夢寫大觀園裏的穢史，不管有無大觀園，而在清代的貴族中有這樣豪奢腐敗淫穢的家庭，則是事實。

總之，自楚詞，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至明清之傳奇小說，乃至現在的許多文藝作品，他們表現出中國文學自己發展之一系列的歷史過程，也反映出歷史上所不載的社會發展的內容，所以他們是文學，同時也是史料。

五　四部以外的各種文字紀錄

不僅四部之書皆爲史料，即四部以外之任何文字的紀錄，都有史料的價值。誠如韓愈所云：「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兼收並蓄，待用無遺。」只要我們善于抓梳廢紙堆，廢紙堆中往往可以找到比經史子集中更可寶貴的史料。

例如原藏內閣大庫之清代檔案，民國以來人皆視同廢紙，以後竟當作廢紙，廉價拍賣。（以擄案四分之三，售與故紙商，數九千袋，得價四千元）但是這龐大的廢紙堆中，却含有極其珍貴的史料。例如其中有關於鴉片戰爭之文件，即有四五十卷，又如其中之康熙年間與俄皇大彼得法王路易十四往來的文件，更是研究清初外交的寶典。關於檔案之整理，

只有羅振玉曾就其所得之一部，編爲史料叢刊十册。此外王芷章曾就檔案中有關於清代宮廷戲劇者，編爲清昇平署志略二卷，其有待於我們整理者其數量至爲龐大，其工作亦至爲艱巨。

又如碑銘墓誌，看起來似乎與歷史無關，但是其中也往往有珍貴的史料。例如大秦景教碑（唐建中二年）記基督教始入中國事。開封挑筋教人所建碑（明正德六年）記猶太人及猶太教始入中國事。九姓回鶻可汗碑（唐刻無年月）記摩尼教由中國傳入回紇事。唐蕃會盟碑（唐長慶間刻）記唐與吐蕃會盟事。而且在這些碑文上還保存了古代外國的文字。如大秦景教碑有古敍里亞文，九姓回鶻可汗碑，有古突厥文粟特文，唐蕃會盟碑，有古吐蕃文，因而這些碑銘又是研究古外國文字的資料。此外私人的墓誌，也有時足以補史籍之缺失。如楊家將在宋史中並不重要，但我們讀歐陽修所作「供備副使楊君（琪）墓誌」而後知楊業父子，在當世就有「無敵將軍」之稱。又如七下西洋的鄭和，讀明史我們只知道他是一個宦者，但自昆明發現「馬哈只墓誌」，而後知鄭和的父親是阿剌伯人。他若碑碣的捐款數目，足以推知立碑時的物價，從而人民的生活程度，更是一般碑碣所共同。

私人的函札，似乎無關大局，但其中也有些足以補史籍之缺失。例如司馬遷史記自序述其遭受腐刑，幾不知其故，但讀其報任安書則詳知其事。又如三國時，中國大疫，三國志僅書某年大疫，而不記其程度，但讀魏文帝與吳質書，而後知「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又如讀多爾袞致史可法書，而後知滿清在征服中國的戰爭中曾執行誘降的政策。讀明桂王致吳三桂書，而後知桂王曾求爲藩封。此外如清曾、左、李、胡諸集所載的信札，都是研究近代史最好的史料。

宗教經典，看起來似乎是一種迷信的說教，但其中也有史料。例如釋氏要略十誦律云：「以佛塔物出息佛聽之。

」僧祇云：「供養佛華，多聽轉賣入佛無盡藏中。」這就反映出唐代的僧侶打起佛教的旗幟大放高利貸。此外在各種佛典中都充滿了古印度的神話傳說。又如基督教的創世紀中有「羅得和他女通姦」「亞伯拉罕和他妹子結婚」等故事，這些都是猶太最古的傳說。

又不僅以上的文字紀錄中皆有史料，誠如梁啓超所云：「一商店或一家之積年流水賬簿，以常識論之，寧非天下無用之物？然以一歷史家眼光觀之，倘將「同仁堂」「王麻子」「都一處」等數家自開店迄今之賬簿及城廂間貧富舊家之賬簿各數種，用科學方法一爲研究整理，其爲瓌寶，寧復可量？蓋百年來物價變遷，可從此得其確實資料，而社會生活之大概情形，亦歷歷若覩也。又如各家之族譜家譜，又寧非天下最無用之物，然苟得其詳贍者百數十種，爲比較的研究，則最少當能于人口之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壽數得一稍盡眞之統計，舍此而外，欲求此類資料，胡可得也？」

又豈僅如梁氏所云賬簿家譜可以當作史料，即雜誌報紙傳單，亦無一不是史料。假使我們把抗戰以來各種雜誌中主張民主與反對民主的論文彙集起來，就可以寫成一部抗戰以來的政治思想史。又假如我們將抗戰以來報紙上所載的貪污事件彙集起來，就可以寫成一厚本貪污列傳。將報紙上所載的兵役故事彙集起來，就可以寫成若干「新石壕吏」的詩歌。將報上所載之敵人暴行彙集起來，就可以寫成無數的「新屠城記」。在相反的方向，假如我們把報上所載的淪陷區域的人民起義事件彙集起來，又可以寫成無數的英雄傳記。總之，只要我們耐煩去搜集，則無往而非史料。

論司馬遷的歷史學

一 司馬遷的傳略

中國之有文字的歷史紀錄，早在殷周時代。甲骨上的刻辭，鐘鼎彝器上的銘文，都是歷史紀錄。春秋戰國之際，儒墨並起，百家爭鳴，其所著述，亦多稱引遠古的傳說神話以自實其說。尚書、國語、戰國策之類的著作，且已接近於有系統的歷史紀錄。以後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卿大夫的世系所出。更後又有楚漢春秋，紀楚漢之間的史實。但這些著作或紀年爲錄，或分國爲史，或僅記世系，或截錄段片，皆係支離斷爛的著作，並未構成一個整然的歷史系統，而且寫著的方法亦無一定的成規。至於諸子的著作，則不過借史料以爲其立論之根據或例證而已，更無所謂體例。所以我說漢以前寫著歷史，尚不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寫著歷史之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即所謂歷史學，在中國，是創始於天才的史學大師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今西安附近）。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西紀前一四五年），卒年不詳。但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武帝後元年間，尚在人間。例如史記「高祖功臣年表」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

者年表」中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漢興將相年表」中，亦記征和後元年間的史實。按後元爲武帝最後的年號，後元共二年，其二年爲西紀前八八年。據此，則司馬遷至少活到紀前八八年，其年壽約六十歲左右。

司馬遷出生於一個世家的家庭。據他自己在史記自序中考證他的始祖是傳說中「顓頊」時代的「重黎氏」。「重黎氏」自「顓頊」歷「唐」「虞」「夏」商之世，皆「世序天地」。到周宣王時，「重黎氏」才失其「天地之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在周代「世典周史」。司馬氏出於「重黎氏」的說法，不可信，這大概是司馬遷的推想而其動念則以「重黎氏」在傳說中爲「星曆」之官，司馬氏爲「文史」之官，在中國古代「文史」與「星曆」不分，故有是說。

自序中又說當周惠王襄王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以後分散，或在衞，或在趙，或在秦。司馬遷的直系祖先，就是在秦的一支，其徙秦的始祖，卽司馬錯，這大概是可靠的。

自序中又歷述司馬錯的子孫，以至於他自己。他說錯生靳，「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王鐵官。」「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司馬談就是司馬遷的父親，他是一位學問淵博的史官。他不但記憶許多歷史掌故，而且精通天文曆算及諸子百家的學說。自序中說他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司馬談正撰次舊聞，準備寫一部史記，不幸於元封元年，因爲漢武帝舉行祭泰山的大典，卽所謂封禪，（封爲山頂之祭，禪爲山麓之祭） 沒有帶他同去 （因爲武帝所

帶的都是方士〕他認爲這是一個莫大的恥辱，於是氣憤而死。

司馬遷生當西漢隆盛的時代，這時漢武帝正在勝利地展開世界征服的偉業。東至今日之朝鮮，南至今日閩浙粵桂以至安南，西南至今日之黔滇，西至今日之新疆乃至中亞，都已經劃入西漢帝國的版圖。只有北方的匈奴，還沒有完全征服，因此戰爭在西北仍然繼續進行。司馬遷親眼看到當時中國的人民，暴骨沙漠，親眼看見當時四裔諸種族，稽顙漢庭。漢武帝的歷史創造，當然也就開拓了司馬遷的歷史心胸，他可以看到他以前的人看不到的歷史活劇，聽到他以前的人聽不到的外來傳說。

司馬遷又生在一個史官的家庭，據他在自序上說：「當時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所以他便有優先的機會，去接近中國古典的歷史文獻。自序中說他「年十歲則誦古文。」

在司馬遷的當時，西漢政府，正在高調「崇儒術黜百家」的口號，執行文化思想的統制政策，但司馬遷卻於諸子百家的學說，無所不看。他對於諸子百家，甚至當時尊爲正統的儒家學說，都有批判，唯獨對於道家的學說，則讚美盡致。他在史記自序中論六藝要旨曰：

「易六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與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從這裏可以看出司馬遷的思想，頗受道家的影響，所以後來班固批評他說他「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其思想「頗謬於聖人」「此其所以蔽也。」

司馬遷在少年時就喜歡遊歷。他不是無目的漫遊，而是爲了縱觀山川形勢，考查風俗，訪問古蹟，采集傳說。自序中說：「余年二十而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宋以歸。」又在五帝本紀中說「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司馬遷曾做過漢武帝的郎中。並曾一度「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元封元年，回京復命，適武帝已赴山東祭泰山，他的父親又病在洛陽，「發憤且卒」因往見父於河洛之間。自序中云其父執其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掌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余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司馬遷俯首流涕，接受了他父親的遺命。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其父卒三歲，（元封三

年（西紀前一〇八年）而司馬遷遂被任爲太史令，時年三十八。

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後，一面整理其父遺稿，即所謂「先人所次舊聞」；另一面又博覽皇家圖書館的古書，即所謂「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編列綱領，樹立規模，經過了五年之久，至太初元年十一月（西紀前一〇四年）才開始史記的寫著，時遷年四十二。

又五年（天漢二年西紀前九九年），而司馬遷遭李陵之禍。關於李陵之禍，據漢書李陵傳載，李陵係李廣之孫，少爲侍中建章監。李廣利選征大宛，派李陵爲糧秣隊長，李陵不願，求自領一軍出居延，以擊匈奴。武帝壯之，乃與以步兵五千。李陵卽率步兵五千，深入蒙古沙漠，至浚稽山，單于以騎兵八萬圍之。李陵奮戰，終以矢盡道窮，援兵不至，降匈奴。這個消息，傳到朝廷，文武百官，都譴責李陵。司馬遷以李陵提步兵五千，與匈奴騎兵八萬，連戰十餘日，縱橫沙漠，所殺過當，「雖古名將不過也」。而且看李陵的意思，「尙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適逢武帝以李陵事召問他，他就本着他的意思替李陵說話。他說，他的動機，是「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但武帝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爲他把李陵投降的責任，推到統帥李廣利的身上，替李陵遊說。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兄弟，與武帝有連皮帶肉的關係，怎樣能說他一個不字呢，所以司馬遷就判了誣上之罪，應處腐刑。在武帝時本來有「出貲者贖罪」的辦法，但司馬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結果下了蠶室，處了腐刑。實際上，司馬遷遭李陵之禍，眞是黑天的冤枉。他在報益州刺史任安書中，曾說到此事，其中有云：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

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謙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狗國家之急。其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

由此看來，司馬遷之爲李陵辯護，並非受李陵之託，爲之遊說，而是因爲他與李陵「俱居門下」看出李陵的爲人，「有國士之風」。同時又看見那些「全軀保妻子之臣」逢迎皇帝，打擊「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的國士，所以慨然犯武帝之盛怒，主持公道。這完全是司馬遷正義感的表現。司馬遷的這種正義感，是他致禍之由，也是他能成爲一個偉大的史學家的基本條件。

司馬遷處腐刑後，漢武帝知道他並沒有犯罪，所以又任爲中書令，而且信任備至，這從任安要他推賢進士可以看得出來。但司馬遷自遭腐刑以後，卻認爲奇恥大辱，他的精神受了很大的摧殘。以至「居則忽忽若有所忘，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辱，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

中書令在武帝時本來是以宦官充任，他主要的任務就是傳達皇帝的詔令於三公九卿。所以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有曰：「今已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又說「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久矣。」

司馬遷何以「受極刑而無慍色」？這就是因爲他的史記「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未成。」他知道他的「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他伏法受誅，「若九牛

亡一毛，與螻螘何異，而世又不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又說：「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知去就之分矣，何致自沈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自是以後，司馬遷乃自託于無能之辭，退而著史以終其生。自序中曰：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而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皆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其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因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由此而知司馬遷之著史也，是因為他「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而其所著史記，也是他「發憤之所為作也。」雖然，司馬遷却並不是亂發牢騷，而是抱持着一種莊嚴的態度，把寫著歷史當作一種神聖的事業。他在自序中說：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斷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由此看來，司馬遷之寫著歷史，蓋志在春秋。所以他在自序中又託為壺遂之問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然後答曰：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

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預，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余讀司馬遷書，想見其爲人，而悲其遭遇，不覺慨然而嘆曰，從來賢聖廢黜，何其如此相同也。身逢亂世者，固無論矣，以司馬遷生當盛漢之隆，亦不能免於無妄之災，是知賢聖之不容於奸佞也，世無分治亂，時無分古今。司馬遷「少負不羈之才，」長有四方之志，亦嘗「側身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亦嘗「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征邛笮昆明，」何嘗不思竭其材力，以效命於國家。但言之不用，道之不行，而且無罪而遭酷刑，結果在西漢帝國大遠征的大時代中，望着千軍萬馬咆哮而過，而自己却閉門著史，垂空文以自見，述往事，思來者，安得而不憤！雖然，司馬遷誠有自知之明，他深知漢武帝英而不明，只知用自己的皇親國戚如衞青霍去病之流，只知用豪富的商人如東郭咸陽孔瑾之流，只知用歌功頌德的文人，如司馬相如之流，像他那樣旣富於正義感而思想又「頗謬於聖人」的學者，決不能得志於專制獨裁的皇帝之前，其不死于非刑，已可謂幸事，又能留下其著作，更爲大幸。到今日司馬遷已死去兩千多年，他的名字，和漢武帝的名字，同樣的響亮。是知事業文章，各有千秋；又知權力之可得而摧殘者，人之肉體；至於精神，則可以從血泊中放出其光彩。司馬遷曰：「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紀，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如司馬遷者，誠爲中國史上俶儻非常的人物。

二 司馬遷的歷史方法——紀傳體的開創

司馬遷唯一的著作是史記。史記所敘述的範圍，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漢武之時。其內容爲本紀十二篇，書八篇，表十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司馬遷之著這部書，其用意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實際上這部書確是中國歷史學出發點上的一座不朽的紀念碑。

用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的體裁寫著歷史，這種歷史方法，即所謂紀傳體的方法。司馬遷的不朽，就是因爲他開創了這種前無先例的嶄新的歷史方法。

所謂紀傳體的歷史方法，即以人爲主體的歷史方法。此種方法，即將每一個歷史人物的事蹟，都歸納到他自己的名字下面，一個歷史人物如此處理，所有的歷史人物都如此處理，於是從這許多個別歷史人物的事蹟中顯出某一歷史時代的社會內容。史記就是用這種歷史方法寫成的一部漢武以前的中國古史。

在史記中，本紀，世家，列傳都是以人爲主體而記事的。本紀記皇帝，世家記貴族，列傳記官僚士大夫等。雖作爲其主題之人物的政治地位不同，但其皆以人物爲記事的主體則是相同的。或曰，在史記中亦有總述文物制度的書，及排比年代關係的表，這都不是以人爲主體的。但我們知道，在史記一百三十篇中，本紀世家列傳共佔一百一十二篇，書表合計只佔十八篇，故知史記是以紀傳爲本體，至於書則不過是史記的總論，表則爲史記的附錄而已。

紀傳體的歷史，以今日科學的歷史眼光看來，自然還是缺點甚多。這種方法最大的缺點，就是要把一件史實割裂爲許多碎片，錯陳於各人的紀傳之中，而且同一史實，到處重複。例如司馬遷下腐刑事，在司馬遷傳中必紀，在李陵傳中也不可不提。同樣李陵降匈奴事亦然，這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在司馬遷的當時，他能開創這樣一個歷史方法，是值得讚嘆的。因爲在當時，所有的古史資料，都是一盤散沙，正像一些破磚亂瓦泥在一堆，需要有一個分類的歸納，而紀傳體就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司馬遷能夠開創這樣一個方法，并且用這個方法「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把漢武以前的古史，歸納到一百多個歷史人物的名下，「自成一家之言」，這如果不是有過人的史學天才，是不可能的。

近人或以爲紀傳體的歷史，簡直就等於家譜或墓誌銘的彙編。誠然，司馬遷的學生——班固在內——的著作，確有此種傾向，但司馬遷的史記，並不如此。

從史記中可以看出，被司馬遷紀傳的歷史人物，並不是毫無歷史價值的人物，而是可以從他的歷史行爲中，透露出一些有關於他的歷史時代之社會內容的人物。簡而言之，即能特徵歷史時代的人物。例如他紀五帝，是因爲這些神話人物可以暗示出中國史前社會的若干內容。他之傳孔孟及莊老申韓等，是因爲從他們的言論中，可以顯示出先秦諸子學說的分派。他之傳蘇秦張儀，是因爲從他們的政治活動中，可以指示出戰國末年的國際關係。一言以蔽之，司馬遷紀傳一個歷史人物，至少可以從這個被紀傳者身上，透露出若干歷史的消息。所以當他寫完了一百一十二篇人物紀傳以後，漢武帝以前的中國古史，便第一次放出了光明。

司馬遷為甚麽要把紀傳體的歷史，別為本紀，世家，列傳，而又再益之以書表？這不是隨便的劃分，而是一種嚴謹的部署。從這種分類，我們可以看出他第一步是將他所選定的歷史人物，依其政治的或社會的地位之不同而別為三類，即以帝王為一類，貴族為一類，官僚士大夫等又為一類。然後分別為帝王寫本紀，為貴族寫世家，為官僚士大夫等寫列傳。於是把所有的破碎的零星的史料，分別歸納於這三類的人物的名字之下，使之各成系統。但是人各一傳，沒有相互的聯系，於是又為之書，總述這一時代社會文物制度的演變，以為紀傳的總論。尙感不足，又益之以年表，排比人與人，事與事間之時代的順序，以為附錄。

司馬遷之作本紀，據其自序中云：是為了追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用近代語說，就是要從王朝的更替，帝王的嬗遞中，提綱挈領，表現出整個歷史發展的線索。換言之，即用本紀作為全書的提綱，指明歷史發展之具體的過程。

即因如此，所以本紀的任務，是要顯出史實發生和發展之時間的順序。因而本紀在體例上，雖以史實分別系於各個帝王，即以事系人。但在內容上，又要將某一帝王之事，依次系於其年。換言之，本紀的作法，是既將其人之事，系於其人，又要將其人之事，系之以年。所以本紀，是紀傳體與編年體之混體。

亦因如此，所以本紀雖為帝王的專傳，但並不能詳記帝王個人的瑣事，只能逐年記載在某帝某王時所發生的大事，否則混淆了他所要顯出的歷史發展的大勢。例如焚書坑儒，在秦始皇本紀中，僅記某年焚書，某年坑儒，說明甚簡略；而在李斯傳中，則敍述甚詳。又如漢武帝擊匈奴，在武帝本紀中，只記某年遣某某伐匈奴，而在衞青，霍去病及其他征伐匈

奴的將領的列傳中則對於每一個戰役皆有詳盡的紀錄。由此看來，帝王雖爲本紀的主人，但帝王本人在本紀中，只是被當作一個歷史時代的符號。

又因如此，所以寫本紀時，對於帝王，沒有選擇的自由，因爲他們之中的每一人，不論善惡，都佔領一個時間。聖如「堯」「舜」，固應爲之紀；暴如「桀」、「紂」亦必爲之紀；英武如秦皇漢武，固應爲之紀，昏暴如二世，亦必爲之紀。總之，凡屬帝王，必爲之紀。

雖然，亦有例外，有名非帝王而司馬遷亦爲之作本紀者，如項羽，失敗之英雄也；呂后，專政之母后也，司馬遷並爲之作本紀。何也？司馬遷曰：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

「惠之早殞，諸呂不台（怡），崇彊產祿，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之紀項羽，是因爲項羽在殺慶（宋義號慶子）救趙之後，曾爲諸侯所立，名雖西楚霸王，實即當時天子。在誅子嬰，背懷王之後，秦已滅而漢未興，支配這秦漢之際歷史時代的，實爲項羽。「天下非之」爲時人之主觀，「諸侯立之」爲客觀的事實，故司馬遷紀之。

司馬遷之不紀惠帝而紀呂后，是因惠帝未死以前，已爲虛君，即其既死，呂后實以母后而即于帝位。而且崇强諸呂，幾移漢祚。在漢高既死，文帝未立的歷史時代中，實際上之時代支配者，確爲呂后，故司馬遷紀之。

司馬遷之作世家，據其史記自序云：「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

上，作三十世家。」

由此看來，世家所錄的人物，都是接近歷史動力的人物。他們對於當時的歷史中心，正如列星之拱北辰，衆輻之於車轂，「忠信行道」環繞在歷史中心的周圍。這些人物，自然，非割據一地的貴族，即執政一時的輔相。總之，他們不是支配過某一局部的空間，便是支配過某一短期的時間。

只要是割據一地或執政一時者，司馬遷皆爲之立世家。例如晉楚鄭趙魏韓等割據一地者有世家；蕭何，陳平，曹參，周勃，執政一時者亦有世家。禮讓如吳太伯者有世家，叛變如管蔡者亦有世家。周召二公，開國之元勳也，有世家；宋微子，亡國之貴族也，亦有世家。五宗三王，皇帝之子孫也，有世家；外戚，后妃之姻婭也，亦有世家。是知世家者，所以錄貴族，記卿相者也。（但有一限制，至漢高時代爲止）

然而亦有例外，有既非貴族，亦非卿相而司馬遷亦爲之作世家者，如孔子，魯之布衣也，陳涉，「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司馬遷皆爲之作世家。何也？司馬遷曰：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遂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於後世。作孔子世家。」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跡。諸侯作亂，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首難。作陳涉世家。」

從這裏可以看出司馬遷之列孔子於世家，是以孔子以經術達王道於當代，「垂六藝之統於後世」在文化思想上

所起的影響作用至爲宏大而悠遠。司馬遷之列陳涉於世家，是以陳涉首義事同湯武而義則春秋，在現實的歷史上所引起的變局至爲劇烈而重大。司馬遷認識了革命和文化的歷史意義過於王侯卿相的權力，所以他斷然列孔子陳涉於世家。

史記有列傳七十。自述中云「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從列傳中可以看出司馬遷所傳的歷史人物，不外如次的幾類。其一、以節操名於天下者，如伯夷田橫之輩。其二、以學術名於天下者，如孔孟老莊申韓董仲舒之輩。其三、以文彩名於天下者，如屈原賈誼司馬相如之輩。其四、以武功名於天下者，如白起王翦樂毅田單李牧蒙恬衛青霍去病之輩。其五、以文治名於天下者，如管晏商鞅呂不韋公孫宏之輩。其六、曾縱橫捭闔左右天下大局者，如蘇秦張儀之輩。其七、曾養士結客扶危救傾者，如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之輩。其八、曾風雲際會鞭笞天下者，如韓信黥布彭越之輩。其九、爲政以德恩澤及於人民者，如叔孫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之輩。其十、以醫藥方術拯救人命者，如扁鵲倉公之輩。此外，則爲怨毒積於人民之酷吏，如郅都寧成張湯趙禹之流，阿諛而無廉恥之佞幸，如鄧通韓嫣李延年之流。這些各種各樣的人物，大抵非官僚即士大夫，不論其或善或惡或賢或不肖，其所行爲，對於歷史皆有其或多或少或好或壞的影響，故司馬遷皆爲之傳。

雖然，亦有例外，有既非官僚，亦非士大夫，而司馬遷亦爲之立傳者。如卓氏，宛氏，任氏，市井子弟也，而司馬遷爲之立貨殖列傳。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匹夫之犯上者也，而司馬遷爲之立刺客列傳。朱家劇孟郭解，以武犯禁之暴徒也，而司馬遷爲之立游俠列傳。優孟優旃，以戲謔爲事之優倡也，而司馬遷爲之立滑稽列傳。司馬季主，長安東市之卜者

也，而司馬遷爲之立日者列傳。丘子明之流，供奉宮廷之巫祝也，而司馬遷爲之立龜策列傳。何也？司馬遷曰：

他之傳貨殖，是以其「取與以時，而息財富。」傳刺客，是以其「義不爲二心」。傳游俠，是以其「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不既信，不倍言」。傳滑稽，是以其「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以道之用。」傳日者，是以「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紀風俗也。傳龜策，是以「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誌迷信也。用近代語說，司馬遷之傳貨殖，刺客，游俠，滑稽，日者，龜策，是因爲從這各種各樣的人物身上，可以顯出歷史上的社會之各階層的人民的活動，從而顯出歷史之各個側面，而且這些人物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說明。

此外，司馬遷又替中國四周諸種族作傳，如南越，東越，朝鮮，匈奴，西南夷，大宛等均有傳。這是因爲這些諸種族，在當時與中國都有着戰爭或交換的關係。

本紀世家列傳以外，司馬遷又別爲八書。八書者，即禮書、樂書、律書、歷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司馬遷爲甚麼作八書？他說：「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由此可知八書之作，可以說是補紀傳之敝。因爲紀傳人自爲篇，割裂了社會文物制度一貫發展的系列，看不清社會文物制度「承敝通變」的大勢。於是別爲八書，揭事爲題，類聚而條分，原始而要終。有了八書，則自社會經濟基礎（平準河渠）政治制度（禮樂律歷）以至天文（天官）宗教（封禪）的演變過程，莫不提綱挈領，粲然大備。所以我說，八書是史記的總論。

史記有十表。司馬遷爲甚麼作十表？他說：「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又在「十二諸侯年表」序言上說：「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其

要難，作十二諸侯年表。」由此而知司馬遷之作十表，實欲指示歷史事實或人物的時間性。自十表作，於是上起「三代」下迄漢武之間，諸侯名臣之世系年代，遂一目瞭然。所以我說，十表，是史記的附錄。

十表在原則上，是以指示史實之具體的年代為目的，但亦有例外。例如於三代，則不紀年代，僅紀世系，而別之曰「三代世表」。又如於楚漢之際則不僅紀年而且紀月，又別之曰「楚漢之際月表。」是知十表中有三種形式，即世表，年表與月表，世表最略，月表最詳，而年表則為十表中之常規。

司馬遷何為於三代不紀年而紀世呢？他說：『五帝三王之事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缺，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不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迄共和為世表。」由此而知年代不可得而紀者，司馬遷決不亂抄不可靠的諜記而強為之紀，以求符合於其自己的公式。

司馬遷何為而於楚漢之際，不紀年而紀月呢？他說：「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即因「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興亡成敗，變化急劇，當此之時，一月之事，多於一年，故司馬遷不以年紀而以月紀，別作月表。

總上所述，因知史記一書是以紀傳為本體，以八書為總論，以十表為附錄之一部自成系統的歷史著作。

司馬遷把過去零碎散亂的史料分別歸類於各人之紀傳而演繹之，然後於八書中總其歷史時代的背境而作歸納

之敍述，最後，則於年表中，排比年代，以求從時間的關係上推求其彼此間之關聯。故歸納，演繹，排比，實爲紀傳體歷史方法構成的要素，而且表現的形式則爲紀傳與書表。

同時，在紀傳中，又以本紀爲綱領，而以世家與列傳演繹本紀的內容，使本紀，世家與列傳，構成無形的連鎖。然後再以全部的紀傳與書表相關聯。這樣，就構成了紀傳體歷史方法之整然的系體。

在述敍方面，於紀傳中，司馬遷已經把眼光注射到歷史上的社會之各階層人民的形形色色的活動，注射到歷史上的社會之每一個角落的種族，從社會的上層到社會的下層，從中國的本部到中國的四周，無所不紀。於八書中，他不僅注意到禮樂律歷，而且也注意到平準、河渠，注意到天官、封禪，從經濟、政治乃至意識諸形態，無所不書。於十表中，他已經知道詳者紀月，次之紀年，又次之紀世，從三代下迄漢武，其間諸侯將相，無不以次爲表。

余讀史記，不禁驚嘆在今日兩千餘年前的史學家，竟能創造如此周密的方法，其頭腦是何等的精細！眼光是何等的博大！

三　司馬遷的歷史方法二——紀傳體的活用

晚近歷史的研究，已經進入科學的階段，對於紀傳體的歷史方法，當然不能滿足。實際上，這種古典的方法，有一個最大的弊病，就是要把歷史割裂爲無數的碎片，令人只看見個個人物的活動，看不見人類社會的歷史之全面的運動，此

種弊病，雖有八書十表，亦不能完全補救。雖然，在司馬遷當時他並不是用紀傳體割裂歷史；反之，而是連串歷史。因爲在當時，並沒有整然有系統的歷史著作，擺在司馬遷的面前，讓他去任意割裂；只有片斷零碎的史料，散見於古典文獻之中，等待他去編纂。紀傳體的歷史方法，就是爲了連串這些零碎破碎的歷史資料而開創出來的。

紀傳體的歷史方法，有一定的公式，自然是過於拙笨。但是在這個方法的創始者運用起來，却能變而通之，神而化之。過細研究過司馬遷的歷史方法的人，就會知道他之運用紀傳體的方法，正如騎着一匹不羈之馬，縱橫馳騁，無往而不適，無適而不可。

司馬遷能夠發明紀傳體的方法，也能駕馭他自己所發明的方法。他決不用公式來擺布歷史，而是用歷史去活用他的公式。他唯一的活用方法，就是依據具體歷史的資料，而或爲專篇，或爲合篇。

首先，就本紀而論，本紀在原則上，是以帝王名篇，卽一個帝王一篇本紀。但是司馬遷於夏以前的傳說時代，則五帝合爲一紀。於夏，於殷，於周，則合一代的帝王，幷爲一紀。於秦則一代分爲兩紀，而兩紀所分配的帝王又不平均。於始皇以前，則合所有秦代的先王爲一紀；於始皇二世，則二人合爲一紀。而始皇二世的合紀，又以始皇爲主，二世爲附。自秦以後，項羽、漢高、呂后、孝文、孝景、武帝，才是一個人一篇專紀。由此而知本紀並不繩於一人一紀的公式，而有其活用之變體。

本紀何爲而有此變體？非常明白，司馬遷的原則，是事少者記略，事多者記詳，事詳者，則一個帝王爲一紀；較略者，則一個朝代爲二紀，更略者，則一個朝代爲一紀，最略者，則五帝合一紀。五帝者，卽特徵中國史前社會中某一階段的五個

神話人物所以五帝合一紀，就是把整個史前時代合爲一紀。

司馬遷說過「五帝三王之事尙矣」「尙矣，」就是遙遠的意思。當時對於遙遠的古史雖亦有傳說，但據他實地考察的結果，各地所傳不同。當時學者雖亦多稱五帝，百家雖亦曾言「黃帝，」但「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而「儒者或不傳」。司馬遷對於當時流傳之古史的傳說，完全抱着懷疑的態度，所謂「疑者傳疑，蓋其愼也。」他於其所致疑者，皆曰「尙矣，」曰「不可紀已，」曰「靡得而記云」。例如他攷曆法，則曰：「神農以前尙矣。」攷龜策則曰：「唐虞以上，不可紀已。」攷平準，則曰：「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云。」攷諸侯世系，則曰：「殷以前尙矣。」如果要他相信，除非與古文相合。他說：「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他說在古文中，雖然「書缺有間矣，」而「尙書載堯以來」是以「虞夏之文，尙可知也。」至於「虞」「夏」以前，則於傳說中「擇其言之尤雅者」以爲史料。因爲史料不多，所以於整個史前時代，並爲一紀。

至於「夏」殷的史料，孔子已不能攷，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自孔子至司馬遷，其間並無新的史料發現，而且經過秦始皇一度焚書，故孔子之所不得而徵的史料，司馬遷亦不能徵之。因此，司馬遷對夏殷兩紀僅就傳說錄其世系而不紀年。若周代史料雖有詩書可徵，然史料亦簡略，且自共和以前，年代尙不可紀，何況其詳。所以司馬遷於「夏」於殷於周，皆幷一代的帝王爲合紀。

秦之先世，出自西羌，春秋時，尙不與于中國之盟會。其時代既屬遠古，而活動範圍，又僻在西陲，亦無詳細論著之歷史資料，故亦幷爲一紀。至於始皇，則秦族已統一中國，典章制度，人物活動，其錄於文書，流爲傳說者至多。但秦代的歷

史至二世，已成尾聲，史實不多，不能自成一紀。所以司馬遷於秦代則分二紀，其一紀，紀秦之先王，其一紀，紀始皇而附以二世。

自楚漢之際至於漢武，則爲司馬遷之近代，有若干歷史事實，都在司馬遷的眼前繼續發展，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無所往而非史料。當此之時，一個帝王的史料，多於「夏」殷周一代的史料，乃至整個史前時代的史料，故司馬遷一帝爲一紀。由此看來，司馬遷決不略其所詳，而詳其所不詳，以維持其一個帝王一篇本紀的公式；反之而是依據史實的繁略，以變通其公式。

其次，說到世家。世家，在原則上，是以諸侯之始封祖先或輔相名篇，亦以一人一世家爲正規。前者如於吳則以太伯名篇，於齊則以太公名篇，於魯則以周公名篇，於燕則以召公名篇，於衛則以康叔名篇，於宋則以微子名篇，於越則以勾踐名篇。後者如蕭何、曹參、陳平、周勃等，皆以人名篇，而且皆係一人一世家。但是司馬遷於陳、杞、晉、楚、鄭、趙、魏、韓等世家，則以其封國名篇，換言之，即幷一個封國世代的諸侯合爲一篇世家，是世家的寫法也有變體。

世家何爲而有變體？顧名思義，我們可以想到世家的主要任務，是在敍述諸侯的世系，即對貴族作集團的描寫。集團的描寫，必須要有一個鮮明的主題，如某一貴族的始祖，係一有名的歷史人物，則以其始祖名篇；如其始祖，來歷不明，或來歷雖明而無史實可紀，則以其封國名篇。

例如吳之太伯，齊之太公，魯之周公，燕之召公，衛之康叔，宋之微子，越之勾踐，都是有名的歷史人物，其史蹟亦多流傳於當時。他們有値得大書的歷史價値，有可以詳書的歷史資料，故司馬遷用以爲標題，以爲一篇的主幹，而以其後裔附

之。如此，則輕重自分，世系自明。

至於陳、杞、晉、楚、鄭、趙、魏、韓等則不然，此諸國貴族的始祖，或爲傳說中的人物，來歷不明，或來歷雖明而史料簡略，不能當作一個主題的人物，所以就合其世世代代的子孫，平行敍述，爲之合爲一個世家，而以其封國名篇。

例如史記陳世家記陳之始祖曰：「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至於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胡公卒……」

杞世家記杞之始祖曰：「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

楚世家記楚之先世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

趙世家記趙之先世曰：「趙之先，與秦同祖，至仲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名其一曰惡來，……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

魏世家記魏之先世曰：「魏之先，畢公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代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獻公之十六年……以魏封畢萬。」

韓世家記韓之先世曰：「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

像陳胡公，杞東樓公，楚季連，趙季勝，魏畢萬，韓厥之流的人物，有無其人，都大成問題，何能以之作爲其世家的主題呢？他若鄭之始封諸侯桓公友，晉之始封諸侯唐叔虞，雖來歷較明，但史蹟甚少，故亦不能以之名篇。

或曰，陳杞不說，但晉獻公，楚文王，趙簡子，韓康子，魏桓子，都是有名的歷史人物，何以不以其人爲其世家的標題呢？但是我們知道以上諸人都不是始封的諸侯，他們都是發跡於中世，若以中世的諸侯爲其世家的主題，則首尾倒置，先世不明，故雖係有名的歷史人物，亦不能以之爲主題。

在世家中除以封國爲單位合爲一篇者，又有以血統爲單位合爲一篇者，如五宗世家，三王世家，就是例子。此外又有合兩個封國而并爲一篇者，如陳杞世家，荆燕世家，就是例子。

最後，說到列傳。司馬遷寫列傳，更表現他對方法運用的活潑。如前所述，他首先把他所選定的列傳中的人物，不管異代同時，先依其人的性質類而別之爲若干組。然後再次其先後，別其輕重，定其主從，或作專傳，或作合傳。

在史記列傳中我們可以看出凡司馬遷作專傳的歷史人物大概不是他認爲這個人物事蹟獨特，沒有可以與他類聚的，便是這個人物史實豐富，非專傳不能詳其平生。如伍子胥，商鞅，皆作專傳，就是因爲他們的事蹟獨特。如孟嘗君等四公子，本爲同一類型的人物，可以爲合傳；韓信，彭越，也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可以爲合傳；樂毅，田單等也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可以爲合傳，但都不作合傳而各爲專傳，這就是因爲他們的史實豐富。把這些人獨立起來作一專傳，而將與他們有關的若干史實和人物附麗在他們的專傳中，則可以透明一個歷史側面。若與人合傳，反而失去了敍述的重心，所以寧爲專傳，不爲合傳。

史記中的合傳，也有各種各樣的體裁。有兩人平等並列，合爲一傳者，有多人平等並列，合爲一傳者，有以一人爲主，一人爲從，合爲一傳者，有以二人爲主，多人爲從，合爲一傳者。不論怎樣合法，要之凡合爲一傳的人物，非其性質相同，即其歷史行動有相互的關係。

兩人平等並列爲一合傳者，如管晏合傳，孫武吳起合傳，屈原賈誼合傳，扁鵲倉公合傳，都是因爲他們的性質相同。如張耳陳餘合傳，魏豹彭越合傳，都是因爲他們的歷史行動，有相互的關係。

多人平等並列合爲一傳者，如老莊申韓合傳，是司馬遷以爲他們同是道家。仲尼弟子七十七人合傳，是以爲他們同是儒家的門徒，而又同時並世，在生活上有其相互的關係。此外刺客，儒林，游俠，貨殖，滑稽，日者，龜策，酷吏，循吏之各爲合傳，而且這些合爲一傳的人物，又生不同時，這就是因爲他們是同一類型的人物。

以一人爲主，一人爲從而合傳者，如伯夷傳而從以叔齊，是以其爲兄弟，而又同以身殉於殷代。以二人爲主多人爲從而合傳者，如孟荀合傳，而從以淳于髡，愼到，騶奭，這是因爲他們同是戰國時代的學者。又如衛青，霍去病合傳，而從以公孫賀，李息，公孫敖，李沮，張次公，蘇建，趙信，張騫，李蔡，曹襄，韓說，郭昌，趙食其，荀彘，路博德，趙破奴，這是因爲他們都是武帝時代北擊匈奴遠征西域的將領。

此外，在列傳中尙有以種族名篇者，如南越，東越，朝鮮，匈奴，西南夷，大宛等傳，這是司馬遷以爲他們都是蠻夷。實際上，司馬遷當時雖然這些四周諸種族與大漢帝國都有或多或少的關係，但對於他們種族內部的情形，還是不大明瞭。例如他對西南夷的君長，僅能說「以什數」，「以什數」，至於他們內部的人物活動，更不知道，所以不能寫出外國人物

的列傳，只有以種族爲單位寫出其種族的集團活動。如果南越王佗，不如司馬遷所云是眞定人，那麼，在史記中就有一篇外國人的列傳。

總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之運用紀傳體的方法，是何等的活潑！他就用這樣的方法，寫成了一部有名的史記。卽因他在紀傳與紀傳之間建立了一些無形的關聯，所以史記，折開看是許多個人的歷史，合攏來看簡直是一部漢武以前的中國通史。

四　司馬遷的歷史批判——「太史公曰」

司馬遷的不朽，固在於他開創了一種新的歷史方法，同時，也在於他所寫的史記，不是一部人物紀傳的彙編，而是一部富有靈魂的著作。換言之，史記不是一部死板的紀述的歷史，也是一部生動的批判的歷史。

從史記中，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司馬遷在大膽地進行他的歷史批判。他敢於指斥帝王，貶抑權貴；敢於歌頌叛逆，同情貧弱。一言以蔽之他敢於揭發歷史的黑暗，抨擊人類的罪惡。他帶着一支禿筆，走進中國歷史學的領域用他敏銳的眼光，正義的觀感，生動的筆致，沉重的言語，縱橫古今，褒貶百代。在他的筆底，不知有若干黜廢的賢聖，失敗的英雄，俠義的豪傑，市井的浪人，放出了光彩；在他的筆底，不知有若干暴虐的帝王，荒淫的貴族，殘酷的官吏，貨殖的豪富，現出了原形。

司馬遷執行他的歷史批判，有各種形式，概而言之，不外四種。一用標題，二用書法，三於敍述中夾以批判，最後而又是最重要的，則爲各篇之後的專評，即「太史公曰」之下的文章。「太史公曰」就是司馬遷設定的歷史審判的法庭。

用標題執行批判的例子，前已略論。例如列項羽於本紀，就是尊項羽爲帝王。列孔子陳涉於世家，就是崇孔子陳涉爲王侯。紀呂后而缺惠帝，並非抹煞惠帝，而是所以深罪呂后之專國。又於在列傳中，對於一般的人物列傳，都以其人之名標題，而獨於儒林、刺客、游俠、貨殖、循吏、酷吏、佞幸、滑稽、日者、龜策則以其人之行爲標題，這就是提示作者對以上各類人物的態度，暗示抑揚之意。

用書法者，如書孔丘則不名，曰：「孔子，生魯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書孟荀，則直稱其名，曰：「孟軻，鄒人也。」「荀卿，趙人也。」同樣書老莊亦不名，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莊子者，蒙人也。」書申韓則直稱其名，曰「申不害者，京人也。」「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書孫武，則在名與不名之間，曰：「孫子武者，齊人也。」書吳起，則直稱其名曰：「吳起，衛人也。」像這樣的書法，正是不說話的批判，他之不書名是表示他對於其人的最大尊崇，書名，是表示他對於其人並不如何尊崇。

史記中有於敍事中夾以批判者，如平準書末載卜式語曰：「縣官當衣租食稅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王翦傳末載客語曰『或曰「王翦，秦之名將也，今將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趙，擧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翦已三世將矣。」』荊軻傳末載

魯勾踐之語曰：「嗟夫，惜哉！其不講於荊軻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鼂錯傳末載鄧公對景帝之語曰：「夫鼂錯患諸侯强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劃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田蚡傳末載武帝語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又曰：「君何不遂取武庫！」這些，都是借用他人的言語，在敍事中兼示批判。

此外亦有用自己的言語，在敍事中順便批判者，如衛靑傳中有曰：「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平準書中有曰：「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縱，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以上都是一種暗示，更有於敍事中直指者。如馮唐傳云：「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郞。遂字王孫，亦奇士。」外戚傳云：「衞皇后字子夫，生微矣。」以上不過略舉數例而已，此種批判的言語，充滿史記各篇。

最後說到「太史公曰」「太史公曰」是司馬遷負責的批判，也是史記一書的靈魂。司馬遷在這里「貶天子，退諸侯，斥大夫」「別嫌疑」「明是非」「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執行他對歷史人物的裁判。

關於「貶天子」者，例如司馬遷對秦始皇，二世，都有不好的批評。他評秦始之語有曰：「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秦王之心，以爲關中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景從，遂羣起而亡秦族矣。……何也？仁義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他評二世有曰「二世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困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

司馬遷不但對前代的帝王有貶辭，對本朝的帝王乃至對他的當今皇帝，亦有微詞。不過他說「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襄之間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但是司馬遷並沒有照孔子的辦法，他的評語，還是直斥。

例如在叔孫通傳評漢高祖曰「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這就無異說「謀計用兵」以外，一無所長。呂后紀評呂后曰「故孝惠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這就無異說「牝雞司晨，惟家之索。」馮唐傳中借馮唐之語評文帝曰「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其評景帝殺鼂錯之誤，已如前述。

司馬遷評武帝更爲大膽。他在封禪書中譏諷武帝惑鬼神，求神仙，迷巫祝，信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方士，以求換取不死之藥，但結果也只是白送了一個女兒而已。在平準書中他譴責武帝因勤遠略，弄得天下蕭蕭然，民窮財竭。結果賣官爵，發皮幣，專鹽鐵，算舟車，稅緡錢，民不堪其命。平準書中有曰：

「自是以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

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司馬遷亦曾退諸侯斥卿相。例如評梁孝王曰：「梁孝王植其貨財，廣宮室，車服僭于天子，然亦僭矣。」評絳侯周勃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評武安侯田蚡曰：「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日月之際」者，即裙帶關係也。評相國蕭何曰：「蕭相國于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依日月之末光」者，即攀龍附鳳也。評相國曹參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韓信）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以與淮陰侯俱」者，冒淮陰侯之功也。

司馬遷對於草菅人命，蔑視人權的酷吏極爲痛恨。他評酷吏傳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酷烈爲聲。……然此十人者，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司馬遷對於佞幸之徒，極爲鄙棄。他在佞幸傳中開始便說：『語云「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他說鄧通「其衣後穿，」可謂譏矣。最後評佞幸傳曰：「甚矣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司馬遷對於宦官亦甚卑之。他在報任安書中說：「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衞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司馬遷對於「財或擁萬金而不救國家之急」的商人也最爲輕視。例如范蠡本是越國的大夫，因爲他曾「治產積居」故不列之於官吏而列之於貨殖。子貢本是孔子的門徒，因爲他「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故亦不列之於儒林，而列之於貨殖。列之於貨殖者，賤之也。司馬遷評貨殖傳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在這里，司馬遷又連帶指斥那些假借政治權力而經商的貴族官僚了。

在另一方面，司馬遷對於古來黜廢的賢聖，則爲之讚嘆惋惜。例如他於伯夷叔齊，則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沒而不稱，悲夫！」於孔子則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於屈原，則曰：「悲其志。」於賈誼，則曰「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馬遷最大膽的地方，就是他敢於當着劉邦的子孫，讚美項羽，因爲讚美項羽，就等於貶抑劉邦。司馬遷評項羽曰：「羽非有尺寸，乘時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王諸侯，政由羽出，號稱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和讚美項羽一樣的大膽，司馬遷又歌頌陳涉。陳涉在封建統治者看來正是一個有名的叛逆，歌頌陳涉，就是歌頌叛逆。但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却把陳涉的起義比之湯武的革命，孔子的作春秋。在陳涉傳的評語上又說「陳涉雖

已死，其所置遣侯王，竟亡秦，由涉首義也。」同時，又在儒林傳序言中指出當陳涉起義之時，雖聖人之徒，也去參加他的革命營陣。他說：「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陳涉俱死。陳涉起匹夫，旬月而王楚，不滿半載，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這段話，雖然是對焚書坑儒者的一個警告，也是指明陳涉的革命，雖縉紳先生之徒，亦往委質爲臣的事實。

此外，司馬遷對於韓信，黥布，魏豹，彭越，這些失敗的英雄，都不勝惋惜。他評韓信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殊幾乎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評黥布曰：「黥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抗興之暴也。」評魏豹彭越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捲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

司馬遷對於善良的官吏，亦爲之表揚。他評循吏傳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司馬遷對於草野豪俠之士，極爲讚嘆。他評刺客傳曰：「自曹沫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又於游俠傳序言中，特別申述其崇拜草野豪俠的理由曰：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於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

身空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阨。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時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於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在封建皇帝之前，直言極諫之士，往往遭橫禍，於是而有善良之士以滑稽的態度，用戲謔的言語，以爲諷刺。這些人，有時「言談微中，亦可以解紛，」故司馬遷亦美之。他評滑稽列傳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大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偉哉！」

總觀以上所錄的評語，我們便可以看出司馬遷之所善與所惡，所賢與所賤，所是與所非；因而也就知道史記一書，不僅是爲了敍述歷史，而且也是爲了批判歷史；從而也就知道司馬遷之作史記，不是爲了清算古人，而是爲了要從古史中找出一些歷史教訓，教育他同時並世的人。他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中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這就是他作史記的用意。

即因司馬遷在史記中的批評，有些不合於封建的教條，所以後來班固批評他說：「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

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以蔽也。」班固對司馬遷的批判，大概都中要害，只有說他崇勢利而羞貧賤一點，是沒有看懂司馬遷作貨殖傳的意義。司馬遷之傳貨殖，不但不是崇勢利，而正是貶勢利，關於這一點，只要看他把范蠡子貢列於貨殖傳就可以證明。以後至於王允，則竟指史記為「謗書」，章實齋又為之辯護，謂其「折衷六藝，何敢於訕上哉！」我以為謂之「謗書」，則未免太過；謂其毫無批判當世之意，亦非司馬遷所能同意。誠如章實齋所云：「今觀遷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孝武之秕政，而司馬遷指出之，非「訕上」而何？司馬遷以無罪而遭大辱，當然有所憤慨。此種憤慨常見於言詞。例如評伍子胥傳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又在屈原傳中曰：「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即因司馬遷積有怨憤，所以發而為文，則氣勢蓬勃，熱力豐富，因而史記一書成為千古的傑作。所以雖「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

五　餘論——史料的搜集編製及其歷史觀

史記一書，因為充溢着作者的批判精神，後來的學者以為史記一書係司馬遷發憤之作，因疑其對於史實的紀述，不甚注意。例如班固就說過：「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言，甚多疏略，或有抵梧。」自宋以後，學者多因襲班固之說，在史記中吹毛求疵。如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中有史記正誤一篇，金王若虛有史記辨惑，明柯維騏有史記考

要，清杭世駿有史記考證，梁玉繩有史記志疑，邵泰衢有史記疑問。這些學者的著作，對於史記，雖亦各有發明之處，然大抵據經以證史，故其所疑者，未必可疑；其所正者，未必盡正。

我不是說司馬遷對於史實的敍述完全沒有疏漏或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以爲司馬遷的疏漏與自相矛盾，不是因爲他不注重史事或故意歪曲史實，而是因爲他在整齊百家雜說貫穿經傳遺文之時，千頭萬緒，精力有時不能顧及之所致也。據我從史記中所知，司馬遷對於紀錄史實，非常嚴謹。非根據古書，即根據訪問，從未隨便紀一事，傳一人。

其根據古書之例，如司馬遷作五帝本紀，自「唐」「虞」以下，則根據尚書，作殷周本紀，則根據詩經，他說：「書道唐虞之際，詩傳殷周之世，」故以爲根據。至於自「唐」「虞」以上，他一再聲明「尚矣」「尚矣」「不可紀已」，故紀此「尚矣」之時，則擇傳說中之「其言雅馴者」以爲資料。

對於上古史如此，對於周以來的歷史亦如此。如司馬遷作十二諸侯表，則曰：「見春秋國語」。作六國表，則曰：「太史公讀秦記。」作秦楚之際月表，則曰：「太史公讀秦漢之際（按即楚漢春秋）。」作惠景間侯者年表，則曰：「太史公讀列封（按即封建諸侯的檔案）。」作孔子世家，則曰：「余讀孔子書」。作仲尼弟子列傳，則曰：「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幷次爲篇，疑者闕焉。」作老莊申韓列傳，孟荀列傳，皆曾讀其人之書。作孫吳列傳，則曾讀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作屈原列傳，則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作賈誼傳，則曰：「余讀服鳥賦。」作陸賈列傳，則曰：「余讀陸賈新語十二篇。」作管晏列傳，則曰：「余讀管氏及晏子春秋。」一言以蔽之，載之經傳者，必據經傳；其人有著述者，必讀其人之書。但司馬遷亦非凡書皆信，如「黃帝以來皆有年數」之「牒記」，因與「古文咸不同乖異，」司

馬遷卽不以爲據。又如言怪物的禹本紀山海經，亦不置信。他在大宛傳評語中說：「故言九州，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司馬遷著史記，並非閉門造車，有若干史料，皆係身歷其地或親訪其人而得來。例如他作河渠書，則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矣哉水之爲利害也。」作齊太公世家則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作魏世家，則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的）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作孔子世家，則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間，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作孟嘗君傳，則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作信陵君傳則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訪侯嬴之遺蹟）。」作春申君傳，則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作蒙恬傳則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作淮陰侯傳，則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作樊酈滕灌列傳，則曰：「吾過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與他廣通爲（余）言高祖時功臣之興時若此云。」這些，都是親歷其地的例子。

還有親訪其人者。例如他作游俠傳，就曾訪問過當時的大俠郭解。他評游俠傳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

語不足采者。」又如他作李廣傳，亦曾訪問過李廣。李廣傳評語曰「余覩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詞。」司馬遷對於同時的人大半可以訪問者必訪問，不僅對郭解李廣二人爲然也。至不能見其人者則「視其友」。

司馬遷對於以前的古人大概有圖像者，必觀其圖像。例如留侯世家評語曰「余以其爲人計魁梧奇偉，至觀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所以他深以田橫沒有圖像遺留下來，不能狀其貌爲遺憾，由橫傳評語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此外，其史料亦有由友人轉述者。如項羽本紀云：「余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刺客傳曰：「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且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霍去病傳曰「蘇建語余曰。」

由此，可以證明司馬遷對史實的紀錄，並不是不注意。至於史記中所載史實仍有疏漏抵梧之處者，則是著作家所難免。而且有一部份是司馬遷所不負責的。例如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中出現了昭宣元成諸帝的年號，楚元王世家記地節二年之事，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司馬相如傳評語中出現了揚雄的名字等等，這些都是後人所竄非司馬遷之原作。

據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載，史記一書至宣帝時，始由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發表於世。以後流布，頗有缺失，班固所見者已缺十篇。但班固僅說「十篇缺」而未指明何十篇。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而顏師古則云：「序目本無兵書，張晏云亡失此說非也。」總之，史記是經過後人的纂補這是很明顯的因而其中有一部分錯誤歸纂

補者負責。

兩千年來讀史記者未有不盛讚司馬遷之文章者，誠然，司馬遷的文章眞是氣勢蓬勃，旣沉重而又飛舞。但無論怎樣，文章總是司馬遷的餘事。而且司馬遷也從來沒有在文字上去彫刻，他決不故爲深奧，作出一些讓他同時代的人看不懂的文章，以顯出自己的高深典雅；反之，他引用古文，多改爲漢代當時所通用的言語。例如他引尙書，決不照抄「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而是改爲「帝堯者，放勳」。如果司馬遷生在現在，他一定把這句話改爲「傳說中的堯皇帝，他的名字叫放勳。」司馬遷不學尙書，而後來的史學家偏要學史記，假如司馬遷死而有知，一定說：「這都是他不肖的門徒，只知模倣其皮毛，而不知師承其精神，見帝王則曰神聖，見革命的豪傑則曰盜賊，何其無恥也！」

司馬遷的文章之好，不在於筆調，而在於他善於組織史料。例如他傳伯夷，則錄其西山之歌，以顯其氣節；傳孔孟，則錄其言語，以顯其大道；傳老莊，則錄其著作以顯其學派；傳屈賈，則錄其詞賦，以顯其文章；傳儒林，則錄其師承，以顯其淵源；傳管晏，則錄其政績，以顯其文治；傳田單樂毅，則錄其戰伐，以顯其武功；傳蘇張，則錄其游說，以顯其縱橫；傳貨殖，則錄其財產，以顯其富厚；傳刺客，則錄其敢死，以顯其慷慨；傳游俠，則錄其重諾，以顯其俠義；傳滑稽，則錄其笑噱，以顯其諷刺；傳佞幸，則錄其賣身投靠，以顯其下流無廉恥。總之，他對於每一個紀傳的人物都能抓住他的特點，闡揚他的特點，使這個被紀傳的人物，躍然紙上，蕭疏欲動。例如他寫刺客，不但從紙上飄起慷慨悲歌之聲，簡直是匕首當前，鮮血射面。像以上所述，就是司馬遷的文章之所以成爲千古的絕調，至若之乎也者，乃其餘事。

自然，我不是說司馬遷的史記完全無缺，例如他的歷史觀受了騶衍終始五德說的影響，而帶着歷史循環論的色彩

。他在高祖本紀評語中說：「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這就是說歷史的發展，卽忠敬文的循環。所以他在平準書評語中又說：「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變，一質一文，終（而復）始之變也。」此外他又替漢高祖作出一些赤帝白帝的神話，在封禪書中又徵引土德水德的受命之說。於是用赤白黑，配合忠敬文，再配合金木水火土，歷史就在金木水火土的相生與赤白黑，忠敬文的循環中，在司馬遷面前打圈圈了。雖然我們論一個人，總要根據他自己的時代，在司馬遷的時代正是五行說高張的時代，他怎能不受影響呢？假如我們以歷史的循論而責司馬遷，那就無異責備殷人不該信鬼。

自司馬遷開創了紀傳體歷史方法以後，兩千年來中國的歷史家都奉爲歷史學的正宗，凡寫著所謂正史都用這種方法。一部廿四史都是用紀傳體的歷史方法寫成的。一直到我們的今日凡達官顯宦死了以後，政府都還有一道「宣付史館立傳」的命令，足見司馬遷在中國歷史學上的影響之巨大而悠久。

但是司馬遷的學生，從班固算起，沒有一個能夠望其肩背的。中國的學者，往往以史記漢書相提並論，我以爲這未免太恭維班固了。班固充其量也不過是司馬遷的學生中比較高明的一個。他用司馬遷的方法寫成了一部西漢的歷史，而且關於武帝以前的歷史，連文章都是照抄史記的原文。如果說他在方法上有發明，那就是把司馬遷的「書」改名曰「志」。如果說他在歷史學上也有創見，那就是去掉項羽的本紀，將漢代的歷史上推於楚漢之際。取消陳涉的世家，把他降入列傳。還有就是加上了惠帝的本紀，辯護呂后的專政。所以若以漢書比史記，那眞是瞠乎其後矣。

現在歷史學已經進入了科學的階段，紀傳體的歷史方法，已經成了過去。但中國的歷史資料，大半都保存在紀傳體的歷史著作之中，爲了找歷史資料，我們應該知道紀傳體的歷史方法。同時我並且以爲卽使在我們今日，紀傳體的歷史，仍不失爲一種保存史料最好的方法，因略論司馬遷的歷史學，以說明紀傳體歷方法的內容。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論劉知幾的歷史學

一 劉知幾的傳略

自司馬遷以後，歷東漢魏晉南北朝，迄於隋唐，其間歷史學家，接踵而起。如東漢之班固，劉珍，荀悅，蔡邕；晉之華嶠，陳壽，孫盛，王隱；宋之范曄，徐爰；齊之沈約，裴子野；梁之蕭子顯，吳均，陳之謝昊，姚察；北魏之崔鴻，北齊之魏收，北周之柳虯；隋之魏澹，王邵，牛弘，王胄，唐之姚思廉，令狐德棻等這些人，都是有名的史學家。他們或身爲史官，職典紀載，或心存褒貶，私撰國書，其所著述皆能獨步於當代，擅名於後世。雖然這些史學家的勞績，最多亦不過保存史料而已，對於歷史學的方法，並沒有甚麽新的發明。自司馬遷而後，迄於唐代，在歷史學方法論上，有新的發明者，唯劉知幾一人而已。

劉知幾字子玄，徐州彭城人。生於唐高宗顯慶五年，卒於玄宗開元九年（西紀六六〇年——七二一年），年六十一歲。其生存之日，正是大唐帝國全盛時代。

劉知幾是漢代皇族的後裔，據他自己在「劉氏家史」上攷證，彭城諸劉，都是楚孝王囂的曾孫，居巢侯般的後裔。如果他要妄據「漢爲堯後」的僞說，他也可以說是聖王之後，但是他不要這樣虛妄的遠祖，而寧肯承認他的氏族是出

白陸紛。

劉知幾出生的家庭，是一個世祿之家。據舊唐書本傳云：「知幾，楚州刺史胤之族孫也。」劉胤之是一個學者，和史學家李百藥是最好的朋友。在唐高宗永徽中，曾任著作郎及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等撰成國史及實錄，並以此而封陽城縣男。後以年老不堪著述，才出爲楚州刺史（註一）。劉知幾之父親藏器，就是胤之的從兄之子。藏器亦有詞學，官至宋州司馬。生二子，長知柔，開元中，爲工部尙書，知幾即其季子（註二）。

劉知幾因爲家學淵源，自幼就開始博覽羣書。史通自敍有云：「余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授古文尙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遭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退講畢，即爲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二歲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解，以後未見其事，乞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誌，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以降，迄乎皇家實錄（唐代），年十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敍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這樣就奠定了他後來研究史學的基礎。

劉知幾的年紀漸漸長大，便要準備一種走進人生旅途的功課，即所謂應世之學。在唐代以科舉策士，詞章最爲重要，於是劉知幾遂不能專門讀史，而要同時效力於文學。自敍中云：「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

（註一）（註二）參看舊唐書劉胤之傳。

。」劉知幾天才放縱，不久便以文學知名於當世。舊唐書本傳曰：「知幾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自敍中亦云「余初好文章，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即因他曾經一度研究文學，所以又準備了他後來寫著歷史的技術條件。

卽因文學甚好，所以劉知幾「年登弱冠」便「射策登朝」。舉進士，並授獲嘉主簿。以後又調回京洛，服官中央。從這時，劉知幾便放棄了文學的揣摩，專心於史學的研究。自敍中云：「於是思有餘暇，復遂本願。旅游京洛，頗積年歲，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這樣，又加深了他的史學素養。

劉知幾不僅學習不倦，而且理解力甚强。他自幼讀史，便不僅徒事記誦，因襲陳說，而是要通過自己的理解，加以批判。自敍中云：「余自幼觀書，喜談明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懷，非由習染。故在總角，讀班（固）謝（承）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人表』，後書宜爲更始（劉玄）立傳。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書，果以二史爲非。其所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已過立（三十歲），言悟日多。」

劉知幾情性孤僻，落落寡合。自敍中有云：「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惟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永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搉，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

劉知幾雖然性情孤僻，但並不高舉其自身於社會之外；反之，只要有機會，便要檢舉社會的罪惡，指斥當代的弊政。新舊唐書皆載，當證聖初，武則天詔天下九品以上官吏各言時政得失，他便上書指陳當時的政府，刑戮太過，賞罰不公。其中有云：「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腕脫之諺。」同書又載，他以武則天時代「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爲趨進而多陷於刑戮，」曾作思愼賦以刺時。當時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嘆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

大約在四十歲以後，劉知幾才任史官。舊唐書本傳云：「（武后）長安（年）中（七〇一——七〇四年），知幾累遷左史，兼修國史。」以後，又「擢鳳閣舍人，修史如故。」「（中宗）景龍初（七〇七年）再轉太子率更令，依舊修國史。」以後，劉知幾的生活，就永遠消磨在史館中了。

劉知幾既任史官，可謂學得其用。他常常想把他的歷史學創見，應用於國史的編修，但是事實並不如他所想。因爲當時的史館組織，是「監修制度」，史官注記，必須仰承監修的意旨，沒有撰著的自由。而當時的監修，大半爲毫無智識的貴官，他們既不知明立科條，又喜遇事干涉，十羊九牧，無所適從。同時，當時同列的諸史官，又皆流俗之輩，但卻「人自以爲荀（悅）。袁（按山）家自稱爲叔駿（華嶠），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白首可期，而汗靑無日。」加之權貴干涉，偵探密佈，史官每有所記，「言未出口，而朝野俱知，筆未棲毫，而縉紳咸誦。」實錄，則取嫉權門；直書，則見仇貴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劉知幾與諸監修及同事，當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尤大爲史官所嫉。」

但劉知幾却素抱刋削史籍的宏願。自敍中說「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以降，迄於姚（察）李（德林）令狐（德棻）顏（師古）孔（穎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行夫子之事，恐將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即不得志於史館，於是於「載筆餘暇」開始其有名的著作史通之寫著。自敍中說「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余者，故退而著史通，以見其志。」由此看來，史通一書，亦劉知幾「道不行」「志不遂」「鬱怏孤憤」之所爲也。

爲了寫著史通，劉知幾很想擺脫史館的職務。恰好當景龍之初，中宗西還，於是他便請求留在洛陽。他在洛陽住了兩年，這時，全部精力皆用於史通的寫作。但是不久便有人說他身爲官吏而私自著述，所以景龍三年，中宗使驛召他到長安，升爲祕書監，仍派他修撰國史。

當他再回史館時，「侍郎韋巨源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這些監修貴官，意見不一，當時「楊令公（再思）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楚客）則云宜多隱惡。」以是史官更難着筆。劉知幾深感其弊而無可如何，適蕭至忠貴其「著述無課」，於是他就上書於蕭，請辭史官之職。在辭職書上列陳當時史館之弊，並謂這些弊端如不革除或補救，則「雖威以刻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欲勒成國史）終不可得也。」（註）辭職書並沒有批准，但從此以後，愈爲同列史官所嫉，不能有所作爲。於是他索性將史館的職務委託於著作郎吳

（註）劉知幾辭職書見舊唐書本傳及史通忤時篇。

覼，而自己則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攷」三卷，攷其氏姓之所自出。

這時，劉知幾的史通已經完成，聲名揚溢，朝庭也要利用他做招牌來裝點史館的門面，所以景雲中（七一〇——七一一年），便升他爲太子左庶子，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到玄宗開元初（七一三年）再升左散騎常侍。而其職務，則始終是修撰國史。到開元九年（七二一年）他的長子貺爲太樂令犯事流配。他爲他的兒子向執政訴理，玄宗聞而震怒，貶爲安州（註）都督府別駕，而這位大史學家到安州不久就死了。

吾人讀劉知幾書，而知其兼才學識三者而並有之，惜乎！任道其職而道不行，見用於時而志不遂，鬱怏孤憤，終至貶死。賢者委棄，千古同嘆，又豈獨劉知幾爲然耶？

（註）舊唐書地理志：「安州，隋安陸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爲安州。」安州，唐時屬淮南道，轄今鄂東皖西一帶。」

舊唐書本傳曰：

「知幾知掌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著述，甚爲當世所稱。禮部尙書鄭惟忠嘗問知幾曰：「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矣。……自夐古以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

二　劉知幾的著作思想及其歷史觀

劉知幾著述甚多，據舊唐書本傳云「知幾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曾）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氏系錄。論孝經非鄭玄注，老子何上公注，修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此外又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攷三卷及史通二十卷。在他的著作中，以史通一書，最爲不朽之作。

史通一書，分內外二篇，各十卷，合二十卷。內篇分三十九目，其中「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有目無文，今所存者，僅三十六目。外篇分十一目，其中「雜說」一目，折爲上中下三篇，共合爲十三目。這部書，是劉知幾的歷史創作，也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歷史方法論的巨著。

劉知幾之著史通，其主要目的，是在於糾正過去中國史學方法上的錯誤。故全書皆以批判的體裁，作爲寫著的方法，而其論點，則側重於歷史學方法。但除歷史方法以外，其所涉及的範圍，亦至爲廣泛。如其外篇中之「中官建置」，則論史官制度；「疑古」「惑經」「雜說」「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則皆係論歷史資料。總而言之，劉知幾在這部書中，可以說，對他以前的中國歷史學，作了一次總的清算工作。

劉知幾對於他的史通一書，曾經在自敍中作過這樣的介紹。他說：

「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學爲主，而餘波所及，

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呑千有。自（楊雄）法言以降（下至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劉邵人物志，陸景典語）迄於（劉勰）文心（雕龍）而往，固已納之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所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惜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也。猶冀後之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

即因史通一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故當時「悠悠塵俗，共以爲愚，」而「見者亦互言其短」。爲了答復當時流俗之徒的惡意批評，劉知幾曾作「釋蒙」以拒之。但當時也還有幾個知己賞識其書。據舊唐書本傳載「時徐堅深重其書，嘗曰『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即因史通不見重於當時，所以他在自敍中嘆曰「夫以史通方諸太玄，則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衡）陸（績）則未之知耳。」又在鑒識篇爲之慨曰「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旣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至若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値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但是事實並不如他所想像之惡劣，史通一書並沒有長期埋沒，在他死後不久，玄宗便派河南府至其抄寫以進，讀而善之，並因此而追贈他爲汲郡太守，工部尚書，賜謚曰「文」而這又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劉知幾的思想頗受王充的影響。他在自敍中盛讚王充的論衡。其言有曰：

「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轉茲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

案王充論衡有「問孔」「刺孟」之篇實爲儒家的一位叛徒，而劉知幾亦有「疑古」「惑經」之作，其思想亦頗謬於聖人。他在惑經篇中說：

「昔王充語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徵舊疑，增其親覺，（作惑經一篇）。」

他在惑經篇中，對於春秋之義，提出了十二個疑問，指出其虛妄者五端，大胆陳說，毫無顧忌。故劉知幾的「惑經」實卽王充「問孔」的續編。至於其「疑古」篇，則係非難尙書，但在序言上，亦指斥孔子。其言有曰：

「故觀夫子之刑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狄夷不存。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删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在于魯國，獨無其章。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

又如王充有「指瑞」「驗符」之作，指斥符瑞之虛妄，劉知幾在史通中，卽反對紀錄符瑞之五行志。書志篇曰：

「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審其體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任者仍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壁傳於鄭客，遠應始皇；臥柳置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雲舛侯，螟蛑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舊禭，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恆事，應彼咎徵。昊穹垂譴，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

於人，應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哉！」

又王充有「書虛」之作，謂竹帛上的文字，不可盡信，而劉知幾在「疑古」篇中，對於尚書所載的史實，提出疑問十點。他在結論上說：「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

從以上所舉各點，我們可以看出劉知幾的思想頗受王充學說的影響，他不迷信聖經賢傳，不迷信災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聖經賢傳，所以他就富有懷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災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他就在這種懷疑的精神與唯物的思想上，展開他的歷史觀。

劉知幾反對「歷史的定命論」，他以為歷史上任何朝代的興亡，人物的成敗，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雜說篇中說：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命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寵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兆其志；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檿弧箕服，彰於宣厲之年；徵褰與襦，顯自文武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做此，安得於魏無譏者哉？

「夫國之將亡也，如斯，其將興也亦然。蓋嬀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石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何

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震極矣乎？必如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

「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議」，虞世南「帝王說」，或敍遼東公孫之敗，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上文列擧史實，證明統治者的滅亡，是由於他們自己的罪惡，無能。不能把他們的滅亡，歸納爲上帝的意思。同樣，新的統治者的興起，也不是上帝預先派定，而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努力。一言以蔽之，人類的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與「上帝」「天命」這一類的鬼話，絕不相干。像這樣承認人類對歷史之創造作用的歷史觀，就正是劉知幾的歷史學卓越之點。

其次，劉知幾反對以成敗論英雄之正統的歷史觀。他在稱謂篇云：

「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揚善，其義安歸？」

在這里，他雖然只提出吳蜀的名號問題，而其主題則是反對那種「以勢窮者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的歷史觀。例如他深以班范二史，不列劉玄於光武之前爲非。他在編次篇中說：「當漢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

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光武稱帝於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錄，登文叔於紀首……夫東觀秉筆，容或諂于當時，後來所修，理宜刊革者也。」按劉玄爲新市平林所擁立，以中國正統派的歷史觀視之，實爲盜賊，而劉知幾主張列紀於光武之前，這就是「不以力屈者乃成盜賊」也。

雖然，劉知幾對於「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歷史觀仍未掃除乾淨。例如他反對列項羽於本紀，而曰「直可抑同盜賊」，反對列陳勝於世家，而曰「起自羣盜」。這又是他自相矛盾的地方。

又劉知幾甚至不主張「內中國而外夷狄」的大漢族主義的歷史觀。他在稱謂篇中說：

「竊以金行（東晉）板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曲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怛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成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主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

歷史是具體的科學，要承認客觀的事實，不能以主觀的愛憎塗改歷史的事實。劉知幾可謂深得此理。所以我說他是一個客觀主義的歷史家。

至於他敢於懷疑，則史料因以訂正，敢於非聖，則成見因以打破；這些都是他的科學精神。

三　劉知幾論中國歷史學各流派

劉知幾對於中國歷史學各流派，曾經展開一個全面的批判。他在六家篇中，把中國的歷史學派分爲六家。他說：

「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按「尚書」爲記言的史體，「春秋」爲記事的史體，「左傳」爲編年的史體，「國語」爲分國的史體，「史記」、與「漢書」均爲紀傳體，而前者爲通史體，後者爲斷代史體。這六種歷史學體裁，不是同時發生，而是中國歷史學體裁相續發展之系列，所謂「古往今來，質文遞變」的結果。

這六種體裁在最初都不過是各時代的歷史紀錄者用以紀錄史實的方法，但是後來的歷史學者，競相模擬，於是這六種歷史學體裁，遂演化而爲六種歷史學流派。

例如尚書本來是一種最古的歷史記錄方法，「自宗周既殞，其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但）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辭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書」「漢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祕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六家篇）

又如春秋，後來也有襲用其名以爲著述的。「如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其所著書，皆謂之「春秋」」。

左傳亦有擬作，如晉著作郎樂資曾撰春秋後傳三十卷，其書始於周貞王而終於二世之滅。獻帝時，荀悅著「漢紀」三十篇，亦依左傳體裁。以後每代都有擬作，如張璠，孫盛，干實，徐廣，裴子野，吳均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

「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其名雖異，但其爲體，則皆擬左傳。

國語體裁繼之者有國策。至孔衍又以國策所書之未盡者，聚爲一錄，名曰「春秋後語」。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著「九州春秋」。這些都是國語的流派。

其模擬史記者，則有梁武通史，崔鴻等所撰的科錄，及李延壽的南北史等。至於漢書，則所有中國的所謂正史，都是屬於這一流派。

中國的歷史家，大概不出這六種流派，即或稍有形式不同，但亦不過這六種體裁之變體而已。所以劉知幾把中國的歷史學派，分爲六家，大概是可以包羅一切的。

劉知幾在劃分中國歷史學的流派以後，然後展開其對各家的批判。其論尚書的體裁，則以爲其最大之缺點，就在於這種體裁的歷史中，對於人物的紀載，不能詳其平生，對於事實的紀律，不能詳其年月，而這些又都是歷史學上最重要之點。他在六家篇中說：

「若乃（尚書之爲體）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其次，他以爲尚書的體裁，既以記言爲主，就體裁論體裁，則不應於記言之外，有紀事的專篇，但尚書中竟有此種例外，這就是體例不純。六家篇說：

「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於「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

其論春秋的體裁，則認爲有長處也有短處。二體篇說：

「春秋者系日月而爲次，列歲時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

「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反之）其有賢如柳（下）惠，仁如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紀錄）之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紀錄）之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

其論左傳的體裁，認爲是一種最好的注釋體裁。他在申左篇說「（左）傳之與經（春秋），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需而成。」又說「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哉？」這種注釋體裁的優美之處，就在於他能補本文之缺略，而又不重複本文。六家篇說：

「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缺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其論國語，則認爲是春秋的外傳，但是它的特點，就在于「又能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寫成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歷史，上起周穆王，下迄魯悼公，自成一種分國爲史的體裁。故六家篇曰「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其論史論的體裁，在六家篇中，專說他的短處。他說：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在書表。每論國家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

為體之失者也。」

但在二體篇中則謂史記的體裁，有他的短處，也有他的長處。他說：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隱顯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

「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宜，前後屢出，（例如）於高（帝）紀，則云：「語在項（羽）」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人物）不求（其出生）年月，後生而擢居首秩，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

其論漢書的體裁，則謂與史記相同。六家篇曰：「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為「世家」，及改「書」曰「志」而已。」即因漢書的體裁，同於史記，所以史記的短處和長處也同樣表現於漢書。惟史記為通史體，而漢書則斷西漢一代以為史，因之漢書就沒有「疆宇遼闊，年月遐長」之弊。所以他在六家篇中說：

「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語甚該密，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以上乃劉知幾對中國歷史學各流派的批判，就史體論史體，可謂切中利弊。他在結論上說：「尚書等四家，其體反廢，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又在二體篇中說「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由此而

知劉知幾認爲最進步的歷史體裁，乃是編年體和紀傳體。這從歷史學發展的觀點上看來，也是對的。惟劉知幾於紀傳體中美漢書而抑史記，未免源流倒置，是其偏見耳。攷紀傳體確爲一種進步的歷史體裁，這種體裁，可以說是尙書等四種體裁之綜合。其中「紀」以編年，猶春秋之「經」也；「傳」以紀事，猶左氏之「傳」也；「世家」以分國錄諸侯，猶國語之分國爲史也；又嘗錄帝王之制詔命令，則又猶尙書之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也。一言以蔽之，這種體裁已並「編年」「紀事」「紀言」「分國」諸體於一書，別而裁之，融而化之，使其相互爲用，彼此相銜，以各家之長，濟各家之短，而又益之以表歷，總之以書志，卓然自成爲一種新的歷史體裁。但這種偉大的創造，是司馬遷的不朽之功，班固的漢書，不過史記的擬作而已，又安能望史記之肩背？

四　劉知幾論紀傳體的各部門

劉知幾在泛論中國歷史學各流派以後，於是集中其論點於紀傳體。他就紀傳體的各個部門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曆」「書志」「論贊」「序例」等，展開其批判。

他論「本紀」，提出了三點意見。第一，「本紀」所以紀天子，非天子不應列入「本紀」。因此他對於司馬遷之列周秦先世於「本紀」，認爲「可怪」；列項羽於「本紀」，認爲「乖謬」。本紀篇曰：

「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儻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

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此尤可怪也。

「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衞世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盜賊，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

其次，他以爲「本紀」所以紀年歲，顯國統，故無年號者不紀，無國統者不書，所以「魏志」曹傳，權假漢年；韋曜「吳書」，不紀孫和。蓋以其子孫雖爲天子，其祖先不能因之而亦稱天子。如其祖先亦稱天子，則當時固有天子，沒有歷史地位，可以安插這位追尊的天子。所以他反對把追尊的天子，寫入「本紀」。本紀篇曰：

「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系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追尊晉代的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無年可編，若必編年，則爲魏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

第三，他以爲「本紀」的體裁，是以事系年，而且專載大事，以顯示某一帝王時代的歷史大勢，不應把瑣碎的細事，寫入「本紀」。本紀篇云：

「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敍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彥淵）李安平（百藥）之徒，其撰（後）魏（書）（北）齊（書）二史，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

他論「世家」，也提出了三點意見。第一，他以爲「世家」所列的人物，必須有世可續，有家可承；否則即不應列於

「世家」。因此他以司馬遷列陳勝於「世家」爲不然。世家篇曰：

「「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

第二，他以爲「世家」所以錄諸侯，不應錄大夫。因此，他反對司馬遷錄三晉及田氏之先世於「世家」，而田完反沒其名號。世家篇曰：

「且諸侯大夫家國有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諸侯之大夫也），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又（田齊）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諸侯也）而沒其名號，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

第三，他以爲「世家」所列諸侯，應該是專制一國傳世甚久的古代諸侯，而徒有其名的漢代諸侯，則不應列入「世家」。世家篇曰：

「夫古者諸侯，皆卽位建元，專制一國，緜緜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臨彊埸。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司馬遷强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劃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

此外，他以爲還有一類人物，卽割據之君，「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亦宜列於「世家」。

他對於「列傳」提出了五點意見。第一他以為「列傳」所以列卿大夫，非卿大夫則不應編入列傳。因此他反對陳壽在三國志中列吳蜀二帝於「列傳」。列傳篇曰：

「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作者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吳蜀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攷數家之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

第二、他以為「列傳」主題皆係人名，如非人名，即不應列入。編次篇云：

「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第三、「列傳」中有「合傳」，但他以為「合傳」的人物必須同時並世，而其行事又首尾相隨，如「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這是可以的。至於以異代之人，列於一傳，如「漢之賈誼，將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荊軻並編」「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詡將荀彧同編」。這是不對的。

第四、「列傳」中有附出之例，但他以為這種附出的人物，必須「名行可崇」而又「事蹟甚寡」，不能獨立成傳，所以「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列於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若名行不可崇者，則無附出之必要。但「孟堅每一姓有傳，則附出餘親。其事跡猶異者，則分入他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姑婦分為二錄。」這也是不對的。

第五、他以為列事作傳，所以播其遺烈，顯其令聞。但「自班馬以降，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生無令聞，死無異蹟，

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這更有違「列傳」的本意。

他對於「表歷」根本反對。他以爲歷史應該用文詞寫著，而不應用「表歷」排列，而且史實既見之於文詞，又再列之於「表歷」，實爲重復。故他以爲截「表歷」於史傳，未見其宜。表歷篇曰：

「夫以表爲文，用於時事，施諸譜諜，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繁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詳。觀司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繁費，豈不謬乎？」

在「表歷」中，他最反對班固漢書所載「古今人表」。他以爲班氏的「古今人表」，既不表現國統的遞襲，又不表現祿位相承，只是品藻賢愚，激揚善惡，這實在不能表示一種連續的歷史意義。（雜說上）而且「人表」中所錄的歷史人物既非同出一族，又非同在一時，並且皆係漢以前的人物，以漢以前的人物而列於漢書，更是不倫不類。他在表歷篇說：

「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寫成一志），何藉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何斷而爲限乎？」

他以爲如必欲作表，亦只應適用於歷史上的紛亂時期，如春秋戰國及五胡亂華時代。因爲在這樣的時代，或羣雄

割據，各爲年世；或諸胡錯峙，自相君長。世變多端，史實複雜，若申之以表，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所以他以爲在史漢諸表中，惟「列國年表」或可存焉。」自此以後，則惟有崔鴻作表，頗爲切要。

他對於「書志」頗爲稱讚。書志篇曰：「紀傳之外，有所不書，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不過他以爲「書志」之中，有「妄入編次」，應予刪除者三，即「天文」「藝文」「五行」是也。亦有「事應可書」，宜予增加者三，即「都邑」「氏族」「方物」是也。

他之所以主張刪除「天文志」，是以爲天文變化不大，不如人事每代變易。書志篇曰：「夫兩曜（日月）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異。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故他以爲天文可刪。如必欲作志，則亦只應載其當代的日月之蝕，星宿移動，而不應重複天體之概論。

他之所以主張刪除「藝文志」，是以爲同一書目，「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故他以爲「藝文志」可刪，如必欲作志，則亦只應列當代撰者所撰之書，不應重複刊載前代之書目。

他之所以主張刪除「五行志」，是以爲「五行志」多載「虛說」「浮詞」「言無準的」「事涉虛妄」。如必欲爲志，亦只應記當代災異，不應追證前事，曲加附會。

反之，他主張增加「都邑志」，則以「京邑翼翼，四方所則……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又以「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所以他主張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

他又以爲各種方物，「或百蠻攸稅，萬國是貢，」古代皆有紀錄。如「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自漢代拓境四國來朝，各獻方物，而種類更多。爰及魏晉，迄於周隋，亦遐爾來王，任土作貢。此等方物與社會經濟有關，故凡爲國史者，宜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前。

他又以爲氏族關係血統，如「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廢所鍾百世無絕。」所以歷代亦有紀錄，如「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繁，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所以他以爲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志之下。

其論「論贊，」則謂後來的作者，都犯了以下的幾種弊病。

第一，不必論而强爲之論。論贊篇曰：「夫論者，所以辨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末各爲一論，（而冠以「太史公曰」。）必理有非要，强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自司馬遷而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經，」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弘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這些作者的史評大抵多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因而就不免有「私徇筆端，苟衒文彩」的弊病。

第二，重複本文。論贊篇曰：「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易言之，卽簡單明瞭，不重複本文。但後來作者，「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這就犯了重牀疊被的弊病。

第三，「論贊」重出。自班固於序傳中以詩體作「述，」范曄改「述」曰「贊，」以後每篇皆有一贊。「事多者

則約之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使大。」論贊篇曰：「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長，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

第四、論事不當。論贊篇曰：「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亮不逮管蕭，魏收謂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事，或擬非其倫。」這都犯了歪曲史實的弊病。

其論「序例」，也說後來的作者，犯了以下的兩種弊病。序例篇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故其爲體，宜「言詞簡質」「敷暢厥義」。但自遷固以後，華嶠而往，後之作者，皆「矜衒文彩」，忘其本義，「累屋重架」，不知所云。』這是第一種弊病。又說「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史例既立，則「科條一辨，彪炳可觀」，但是後來作者，往往紀傳的內容，並不依照史例，甚至背道而馳。這是第二種弊病。

以上是劉知幾對紀傳體的批判，這誠如他自己所云：「其所發明者多矣。」雖然，尺有所短，劉知幾亦有自相矛盾之處。

例如劉知幾論「本紀」，則曰：「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直可貶同盜賊」，不應列諸「本紀」。但在列傳篇中則曰「吳蜀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按吳蜀之於漢，猶西楚之於秦，都是割據的豪族。若必謂項羽爲僭盜，則劉備孫權，又何非僭盜？若必謂僭盜不可以爲紀，則又何以於吳蜀二帝之傳而曰「其實紀也」？此其自相矛盾者一。

又如他論「世家」，則曰：「陳勝起自羣盜」「無世可傳」「無家可宅」，不應列於世家。但題目篇中，又謂「平

林新市諸人應列爲載紀。」按新市平林諸人之於漢，亦猶陳勝吳廣諸人之於秦，同爲農民暴動的領袖，如必謂陳勝起自羣盜，則新市平林諸人亦起於羣盜。如必謂起於羣盜者卽不可列於「世家」，則何以又謂新市平林應列於載紀？此其自相矛盾者二。

又如他批評司馬遷列周秦先世於「本紀」，列三晉田氏先世於「世家」，則持規律以爲斷曰：諸侯不應列於本紀，大夫不應列於世家。但司馬遷列漢代諸侯於世家，於規律正相符合，而又持事實以爲斷曰「雖得劃一之宜，詎知隨時之義。」如持事實以爲斷，但項羽名雖霸王，而實同天子，司馬遷列之於「本紀」，並不乖謬。如持規律以爲斷，則漢代諸侯，不論是否專制一國傳世久暫，而名實諸侯，司馬遷列之「世家」，又不爲錯。劉知幾有時持規律以繩事實，有時據事實以反規律，此其自相矛盾者三。

又如他論「表歷」，則曰：「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但在雜說篇中則曰：「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敍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敍。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表歷」之用既如此其大，何以又說不宜列於史傳？此其自相矛盾者四。

此外如「天文志」，所以推歷數之變化；「藝文志」，所以溯文獻之淵源；「五行志」，所以紀災異之現象；而劉知幾皆謂可刪。凡此都是劉知幾評紀傳體的美中不足。

五　劉知幾論歷史學方法

「史通」一書，全部都是論述歷史學方法，但其中有一部分係泛論歷史學各流派，有一部分係專論紀傳體各部門。故這裏所謂歷史學方法，乃係狹義的歷史學方法，即劉知幾論怎樣寫著歷史的部門。關於怎樣寫著歷史，劉知幾論述最詳，但若總其要義，挈其宏綱，亦不外如次各點。

1. 論歷史學體裁

用怎樣的體裁寫著歷史，這是歷史方法論上的一個先決問題。劉知幾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了嶄新的見解。這就是說他堅決地反對摸擬已經廢棄了的古典體裁，主張應用當時流行的體裁。他在摸擬篇中說：

「語云『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敍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在這裏他指出歷史的體裁，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時發展的，學者不應以古爲高，妄事摸擬。若必欲摸擬，則其著述，必不能爲當代讀者所接受。他在六家篇中說：「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裁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所撰漢魏等（尚）書，不行於代也。」又說「君懋（王劭）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

孔子家語，臨川世說，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因此他以爲如必欲摸擬，亦只應師其立論命意而不應學其形式。摸擬篇曰：「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眞，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互同，若斯而已。」又說：「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眞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喩也。」

2. 論歷史學言語

體裁是歷史學的形式；而言語，則是歷史學的本體。因爲任何形式的歷史學，都必須藉文字來表現其內容。劉知幾在敍事篇中說「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正是說明這一意義。劉知幾以爲歷史雖係述古人之事，但並非寫給古人讀的，而是寫給當代之人讀的。因此他反對在歷史學上應用陳死的古代言語，主張應用作者當時流行的言語。他在言語篇中說：

「夫三傳之說，既不襲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國策；以驗氓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遂無遠識，記其當時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詞，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松山）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在這裏，他指出言語也是隨時演變的，未必古之言語優於今之言語。所以三傳不學尚書的言語，史漢不學國策的詞句，以今古不同，言語已變。然而自魏以前作者多效三史；自晉以降作者喜學五經；以爲如能學像了古人的言語文字，便可以向讀者證明他的典雅高古淵博，這豈不荒謬！所以劉知幾在言語篇中批判這些「擬古派」曰：

「夫天長地久，風俗無恆，後之猶今，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

把近代語改裝爲古代語，而以寫作歷史，已經是今古不分，眞僞相亂。而北朝諸史家又改夷語爲華語，再改近代的華語爲古代的華語，這就更使歷史的紀錄，失其眞實了。言語篇曰：

「崔鴻修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二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不實，過莫大焉。」

3. 論歷史學的編製

決定了體裁和言語，然後才能開始歷史學的編製。劉知幾認爲歷史學的編製，最主要的，是翦裁浮詞，削除繁文。（參看削煩點煩浮詞諸篇）他不主張在紀事體的歷史中，兼錄言論。因爲言論與事實夾雜，則敍事因之不能明晰。他在載文篇中說：

「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與）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擧，務存恢博，文詞入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止錄言，罕逢載事。夫方敍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後之讀者，有所惽然。……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凡人主之制册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册章表書。」

在這裏，可以看出劉知幾之不主張言與事雜書，是因爲這樣的編製，遮斷了敍事的連絡。除此以外，他又以爲史籍上所載的許多歷史文件，都是虛構，不但不能說明史實，反而殽混史實。他在載文篇中，列擧其例。例如他說在史籍中，常有「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又說在史籍中「凡有詔勑，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敍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又說「（在史籍中）凡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眥，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這些，都是「徒有其文，竟無其事。」若以這類虛僞的歷史文件，載之史籍，則「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之不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創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像這樣的歷史已經「非復史書，更成文集」了。所以劉知幾在結論上說：

「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眞實，亦可使乎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

4. 論歷史學的標題

編製的規律既定，這就要輪到題目了。劉知幾以爲假如書的內容是體，題目便是這個體的名稱，因此，題目必須要能概括書的內容。他在題目篇曰「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但是他以爲歷來的史學家往往對於標題一點，有些名不符實。

他說照一般的習慣，在史書中「其編年月者謂之紀，列紀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爲最也。」但是「呂（不韋）陸（賈）二氏各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系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尤多，而俱牓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歟？」

又如篇章之標題，亦須與其內容相合。但是「司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這些都是題不對文。

此外，劉知幾以爲題目的用處，在於提示內容，故其爲體，以簡明爲要。如列傳標題，人少者具出姓名，如「伯夷傳」。人多者唯書姓氏，如「老莊申韓列傳」。又人多而姓氏相同者，則結定其數，如「二袁」「四張」「三公孫」傳。但是到范曄便於題目中全錄姓名，其附出的人物，亦以細字列其名於主題之下。降至魏收，則更爲瑣碎。「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這些既已詳述於傳內，又重標於篇首，大失標題

的本意了。

5. 論歷史學的斷限

斷限，就是劃分階段的意思。但劉知幾所謂斷限，是指斷代而言。劉知幾以為既斷代為史，則在斷代史中只應記其所斷之代的史實，不應超越這個朝代的界限。但是他以為後之作者，並未嚴守紀律。例如班固漢書是斷西漢以為史，而「表志所錄，乃盡犧年。」又如「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又如「漢之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臧洪，陶謙，劉虞，公孫瓚，生於季末，不關曹氏，何「漢典既具，而魏冊仍編？」此外，如「沉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以上所舉，他認為都是斷代不清。

至於「夷狄本系種落所與，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勾驪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鬭徙居，諸如此說，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這些，他認為都是侵官離局，越俎代庖。

總之，劉知幾所謂斷限，其意即如係一代之史，則非本代之事不書；如係一國之史，則非本國之事不書。

6. 論歷史學的敘事

寫著歷史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敍事。劉知幾論敍事之要有三，即簡要，隱晦與確實。而最反對者，則爲因習。

他在敍事篇說「夫國史之美者，以敍事爲工，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但他所謂簡要，並不是略去史實，而是削去繁複。因爲自昔以降，史籍之文日趨繁縟。「作者蕪言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文體既如此繁縟，而敍事又多重複。例如劉知幾舉出敍事之體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贊論而自見者。此四種方法，用其一，即可暢敍事理，但後來作者，往往四者幷用，牀上架牀。所以劉知幾首先提出簡要的原則，正是對症下藥。

劉知幾以爲敍事不僅要工，而且要美。歷來史籍，敍事之美者，以春秋爲最，而春秋敍事之美，則在於「微婉其說，隱晦其文。」因爲這樣，文章使有言外之意。所以劉知幾以爲敍事之要，其次就是隱晦。他在敍事篇中說：

「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也。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別，而隱晦無異。……（其紀事也）皆言近而旨遠，詞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義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

敍事之要，尤在於眞切，然而後來作者，多以古事比於近事，古人比於近人，設喩不當，遂使史實失其眞切。劉知幾在敍事篇中，曾列舉此類例子，如云「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

」又云：「稱劉氏約貢則曰來獻百牢」；吳均齊錄，「敍元日臨軒必云朝萬國。」又云：「裴景仁秦記，記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百藥）删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攷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劉知幾以爲敍事之病，莫大於因俗前史之文。他在因習篇中曰：「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他又列舉實例以證明因習之弊。例如他說：

「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苗裔流祚東京者乎！」

又如他說：

「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司馬昭）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拆於宇文之朝，而李（百藥）刋『齊史』，顏（師古）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

7. 論歷史學上的書法

書法和紀事不同，紀事是敍述史實的原委；而書法，則是歷史家對史實的褒貶。歷史家執行褒貶之法甚多，但要而

言之，則不外直書與曲筆。直書者，即以明文嚴詞，直斥權貴；曲筆者，則飾非文過，取媚當道。即因如此，所以自古以來，直書的史學家，多遭刑戮。如齊史之書崔弒，司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北魏，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塡坑窖，無聞後世。反之曲筆阿時之徒，則功名富貴，忝然偷生。雖然歷史學的任務是在於明是非，別善惡，賢賢賤不肖，所以劉知幾還是主張直筆。他在直書篇中說：

「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强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未及，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偸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喩其高下也。」

同時他對於那些曲筆之徒，則大致貶詞。曲筆篇曰：

「其有舞詞弄扎，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以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以惡，持報己仇。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以上所述，乃劉知幾論歷史學方法之大要。這誠如他自己所云「其所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劉知幾論史體，則反對摸擬經傳，主張應用近體；論言語，則反對憲章虞夏，主張應用今文；論編製，則反對繁文縟詞，主張言事異篇；論敘事，則反對因襲陳說，主張簡要隱晦；論命題，則反對題不對文，主張名實相符；論斷限，則反對越

組。代。庖，主張不。錄。前。代。論。書。法，則反對曲筆。阿。時，主張仗。義。直。書。這些見解，都是很正確的，特別是反對摸擬古典的體裁和古典的言語，一直到我們的今日還有教育的作用。因爲一直。到。現。在，還有人企圖用古典的文字來掩蓋自己的淺薄。惟其中有一點是值得商量的，卽言與事異篇。誠然把長篇大論的文章，插入敘事之中，的確會打斷讀者對史實的觀察之聯系，但是有些文詞，往往與史實不能分開，而且甚至就是史實的構成部分，如項羽的烏江自刎之歌，卽其一例。因此，我以爲短文而必要者，仍然要插在敘事之內，長文而次要者，則記於註內，以備參考，如此則言與事，各得其所。

六 劉知幾論歷史學文獻

劉知幾對於他以前的歷史文獻，也曾經展開一個全面的批判。他把中國的歷史文獻，分爲兩大類：一曰「正史」，二曰「雜史」。他所謂正史，就是「經」「傳」「史」「漢」及其以後的官脩國史；所謂「雜史」就是歷代以來私家撰述的史籍。

他在古今正史篇中，歷述中國正史的源流。上自尙書春秋左傳史記漢書，下迄隋唐諸史，無不源源本本，詳述其作者姓名，成書經過，卷數篇數，及其後來的補註。其所根據的材料，自史漢而下，都是援引本書序論的原文，至梁陳以還，則多舉其見聞所接。

他又在雜述篇中，列舉中國歷史的流派。他把古今「雜史」分爲十類：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

」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敍其性質，舉其書名，條分縷晰，巨細無遺。（註）

（註）雜述篇云：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載記，王韶晉安帝紀，姚最梁昭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宏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其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

「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

「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或作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

「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傳，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

「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牒，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

「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于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

「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

「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

「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恆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皇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

劉知幾雖然把全部史籍別爲「正史」與「雜史」，但他並不是重「正史」而輕「雜史」。他以爲治史者，「正史」固然要讀，「雜史」也要讀，因專讀「正史」不讀「雜史」則見聞不周。但無論讀「正史」或「雜史」都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讀。他在雜述篇中說：

「蒭蕘之言，明王必擇；葑非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欲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此者謂周孔遷固也）。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他以爲如果不用批判之眼光去讀書，則「見良直而不知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這樣雖「學窮千載，書總五車，」亦猶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雖多亦希以爲用。

不過他所謂批判，不是根據于主觀的愛憎，而是根據于客觀的實在。他在雜記篇中說：「夫自古學者，談稱多矣。

精于公羊者，尤惜左氏；習于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批判態度。

劉知幾無論對「正史」或「雜史」，皆有批判。他對于「正史」，則在疑古篇中批判尙書，在惑經篇中，批判春秋，在申左篇中批判公羊穀梁二傳，在雜說篇中則批判諸史，上自經傳史漢，下迄隋唐所有的歷史文獻，無不具體地指出其牴牾之處，疏略之點，而予以辯證。此外在雜述篇中，對于十種雜史也逐一予以評述。這樣就完成了他對中國歷史學文獻的批判。

他評尙書則曰：「（尙書）上起唐虞，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爲主，至于興廢行事，萬不記一，語少缺略，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疑古）。

評春秋則曰：「按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隱），內爲本國（諱），事靡洪纖，動皆隱諱。」（疑古）是則「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誡，其義安在？」（惑經）且「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哀定之際則微，爲其切當時之夕，而罔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也。」（仝上）

評公羊穀梁二傳則曰：其錄言則「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其紀事，則「缺漏不可殫論。」其命意則「獎進惡徒，疑誤後學。」（申左）至于「論大體舉弘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古今疑滯，莫得而申焉。」

評史記，則曰：「述儒林，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不言冉季之政事。」而傳貨殖「獨以子貢居先」，錄佞幸，「惟以彌子瑕爲姓」，是其揚善顯惡，有所未盡。又說：「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書；至管晏列傳，則不取本書。」是其取材，「

可除而不除，可取而不取。」又說「史記、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矣，何用彙書其事乎？」而于序傳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不及其他。是其敍事可省而不省，不可省而省。自然他認爲最大的弊病就是「推命而言成敗。」

其評漢書則謂其以漢史而列「古今人表」于體裁，大爲不類；以漢書抄錄史記而「一字無改，于紀事事理皆殊。」又說「漢書編蘇氏之傳則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相冠首」于標題前後不一。又說「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夫亡。又云「于公（定國）高門以待封，嚴母（延年之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乎「天怒神怨，禍善禍淫者矣。」這又與司馬遷同陷于歷史的定命論了。

其評諸晉史則曰「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紓，良可惜也。王檟著書，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其評宋略則曰「裴幾原（子野）刪略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

其評魏書則曰以文字而論則「援引詩書。」「妄益文彩。」使讐音夷語，頓成經傳之文，以書法而論，則「標牓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爲草服之地。」反之。「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樸，嚴師少皞；逃道武結婚落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于此。賣國求榮「何其厚顏」如此。」

其評北齊諸史則盛稱王邵齊志，這是因爲這部書多載方言保存風俗他在雜說篇中說「或問曰「王邵齊志」多載當時鄙言爲是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

。自漢以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仆夫舍長。示有荊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門底箇江左彼此之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册，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士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邵之所錄，其爲弘益多矣。足以開後進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其評周書（令狐德棻所撰）則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眞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于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敕朝廷，他文悉準于此。蓋史臣所紀。柳虬之徒，從風而靡。令狐因之，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焉。」

其評唐書，則曰「詭辭妄說」「以無益而書。」又說「嗚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陷阱，董卓之成幕蓋，雖其所紆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劉知幾對「正史」的批判，大概如此。現在再看他對「雜史」的批判。他在雜述篇中說：

「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樸，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

不刊，求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稿之資焉。

「逸事」者，皆前史之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也。

「瑣言」者多載當時辯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于牀笫，莫不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已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

「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俗。施于本國，頗爲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于室家，難以播于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矣。

「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

「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鬼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揚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

「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于九州，闞駰所書，殫于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于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我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

「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論梜楝，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譾，持此爲能，遂使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

以上，是劉知幾對「雜史」的批判。此外對漢書五行志，還有單獨的批判，這裏不及再述。從以上的批判中，我們可以看出劉知幾對中國的歷史文獻，皆認爲有美中不足之處，但有一例外，卽他對于左傳一書，則認爲盡善盡美。他在雜說中說：

「左氏之敍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咙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敍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凄涼可憫。或腴詞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

不論他對歷史文獻的批判，是否完全正確，而其所指皆係據各書內容，并非憑空武斷。這種客觀的精神，和判斷的能力，實可驚嘆。

七　餘論

史通一書，雖係一部專論歷史方法的著作，但劉知幾在論歷史方法之中，亦嘗寓襃貶與奪之義。其中疑古一篇，題

名疑古，實卽諷今。

例如他看到當武后之世，小人滿朝，而武后尙以帝堯自居，則天爲號。于是他在疑古篇中引據左傳堯時有四凶而不能去之傳說，而曰：『斯則當「堯」之時，小人君子，比肩列朝，善惡無分，賢愚共貫。』又引據論語「舜舉咎繇，不仁者遠」的傳說，而曰『是則當時，咎繇未舉之前，不仁甚多，彌見當時羣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又如他看到唐代史官爲了頌揚李淵而厚誣楊廣，欲比楊廣于桀紂，以顯出李淵卽湯武。于是他任同篇中引據子貢「桀紂之罪不至是」一語，而曰「武王爲「泰誓」數紂罪過，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爲晉絕秦，陳琳爲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詞乎？」

又如他看到李淵始則推戴恭帝，終則成其篡奪，而美其名曰禪讓。于是謂堯舜禪讓不可信，而曰：「觀近古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立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

又如他看到李世明弒其兄，而當時論著，比之周公誅管蔡，因爲左傳有云：「周公弒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爲了打擊這種諛詞謬論，于是他引據尙書君奭篇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的傳說，而曰：「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傾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訛，而周公自以不誠，劇加顯戮，與夫漢代之赦淮南，寬

皐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于友于之義薄矣而書之所述，用爲美談者何哉？」

以上不過略舉數例以示其範。此種例子，散見于其他各篇者往往而有，不及備舉。但由此已可看出史通一書、實爲一部富有靈魂的歷史著作。誠如他自己所云：「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鑑誡焉，有諷刺焉。」

總上所述，可以說就是劉知幾的歷史學之大概的內容，雖然亦有其短，但是只要我們想見劉知幾是七世紀末的一位歷史學家，那他的短處，就應該由時代負責了。

昔班固評司馬遷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以蔽也。」

傅玄評班固曰：「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敍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詞章而略事實；此其所以失也。」

劉知幾評孫盛等曰：「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臣；敍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鄙華夏；此其大較也。」

吾于劉知幾則曰：「論大道，則先論衡而後六經；述史觀，則反天命而正人事；疑古史，則黜堯舜而寬桀紂；辯是非，則貶周公而恕管蔡；評文獻，則疑春秋而申左傳；敍體裁，則恥摸擬而倡叛造；此其所以爲長也。但其論「本紀，」則貶項羽而尊吳蜀；評「世家，」則退陳涉而進劉玄；此又其所以爲短也。」

論史前羌族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的關係

一　考古學發現中所見之羌族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的史前文化

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直至漢初，始以西域諸國之名，見於中國史乘。然而以吾人考察，早在史前時代，這個盆地的諸種族，已通過羌族的關係，與中原諸夏，發生接觸。

據考古學的報告，史前時代的諸羌之族，大半分布於甘肅西南及青海沿岸一帶。安特生甘肅考古記云：

「吾人發掘古物之地，大都皆在以下之三大肥沃河谷中，即貴德盆地之黃河河谷，西甯河谷及洮河河谷是也。考遠古殖民，多喜就此佳麗之河谷，尤以仰韶時代及辛店時代爲甚。蓋彼時這一帶河谷中林木暢茂，禽獸繁多，而牧畜種植等事，亦可得極良好之機會也。」

同書又云：

「當吾人作此鹽湖（即青海）之旅行，發見遠古之陶片多處。其具有村落遺址之特徵者，共有兩處，以在湖之東端者尤堪注意，湖之南岸，頗有多處，適於地形上之觀察。余曾見舊時之湖岸，高出近代湖面約三尺；湖之東端，高出

今水面六公尺，此外更無其他湖面擴張之跡。此等舊時湖岸構成一種極低平而明顯之山脊，山脊之頂則文化層在焉。」

此外，據安特生報告在「甯定縣屬洮河河谷之兩側，見仰韶期之葬地，位於侵蝕平原所成之山頂。此等葬地，多見於八羊溝深谷之北面向洮河河谷。葬地全面統名半山區，蓋從半山名也。」（甘肅考古記第七頁）同時「在洮河西岸，與導河縣隔岸相對者，見辛店期之葬地一處。」（同上）安氏稱之曰「四時定之葬地遺址」亦從今名也。吾人由此而知在史前時代，今日甘肅西南及青海沿岸一帶，實爲諸羌之族生養死葬之地。而且從其「村落遺址之廣闊，文化層之深厚，凡此皆示其居住之攸久。設非務農爲本，則殊難以自存。且陶器上之繩紋與格紋，則示當日有紡織植物之培養。村落遺址豕骨之多，則示當日畜豕之繁。此等設施，非農業之社會當不克維持者也。」（同上四四頁）

與甘肅西南之羌族平行發展，史前塔里木盆地諸種族也進到了新石器文化的歷史階段。

塔里木盆地在今日已經變成充滿了流沙的塔斯馬干大沙漠。據斯坦因西域攷古記云：

「在這片地方以內，自東到西，徑長一千五百哩，自南到北也在五百哩以上。而生物可以居住的，只嚴格的限於幾條沙漠田，這些沙漠田，除去些許地方以外，比較又都是很小的地方，此外就是一望無垠的沙漠了。這些沙漠，無論散布在高峻的山脈之上，或是位於山麓，挾帶冰川，窮荒不毛，以及流沙推動的平原上，幾乎是任到何處，滴水全無。」（第二頁）

但是在太古時代，這里因爲承受天山，昆侖山及帕米爾高原三面的冰河之灌注，今日之大沙漠，在當時却是一個大

內海。這個內海，到新石器時代，隨着冰河之退去，水源的減少而逐漸涸竭，但尚沒有完全變成沙漠。所以在舊石器時代末期，蒙古高原系人種之一分支，便踰過天山東麓，西徙於這個盆地，而他們便成爲這個盆地之最初的人種。在整個新石器時代他們都在這里發育滋長。他們在這里留下了不少新石器文化的遺物，近來已爲攷古學家所發現。

據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云：

「在（古樓蘭）風掃光了的地上，屢屢拾得石器時代的石箭鏃，刀片，其他小件器具，以及很粗的陶器碎片。至於荒涼的地域，我們還很少的進到裏面去。更向前進，每隔不遠，又見着同樣的東西。就我們的路線而言，我門極力地保持取直線前進，實際上不許向左右尋找，而這種發見，屢見不已，可以證明這些地帶，在史前時代末葉，必然已爲人類佔有。」（第九五頁）

同書又云：

「（在乾涸了的庫魯克河）（註一）所得之正確的古物證據，對於遺址毗鄰地方地文年代的斷定，有特別的價値。有史時代及其以前不久羅布泊區域的文化和古代佔領的情形，由此可呈現光明。關於後述一期者，在風蝕了的地面上，得到很多新石器時代的箭鏃玉斧一類的石器。」（第一〇六頁）

同書又云：

「在我們到樓蘭去的兩大站途中，再經過一些連續不斷的古河床，兩岸夾有成行倒去了的死野白楊樹。河床

（註一）庫魯克河，一稱乾河，的南支，在乾涸了的羅布泊中，以前河水是流向樓蘭廢址的。

的方向很明白指出，都是屬於古庫魯克河所成的三角洲的地方。風蝕的地面上，有些處所發見石器時代的遺物。」（第一〇六頁）

根據以上攷古學的發見，吾人又知史前塔里木盆地，也是一個新石器文化繁榮之區。在史前時代，這裏的人類，與甘肅西南的羌族，東西輝映，放出歷史的光輝。

二 考古學發現中所見史前羌族文化之西漸及其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的史前文化之關係

現在我們進而考察甘肅史前文化的創造者，與塔里木盆地史前文化創造者，是否曾經發生接觸。換言之，即羌族與西域諸種族是否在史前時代，即有着血統與文化的交流呢？關於這一問題，今日既存之考古學的發現，尚不足資以爲充分之說明。惟沙井期的文化遺址之發現，至低限度，可以使吾人想像此兩大文化種族在史前時代，頗有接觸之可能。

安特生甘肅攷古記云：

「鎭番縣者，實一巨大繁盛之沙漠城也。有一河自南山之麓，經涼州之東北，流入沙漠。鎭番西北之沙漠中，吾人所見之遠古遺址，爲數甚夥，據余個人研究所得，盡爲遠古文化之最晚者，因名之曰沙井期。沙井者，鎭番西三十里之小村。吾人所見之村落遺址三處，葬地遺址二處，其地皆爲沙丘湮沒。但此等沙丘，當發生於古址之後，自無可

疑。」（第六頁）

同書又云：

「吾人於鎭番縣之附近，尋獲古址多處，爲沙丘所沒。古址之中，葬地住址，均有發現，後者（住址）四側，圍以土牆，蓋地勢平坦之中。自當藉此以爲屏障也。」（第十五頁）

按如前所述，安特生所發現之甘肅史前文化的遺址，皆在甘肅西南，惟沙井期文化遺址，則發見於甘肅西北鎭番西三十里之地。同時，沙井期文化，又爲甘肅史前文化中最晚期的文化，（註二）此種晚期的文化，發現於甘肅的西北，這就證實了在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羌族——甘肅史前文化的創造者之一支，已沿南山北麓之小河，徙向涼洲一帶。

涼州西北一帶，今日已成爲一片荒涼的沙磧之地。惟據安特生根據地層構造攷察此間的沙丘，係發生於古址之後，即發生於晚期新石器時代以後。當史前羌族遊牧於此之時，此間固爲一水草肥美之草原，最足以引誘原始牧人之勾留也。惟直至今日吾人于涼州與甘肅西南史前遺址之間，尙未發現史前人類之遺跡，因而沙井期似爲一孤立之古址。但是攷古學的發現指示吾人，沙井期的文化，顯然與甘肅西南的史前文化有其傳統的承襲關係，因而沙井文化的創造者之來自甘肅西南，實無可疑。

羌族在史前時代已西徙於今日之涼州一帶，此爲已經確證之事，惟羌族在史前時代，是否曾由涼州繼續西徙，以達

（註二）甘肅攷古記云：「在沙井葬地遺址及村落遺址之中，吾人採獲銅器之小件無數，內有帶翼之銅鏃，乃精工之作。職是之故，著者因疑與沙井期相同之文化，當爲甘肅各期史前文化之最晚者。」

於塔里木盆地，直至今日，吾人於沙井遺址與塔里木盆地史前諸遺址之間，尙未發現史前文化遺址，因而無從確切證實。惟據安特生考察，沙井所出彩畫陶器與蘇薩所出者頗有類似之處。甘肅考古記云：

「多數之沙井陶器，上繪清晰之紅色條紋，最特別者，爲繪鳥形之橫帶花紋，使吾人憶及蘇薩之圖案。」（第十九頁）

同書又云：

「（沙井）陶器，質較粗，形制複雜，如附圖第十一版第三圖及第六圖所示，器之大半，均無彩紋，否則器之一部，另加紅色之衣，於附圖第十一版第三圖第五圖可以見其詳。更有少數陶器，上繪精緻彩紋，其主要者爲直立之三角形，及有鳥形之橫帶紋（第十板第一圖及第二圖）。此種彩色陶器，頗與蘇薩陶器之鳥形花紋者極相類似，因使吾人視二者之文化互有關連。但沙井期之文化，似又較蘇薩者爲晚。」（第十六頁）

按沙井村在甘肅涼州，而蘇薩則在波斯，沙井的史前文化果受蘇薩文化之影響，則勢必通過塔里木盆地諸種族之仲介。因此之故，若非塔里木盆地諸種族東徙於甘肅西北，則必係羌族由甘肅西北西徙於塔里木盆地，否則沙井文化與蘇薩文化決不能發生接觸。余因此而疑在史前時代，諸羌之族已由涼州再向西徙，進入塔里木盆地之內矣。而沙井村者，則爲史前西徙羌族在其西徙途程中寄頓之所，亦卽史前甘肅西南與史前塔里木盆地兩大文化區域之間的一個文化的驛站。

誠然，當人類社會達到一定歷史階段的時候，卽達到相當定住生活的時代，任何地域的人類，都不必藉其他種族的

文化之影響，而能自發地發明陶器，并且依據其原始藝術程度之發展，而能在陶器上施以彩色繪畫或彫刻。此種彩色繪畫或彫刻也可能偶然地相同。故沙井期文化與蘇薩文化中的陶器彩繪之相同，不能認爲是這兩大文化相互接觸之絕對的證據。惟據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略記有云：

「在塔里木盆地以南之沙漠中，……風霜侵蝕之處，時常發現史前時代之石器及彩色陶器甚多。與裏海附近米索不達米亞，俾路支及中國西垂發見銅器時代之遺物（卽辛店寺窪沙井三期文化）頗相類似。」

據此，則史前塔里木盆地的文化已接受中亞及甘肅的史前文化之影響，而表現爲一種複合的型式。塔里木盆地的史前文化，余未及見，但果如斯坦因所云，則塔里木盆地一帶，在史前時代，已爲東西文化交流之處，而此間之有羌族的徙人，則又爲必然之事也。

三　傳說中所見史前羌族之西徙的神話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的關係

關於史前羌族的西徙，中國有着不少的傳說，其中最有興趣者，爲西王母的故事。這個傳說實際上就是暗示史前諸羌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的關係。

傳說中把西王母的像貌描寫得像一個半人半獸的司芬克司(Sphinx)。山海經海內四經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故漢世相承，皆以西王母爲女仙人。其實所謂「豹尾虎齒者」乃

原始種族所習用之一種假面具，此種假面具，在後來的西域諸種族中，尚習用之。據隋書音樂志云：「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其中魚龍，巨象，殺馬，剝驢，皆假面具戲也，而此種假面具戲，則來自西域。至於「蓬髮」，亦為西方諸種族之一種習俗，所謂西戎人，披髮左衽者，此之謂也。所謂「戴勝」者，郭璞註云：「勝，玉勝也，」卽石環之類，蓋一般原始種族用以為頸飾者也。總上所述，則所謂半人半獸之西王母，乃一種披髮，帶假面具而以石環為頸飾之原始種族也。

傳說中對於西王母之邦的所在，不一其詞。如云：

「玉山，是西王母之所居也。」（山海經西山經）

「低佪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司馬相如大人賦）

「西王母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漢書地理志）

「酒泉南山，有石室西王母堂。」（十六國春秋）

「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淮南子墬形篇）

「西王母居昆侖之山。」（河圖玉版）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丘曰昆侖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山海經大荒西經）

「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見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

「大秦國西有弱水西王母。」（見後漢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及魏略西戎傳）

如傳說所述，所謂西王母之邦，其範圍似在甘肅以西西至中亞一帶，而這一帶正是兩漢時代所謂西域之範圍也。惟依據穆天子傳所云：「自羣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按羣玉之山，卽今日甘肅西部之南山山脈，由此以西三千里，正是塔里木盆地。故知最初所謂西王母之邦，實卽指塔里木盆地而言，到兩漢時代隨着西域的範圍之擴大，故又將西王母之邦推而遠之，至於條支。

因此，所謂西王母者，並非如漢人之所設想爲一不死之女仙人，亦非如近人之所附會爲周穆王之女，（註三）爲圖伯特語「濃波」（註四）或烏孫語「昆莫」（註五）之對音，乃至爲波斯古傳中之賽西陀王（註六）或舊約中之阿剌伯的示波女王，（註七）而誠如王應麟所云：「西王母者，不過女眞彡姐，八百媳婦之類，」蓋指史前塔里木盆地諸種族而言也。

（註三）穆天子傳載西王母爲穆天子吟，其詞有曰：「我惟帝女，」學者因附會此語，謂西王母爲周穆王之女。其實，此所謂帝者，乃指上帝而言。

（註四）「濃波」或係「贊普」之誤，「贊普」者，圖伯特人所謂王也。

（註五）「昆莫」者，烏孫人稱其君之尊稱，猶言王也。法人拉克伯里（Terrian De La Leupere）以爲中國古籍王昔近昆，因疑西王母者，卽烏孫之君。

（註六）台愛爾（T. Teijel）英譯穆天子傳，據波斯詩人富爾達伊（Firdouse）引波斯古傳賽西陀王（Jamshid）與馬貞王（Mechin）馬亨（Mahang or Mahenk）通婚，因以馬貞爲大秦，卽支那。馬亨爲周穆王，而賽西陀爲西王母。蓋以馬貞王與賽西陀王之結婚，附會爲穆王與西王母之事也。

（註七）佛爾克（A. Forke）因見舊約中有阿剌伯示波女王（Konigin non Sabo）訪問瑣羅門（Solomon）王於耶路撒冷之事，又以示波與西王母音相協，故以示波女王爲西王母。

傳說中又謂自黃帝以至堯舜禹，皆與西王母有往還聘獻之事，如云：

「黃帝時，西王母獻白環。」（瑞應圖）

「堯身涉流沙，封獨山，見西王母。」（賈子修政篇）

「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環玉玦。」（世本）

「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西王母使使來獻白環之玦，益地之圖。」（金樓子興王篇，

「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琯。」（見尚書大傳，此外大戴禮少閒篇，漢書律歷志，風俗通聲音篇，晉書律歷志，宋書音樂志，符瑞志說文，皆有堯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之記載）

「禹益見西王母。」（論衡別通篇）

「禹學於西王母。」（見荀子大略篇，新序雜事及韓詩外傳）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淮南子覽冥篇）

以上諸神話人物所特徵之歷史時代，正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中期以至晚期。這些人物皆與西王母有往還，卽無異暗示在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屬於夏族系統的諸羌之族，已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有了血統的文化的關係。同時，從西王母之貢物看來，又皆係白環玉玦；從西王母之飾物看來，又爲玉勝；而且其所居之處，又稱瑤池；則西王母之邦，必爲產玉之地，若以今日地理按之，當在于闐一帶。準此而論，則在史前時代，諸羌之族，其西徙之支裔，或已達到今日于闐一帶？

除西王母的傳說以外，還有許多傳說，都暗示史前中國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的關係。如穆天子傳云：「天子升于昆侖，觀黃帝之宮。」

淮南子謂「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王逸，高誘兩氏皆謂「不周山在昆侖西北。」

山海經謂「羿與鑿齒戰於華壽之野，在昆侖虛東。」

山海經海內西經謂：「大樂之野，夏后氏於此舞九伐。」此云大樂之野，余以爲即「沃民之野，」大荒西經云：「沃民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處，是謂沃民之野。」而此所謂「沃民，」淮南子作「樂民」。時則篇云：「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故「沃民」即「樂民，」亦即「大樂，」而其地則在昆侖之虛。

綜合以上諸傳說以與考古學的發現相印證，則史前羌族之西徙塔里木盆地，實有蛛絲馬跡可尋。

四　結語——禺氏禺知虞氏與月氏

管子書中，盛稱禺氏爲產玉之地。如云：

「玉起於禺氏。」（國畜篇）

「北用禺氏之玉。」（揆度篇）

「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山去周七八百里。」（同上）

「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七（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輕重甲篇）

「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輕重乙篇）

如上所述，禺氏既為產玉之地，又去周七千八百里，而且與崑崙之虛並提，則其地必為今日于闐一帶無疑。吾人由此又知在春秋時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為中國所知者有禺氏。

余以為禺氏即虞氏。虞氏在後來的文獻中有各種變稱，如左傳中之「虞」，穆天子傳中之「禺知」，史記大宛列傳中之「月氏」，皆虞氏二字一音之轉也。蓋古代有音無字，後人以字記音，此種紛歧訛謬，正不可免。猶之後來譯音，不能盡同，同一理由。如吐火羅之為覩貨邏，印度之為身毒也。

考虞氏，史稱有虞氏，為夏族中之一原始氏族，原住鄂爾多斯一帶，以後一支東徙中原，一支西徙甘肅，但仍有一部分殘留於原處，故逸周書王會解，伊尹獻令，皆列禺氏於正北。穆天子傳所謂「禺知之平」，據王國維攷證，亦在雁門之西北，與伊尹獻令合。惟虞氏之另一分支，在史前時代即已西徙塔里木盆地。管子小匡篇云：「西服流沙西虞」，此西虞者實即指西徙流沙之虞氏。此西徙之虞氏到春秋時，遂以禺氏之名聞於中國。到漢代更以月氏之名而出現於西域。吾人由此又知所謂月氏者，實即虞氏一音之轉，其族類之開始西徙，固早在史前時代。至於漢初大月氏之西徙，（註八）則不過追蹤其祖先之足跡而已。惟此次羌族之西徙，已由塔里木盆地，西踰帕米爾高原，遠至於中亞。自是以

後，諸羌之族，遂布滿帕米爾高原西南山谷之間（註九）以及印度之西北。（註十）

吾人由此而愈益相信，發現於涼州西北之沙井文化遺址，實爲羌族西徙塔里木盆地途程中的寄頓之所。假若我們再作廣泛之搜求，則在涼州與古樓蘭之間，必能再發現類似沙井期文化之遺址。蓋南山北麓這一道天造地設的走廊，自古以來就是甘肅與塔里木盆地之通道，史前的古人也自然是經由這一自然的走廊通達於塔里木盆地也。

人們或許懷疑，自甘肅西至塔里木盆地，雖在今日，亦爲畏途。因爲中間需要經過羅布沙漠，這個沙漠會使通過他的人感到無法克服的困難。（註十一）史前人類，何能克服此種困難，但是我們一定要想到在史前時代，這里還是一個波

（註八）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轉徙，與匈奴同俗，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夏而臣之，都媯水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按月氏之由敦煌一帶西徙伊犂，約大在文帝前八年至後元三年之間，（西紀前一七二年至一六一年間）其由伊犂一帶再徙媯水流域，則大約在武帝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之間（西紀前一三九年至一二九年間。）

（註九）漢書西域傳云：「蒲犂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按此諸國皆在今日帕米爾高原西南山谷之間，所謂葱嶺諸國者是也。

（註十）漢書西域傳云：「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按漢時罽賓即北印之迦濕彌羅，塞王，即希臘在大夏的統治者，因月氏入據大夏，於是希臘人被迫由濮達高附諸地（今阿富汗境）迤邐而下，南入罽賓。但月氏人亦踵而躡之，因而所謂「南君罽賓」之塞王，不久亦見逐於月氏。羌族之裔，遂徙入印度與希臘人及北印之雅利安族混種而構成所謂 Inde——Sokyiano。

（註十一）馬可勃羅遊記對於羅布沙漠，有如次的描寫：「這一片沙漠很長，據說由一頭騎馬行到那一頭要一年以上。此處較狹，橫越過去也得要一個月。全是沙丘沙谷，找不到一點可吃的東西。但是騎行一日一夜以後，便可以得到淡水，足够五十到一百人連牲口之用，多了可不行。斯田因

濤潯漾的羅布泊，而不是羅布沙漠。（註十二）至於南山北麓這一道橫貫東西的走廊，並不如何的荒涼。據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云：「肅州河極西端的河谷一帶，植物都異常豐富。」同書又云：「肅州河同甘州河河源處空闊的河谷地方，雖是很高，有些處所，甚至達一萬一千呎以上，但是仍有極優美的夏季牧草，眞是一個很動人的經驗。再向東南，雪同雨量愈增，南山極北山嶽中，甘州河灌域所及的河谷里，因此能容許更能豐富的森林在那里生長。」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史前時代的羌族，他們驅着畜羣，沿南山北麓一帶富於森林與植物的山嶺與河谷綏綏西徙，忽然發現了一個夢想不到的大盆地，是如何地高興啊！

塔里木盆地三面高山，誠如斯坦因所云：「從地圖上看來，這一片地方很像是自然有意在地球上發生大文明的幾處地域之間，造了這樣一座障壁，遮斷了他們在文化方面彼此的交流。」然而文化的浪濤，終於打通了這個障壁，反而使這個盆地，自有史以前下迄秦漢隋唐，都成爲東西文化交流之處。而史前的羌族，則爲東方文化西進的先鋒。

西域考古記也有如次的描寫：「我們完成這一次的沙漠旅行，一共橫渡十七大站地方。普通的算法，仍同馬可勃羅時代一樣，說是二十八站。……在這一次的旅行中，我們沒有遇到一個行人，沒有生命的岑寂，容易使我體會到古代行旅者循着這條寂寞的磧道所生的迷信恐怖的感覺。」

（註十二）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云：「較古時代吸收南山山脈一大部分積雪的疏勒河，原來是注入大羅布泊的。所以羅布泊的瀦域竟從右方的帕米爾起，橫越亞洲腹部，以及於太平洋。」

吐番人種起源考

一　吐番在中國史上的出現

西藏高原諸種族，直至唐貞觀八年（西紀六三四年）始以吐蕃之名見於中國史籍，在此以前，未嘗通於中國。當唐代與吐蕃接觸時，吐蕃之族已經知道冶鑄金屬，（註一）知道種植牧畜，（註二）並且在這種社會經濟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種族國家。在這國家內，有君長曰「贊普」，（註三）有各種臣僚曰「尚論掣逋突瞿」，（註四）有軍隊

（註一）新唐書吐番傳上云：「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又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舊唐書吐番傳上云：「吐番多金銀銅錫」二書皆不言有鐵，蓋唐時吐番尚在青銅器時代。

（註二）舊唐書上番傳云「其地（吐番之地）氣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麥，䝁豆，小麥，喬麥。畜多犛牛，豬，犬，羊，馬。又有天鼠，狀如雀鼠，其大如貓，皮可為裘。……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

（註三）新唐書吐番傳云：「其俗謂彊雄者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

（註四）同上書云：「其官有大相曰「論茝」，副相曰「論茝扈莽」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逋。」又有內大相曰「曩論掣逋」，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逋」，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逋」，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尚論掣逋突瞿」。」

（註五）有監獄（註六）而且已經從印度傳入佛教，因而也有僧侶，（註七）惟尙無文字。（註八）

吐蕃在唐太宗時，（西紀六二七年至六四九年）正開展其向四周的征服，北向青海，西向川邊，成爲大唐帝國西南之嚴重威脅。致使大唐帝國不能不把文成公主送到吐蕃，而下嫁於其國王弄鑽。（註九）到高宗時，（西紀六五〇年到六八三年）吐蕃強盛達到極點，其國土北至甘肅西北涼洲一帶，東至四川松潘及西昌一帶，南至印度西北，西至新疆南部，巍然爲中國西南一個央央的大國，與大唐帝國相匹敵。（註十）

（註五）同上書云「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病終。」新唐書吐番傳亦云：「（吐番）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於人。」

（註六）舊唐書吐番傳云：「用刑嚴峻，小罪剜眼鼻，或皮鞭鞭之，但隨喜怒而無常科。囚人於地牢，深數丈，二三年方出之。」

（註七）新唐書吐番傳云「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爲大神，喜浮屠法，習咒詛。」

（註八）舊唐書吐番傳云「（吐番）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

（註九）舊唐書吐番傳云「弄鑽弱冠嗣位，性驍武，多英略，其鄰國羊同及諸羌並賓服之。太宗遣行人……往撫慰之……乃遣使……入朝，……求婚。太宗未之許。……弄鑽遂與羊同連發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靑海之上，以避其鋒。……於是進兵破黨項白蘭諸羌，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今四川松潘。）……太宗遣吏部尙書侯君集爲……行營大總管……以擊之。……弄鑽大懼，引兵而還，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貞觀十五年（六五四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

（註十）同上書云「（高宗）咸亨元年（六七〇年）四月，詔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率衆十餘萬以討之……爲吐番……所敗。……自是吐番連歲寇邊，當悉等州諸羌盡降之。……吐番盡收羊洞黨項諸羌之地，東與涼（甘肅武威）松（四川松潘）茂（四川茂縣）嶲（四川西昌）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印度）西又攻陷龜茲疏勒（于闐，碎葉）等四鎭，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武后時，雖曾從吐番手中收復新疆西南四鎮，(註十一)但是當時的吐番，西結大食(即漢之條支，今之阿拉伯人)屢次企圖由克什米爾北之小勃律(今吉爾吉特 Gilghit)侵入新疆。同時，東結南詔(今雲南四川爲南蠻之族)擾亂西南。並常由青海方面威脅大唐帝國通達西域之孔道。所以到中宗時，又不得不把金城公主送到這個神祕的國土。(註十二)

玄宗時(八世紀中葉)阿拉伯人已經征服了媯水盆地，大唐帝國的西方又感到一種新的危險。(註十三)爲了抵抗大唐帝國在中亞的優勢，吐番人與阿拉伯人攜手突入印度河流域，橫越吉爾吉特(唐代稱爲娑夷水)和雅西爾(Yasir)的興都庫什地方，進到媯水流域的最上游處，向新疆的塔里木盆地進展。吐番與阿剌伯人的聯合攻勢，嚴重的威脅着唐代在西域的地位，爲挽救這種危險，於是乃有玄宗天寶六年(七四七年)大唐將軍高仙芝橫越世界屋脊的帕米爾和冰雪皚皚的興都庫斯山達科特(Darkot 即唐代所謂坦駒嶺)之遠征。但是高仙芝的遠征，終於在塔什干

(註十一)「長壽元年(六九二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番之衆，克復龜玆，于闐，疏勒，碎葉等四鎮。」(舊唐書吐番傳)

(註十二)同上書云：「神龍元年(七〇五年)……中宗以所養雍王宗禮女爲金城公主許嫁之(吐番)。」

(註十三)惠超往五天竺國傳(見敦煌石室遺書)中謂：當時西天竺，波斯均屬大寔(即大食)所管。吐火羅都城，有大食兵在彼鎮壓，吐火羅王被迫向東走一月程，在普特山居，屬大食所管。胡蜜(即護蜜)兵馬少弱，現屬大食所管，每年輸稅絹三千疋。安國，曹國，史國，石騾(即石國)，米國，康國，雖各有王，並臣屬於大寔。拔汗鄴(即拔汗那)河南一王屬大寔，河北一王屬於西突厥。由此可知當時阿拉伯人在中亞一帶之勢力。按惠超之往印度，不知在何年，但其歸國則在開元十五年(七二七年)，是在玄宗時正阿拉伯人勢力在中央擴展之時，當時適值吐番勢力西展，故此兩大勢力得以相遇於中亞。證之唐書所紀當時拔汗那，安國，康國，俱密國，吐火羅國均有因大食之侵略而請援於大唐之事，就可證明。

城附近一戰，由於同盟軍中的突厥人之背叛而歸於慘敗。不久安史之亂爆發，於是吐番遂乘間由青海方面大舉北犯，進入陝西。（註十四）到代宗時，並攻陷大唐帝國的首都。（註十五）以後又再犯首都，唐代藉回紇之力才把吐番從近畿驅逐出去。（註十六）德宗時唐代有朱泚之亂，吐番又在「請助討賊」的名義之下，一度進入陝甘。（註十七）自是以後，吐番內亂，遂漸衰歇。

吐番在八世紀中葉，勃然興起於從無歷史紀錄的西藏高原，南略印度，東入川滇，北犯甘肅，西侵中亞，並且與阿剌伯人的勢力結合，與大唐帝國展開爭奪帕米爾高原內外一帶世界的鬥爭。這一個新興的勢力之興起於西藏高原，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很早以前居住於這個高原的諸種族，在其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孳裂與融混的結果。可惜吐番以前之西藏諸種族的歷史，已消失於沒有文字紀載的歷史時代之中，到現在，祇剩下一些模糊影響，似是而非的傳說而已。雖然，假如我們根據這些傳說的暗示，則對於吐番的人種之來源，仍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假若我們對於吐番種族的淵源，找

（註十四）舊唐書吐番傳云「吐番乘我間隙（安史之亂）日蹙邊境。……數年之後，鳳翔之西，邠州之北，盡蕃戎之境，淹沒者數十州。」

（註十五）「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年）（吐番）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三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入之，……又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陝……高暉導虜入長安……吐番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見同上書）

（註十六）舊唐書吐番傳云「（代宗）永泰元年（七六五年）僕固懷恩誘吐番回紇之衆南犯王畿……至奉天界……京師戒嚴，……郭子儀於河中府領衆出援……諸酋陽降狀，請擊吐番爲效，子儀許之，於是……合……攻吐番……京師解嚴。」

（註十七）新唐書吐番傳云「（德宗時）朱泚之亂，吐番請助討賊……及泚平，責先約其地，天子薄其勞……於是虜以爲怨，……入寇，……涇隴邠之民蕩然無存矣。諸將試不能得一俘，但貫賊出塞而已。」

到了一些綫索，則同時對於西藏高原諸種族的來源也就可以解決了。

二　吐番的原始人種是羌族的苗裔

關於吐番種族的來源，舊唐書吐番傳云：

「吐番，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地也。其種族莫知所出也。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為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傉檀為西秦乞伏熾所滅。樊尼召集餘衆，以投沮渠蒙遜，蒙遜以為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行，濟黃河，踰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望素著，為羣羌所懷，皆接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為窣勃野，以禿髮為國號；語訛，謂之吐番。其子孫蕃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歷周（北周）及隋，猶隔諸羌，未通於中國。」

新唐書吐番傳云：

「吐番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並諸羌，據其地。「蕃」「發」音近，故其子孫曰「吐番」，而姓「勃悉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為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黃河，踰積石，遂撫有羣羌云。」

按新舊唐書皆載吐番爲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的傳說，此外此說亦見通典西戎吐番條，通考四夷吐番條，唐會要吐番條，太平寰宇記四夷，宋史外國吐番傳。而新唐書吐番出於西羌之說，則不見於以上各書，不知其說何所本。

按以上二說，一謂吐番之族爲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子樊尼之後，「吐番」之得名，乃「禿髮」之音轉；一謂吐番之族爲發羌之苗裔，「吐番」之得名，乃「番」「發」二字一音之轉。

攷禿髮利鹿孤者，禿髮烏孤之弟。禿髮烏孤曾於東晉末年，據甘肅涼州一帶，建立一個短期王朝，是爲南涼。十六國春秋南涼錄云：

「禿髮烏孤者，河西鮮卑人也。世祖疋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孤子壽闐立，壽闐卒，孫樹機能立……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能死，從弟務丸立……丸死，孫椎斤立；斤死，子思復鞬立；部衆漸盛，遂據涼土。鞬死，子烏孤襲位，……徙於樂都。」

據此，則禿髮利鹿孤者，鮮卑人也。後漢書鮮卑傳云：「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因鮮卑山，故因號焉。」鮮卑之族，在漢初尚遠在遼東塞外，西阻匈奴，南隔烏桓，未嘗通於中國。直至東漢末葉，桓靈之際，匈奴西徙，中國內亂，鮮卑之族，始乘間西徙，佔領匈奴故地。以後，其族類漸次分徙於陝甘北部塞外及塔里木盆地之東北一帶。由此而知所謂禿髮族者，乃自東漢末以迄西晉，鮮卑西徙猛潮中徙入涼州之一支。在禿髮族以前，中國西部甘肅一帶乃匈奴與西羌交錯之地，並無鮮卑之族類也。

禿髮族確爲鮮卑族中向中國西南突入之一支，據十六國春秋緝補云：「（當禿髮族全盛之時）其地東至麥田、牽

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按澆河，在今青海東北，或卽湟河。是禿髮盛時其族類已進入青海。

惟禿髮族種落甚小，不久卽爲其他鮮卑種之乞伏族所驅散。當其散亡時，確有一支在樊尼領導之下，由樂都再向西徙。十六國春秋傉僨利傳云：

「乞伏熾盤乘虛來襲，旦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傉僨，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盤所陷，卿等能爲吾籍乙弗之貲，（著者按乙弗乃乞伏之訛，此族當時在禿髮之西，因傉僨於樂都陷落之時正西征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萬，故熾盤得以乘虛而入，此所謂乙弗之貲者，卽指傉僨之虜獲物）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征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

但十六國春秋僅謂樊尼引師而西，不及其所至何地，且謂「衆多逃返。」是則禿髮之族，卽使有西濟黃河逾積石建國於羌中者，其種落亦必甚小。過去的歷史家，因不明吐番種族的淵源；見禿髮族有自青海西徙之事，而「禿髮」與「吐番」之聲又極相似，故謂吐番爲禿髮之音訛，於是推而論之，謂吐番卽禿髮。如果此說，則直至東晉末年，西藏高原一帶，始初有人類。而此種人類，在短短二百年左右，卽發展爲一強盛的吐番，豈非歷史的奇蹟？實際上，據傳說所云禿髮者，乃鮮卑語「被」之稱謂，（註十八）而吐番則爲西藏語之譯音，（詳後節）兩者之音雖偶同，而實則毫不相干。

再攷吐番出於發羌之說。

攷發羌之名，首見於後漢書西羌傳滇良條。其中有云：

（註十八）十六國春秋輯補云：「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此句亦見廣韻）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

「迷唐（燒當羌滇良之後裔）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居賜支河首，依發羌居。」

如上所紀，則所謂發羌者乃燒當羌南徙以前賜支河首以外的先住種族。據後漢書所載，燒當羌的南徙，在和帝十三年（西紀一〇一年）是發羌之族，至遲在東漢以前已定住在賜支河首一帶。惟唐代吐番所居之地，在今日西藏，賜支河首以外是否係今日之西藏，其說不一，但據通典邊防西戎黨項羌條云「堂項羌在古析支之地……大唐貞觀三年……後諸部相次內附，列其地爲崌，奉，巖，遠四州。又州郡雪山郡奉州條云：「奉州蠻夷之地，南接吐番。」則賜支以南，實卽吐番之地，亦卽今日西藏高原，殆無可疑。據此，我們又知在東漢以前已有發羌之族，分佈西藏高原。

惟發羌之族，是否爲後來吐番之原始的淵源，則尙待攷證。近人鄭天挺氏曾著「發羌之地望與對音」一文，引中新唐書之說，從音韻學上論證發羌卽吐番。其中有云：

「竊疑中國史傳中之所謂發羌，質卽西藏土名 Bod（西藏自稱其種族曰 Bod 自稱其人曰 Bod-Pa）之對音。廣韻月韻發，方代切，爲合口三等非母字，Kar Cren 氏擬讀爲 piwdt。案說文『發，從弓發聲』『發从癶，从殳』段玉裁註『癶亦聲，普活切，滂母』『癶，讀若撥，北末切，幫母』均屬重唇。而从發得聲之字撥，北末切，幫母；鏺，普活切，滂母；』亦屬重唇音。錢大昕云『古讀發如撥。詩鱣鮪發發，釋文補末切，此古音也。』一之日蹙發，說文作滭泼，此雙聲，亦當爲補末切，釋文云『如字誤矣，說文泼分勿切。』此古音上發可讀撥之證。」

鄭氏卽據此而作出發羌卽吐番之音轉的結論。余以爲發之古音讀撥爲一事，而發羌之是否爲吐番又爲一事。蓋藏語 pod 之音爲「撥」，決不能於「撥」之前加上一個「吐」字之音。若謂係 pod-pa 之譯音，則應譯「撥巴」，

而撥音總應在前。誠如鄭氏所云，中國古代翻譯名詞，亦有省略者，如「帆衍那」之譯「帆延」或「帆引」「阿修羅」之或譯「修羅」，「迦毗羅婆」之或譯「迦毗」，但只有略音。決無憑空添注原文無有之音節如 pod 之前而加一吐字音者，故吐番爲發羌之對音實不能通。

余近攷藏語中有 To-Po 一語，其音讀如「吐撥」，其意義則爲「上西藏」(uper Tibet) 此語阿剌伯人譯爲土伯特(Tobet)嗣後英人轉譯爲底伯特(Tibet)。中國後來亦稱西藏爲土伯特，或圖伯特，皆係出於 To-Po 之譯音。中國古音撥與番通，故譯爲吐番。因此，余以爲吐番者，乃藏語 To-Po 之直譯，而非發羌之對音也。

吐番種族，既不始於東漢之發羌，亦不始於東晉末之禿髮。其最古的遠祖，可能是史前時代的羌族。蓋羌族在史前時代，卽有一分支由甘肅西南緩緩南徙。

關於史前羌族的南徙，吾人至今於甘肅與西藏之間，尚未發現史前人類之遺蹟。惟步達生氏(Pr. Paoid Black)曾於其所著甘肅河南晚石器時代及甘肅史前後期人類頭骨與現代華北及其他人種之比較一書中云：「甘肅晚期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頭骨，與西藏B種及「甘姆斯人種」(Khams Tibetitns) 有許多形狀相同。」按甘肅史前人種，卽係後來所謂羌族，此種史前人種的肉體型，與西藏B種及甘姆斯人種的肉體型，有相同之處，則後者必然出於前者，因而吾人以爲吐番最古的祖先，可能就是史前南徙的羌族之支裔。

其次，鐵雲藏龜一〇五頁有一條云：「貞。吳弗其𢦏羌蜀」「蜀」字之上冠以「羌」字，其意當然是指蜀中之羌，又卜辭中有「湔方」後上九頁云：「囗乎湔光。」前七，四二頁云「湔方」。按許書謂「湔水出蜀綿虒玉壘山，東南

入江。」此淌方余疑卽華陽國志所謂「魚鳧王田于湔山」之「湔，」其地在四川西北松潘境內。卜辭爲殷人之記載，卜辭中而謂蜀中有羌，是則當殷人進入四川以前，四川西北已有羌族之分佈，其南徙之時，正値傳說中之夏代也。

又據後漢書西夷傳云：「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諸羌……推以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秦獻公元年爲紀元前三八四年，周安王十八年）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羌衆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犛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

按廣漢，武都，在今松潘，越嶲在今西昌，這一帶到西漢初，皆諸羌分佈之地。史記，西南夷傳云：「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余以爲此等諸羌之南徙，必在秦獻公時代以前，否則不能在西漢初，有如此廣大之分布與繁盛之發展，而且據史記所載，在漢初西南諸羌已販賣枸醬于南越，販賣卭竹杖于身毒，則當時已與廣東印度發生關係，其入印度，可能是道出緬甸，也可能是道出西藏。余因疑西漢時代之羌族的一支，或者已於秦漢時代以前徙入西藏，特未被漢人所發見而已，而其南徙，則在史前時代也。故水經注河水注引司馬彪語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而這一帶，正是今日之西藏。

至於諸羌之徙入西藏的路線，吾人於燒當羌之南徙，可以窺見一般。後漢書西羌傳云：

「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湳，並皆強盛，數侵犯之。滇良父子，於是卽會附落，及諸

雜種，乃徙入大榆，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滇吾子東吳……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迷吾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西紀九二年）……蜀郡太守聶尙代為校尉……乃遣使召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和帝）十二年（西紀一〇〇年）迷唐復背叛。……明年……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守侯霸暨諸郡兵屬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久川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陣，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不滿千人，遠逾賜支河首。」

按大允谷及大小榆中皆在今日甘肅西南，賜支則在今日西藏，燒當羌自大小榆中徙於賜支河首以外，是自甘肅西南徙入西藏，其間有廣漠的青海艸原，古人要從甘肅西北徙入西藏，必須穿過青海艸原。據史乘所載，秦漢時代的諸羌之南徙西藏，以及東晉時代的禿髮族，皆係採取這條道路。是知自甘肅西南通過青海艸原以達於西藏，自古以來即有一條通道。所以自秦漢以至隋唐，這一通路，幾乎成為羌族通達西藏的大道，尤其是他們在緊急環境中的一條逃亡路線。因而西藏高原不啻為羌族的避亂所，積而久之，他們便聚成了許多種落在一個新的世界中展開了他們新的發展，因此吾人推想史前的羌族之南徙川藏一帶，亦或是採取這條道路。

總上所述，吾人因知羌族之南徙西藏，蓋早在史前時代，發羌者，不過南徙的羌族之一支，所以吐番的人種之主要的成份是南徙之諸羌，並非發羌一族，更非後來之禿髮族。

三　評吐番人種來自印度或緬甸諸說

學者亦有疑吐番人種來自印度者，蓋吐番建國在西藏與印度接境，其間僅隔一喜馬拉雅山（在遠古時代）印度人種逾過喜馬拉雅山徙入西藏實爲可能。而且至今西藏人的典籍中尙有西藏人種起源印度的傳說，惟此類傳說之反面皆謂吐番族形成之前，西藏尙無印度人種。近人冷亮氏節譯西藏紀年史中有云：

「吾人導師釋迦牟尼涅槃後，聖人觀世音菩薩，化身爲猿猴，降臨西藏，修道于某黑山中。黑山中有一魔女，一日，來至菩薩處告以相愛之忱，菩薩無所動也。魔女白菩薩曰：『余以夙孽，轉生爲魔，已大不幸，今復爲情欲所驅，眷念於汝，願與汝締爲因緣。汝或不許，余則與其他男魔爲婚姻，誕育魔類，以荼毒於藏土。汝若有不忍人之心，則從余之所請。』菩薩聆言，發慈悲心，遂與魔女爲夫婦。生六男六女，菩薩飼以神穀，於是其子女身上之毛漸脫落，尾亦縮短，終至消滅。……菩薩攜此六子六女，至於馬亞礎森林中自相配偶，由是族類繁衍，以後擘裂爲十二國。」

按此神話首云「吾人導師釋迦牟尼涅槃後，」則神話之構成時代必在佛教進入西藏以後。次云「聖人觀世音菩薩化身爲猿猴，降臨西藏。」攷觀世音菩薩之出現於佛教諸神中，在亞歷山大遠征印度之後；當時希臘藝術家膺集犍陀羅（Candhala）把許多希臘諸神改裝爲佛教的諸神，觀世音菩薩者，即希臘諸神中之埃西，印度稱之曰阿利帝母，（Hariti）到中國則稱之曰觀世音，或簡稱觀音。亞歷山大之遠征印度在紀前三三〇年代，而觀世音之出現則又當在

此時之後，其輾轉以傳播于西藏，而成爲西藏土人之信仰，恐在隋唐之際。因其中所謂魔女魔男，乃指異教徒而言。據西藏紀年史所載，在佛教未傳入西藏之前，西藏地方流行一種黑教，藏文稱之曰「班」，此種宗教係由阿剌伯輸入，乃係一種崇拜自然的宗教。即新唐書所云「事羱羝爲大神」者是也。當佛教進入西藏時，此種黑教曾與佛教作激烈之鬥爭。西藏之通於阿剌伯，正在唐代，亦即吐番全盛的時代，故黑教之傳入西藏，亦當在唐代，此時即有印度人種之加入，亦與吐番之種族來源無關。所以傳說中雖欲製造西藏人種來自印度之假說，然而在這個神話的反面，却露出了當觀世音菩薩未化身入西藏以前，西藏高原早已佈滿魔男魔女。而此魔男魔女，正是信奉阿剌伯黑教的吐番種族。是印度人在西藏所遇到的，不是一塊無人的世界，而是強大的吐番族。

同書中又載一類似之神話云：

「昔印度釋迦族中阿育王之後，有瑪加達與結巴者，孿生兄弟也。以政見不睦，瑪加達太子，被竄於藏土。或曰太子生而狀不類人，手指足趾間，皆綴有薄膜若鵝鴨之蹼然。其眼皮復自下而上覆，有如鳥雀。其父以爲不祥，故放逐之。太子至於藏邊，登拉納子（按即喜馬拉雅山）乃縱望藏土。於是踰雪山，良地阿隆，至於眞塘之貢比納山。由此降於山麓，遂爲郊原牧人所見。牧人詢之曰「君從何來？」太子以手指天，意謂來自高山之上，牧人誤其意，以爲自天而降神也。乃負之歸其部落，戴以爲王，是爲仰賜贊普。仰賜贊普者，西藏首出之人王也。」

按瑪加達在紀元前五世紀即出現於印度。而阿育王之時代則在紀前二六四年至二二七年。故神話中謂瑪加達爲阿育王之後，時代顛倒。瑪加達與釋迦族同係雅里安人種，但是否屬於釋迦族，則不得而知。佛典中謂淨飯，白飯，

斛飯，甘露皆爲釋迦族，但未見瑪加達。從世界史的文獻攷察，當紀前五世紀時，正是佛教興起的時代。當時雅里安種族已進到恆河流域，建設了強大的國家。他們的勢力，幾乎擴大到全印度，從犍陀羅到亞梵提(Avanti)之間，散在有十六個國家，而瑪加達與哥薩拉最爲強大。據「摩拏法典」所載，當時印度已有六十種職業，想見當時手工業分工之發達，佛典中亦常有關於商人之記載，或者在當時已有少數瑪加達的商人逾過喜馬拉雅山而至於西藏，亦未可知。但是誠如傳說所云：當瑪加達的太子到達西藏之時，西藏高原已經有了「郊原牧人」之部落，此「郊原牧人」之部落，即吐番之原始種屬也。

由此看來，吐番族中，即使有印度人種之血液，也是非常稀薄的。

學者又或疑吐番之族，來自緬甸，因今日西藏的語言系統，屬於緬甸語系。英人查理貝爾氏(Charles Pell)於其所著西藏之今昔(Tibet Past and Present)一書中，即謂西藏人中一部份來自東北(甘肅一帶)一部份來自南方阿薩密(Assam)與緬甸。

按緬甸人種，屬於南太平洋系統，此種人種之一分支，在史前時代，即與南徙於西昌一帶的諸羌發生接觸，在當時，南北兩系人種之間，當然有血統與文化的交流。但當時彼此皆處於無文字的歷史階段。甚至到唐代吐番種族還是沒有文字，故西藏的語言，即使受南太平洋系人種之影響，亦爲吐番佔領西藏以後之事。攷西藏人種與南太平洋人種之繁密接觸，當在唐代中葉，吐番族與南詔角逐於西南山嶽地帶之時，當時吐番與南詔在聯盟(註十九)與戰爭(註二十)中，確實有着血統與文化的交流，但其時在吐番種族形成之後，與吐番人種之淵源無關也。

由此吾人又知吐番之人種與印度緬甸人種無關，因而余以為其種族之來源，乃自史前以迄秦漢時代南徙諸羌之匯合也。

（註十九）舊唐書南詔傳云：「明年（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率……遇大和城，為南詔所敗，自是閣羅鳳北臣吐番，吐番令閣羅鳳為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蠻謂弟為鍾，時天寶十一年也。」同上書又云：「大曆十四年……吐番役賦南蠻重數，又奪諸蠻險地立城堡，歲徵兵以助防，牟尋厭苦之……乃去吐番所立帝號。」

（註二十）同上書云「初（貞元十年）吐番因爭北庭，與回鶻大戰。死傷頗眾，乃徵兵於牟尋須萬人，牟尋既定計歸我，欲徵兵以示寡弱……遣兵五千人戍吐番，乃自將數萬躡其後，晝夜兼行，乘其無備大破吐番於神川。」

論陳涉吳廣的起義

一 革命的領導者陳涉吳廣

紀元前二〇九年，中國史上爆發了一次有名的農民革命。這就是陳涉吳廣的起義。陳涉吳廣的起義，雖然像紙砲一聲，轟然而滅，但這一次起義，是中國農民第一次反專制反獨裁的革命，而且第一次粉碎了專制和獨裁的政權。

據史記陳涉世家云：「陳勝者，陽城（今河南登封縣）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今河南太康縣）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與人傭耕」就是傭農。至於吳廣，是否也是傭農，史無明文，但他的身份，大概和陳涉差不多，因爲他和陳涉同樣是秦代的「閭左」之民。徐廣曰：「（秦時）凡居以富強爲右，貧弱爲左。」「閭左」之民，就是「貧弱」之民。

同書又云：「二世元年七月，（因北邊有警，秦代政府徵發閭左之民，）適戍漁陽（今河北懷柔縣）九百人，屯大澤鄉；（今安徽宿縣南）陳涉吳廣，（以同爲閭左之民，）皆次當行，爲屯長。」

「屯長」就是押解壯丁的隊長，壯丁的隊長，也是壯丁。於是他們就由「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一變而為「遷徙之徒。」

從這裏我們知道陳涉，吳廣，以前是「與人傭耕，」胼手胝足於壟畝之間，以後又被徵為壯丁，「躡足行伍之間，俛仰仟陌之中。」既沒有絲毫財產足以結納徒衆，又沒有受過政治和軍事的教育，足以乘時因勢，更沒有高名重望，足以號召天下，然而何以卒能發動一個驚天動地的革命？

或有人說這完全是歷史的偶然。誠然，陳涉吳廣之最初的起義，不過是一隊壯丁的造反，造反的原因，是因為天雨失期，失期當斬。看起來好像是偶然的。

又有人說，這完全是陳涉的煽動。誠然，陳涉起義之前，曾經玩弄了一些魔術。例如，他以丹書帛曰：「陳勝王」。又如他於叢祠中夜篝火使人作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這些魔術，對於當時富於迷信的農民，不能說沒有煽動的作用。

但是，我以為這些都不能成為理由。陳涉吳廣之最初的起義，固然是由於「天雨失期，」然而「天雨失期」之所以成為造反的原因，則是秦代「失期當斬」的苛法。帛書狐鳴的煽動作用，不過是暗示陳涉當王的天命，但陳涉當王的天命之所以有人相信，則是由於人民認為咸陽政府的天命已盡。所以我以為陳涉吳廣之能喚起一個大革命，不是天雨，不是帛書，也不是狐鳴，而是秦代專制獨裁的暴政。

二　革命前夕的社會

司馬遷曰：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

在這裏，司馬遷把陳涉的起義，比之於湯武伐罪，春秋誅暴，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爲秦之失政，由來已久，自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就走上了專制獨裁的道路，推行暴君政治。其積怨於人民已非一日，陳涉吳廣的起義，正是秦末農民對專制獨裁的暴政之血的回答。

秦始皇是中國第一任專制獨裁的皇帝，他總以爲天下是他打出來的，他就有權一手包辦天下之事。他不知道削平六國，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而是當時商人地主集體的力量，並且是當時歷史發展之必然的歸結。但是秦始皇却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專制暴虐，開創獨裁政治的端序。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所以秦代政權，不及二世而亡，雖然滅亡的只是他的直系子孫，至於他的傍系子孫，則眞是自一世二世以至萬萬世，歷代相承，以至今日。

秦始皇直至現在，尙被當作專制獨裁的典型人物，史記論秦始皇之爲人曰：

「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幷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服謾欺

以取容。秦法(一人)不得兼(有兩種)方(技),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卽方士)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文)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其)貪於權勢至此。」

為了鞏固專制獨裁的政權,這位獨裁的皇帝卽位以後,就採取了左右開弓的政策。他一方面「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解除全國農民的武裝;另一方面「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把殘餘的六國舊貴族一網打盡。

六國的殘餘舊貴族,大半都圈禁在咸陽,但猶以為未足,又通緝在逃的舊貴族,如楚之貴族項梁,「嘗有櫟陽逮捕」。(項羽本紀)魏之名士張耳陳餘,同被懸賞購求(本傳)。猶以為未足,又將集中軟禁的舊貴族,流放邊疆,所謂「徙謫實之初縣」。卽指明此事。猶以為未足,於是而有焚書坑儒之舉,企圖以此根絕舊貴族之思想的根源,從而滅絕人類的知識,以遂行其統制文化思想的愚民政策。

紀元前二一三年,咸陽宮裏發布了焚書的通令,其令曰:

「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郡守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而不舉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者),黥為『城旦』。(城旦,卽輸邊令築長城,四年徒刑。)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跟着這道命令的發布,首先在咸陽市的廣場上,就縱起了焚書的烈火。接着這焚書的烈火遍及全國,而中國最優

秀的古典文獻，除皇家圖書館（即博士官所職）留下一分，其餘全部化爲黑灰。

第二年諸生四百六十餘人，在咸陽的郊外，一坑活埋。其餘各郡各縣以「偶語詩書」或「見書不舉」或「令下三十日不燒」，而在「以古非今」的罪名之下，被黥爲「城旦」，被「棄市」，被滅家夷族者尚不知有多少。

咸陽變成了殺人犯的巢穴。這裏是智識份子的屠場，文化思想的墳墓。在當時，智識份子要想逃出咸陽，就像逃出地獄一樣。然而秦始皇却不許他們逃亡，他要留下幾個知識份子作爲他的政治花瓶。所以博士七十人雖已「弗用」仍然「備位」。

在另一方面，農民雖然已經解除武裝，但猶以爲未足，又於各郡置「材官」（即常備軍）以準備對農民之隨時的屠殺。猶以爲未足，又「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獄吏」，嚴刑峻罰，向人民示威，以至「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漢書刑法志）猶以爲未足，又嚴密基層政治的組織，於縣之下分鄉，鄉之下分里，把農民放在三老，嗇夫，游徼，亭長，里正的層層統治之下，成爲馴良的農奴，一聲不響地被榨取，被奴役，乃至餓死。

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一隊一隊的農民，連同他們的妻女財產，送到咸陽，到了咸陽，農民的財產便化爲離宮別館；農民的妻女便化爲妃嬪美人，而農民的本身則被當作壯丁，送到四方。或負弩前驅，北伐匈奴；或肝腦塗地，南征五嶺；或壘石擔土，修築長城；或塹山堙谷，開闢馳道。

猶以爲未足，又於咸陽附近之酈山，設置一所類似今日法西斯「集中營」的大監獄，其中禁閉着「隱宮徒刑者七十萬人」，秦始皇強迫這些囚徒作無償勞動，替他建宮殿，掘墳墓。

在這一時代，三十萬人守塞北，五十萬人戍嶺南，七十萬人修宮殿，此外還有成千成萬的人築長城，開馳道。西自臨洮，東至遼東，北自齊魯，南至吳楚，到處都是農民屍骨。這些農民，死於戰爭，死於飢餓，死於虐待。或暴骨沙漠，或委命山谷，或斃命黑獄，或轉死道路。所有的農民都脫離了土地，脫離了生產，咸陽變成了金穴，而全國農村則變成了沙漠。誠如淮南子人間訓所云：「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攷縷。羸弱服格于道，丈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而這就是秦始皇左右開弓政策的結果，專制獨裁政治的成績，也就是陳涉吳廣革命起義之前夕的社會內容。

三　革命的爆發及其展開

人民對暴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他們就不管甚麼皇帝不皇帝，都要和他拚一個死活。語云：「捨得一身剮，皇帝拉下馬」，這就是被壓迫人民之最後的辦法。

當始皇時，人民對這個窮兇極惡的獨夫，所發出的警告已經不只一次了。始皇二十九年，博浪沙中已經伸出了舊貴族的鐵錘。三十一年，蘭池道上，又出現了農民的匕首。三十六年，東郡的隕石上，又刻出「始皇死而地分」的標語；同年華陰道上，又有人帶給始皇一個口信說「今年祖龍死」。這一系列的事實，表示了當時農民對土地之渴望，和對這個獨夫的深惡痛絕，憤怒和願與偕亡

秦始皇在暴風雨的前夕死去了。其子二世繼立，趙高爲承相。宦官執政，奴才當權，殘殺親族，壓榨人民，屠滅文化，統制思想，貪污腐化，荒淫無恥，較之始皇時代更變本加厲。

據史記二世本紀云：「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同書又云：「（二世）繁刑嚴罰，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時。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更處窮困之實，咸不安其位。」

像這樣一個政權，當然是罪惡的淵藪，人民的怨府，除了二世那個獨夫和他的奴才以外，當時社會各階層的人民，無不企圖推翻這個萬惡的政權，以求解放。

恰好當時北方有警，全國大徵兵，所有的農民，都要被征，送到漁陽的戰場。歷史的記錄告訴我們，在當時，到處的亭長都在捕捉壯丁。無數的壯丁大隊，都在向今日河北北部開拔。此外輸芻挽粟以向咸陽的運送隊，遍於道路。而貪官酷吏，則假借徵兵徵糧，額外苛索。

太陽熄滅了，遍天下都是貪官酷吏，強盜吸血鬼，殺人犯。就在這個時候，暴風雨來了！陳涉吳廣舉起了革命的大旗。

革命在大澤鄉（今安徽宿縣境內）爆發，最初不過九百個戍卒的叛變。但在陳涉吳廣的指揮之下，他們很快就佔領了大澤鄉，佔領了蘄縣（今宿縣）的縣城。

革命的攻勢，疾速地展開。在一個符離縣的農民葛嬰的指揮之下，不到幾天，就解放了蘄縣以東銍、酇、苦、柘、譙諸縣廣大地域的人民。

苦難的人民，一旦從暴政中得到解放，他們都紛紛起來，用鋤頭木棒，武裝自己，並且自己帶着糧食車輛和騾馬，來參加農民軍的隊伍。旬日之間，在陳涉吳廣的旗下，已經不僅是九百個戍卒，而是「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

現在革命的農民軍，從蘄縣（宿縣）轉旗而西，向陳州（今河南淮陽）進軍。陳州的守令，早已聞風而逃，革命軍在沒有抵抗的情形之下，進入陳州，就在陳州組織了以陳涉爲首的革命政府。

太陽出來了，陳州城上，揚起了「張楚」的旗幟。

革命的農民軍，並沒有把他們的步伍停在陳州，他們展開了更大的攻勢。在當時，吳廣之軍，西擊滎陽；宋留之軍，南向武關；分道並進，西向咸陽。在後方，則葛嬰之軍，已下東城；鄧宗之軍，已入九江郡；革命的勢力，深入淮南。

革命的影響，很快就擴大到全國的範圍。據史載，當時各地農民起義者，有：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

銍人伍徐，將兵居許。

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鷄石、取慮人鄭布，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

此外，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

這些革命的農民，無不斬木爲兵，截竿爲旗，風起雲湧，起來響應陳涉的革命。他們「家自爲怒，人自爲鬥，各報其怨，

而攻其仇。」於是縣殺其令丞，郡刑其守尉，羣起而亡秦族矣。不到幾月，秦代專制獨裁的政權，就在農民大衆的鋤頭木棒之下，搗成粉碎了。

司馬遷曰：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錟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勢，功業相反……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四　革命的被篡竊及其失敗

自農民軍佔領了陳州以後，陳州就變成了革命的中心。這裏，不僅是農民的大本營，也是舊貴族和智識份子的避亂所。據史載：張耳陳餘，「魏之名士也」「上謁陳涉」。魏咎，魏之諸公子也「在陳王所」。此外如周文，周市，蔡賜等所謂「賢人」「豪傑」之流，都在革命的高潮中湧到了陳州。甚至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和魯國諸儒，這些寬衣博帶的智識份子，都紛紛投到陳涉的旗下。

智識份子之投到陳涉的旗下，其動機很簡單，就是爲了反對秦代政府「焚書坑儒」的政策。司馬遷曰：

「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

旬月以王楚，不滿半載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至於那些舊貴族之混進農民革命軍的營陣，他們就懷抱着一種卑劣的政治陰謀，他們是企圖利用農民革命軍的武裝，再建六國的政權。具體的史實指示出來，當革命軍進入陳州，農民都一致推戴陳涉爲首領。他們說：

「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請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張耳陳餘列傳）

但當時舊貴族却找出許多理由，反對陳涉爲王。史載張耳陳餘之言曰：

「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胆，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暴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無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立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張耳陳餘列傳）

這是何等漂亮的治政說詞呵！但是一句話揭穿，就是反對農民組織自己的政權，而要引導農民的力量去實現舊貴族的政治目的——「立六國後」，恢復戰國時代的舊局面。

張耳陳餘反對組織政府的異議，並沒有爲農民軍接受。政府還是要組織，陳涉還是要稱王。舊貴族第一次的陰謀，算是失敗了。

舊貴族既不能阻止革命政府的組織，於是改變計劃在組織政府的時候，拚命的鑽進政府的機構，企圖從政府的內部去控制這個革命的政權。據史載當時陳州政府以上蔡人房君（房邑之封君）蔡賜爲上柱國，（等於丞相）以陳之賢人周文爲將軍，以孔子七世孫孔鮒爲博士，以酷吏出身的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而張耳陳餘則定計決策，參與大計。此外「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更不知有多少「豪傑」「賢人」擠進了陳州政府。這樣一來，陳州政府，便不是農民的政府，簡直是貴族，豪傑，賢人，智識份子的政府。

舊貴族既混進政府的機構，他們又進一步篡竊革命的武裝。據史載：陳餘說陳涉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地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涉以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張耳陳餘，一過黃河便背叛了農民革命，立武臣爲趙王，張耳自爲大將軍，陳餘爲丞相。此外，魏人周市，竊兵入魏，也背叛了農民革命，而立魏之貴族寧陵君咎爲魏王。陳之賢人周文，亦自言知兵，竊兵入關，結果爲章邯所敗，周文自刎，軍遂不戰。這樣革命的武裝，一部份犧牲了，一部份則變質而爲舊貴族割據的工具。

舊貴族既篡竊革命的武裝，又更進一步去腐化革命的領導者。他們使陳涉深居高拱於殿屋帷幄之中，隔離他和農民的接觸。陳涉究竟是一個天眞爛漫的農民，他在舊貴族的玩弄中昏迷了。他眞以爲有了舊貴族，豪傑，賢人和智識份子來捧場就可以不要農民，於是開始脫離農民，而農民也就離開了他。史記陳涉世家云：

「陳涉已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

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具歸。入宮見殿屋帷幄，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沉沉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

陳涉和農民一天天疏遠，並且漸漸對自己的同志，表示不信任，於是農民軍將領吳廣，鄧說，葛嬰相繼被殺害，此外被殺害的將領，尚不知有多少。陳涉世家曰：

「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跟着革命首腦的腐化，各地農民革命軍遂開始瓦解的過程，據史載：「陳涉使武平君畔，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勿聽。」因矯王命以殺武平君畔。」從此以後，郯下諸軍，遂脫離了陳州政府的領導。此外淮南一帶之「楚軍數千人爲聚者」，亦各自爲戰。

農民革命的高潮過去了，跟着而來的，是他的敗亡。不久秦代政府的大軍，在章邯的指揮之下，東向而擊。當時周文之軍，一敗於戲，再敗於曹陽，三敗於澠池，周文自殺，軍遂潰散。秦軍乘勝而東，至於滎陽。時吳廣已被害，田臧爲上將。乃使主將李歸守滎陽城，而自率精兵，迎擊秦軍於敖倉。田臧戰死，軍亦潰散，秦軍遂圍滎陽，李歸敗死，滎陽陷落。

爲了牽掣秦軍的攻勢，當時陳涉曾遣使命趙王武臣率兵西擊。但是張耳陳餘却建議趙王反對出兵，於是章邯由滎而東，一擊而下陳州。陳涉逃至下城父，爲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州政府就這樣結束了。

陳涉雖死，而革命的農民並沒有被秦軍嚇退。跟着陳涉之死，將軍呂臣又出現爲農民軍的領導者，組織蒼頭軍，起義於新陽（今河南汝南縣境內）克復陳州，誅死叛徒莊賈，復以陳爲楚。秦嘉則立景駒爲楚王，集合郯下的農民軍，繼續反秦的鬥爭。此外酈山囚徒鯨布亦出現爲淮南一帶農民軍的領導人物。但這已經是農民革命的尾聲了。

我們從上述的史實中，可以看到陳涉吳廣領導的農民革命之失敗。其原因，是因爲陳涉吳廣不能控制革命的高潮，因之使革命的破壞者舊貴族，混進了革命的陣營。篡竊革命的政權和革命的武裝，並且隔離革命領導者與羣衆的關係，進而使革命的領導者不相信自己的幹部，殺戮自己的幹部，這樣一來，革命的政權變了質，革命的武裝落了空，革命的陣營瓦解了，革命的領導者變成了孤家寡人。

任何時代，當革命高漲的時候，都會有革命破壞者竄進革命的陣營。謹防「張耳陳餘」，不要有了貴族，豪傑，賢人，縉紳，就忘記了農民，不要不相信自己的幹部，而且隨時要檢舉莊賈那樣的在革命危急中倒戈的叛徒，這就是秦末農民革命留下來的教訓。

陳涉吳廣的起義雖然失敗了，但這個起義是偉大的，因爲這是中國農民第一次和專制獨裁的皇帝宣戰，而且是第一次告訴中國的農民：

「要推翻專制皇帝獨裁政治，唯一的辦法，就是拿起武器，起來革命。」

論王莽改制及其失敗

一　非變不可的時代

王莽改制，是出現於中國史上的第一次改良運動，但這件事，寫在西漢史上，却變成了一幅滑稽的插圖。

王莽改制之被滑稽化，主要地，是因爲王莽曾經用了一種政治手段，篡竊了西漢的天下，而這在中國政治道德上，是不允許的。不僅如此，在篡竊的過程中，王莽又動輒稱引聖經賢傳以文飾其奸逆。例如他本來是一個亂臣賊子，而到處自比于伊周，本來桀紂不如，而晏然自以爲黃虞復出也。當王莽之時，聖經賢傳的文詞，充滿文告，仁義道德的口號，響澈雲霄。例如當王莽辭新邑田時，當時大司徒陳崇曾有一封頌聖的奏書，其中把聖經賢傳上的美辭，都搜集起來，歌頌這位篡竊的「聖人」。其中有言曰：「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也。」「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公之謂也。」「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公之謂也。」「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也。」「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也。」「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也。」這誠如漢書王莽傳所云「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塗殊歸，俱用滅亡。」吾人讀史至此，不覺深有慨乎聖經賢傳之

往往爲奸人所利用，而仁義道德之往往爲篡竊者所假借也。

雖然，姦逆終非文辭所能粉飾，是以千餘年來，王莽在道德的法庭之前，遭受了中國歷史家殘酷的裁判。王莽的名字，直至現在，還是被當作篡竊者的符號，足見善惡之心，人皆有之。卽因如此，所以王莽改制，也被滑稽化了。

但是，假如吾人離開「祖劉」的立場，則可看出王莽的改制，並不是一種純理想的企圖，而是西漢歷史發展到不得不變之結果。具體的史實，指示出來，西漢的政權，至於成帝已開始其崩潰的過程。當此之時，五侯專政，外戚用事，阻塞賢路，濁亂天下，貪汚腐敗，驕奢淫逸，達到極點。例如「五侯諸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來。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又「大治第宅，第中起土山漸台，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元后傳）當時貴族之驕奢也如此，其他官僚亦「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蓄奴婢，被服綺穀，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埋葬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成帝紀）這種情形，卽以成帝之昏庸，亦知「似此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

當時的貴族官僚，其貪汚所得，過於龐大，用之於彫樑畫棟而不盡，用之於聲色狗馬而又不能盡，於是出其餘裕，用於土地之收奪，以再生產其財富。如：「紅陽侯王立，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田數百頃。」（孫寶傳）又如「張禹佔鄭白之渠田數百餘頃，他人兼併者類此。」（通考）這樣就加速了農民離開土地的過程。

與政治的收奪平行，同時，又來了一支掃蕩農村的生力軍，這就是商業資本。按西漢至成帝時，世界統治，已經瓦解，跟着建始四年「典屬國」（今之拓殖部）的衙門之撤消，大多數經營外國貿易的商人，皆相率從世界市場上退回本

士，因而演成龐大商業資本向國內倒灌的現象。當時國內的手工業作坊，亦因國際市場的喪失，正緊縮其規模，並不能完全消納此等撤回的資本。但是資本總是要找出路的，所以不久此等過剩資本一部份遂囤積居奇，壟斷人民的生活資料。另一部份則搖身一變轉化爲高利貸資本湧進農村，而且卽刻就抓住了那些渴望貨幣的貧苦農民的頭髮，迫使他們把自己的土地家屋、以及一切有價物都當作利息交付出來。最後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身體也以奴婢的形態提供出來作爲債務的淸算。

由於貴族官僚與豪族商人之土地兼併的競賽，於是土地日益集中，貧困日益擴大。當此之時，誠如王莽詔令所云：「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地，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於臣民，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又如荀悅所云：「西漢之世，豪強之暴，酷于亡秦，今豪民佔田，或至數千百頃，富過王侯。」

又況人禍之外，復益之以天災。成帝有詔曰：「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于飢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成帝紀。）

當時農民，其土地之被剝奪者，多已餓死溝壑，卽有土地者，「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牛馬餘菽粟，貧者不厭糟糠。」（王莽傳）加以急征暴斂，敲骨入髓，地租之外有稿稅，算賦之外有更賦，此外鹽鐵有稅，酤酒有稅，車船有稅，海有稅，山林園池市肆乃至六畜亦無不有稅。農民若不能交出此種稅款，則「一人有辜，舉家系獄。」（成帝紀、如此，則當時的農民，雖欲不女爲倡，而男爲盜，豈可得乎？果然潁川的鐵官徒（鐵廠的工徒）首先爆發了叛亂，

接着在廣漢，在尉氏，在山陽，也相繼發生了民變，自是而天下蕭蕭然矣。

到哀帝時，外戚倖臣，把持國柄，貪汚腐敗，日甚一日，據史載，哀帝一次就把農民的土地賞給他的男寵董賢二十萬畝以上，又賞給董賢的錢合計四十三萬萬，其他不及細舉。當時諫議大夫鮑宣曾上書曰：「陛下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倖臣董賢，多賞賜以鉅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

當時社會的情形，鮑宣曾慨乎其言之曰：「夫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幷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徭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刼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錯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

在七亡、七死的災難之中，當時的人民，遂騷然大動。哀帝紀云：「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夜或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在堂堂的首都而飢民公然「持火上屋，擊鼓號呼。」這是何等駭人的現象！

由此看來，西漢至哀帝時，天下蕭蕭然已呈變局，有王莽的改制固變，無王莽的改制亦變，王莽知變可以制變，故爲改制之圖。其主觀動念固在欲因天下之變以鞏固地主的統治，但在客觀上也正是當時人民的願望。蓋當時除少數

的貴族官僚和豪族富商外，所有的人民，無不希望有一種政治的改良，以打破當時黑暗腐敗的局面。所以我以爲王莽的改制，在客觀上，是順乎人也，順乎人者昌，是以王莽得以變而致身於皇帝。但在主觀上，是私乎己也，私乎己者亡，是以王莽雖篡竊大位，不旋踵而遂血肉狼藉於人民之前。

二 改革的內容

不論怎樣，王莽總是一個聰明的政治家，他看清了當時社會，已經非變不可，與其任其自發的變，不如先爲之變以制其變，如此則變之權操於己，變之用存於己，從而導天下之變於自己有利的方向，以鞏固其統治。同時，王莽又看清了當時社會的危機，是從社會最深刻的內部爆發出來的。最主要的，是貴族官僚豪族商人之土地兼併，使農人失掉了土地。其次是商人之高利盤剝與物價壟斷，造成了社會的不安。所以他針對着這種社會癥結，展開其改良政策。

王莽知欲天下之安，必須消滅「部落鼓鳴盜賊橫發」的現象，欲消滅此種現象，必須農着於土，欲農着於土，必須耕者有其田，故爲王田之制。所謂王田者，即將兼併者的土地，收爲國家所有，再由國家計口授田，以之分配於人民。王莽傳云：「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鄉黨，故(以前)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如制度」者，即一夫受田百畝也，王莽對於執行此種土地政策，似有決心，他曾有詔曰：「敢有非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跟着土地之政策而來的是勞動政策，爲了發掘勞動力，王莽又在「天地之性人爲貴」的人道主義的美名之下頒

布了禁止奴婢買賣的詔令。其令曰「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

為了打擊豪商巨富之囤積居奇操縱生活資料，王莽又曾為六筦之政。筦者，專賣之意，六筦者，即對於六種日用必需的物資之專賣也。王莽傳曰「夫鹽食餚之將，酒百藥之長，宴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筦之。」

為了打擊豪民富賈之壟斷物價及高利盤剝，王莽更為五均之政。五均者，即於當時商業最繁榮的五個城市，如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各置均輸官一人，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謂之曰五均輸市。其職務一方面是徵收商稅，另一方面則是平準物價，及對農民作小本貸款。當時的平價，據漢書食貨志云，並不是追隨黑市而高漲，而是「萬物昂貴過平（價）一錢（者），則以平賈（價）賣與民，其賈（價）依賤減平（價）者，聽民自相與市」政府并不希望利用平價政策作發財的企圖。其貸款也亦不僅豪民富賈始能享其利，而是「凡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丞以取入工商之貢，但賒貸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每過歲什一。」這樣一來，壟斷物價者與高利盤剝者，遂無所施其技矣。

為了集中現金於政府的手中，王莽又為幣制的改革，據史載，王莽曾廢當時通用之五銖錢，更為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凡二十八種，並嚴申私人盜鑄之禁。此種新幣如龜貝之類，大抵一錢不值，其他亦多為額面金與實際價值不符之錢幣，實即後來之所謂不兌現之法幣也。這種新幣的發行，則豪民富商之現金，遂可以轉移于國家之手中。

王莽的經濟改革大概如此，此種經濟改革顯然是集中打擊於豪民富商，同時貴族官僚亦不得不遭受其殃。因此王莽在當時的貴族官僚豪民富商看來，簡直是自己集團中的叛徒與敗子，反之，在農民看來，則是一種意外的希望。假使王莽的經濟改革能順利進行，逐步實施，則未始不可使當時的社會轉危爲安，而王莽的政權也不致曇花一現。可惜他的政策遭遇了貴族官僚豪民富商之激烈的反對，同時，王莽在新政的推行中又用非其人，以至半途而廢。

據王莽傳所載，在推行政治的過程中，因「坐買賣田宅，奴婢鑄錢，自諸卿大夫至於庶民（豪民富商）抵罪者不可勝數。」於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言人區溥公開反對王莽沒收土地的政策。他說：「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所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侯，迄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者（地主之心）追復千古絕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不可施行。」即因土地所有者之反對，於是王莽遂于建國四年下令取消。其令曰「諸名田王國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農民）者，一切勿治。」

五均六筦者，所以制止豪民富商之壟斷物價，高利盤剝者也，然而王莽用以執行此種政策之人，皆係豪民富商。漢書食貨志云：「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淄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庫不充，百姓愈病。」即因五均六筦之權，操于豪富之手，於是他們與地方官相互勾結，利用平價政策，賤買于民而貴賣于市。因而愈平價而價愈高，以致「米斗萬錢」「黃金一斤，易豆一斗。」像這樣的平價政策，比不平價還要壞百倍千倍，當然引起人民的痛恨。所以到地皇三年五均六筦也取消了。

至於新幣制，則以種類複雜單位太多，以致人民「每一易錢，輒因破產。」所以人民更不樂從，而仍多盜鑄五銖錢，私相流通。於是王莽令「伍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鐘官(鐘官者主錢幣之官)愁苦死者十六七。」雖然如此，新幣仍不能行。

由此看來，王莽的經濟的改革無一不半途而廢，以是而知王莽之敗非由於變也實不能堅持其所變而使之及於通，換言之，乃不及於通而遂不變也。

三　回到暴力政策

王莽的改良政策，曾經給農民以一種新的希望，一旦皆半途而廢，則農民皆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怨恨，以致於叛亂；此自然之理也。王莽深知欲鎮壓此輩失望之農民，必須用更大的殘酷，而這就是王莽在後來走向暴力政策的原因。

王莽最初本想招來一個「四夷來王」的盛事，用外來的光輝來替自己鍍金，藉以在國內人民之中建立威信。據史載，他曾大派外交使節，分道四出，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勾驪扶餘；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至句町；西出者至西域，北出者至匈奴。但四夷並不捧場，他招來的不是「四夷來王」，恰恰相反而是「四夷叛變。」首先叛變的是匈奴，跟着高勾驪穢貉遂反。以後西南夷和西域諸國也叛變了。

為了維持自己在人民中的信仰，并欲以對外戰爭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於是王莽大發兵征四夷。據史載王莽曾派孫建等十二員大將十道并出征匈奴，派嚴尤擊高勾驪穢貉，派馮茂擊句町，及其他西南夷，派王駿遠征西域。在這些東西南北的國際戰爭中，除了東征之軍以誘殺高勾驪侯騶而結束，西城之軍以王駿死於焉耆之襲擊而消滅，此外北伐匈奴南征西南夷的戰爭則變成了長期戰爭了。

為了支持征伐匈奴和西南夷的戰爭，於是王莽下令大募天下丁男以實邊塞，苛徵暴斂以給軍食。王莽傳曰：「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徒吏民奴名曰『猪勇』以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資卅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國黃綬皆出錢為政府保養軍馬，多少以秩為差。」又云「莽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驅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天下騷動。」

戰爭長期地持續，據王莽傳云「自越巂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皆西南夷名）反叛以來，積且十年，郡縣距擊不已……費以億計，吏士罷毒氣，死者什之七。」最可笑的，是王莽派出征伐匈奴的將軍「先出者屯邊郡」「不敢與匈奴戰」只是「貨賂為市，侵漁百姓。」這些將吏他們在自己的戰區「各為權勢，恐猲良民，妄封人頸，得錢者去，毒蠹并作，農民離散。」

對外戰爭，并無結束之望，當時每年運往西河、五原、朔方、漁陽一帶的錢穀，每郡以百萬數。又令郡國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長安，前後僕僕于道路。而貪官汚吏又假借戰爭之名，苛征暴斂，據王莽傳云：「（當時）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轉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

迭相賄賂，白黑紛然。」黃金白銀，盡入私囊，檻車鐵鎖，無非冤枉。又「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長安變成了貪污的中心，殺人犯的窠巢了。

與戰爭平行，又大興徭役。據王莽傳云：「莽太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九廟）者絡繹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章（諸宮）……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殿皆重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瑚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當建築時，十個「將作」日夜督工，「卒徒死者數萬人。」

王莽又聽說古有黃帝，曾以百二十女致神仙，乃派中散大夫及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採鄉里淑女，上其姓名，由王莽挑選一百二十名，於是王莽遂與這些淑女講求所以爲神仙之道。但同時，也不忘記和公卿大夫宣揚六經，講求所以爲聖人之道。更沒有忘記發號施令，南征北討，與諸將講求所以爲英雄之道。他想做神仙，想做聖人，也想做英雄，實則他已經踏入了荒淫暴虐，糊塗的深坑，而不能自拔了。

雖然如此，他還是要一手攬盡天下的大權，專制獨裁，剛戾自用，命令如牛毛，而又朝發夕改，據王莽傳云：一切「務自攬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之官，皆用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皆由宦者左右開發，尙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改變制度，政令繁多，當奉行者輒質問（質問者請示也）乃以從事。（從事者實施也）前後相承，憒眊不渫。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尙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去。衞卒不交代者三歲矣。」「縣宰缺者數年，郡守兼任。」

又據王莽傳云：「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遴者吝也）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官吏俸祿「不能盡得。」但是據同傳所載，當新市平林圍長安時，王莽「省中黃金萬斤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鈎盾藏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櫃。長樂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然則王莽之不發官俸，並非無錢。

像這樣的政治，當然要使得天怒人怨。史載王莽時，嚴重的天災，如大雨雪，大風雹，大蟲蝗，大旱災，大癘疫，河決地震，幾乎年年都有。同時農民也以窮困紛紛流亡道路了，當時「流亡入關者數十萬人。」

據說王莽亦曾派員賑濟飢民，但「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廩，餓死者什七八。」後來「莽聞城內飢饉，以問王業，（賑濟專員）業曰皆流民也，乃市買粱飰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然則以王莽之明，亦頗受左右之蒙蔽也。

不久，農民大叛亂爆發了，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南北並起，於是王莽通令全國，就地剿滅。但當時地方官皆畏賊不敢進剿，「縣欺其郡，郡欺其朝庭，實百言千，實千言萬，」以卸責任。卽有討賊者，而討賊之軍「郡縣苦之，反甚于賊。」（王莽傳田況語。）

盜賊之勢，日益擴大，王莽乃命太師廉丹，更始將軍王匡，率領大軍進討，但這些官軍「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甯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猶可，更始殺我。」所以廉丹一出馬門，便被赤眉殺死，而更始也全軍覆沒，落荒而逃。

跟着四方盜賊的挺起，而王莽肘腋之下，也發生了不穩的現象，這首先就是劉歆、王涉等的叛亂陰謀之暴露，接着他的兒子王臨，也要謀殺他。衆叛親離，已至獨夫末路。爲了鞏固首都的秩序，王莽曾「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市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但鉅鹿男子之謀刺王莽如故也。

一切的暴力都沒有得到效果，不久新市平林攻破長安，而王莽之頭遂高懸宛市矣。

漢書王莽傳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稱仁……及其篡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又復姦雎，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流毒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肢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腐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漢書之言是也，但王莽之所以陷于慘敗者，蓋以其由改良政策走向暴力政策之必然歸宿，蓋天下既已變矣，而王莽亦曾利用其變以登于寶座矣，此已變之天下，决不能因王莽之不變而遂不變，王莽不變而天下自變，此王莽之所以敗也。

兩漢的尙書臺與宮廷政治

一　尙書的沿革

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與宮廷是分不開的。因爲這種政治的特徵，是皇帝個人的獨裁，皇帝深居高拱於宮廷之內，所以宮廷就必然要成爲國家大政的機構。即因如此，在封建專制主義時代，皇帝往往於其御用的中央政府以外，又再有其宮廷政治機構的組織。皇帝就運用這種宮廷政治的機構，把政權從朝堂集中到自己的臥室。亦即因爲如此，在中國史上，皇帝的近侍往往漸變而爲掌握國家大權的執政。兩漢的尙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考尙書之職，在戰國時代就已經有了，如魏之主書，齊之掌書，實際上就是尙書。不過當時的主書或掌書，其職位並不重要，只是替封建諸侯主管文書的小吏而已。

尙書的官名，始見於秦。通考職官考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法書故謂之尙書。」又云：「尙，猶主也。」「主」與「掌」同義，故秦之尙書實即由戰國時之「主書」及「掌書」發展而來。

據宋書百官志云：「秦時有尙書令，尙書僕射，尙書丞。」是秦代尙書，雖係少府屬吏，但已形成其自己的機構。雖

然形成其自己的機構，但其地位，仍不重要。唐六典云「秦置尚書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事皆决於丞相。」換言之，秦代的尚書，尚不過皇帝與丞相間之一傳達吏而已。

漢興，官制多承秦舊，仍設尚書之官。到武帝時，隨着諸侯王國勢力的削弱，世界征服戰爭的展開，因而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從而提高了總理中央政府之丞相的權力。爲了削弱丞相的權力，武帝乃改用宦官爲尚書，更尚書之名曰中書，組成其宮廷的辦公廳，轉移丞相之權於其自己，自是尚書之權，漸次重要。雖然如此，當武帝之世，中書的地位，尚不尊崇。司馬遷即曾任武帝的中書令，他寫給他友人任安的信中有云「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這裏所謂「掃除之隸，」即指中書令而言，由此可以想見。

自武帝以後，隨着君權的發展，尚書的職權，亦因之而擴大。降至西漢末葉，建三公分權之制。以前以丞相總理庶政之中央政府，一變而爲司徒司馬司空三公平等的中央政府。自是三公各不相屬而總隸於皇帝，因而皇帝遂成爲中央政府之實際的首領。但不論怎樣專制獨裁的皇帝，總不能一手攬盡天下之事，而天下萬事，又非通過他的裁決，不能實施。因此，皇帝就不能不委政於其近侍。因而擴大尚書的名額，提高尚書的權力，組成其宮廷政治的機構，遂成爲必要。於是以前隸屬於少府的尚書，遂從中央政府的組織中分離出來，一變而爲直接隸屬於皇帝的尚書台。文獻通考卷五一云：「尚書，總謂之尚書台，亦謂之中書台。」這個中台，與被稱爲外台之謁者，憲台之御史，總稱曰三台。（初學記一二，引漢官儀）但是在三台之中，尚書台的地位，最爲重要。因爲尚書台是皇帝私人的辦公廳，是獨裁政治的出發點，是超中央政府的御用政治機關。雖然如此，但直至成帝時，尚書還不過「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內外

而已。」（通考）

尙書的地位之更加重要，是在東漢時代。東漢光武，以商人地主，乘天下之亂，篡竊新市平林等農民革命軍的力量，揭起復興漢室的旗幟，以後又背叛農民，剿滅赤眉銅馬，以取媚於地主；更後，削平羣雄，統一天下，而致身於皇帝。因爲他自己反復無常欺詐成事，所以他對於任何臣民都不信任。他雖然也組織了一個以三公爲首九卿分職的中央政府，但這只是爲了完成國家的政治體制，實際上，國家的大權，完全集中於宮廷，即集中於尙書台。後漢書仲長統傳云：「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政歸台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唐六典亦云：「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尙書，（尙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

自此以後，迄於東漢之末，尙書的威權，日益高漲。通考曰：「至後漢，（尙書）則更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由此看來，則東漢的尙書，已由少府的屬吏變爲三公的上司，東漢的尙書台，已由皇帝私人的辦公室，變成了高居中央政府之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了。

二　尙書的職權

尙書台，是獨裁政治必要的機構。因爲獨裁政治發展到頂點的時候，連自己御用的中央政府，也是不要的。他要

求把政權引渡到自己的臥榻之側，而尚書台恰好就可以設置在皇帝的臥榻之側。卽因尚書台是代替中央政府的一個機關，所以尚書台權力的提高，中央政府的權力就要減低。到最後，大權集中尚書，總理國家庶政的三公便變成「坐而論道」的閒員了。

如上所述，尚書在最初不過「在殿中主法書」或「掌通章奏而已。」他的職務，就是收發章奏，本身並沒有甚麼政治的權力。又漢書王嘉傳云：「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是最初的尚書，除傳達章奏於各該機關以外，並無下章之權。但是自武帝以後，尚書的職權，逐漸提高，他由「通章奏」而「讀章奏」，由「讀章奏」而「裁決章奏」，由「裁決章奏」而直接「下章。」

漢書霍光傳云「光與羣臣連名奏（昌邑）王，尚書令讀奏。」這就是尚書有讀奏之權。同書魏相傳云：「故事諸尚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後漢書明帝紀亦云：「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這就是尚書有裁決章奏之權。又無極山碑光和四年八月丁丑詔書有云：「尚書令下太常，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這就是尚書有下章之權。卽因尚書不僅出納章奏，而且拆閱章奏，裁決章奏，所以楊雄尚書箴謂尚書之官「是機是密，出入王命，王之喉舌，獻善宜美，而讒說是折。」後漢書李固傳亦云：「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職重，責之所歸。」

尚書不僅把持言路，而且漸漸侵蝕中央政府的職權。例如選舉，銓敍，任用之權，在武帝以前，乃操之於丞相御史二

府，但武帝以後，此種用人行政之權，却轉移於尚書台之「侍曹」與「二千石曹。」例如漢書馮野王傳云：「孝元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太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又如同書張敞傳云「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道些都是例證。至東漢光武改「三公曹」爲「吏曹」於是「吏曹」遂成爲專掌選舉的一科。用今日的名稱言之，就是人事科。

尚書不僅掌握官吏任用及黜陟的大權，而且還掌握刑獄誅賞的大權。如漢書黃霸傳云：「天子使尚書台問霸。」同書王嘉傳云：「丞相王嘉荐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同書朱博傳云「上（哀帝）知傅太后素怨傅喜，疑丞相博御大夫玄承指，卽召玄詣尚書問狀。」又後漢書楊秉傳云：「太尉楊秉劾宦者……尚書召對秉掾屬。」以上皆係決獄之例。自成帝於尚書台設『三公曹』主斷獄以後，而廷尉遂成虛設之官。總之兩漢的尚書特別是東漢的尚書，他們眞是包辦一切，無所不總，不僅侵蝕中央政府的職權，而且陵駕丞相御史之上。陳樹鏞漢官問答有云：「大臣有罷，則尚書劾之天子責問大臣，則尚書受辭，選舉中二千石，則使尚書定其高下；吏追捕有功，則上名尚書因錄用，刺史奏事京師，則見尚書。」（漢書王暹傳）像這樣掌有「選舉誅賞」「留難書奏」的尚書，當然其「見任重於三公」，而三公也就當然「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了。（後漢書陳寵傳）

由於尚書的職權在政治機構中之畸形的發展，在兩漢時代，尚書台的台官，遂成爲一種陵駕於百官之上的特權階級。漢官儀云：「其三公列卿將軍五營校尉行移道中，遇尚書，僕射，左右丞相回車豫避，衞士傳不得遷台官，台官過乃得去。」由此可以想見其權勢。

尙書的實際職權，雖高於三公，但終兩漢之世，尙書還是少府的屬吏，其位秩不過千石，而少府爲九卿之一，九卿又分隸於三公，因而尙書在名義上還是三公的部屬之部屬。這裏就發生了矛盾，卽部屬變成了上司，上司不能指揮部屬。爲了解決這一矛盾，於是兩漢時代的中央大員多加「平尙書事」「領尙書事」「錄尙書事」等官銜。「平」「領」「錄」尙書事，並不就是尙書，以今日的名稱言之，卽尙書台行走或參議而已。這樣，一方面以中央大員仍能保持其本職的位秩，而同時又能參與樞密了。晉書職官志云：「案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尙書奏事，知樞密者，始領尙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尙書事。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尙書事。尙書有錄名，蓋自融熹始。……和帝時，太尉鄧彪爲太傅，錄尙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爲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尙書事，猶古冢宰總已之職，薨輒省之。」由此看來，兩漢的尙書台實爲權勢之所歸，雖上公三公，大將軍亦必加領錄尙書之銜，而後始能成爲實際之執政者。

三　尙書台的組織

跟着尙書的權力日益提高，尙書台的組織也日益擴大。如前所述，尙書的名額，自秦迄武帝，都不過四人，其中有令，有僕射，有丞。尙書台的組織之擴大，始於西漢成帝。通考謂成帝建始四年，於尙書令之下「又置尙書五人，一人爲僕射，四人爲四曹。」曹猶科也，四曹就是四科，從此尙書便分科辦事。至於東漢尙書台便增爲六曹，儼然是一個小形的

中央政府了。

尙書台的首長是尙書令，尙書令之下有尙書僕射，尙書丞，尙書郎及令史等職，以此而構成尙書台組織。

尙書令就是皇帝私人辦公室的主任。這個官名，創於秦代，至武帝時，因用宦者，改名爲中書謁者令，簡稱中書令。武帝以後，或用宦者或用士人，或宦者與士人並用，故尙書與中書並見。至成帝時，專用士人，故又恢復尙書令之名。自此迄於東漢之末，皆用士人，故皆稱尙書令。

卽因武帝以後，成帝以前，尙書與中書並見，因而學者遂有疑尙書與中書各爲一官者。如通考謂武帝後『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卽以中書與尙書各爲一官。趙翼因之，他在陔餘叢考尙書條說：「武帝用中書謁者令，於是尙書與中書事多相連，」亦以中書與尙書各爲一官。但應劭漢官儀云：「漢舊置中書官領尙書事，」則以中書之職，卽尙書之職。續漢志百官志亦云：「尙書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亦以中書卽尙書之別稱。我以爲漢官儀與續漢志之說是也。按秦漢稱宦官皆曰中官，中官者宮中之官，猶後來宮女之稱內人，內人者，內廷之人也。卽因宦官稱中官，故凡宦官兼任之官，皆冠以中字，如趙高爲丞相則曰中丞相，卽其一例。因而宦官任尙書，則曰中書，中書者，中尙書之簡稱也。

至於昭宣之世，尙書與中書兩名確有同時並見之事。如漢書霍光傳云：「後尙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尙書。」又同書京房傳云：「中書令石顯尙書令五鹿充宗，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因此，通考曰：「其時中書尙書似已分而爲二。」實則不然，中書與尙書之同時並見，乃係宦官與士人之同時並用，而異其官稱，實一官之兩稱，

非分而爲二。

尙書令的職掌，最初不過通章奏，已於前述。但至元帝時，石顯爲令，則「事無大小，因顯自決，貴倖傾朝，百僚皆敬事顯。」據此，則知尙書令之職權，自西漢中葉以後，即已擴大。以後遂如漢官儀所云：「尙書令，主贊奏，總典綱紀，無所不統。」尙書令的官階，據司上書云「秩千石，若公爲之，朝會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尙書令秩雖不過千石，但地位却甚尊崇。在東漢時，光武特詔尙書令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於朝會均專席獨坐，京師謂之三獨坐。

尙書令之下有僕射。僕射即副尙書令，其職掌同於尙書令，「令不在，則僕射奏下衆事。」僕射「秩六百石，若公爲之，加至二千石。」原來只有一人，謂之尙書僕射，至獻帝建安四年，始置左右僕射。

僕射以下，有尙書丞。尙書丞秦置一人。至西漢成帝建始四年，置四人，皆屬少府。東漢光武減其二，改爲左右丞各一人，秩各百石。其職掌係佐令僕治事。其所治之事，據續漢志云：「左丞主吏民報章及騶伯吏，右丞假印綬及紙筆諸財用庫藏。」

令僕丞之外，有尙書郎。晉志云：「尙書郎，西漢舊治四人，以分掌尙書，其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及光武分尙書爲六曹之後，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並左右丞爲三十六人。郎主作文書起草，更值五日於建禮門內。尙書郎，初從三署詣台試，守尙書郎中，歲滿稱尙書郎，三年稱侍郎，選吏有能者爲之。」

尙書郎之外，有諸曹尙書，諸曹尙書，等於今日的科員。諸曹尙書始於秦代，秦時已有左右曹諸吏官，但無一定的職

事。自武帝以至成帝，諸曹成立，尚書台開始分科辦事，初爲四曹，成帝加一曹爲五曹，至東漢光武再加一曹，遂爲六曹。

關於尚書台分曹之事，續漢志與漢官儀所載頗有出入。續漢志云：「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爲四曹：『常侍曹』主公卿事；『二千石曹』主二千石事，『民曹尚書』主吏民上書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世祖（光武）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漢官儀云：「尚書四員，武帝置。成帝加一爲五：有『侍曹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四夷事。成帝加『三公尚書』，主斷獄事。」按以上二說，一謂成帝時爲四曹，一謂爲五曹，但我以爲五曹之說較爲合理，因爲在秦代尚書已分左右曹，以後自武帝歷昭宣之世，尚書台的職務日益發展，可能已有四曹之設，至成帝時加一爲五，非常自然，光武增爲六曹，合令僕各一人，遂有八座之稱。

諸曹職務已如上述，但亦有異說。如續漢志謂三公曹，「典天下歲盡集課事，」二千石曹，「掌中都水火盜賊辭訟罪眚，」客曹「天子出獵，駕御府曹郎屬之。」這與以上所說，又大有差異。大抵兩漢尚書的職權日有發展，在發展中常於原的職務之外，處理新的職務，故說者不同。

此外尚書台又有令史。令史之設，始於西漢，至東漢則有十八人，秩皆二百石，每曹三人。以後又增劇曹三人，合爲二十一人，皆選蘭台令史有吏能者充之。

總之，兩漢的尚書台，其職權實至爲重要，其規模亦至爲宏大，他是天子的喉舌，也是百官的冢宰。在名義上，雖爲宮廷的政治機構，實際上就是中央政府。西漢的專制皇帝，就利用這種宮廷政治的組織，把政權由中央政府移到自己的

臥室，他以爲這樣就可以大權在握子孫萬年，而不知政權移到宮廷以後，不久，大權又傍落於近侍。降至東漢末葉，外戚宦官迭起竊政，皇帝竟變成了他的親戚和奴才用以升官發財的傀儡，而卒以滅亡。由此看來，把政權集中到宮廷，又何補於滅亡？

杜甫研究

一　前言

杜甫，字子美，是唐代的一個大詩人。他在中國文藝史上，有詩聖之尊稱。詩如何而後始爲聖，沒有標準，不論杜甫的詩，是否至於聖，但自唐以來，迄於近世，言詩者，無不推尊他，確是事實。

唐代有名的詩人元稹，曾爲杜甫作墓銘，他在墓銘序言上說：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專矣。使仲尼考鍛其要旨，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宋王安石爲一目無古人之作家，但對於杜甫之詩，則曰：

「至於子美，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幽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此子美所以光掩前

人，而後來無繼也。」

清畢沅序杜詩鏡銓，其言有曰：

「（杜）詩發源於三百篇及楚騷漢魏樂府，吸羣書之芳潤，擷百代之精英，抒寫胸臆，鎔鑄偉詞，以鴻博絕麗之學，自成一家言。」

梁任公曾爲「情聖杜甫」一文，其結語有曰：

「像情感熱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很強，近於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張人生藝術觀的人，固然要讀他。但還要知道他的哭聲，是三板一眼的哭出來，節節含着眞美；主張唯美藝術觀的人，也非讀他不可。」

以上諸人對杜甫作品的評價，雖各有其自己之觀點，但推崇備至，則異代同聲。其推崇的出發點，除梁任公着重於他的作品中所含的情感，其餘皆係讚揚他的文學素養之深厚與文字技術之熟練，嚴謹，細緻與醇朴。

我在二十歲以前，曾一度對中國文學發生熱烈的興趣，當時，我最歡喜讀杜詩，現在回想起來，已經有三十年左右了。我在當時雖歡喜杜詩，但並沒有發現他眞實的價值，只是爲了模倣他用字造句的方法，因爲在唐代詩人作品中，杜詩最爲豐富，他有各種不同的格調，足以爲學詩的範本。後來，我研究中國史，在新舊唐書中，讀到了杜甫的列傳，才知道他所處的時代和他個人的身世。我再讀杜詩，才知道他並不是爲作詩而作詩，而是爲了不得不作詩而作詩。這次我讀的本子，是清人楊西龢所輯的杜詩鏡銓，杜詩鏡銓的編輯方法，不是依詩的體例分類，而是依其寫作的前後，依次編排。這種編排方法，使我對杜詩發生了一種時間性上的概念，因而杜詩中的任何一首詩歌，到我眼中，都是最珍貴的歷史材

料了。

從這裏，我發見了杜詩的眞正價值，固然在於他具有靈活、熟練、細緻、謹嚴的文學手腕，固然在於他具有深厚、淵博、溫柔、敦厚的文學素養，足以紀事舒情，鋪陳終始，屬對切律，排比聲韻，令人讀之，餘味悠然，但最主要的，還是由於杜甫的作品，具有豐富的內容，深刻的含義和眞實的情感。易言之，杜甫作品的價值，不僅在於他的美辭，而是在於他的現實主義。誠如梁任公所云杜甫的詩，是「三板一眼」地在「哭叫人生」，他不僅爲自己的窮愁抑鬱而哭叫，也爲貧苦大衆，爲變局的時代而哭叫。他控訴社會的罪惡，代言人民的痛苦，所以杜甫的詩，可以說是唐代天寶前後的時代呼聲。即因如此，所以他的詩歌，便具有一種不冷的熱力，一直到現在，尙能鞭辟讀者的情緒，震蕩讀者的心弦，所謂千古之後，有餘響也。

杜甫爲什麼要爲自己，爲大衆而哭叫？這就與他所處的時代，他個人在他所處的時代中的遭遇，乃至他的性格都有很大的關係。因爲一個文學家，不論怎樣冷靜，超然，總不能對自己的時代和個人的遭遇，絲毫沒有感覺，而飄然高擧於時代之外，此中國詩人所以常有傷時感世以及感懷身世之作也。

二　杜甫的時代

杜甫生於何年，新舊唐書本傳皆不記。二書雖皆記其死年，但其說不一。舊唐書謂其卒於代宗永泰二年，新唐書謂其卒於大歷中，不詳大歷何年。但均謂其享年五十九歲。

杜甫究竟死於何年，我們可以從他自己的作品中考察出來。杜甫到了湖南以後，曾有「追酬故高蜀州（適）人日見寄」一詩，其序言中有云：「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卻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他就在是年秋死在湖南，所以我們知道他是死在大曆五年。由大曆五年上推五十九年，便是他的生年，則其生年當為睿宗先天元年（西紀七一二年，即開元元年之先一年）。由此，因知杜甫所處的時代是從睿宗先天元年到代宗大曆五年（西紀七一二年至七七〇年）間之五十九年。

在杜甫生存之五十九年間，唐代的政權，有着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是以天寶之亂為轉捩點。在天寶之亂以前，特別是開元年間，可以說是大唐帝國全盛時代的頂點。當此之時，帝國的聲威，遠播異域，正如杜甫贈哥舒翰詩所云：「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又如他贈田九判官梁邱詩所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同時，國內人民雖在大遠征中遭受了災難，但封建秩序還是井然。像這樣的景象在中國史上，總算是頭等的太平盛世。即因如此，所以當時詩人輩出，歌頌昇平，文彩風流，英華競吐，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據杜甫「飲中八仙歌」所述，當時的詩人，眞是自由而又快樂，他們或「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或「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殿」，或「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或「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像這樣「痛飲狂歌空度日」的詩酒之會，杜甫也曾參加過。

全盛的時代並不長久，不久，唐代的統治者，就在豐富的賦稅和貢納中腐化了。玄宗晚年，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昏倒在楊貴妃的懷抱之中，吃廣東進貢的荔枝，一切政事，都委之於李林甫。李林甫，是一個大大的奸臣，他勾結

皇帝的左右，專門逢迎皇帝，蒙蔽皇帝，排除異己，樹黨營私，妄興寃獄，誅逐大臣，並且私通胡人，以張其聲勢，而這就埋下了後來安史之亂的禍根。

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天下側目，而玄宗假裝不知道。當李林甫爲相時，把持朝政的，都是一羣毫無智識的混蛋，那些天眞爛漫的詩人們，當然不能進身。杜甫贈鮮于仲通詩中有云：「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又天育驃騎歌云：「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至無王良伯樂死卽休。」像這樣的感慨，不只是杜甫一人的感慨，而是當時一般才智之士共同的感慨。

李林甫死，繼任首相的是楊貴妃之兄楊國忠。他恃有椒房貼肉之親，專斷獨行，頤指氣使，公卿以下，莫不震慴。他之所以敢於橫行，就因爲他除楊貴妃以外，尙有妹三人，皆封國夫人，並承恩澤，出入宮廷，四條裙帶，當然不會同時斷絕。據楊貴妃傳云：「（楊氏）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華，遞相夸尙，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士木之工，不捨晝夜。玄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絕，開元以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這誠如當時詩人白居易所云：「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楣，致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當這些外戚和貴婦們窮奢極欲的時候，而杜甫却發出了「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的呼號。（按桑宏羊曾封平津侯，此指楊國忠也。）「愁餓死」的，當然也不只杜甫一人，而是當時一般智識分子的境遇。所以杜甫又說：「紈袴不餓死，儒冠總誤身。」

腐化的局面也不允許長久的，在天寶十四年冬，召來了安祿山之亂。大河南北，頓時成爲鐵騎馳逐之場，洛陽長安，

先後淪陷。當此之時，玄宗皇帝不得不從芙蓉帳裏翻身起來，帶着他寵愛的妃子和信任的國舅倉惶逃遁。不幸逃到馬嵬，御林軍叛變了，他們殺了楊國忠和韓國虢國二夫人，並且逼着楊貴妃也自殺了。這眞如當代詩人白居易所云：「六軍不發可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皇帝和許多達官貴人都望風而逃，到了成都，長安變成了蠻族的兵營，文化之宮倒塌了，黃金時代變成了黑灰。當此之時，那些窮困旅邸的詩人，當然也東逃西散，杜甫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並且曾經被蠻族所俘虜。

不久，肅宗卽位於靈武，新的抗戰政府在西北出現，這才收回首都，扭轉危局。但天寶之亂，自安祿山安慶緒以至史思明史朝義繼起爲禍，其間經過七年之久。在這七年中，河朔關陝化爲坵墟，世變之劇，實無其比。如果不是回紇幫忙，也許大唐的天下，就此斷送了。

接着安史之亂以後，又有僕固懷恩之叛和回紇土蕃的屢次入寇，同時，自關以東，藩鎭割據，朝廷的命令已不能出國門一步。這一幕一幕的悲劇，杜甫都親自經歷過，親眼看見過。他怎能望着千軍萬馬在他面前咆哮而過，而自己却高臥在象牙之塔？

政治的變局，必然要影響到文學的作風。天寶之亂以前太平盛世之靜止的文學，到天寶之亂以後，自然而然就會一變而爲波濤壯闊之動的文學了。杜甫正是這個變局時代的詩人。

三　杜甫的身世

杜甫，河南鞏縣人。他出生於一個小官吏的家庭，（註一）在洛陽附近的土婁莊有他祖遺的小小的田園。（註二）他是一個天才的詩人他在壯遊詩中自述曰：「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又曰：「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尚）魏（啓心）徒，以我似班（固）揚（雄）。」這樣看來他七歲即能作詩，在十四五歲時已在當時的文壇卓然露頭角了。

杜甫在二十歲時，就開始了他的流浪生活。他最初流浪於山西，（註三）以後又流浪於吳越之間。（註四）二十四歲時，曾由地方官貢舉，政府不用，於是他又浪跡於齊趙之間。他在壯遊詩中有云「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兆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由此看來，他在少年時代的生活，雖在流浪之中，還是很快樂的。

杜甫在齊趙流浪了好幾年，到三十歲時，（開元二十九年）又回到洛陽。他在洛陽一連住了三年。這幾年，他家

（註一）新唐書本傳云：「甫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

（註二）見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莊詩。

（註三）哭韋之晉詩云：「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又渊冠侍郎詩云：「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案郇瑕，晉地也。

（註四）壯遊詩中關於遊吳越之事有云：「東下姑蘇台，」「渡浙想秦皇，」「剡溪蘊秀異。」又在進大禮賦表中亦云：「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此所謂「陛下豐草長林」當即指吳越而言。

庭多故，他的姑母和祖母相繼逝世，在這一時期杜甫的生涯，大半消磨於料理喪葬和寫作墓誌。這時他的生活境況，似乎更壞，他在贈韋濟詩中自述云：「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洛陽在唐時稱東京）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家里實在住不下去，杜甫在三十四歲時，（天寶四年）又再游齊魯，過度流浪的日子。恰好當時李白也自翰林放歸，客遊梁宋齊魯之間，他們就在一起，痛飲狂歌起來。他們「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相憐如兄弟，大有「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的遐想。

生活問題壓迫這個中年詩人不能不尋找職業，天寶五年，杜甫便走進繁華的長安。天寶六年，（三十六歲）他應詔赴尙書省試，但李林甫要向皇帝證明「野無遺賢」所有應試的人都一律落第了，（註五）杜甫也在其內。這一落第，就有四五年不曾翻身，生活的困苦，不堪設想。

天寶十年，玄宗舉行郊祀大典，杜甫因進呈三大禮賦。（按三大禮賦載潘陽張溍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之一，此書共二卷，即附在杜詩鏡銓之後）這一次，算是碰着了皇帝的高興，派他待制集賢院，這算是杜甫第一次做了官，他的年紀已經是四十歲了。

從此以後，一直到天寶之亂以前，杜甫都在長安。長安城裏的生活很貴，居大不易。而況集賢院又是一個冷衙門，俸祿很薄。爲了要守住這個窮官，杜甫在郊外杜曲的地方買了一座小小的園宅。他在曲江詩中有云：「自斷此身休

（註五）元結諭友文云「天寶六年，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李林甫命尙書省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

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正是指明此事。

杜甫雖然住在鄉下，還是不能解決生活。他在醉時歌中有云「諸公袞袞登台省，廣文先生（註六）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原稿刪去「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但知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這裏簡直可以聽到杜甫在饑餓中向他朋友哭叫的聲音。）又投簡咸華兩縣諸子有云「赤縣官曹擁才傑，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這樣看來，杜甫在長安的生活，還是在飢寒交迫之中。

即因不能生活，所以杜甫的家眷，當時寄住鄜州，（以後曾移居奉先本文原附年譜云：十一月往奉先。）不能接到長安。到天寶十五年，他自己也不能不前往白水，就食於其舅父崔少府，以後又從白水到奉先去探望他陷於飢餓中的家眷，（原稿刪去下面一段：『他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中有云「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而這就是當時小公務員的生活』）

當時安祿山之亂，已經爆發（十一月，安祿山反見原附年譜）洛陽長安，先後淪陷，他既不能回長安又不能回家鄉，後來他聽說肅宗已即位於甘肅的靈武，就拋棄了妻子，奔赴行在，中間經過淪陷區，爲賊軍所俘，不久脫身賊中，終於到達了行在，見了肅宗，肅宗委他一個「拾遺」的官。關於此事，他在述懷詩中說：「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

這位老詩人拋妻棄子，歷盡艱險，來赴國難，本想能對國家有所匡救，但是當時的流亡政府，並不把智識分子當人。

（註六）天寶九年，國子監設廣文館。

他在徒步歸行中說：「鳳翔千官且飽飯，裘馬不復能輕肥，靑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

不久，杜甫爲了疏救房琯，幾乎下獄，（註七）幸有張鎬救他，才改爲貶放華州司功的處分。這時杜甫又不得不離開鳳翔前往華州。在到華州之前，他順道回到鄜州去探視妻子。乾元元年（四十七歲）杜甫到了華州，是年曾間至洛陽，探視他的兄弟。

經過這一次打擊，杜甫遂決心從此放棄政治生活，準備到四川去投依他的友人西川節度使嚴武。乾元二年辭官不做，帶着他的夫人和幾個兒女開始入蜀的行程。由鄜州，秦州，輾轉到同谷。當時陝西大飢，他的幼子早已活活地餓死。而他自己也弄得「白頭亂髮垂過耳，」「手脚凍皴皮肉死，」簡直不像様子了。在同谷沒有住一月，又由劍閣南行，上元元年定居成都，（杜甫於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見原附年譜）這時杜甫已經四十九歲了。

因爲王司馬的資助，在成都郊外「浣花溪水水西頭」蓋了幾間茅屋，這就是他詩中所謂「浣花溪草堂，」他有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貲一詩云：「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勞。」他在草堂的周圍栽種了許多花木果樹，特別是松竹，又養了一羣鷄鴨，就在這裏住下來了。可憐「三年餓走荒山道」的白頭詩人，好容易得到這様一個棲息之所。

（註七）舊唐書本傳云：「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年（至德元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琯罷相。甫上書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新唐書本傳謂：「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則絕言者路。』帝乃解。」

代宗寶應元年，嚴武入朝，西川兵馬使徐知道發動了叛亂，同時吐番入寇今日之松番，成都危急，這時杜甫再逃亂到梓州。第二年（廣德元年）又流浪於漢州、閬州。第三年（廣德二年）嚴武再鎮蜀，他才回到成都草堂。就在這年，嚴武保舉他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遂入嚴武的幕府。杜甫的脾氣很大，他雖依靠嚴武，却不善恭維，在幕府時幾乎和嚴武鬧翻了。所以不到半年（永泰元年正月）他便辭了幕府。辭幕府後之四月，嚴武也死了。

這時，這位老詩人不能不離開他浣花溪的草堂，再走上流浪的旅程。永泰元年五月，杜甫離別了成都，扁舟東下，經今日之瀘州、重慶，東向夔州。大歷元年春，到了夔州。他在夔州住了兩年，大概是等候故鄉的消息。

從杜甫的詩中，我們知道他在夔州的郊外瀼西有四十畝果園，又在東屯有一百畝稻田，兩處相距不遠，都有茅屋數間。他曾請了幾個工人，經營果園和稻田。他在課伐木詩中有云「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又有示獠奴阿段詩及淸晨遣女奴阿稽詩。這裏所謂隸人，獠奴，女奴，大概就是他雇的男女工人。此外又有修理水筒，建造雞柵及築禾場等詩，足見他在夔州已經是過的耕田而食的生活。這裏的果園和稻田，大概也是朋友送他的。

大歷三年正月，杜甫離夔東出巫峽。三月至於江陵。不久又離江陵，當他離江陵時，他自己都不知飄流到那裏去？他在暮歸詩中說：「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又在別江陵詩中說：「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但是船還是順流而下。秋，至公安，冬，至岳州。從此以後，他的生活，完全在船上，當時他曾寫了一首極沉痛的詩，其中有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大歷四年，夔府孤城落日中的老詩人，又出現在洞庭舟中。詩人的孤舟，不久便渡過洞庭，溯湘江而上，到了長沙。

眞是奇怪，杜甫走到那裏，災難就追蹤到那裏，當他到常沙時，長沙又發生了臧玠之亂，這誠如他自己所云：「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原稿删去實則不是災難追逐杜甫，而是當時唐代的天下已經開始潰爛。干戈滿地，到處都是內戰。正如他在蠶穀行中所云：「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爲了避臧玠之亂，他不得不把船開到衡州。大曆五年他想到郴州去投依他的舅父崔偉，走到耒陽就病了，因轉帆北上，想回洛陽故鄉，不幸舟下荆楚，就死在船上。這就是杜甫的一生。

杜甫一生，眞是閱盡治亂盛衰之蹟，歷盡刀兵山川之險，嘗盡飢寒流離之苦，自中年以後，一官廢黜，萬里饑驅，餓走荒山，老病孤舟，其生世之慘淡，實已極人生之酸辛。雖然，在天寶亂中，智識分子之遭遇如杜甫者豈少也哉？杜甫寄柏學士林居詩云：「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河。」嗚呼，智識分子之「蕭然暴露依山河」者，又豈僅在天寶之亂爲然哉？誠如杜甫西閣曝日詩所云：

「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

又如杜甫錦樹行所云：

「自古聖賢皆薄命，姦雄惡少盡封侯。」

四　杜甫的性格

杜甫晚年的性格，看起來很沉鬱，但他的沉鬱並不是天生的，而是殘酷的現實把他壓迫到展不開眉頭。實在他也曾經是一個活潑而天眞的孩子，曾經是一個浪漫淸狂，豪放的青年。

他在百憂集行中自述曰「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這不是活現了一個頑皮的孩子嗎？

他在壯遊詩中自述青年時在齊趙的生活曰：「春歌叢臺上，冬獵青邱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又在今夕行中自述青年時在長安度除夕，「相與博塞爲歡娛」的情景曰：「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又在贈李白詩中自敍曰「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這不是活現了一個飛鷹走兎，縱鞚據馬，呼盧喝雉，醉酒狂歌的青年嗎？

中年以後，這位生氣勃勃的青年詩人，的確是沉鬱了。他在杜位宅守歲詩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又病後過王倚贈歌中自述云：「但使殘年飽吃飯，只願無事常相見。」又在重遊何氏園詩中云：「何日沾微祿，歸山買薄田。」在飢寒交迫的環境中，他怎能笑得出來？

到晚年他更是傷感了。他在哭台州鄭司戶詩中自哭云：「瘧疾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這簡直是一幅老淚縱橫的面孔了。在飢餓走荒山，白頭趨幕府的生活中，他怎能不哭？

杜甫是一個極有骨氣的人，他雖然窮困，但毫不將就。他在奉先詠懷詩中說：「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也許就因爲他不願趨炎附勢，所以「潦倒終生。」

他常以淸白自賞，不肯同流合汚。他在贈韋左丞詩中有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又在白絲行中云：「己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又在佳人詩中云：「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淸，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採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這裏所謂「白鷗」、「白絲」、「佳人」都是他自己的寫照。

杜甫的脾氣雖然很大，但情感却非常熱烈，實際上也只有這樣淸高的人，才有眞正的情感。他對於他的夫人，兒女，兄弟，姊妹，朋友，都有一種眞摯的情感。他有一首思家的詩，題曰月夜，詩云：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淸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分明是他望着長安的月亮想念他的夫人和兒女，但他却進一步想到他的夫人也在望着鄜州的月亮在想念他，他這種思維過程的描寫，是何等的細膩。

又在同谷七歌中，有憶弟、憶妹兩詩。其詩曰：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輾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前飛駕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聲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沒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猨爲我啼淸晝。」

他憶弟妹詩前後二十餘首，無不至性流露。至於懷友的詩，那就更多了，例如他送鄭虔詩有云：「便與先生應永

九重泉路盡交期。」又夢李白的詩云：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時李白因附永王璘造反事流放夜郎，故曰逐客。）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靑，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毋使蛟龍得。」

像這樣的詩句，眞是字字出於心坎。

杜甫的情感，不僅表現在家人骨肉和朋友之間，也表現於對當時貧苦人民的關懷。例如在奉先詠懷詩中有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三川觀水漲詩中有云「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中有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喜雨詩中有云「巴人困軍需，慟哭厚土熱。」像這一類的詩句，在杜甫的詩中，舉不勝舉。這並不是他隨便說漂亮話，杜甫的目光的確常常注視到社會最下層的人民。因爲他自己有貧困的經驗，他最瞭解這些可憐的窮人的痛苦。舉例來說，他有一次在石龕看見一個農民伐竹，他就想起他們的徭役。石龕詩曰『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採美箭，五歲供梁齊。』他看見了闊人所穿的布帛，就想起了貧窮的婦女。奉先詠懷詩中有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他看見了四川的橘子，就想起了農民的貢納。柑林詩中有云：「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

他最能了解窮人的心理，有一次他住在成都（原稿刪去：『有一個農民在社日請他吃春酒，這個農民向他陳訴徵兵徵糧的痛苦，雖然他覺得這個農民的言語太瑣碎，舉止近粗野，但他總覺得這個農民請客不容易，也只好聽着。他在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詩中述此事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父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又有一次他在夔州，他西鄰的一個窮婦人偷他的棗子喫，他發覺了，那窮婦人很恐懼，但他却因此而更同情那窮婦人。他在戲呈吳郎詩中記其事云：「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家貧寧有此，只緣恐懼更相親。」卽因他了解窮人的痛苦同情窮人的痛苦，所以他痛恨當時的剝削人民的貪官汚吏。他在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詩中有云：

「步國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爲德。……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

園官送菜詩云：

「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爲態何喧喧！」

晝夢詩云：

「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

他把好人比作新松，惡人比作苦竹，於是作詩曰：「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他又把惡人比作草萊，作詩曰：「芟荑不可闕，疾惡信如讎。」他在述懷詩中說：「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還簡單有些社會主義者的嫌疑

了。

富有不屈的氣節，最眞摯的情感，同情貧窮人民，痛恨貪官汚吏，這就是杜甫的性格。

五 杜甫的作品

杜甫處在這樣一個變局的時代，他個人的身世又如此慘淡，同時，他又是一個孤芳自賞，情感熱烈的人，所以他的作品必然要走上現實主義的道路。用梁任公的話說，他必然要「哭叫人生。」

在杜甫的作品中，很少有那種吟風弄月，留連光景之作，也很少有那種歌頌功聖，讚美權要之辭；他的詩，完全是紀錄他的時代，紀錄他的身世，而且絲毫不走樣地紀錄出來。他有時直書，有時暗示，有時諷刺，有時譴責，極盡「哭叫」之能事。從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時代，他的身世。換言之，杜甫的詩歌，簡直就是天寶前後的一部歷史。

從杜甫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天寶以前的唐代社會是何等的安定，繁榮，太平。他在憶昔詩中說：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在這樣的太平盛世，租稅集中之地的長安，自然變成了紙醉金迷的城市。每當春秋佳日，在長安城外的風景之區，

如樂遊古園的森林中，芙陂的荷塘中，曲江的兩岸，都擠滿了遊人。在這些遊人中，有風流的皇帝，顯赫的貴族，凱旋的將軍，得意的官僚，腐朽的地主，發財的商人，獵豔的公子哥兒，這些人都帶着漂亮的妃子、姬妾、情人，在郊外展開歌舞盛宴。只有那些落魄的詩人，他們既沒有愛人，也沒有酒宴，只有徘徊於山水人物之中，搜集一些作詩的材料而已。

在遊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唐玄宗和他的幾位妃子。杜甫的麗人行，就是描寫他們。詩曰：「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爲㔩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筋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愼莫近前丞相嗔。」這首詩簡直把楊家姊妹遊春的情景活現出來了，他們穿的甚麼，吃的甚麼，連簫鼓的聲音，和衛隊的呼喝，都隱隱可聞。全詩寫實，不加批評，到最後兩句，才來了一個哭笑不得的諷刺，堂堂的丞相，現出了椒房親貴的色相了。

唐玄宗和楊家姊妹，有時也到芙蓉園。杜甫在遊園歌中說：「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詄蕩蕩，曲江翠柳排銀牓。拂水低囘舞袖翻，緣雲淸切歌聲上。」

再聽杜甫報告當時顯貴子弟的遊宴。樂遊園歌中云：「樂遊古園翠森爽，烟緜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賞。」西陂泛舟詩云：「靑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船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當此之時，靑蛾皓齒在歌舞，橫笛短簫在吹奏，錦纜

牙檣在徐牽，公子歌扇在搖動，百壺美酒在飛送，這是何等的快樂呵！

杜甫又有一詩報告他有一次參加了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的情景。他說：正當「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的時候，忽然「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於是「越女紅妝濕，燕姬翠黛愁。」又有一次陪一位官僚遊宴渼陂，他吃了很多好東西，他說「飯炒之子白，瓜嚼水精寒。」又有一次他親眼看見一個貴族公子，在郊外某酒店糊鬧。他曾為少年行以紀其事曰「馬上誰家白面郎，臨軒下馬坐人牀，不通姓氏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從這些記事詩，我們可以想像天寶之亂以前的長安城郊，是一種怎樣的景象。

當時的貴族，以外戚最為闊綽。（原稿删去以下一段：舊唐書楊國忠傳云「國忠於宣義里構連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有時與虢國並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為諧謔，衢路觀之，無不駭歎。」他們駭嘆這位依靠姊妹的媚態而致身於宰相的楊國忠之荒淫無恥，至於如此。至若當時的智識分子，即使「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贈韋左丞）也只好和原憲一樣，守着貧困。所以杜甫把這種貧富懸殊的情形，來了一個對比的描寫。）他在自京赴奉先詠懷詩中云：「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煖容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其他豪貴的奢侈，亦復大有可觀。李監宅詩云：「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又鄭駙馬宅宴洞中詩云「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椀碧瑪瑙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從這些詩句

中，可以看出當這位窮詩人走進那些豪貴邸宅中時，大有劉老老進大觀園的感覺。

原稿刪去以下一大段：

至於當時的農民，他們的生活，就和當時的達官貴族大不相同，他們在租、庸、調的壓搾之下，要繳出穀物，繳出布帛，還要繳出生命。關於唐代政府怎樣剝削農民，詳見「作品」節中，這裏我只略述當時農民怎樣爲統治階級的利益而粉身碎身於萬里之外的黷武戰爭。

我們從史籍上知道在玄宗天寶六年（西紀七四七年）中國曾經發動一次空前的大遠征，這就是高仙芝橫越世界屋脊的帕米爾高原及冰雪皚皚的興都庫士山遠征小勃律之戰。唐代的這一次遠征，是想從中亞驅逐大食的勢力，但是在怛邏斯城一戰，却因爲他的同盟軍葛邏祿部的倒戈，爲大食所大敗，雖然虜囘了小勃律王，但從此以後，大唐的勢力，遂退出中亞。杜甫高都護驄馬行一詩正是借高都護的青驄馬，以紀述這一次大遠征。

以後，吐蕃北侵，變成唐代西疆之威脅，因而玄宗季年，窮兵隴右，徵戍驛騷，內郡幾遍。杜甫曾有兵車行一篇，前一段描寫遠征軍出發的情形，其詩曰：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後一段描寫當時租稅繁重，農村破產，出征軍人的家屬之痛苦。其詩曰：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

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靑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此外又在前出塞詩中描寫遠征軍人的痛苦。如在前出塞詩中云「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這是說逃避兵役者有罪。又云「送徒旣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這是說出征軍人遭受吏人的壓迫。又云「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這是說軍中苦樂不均。又云「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這是說有功者不賞，無功者謊報勝利。從這些詩歌中我就可以看到大唐帝國全盛時代的社會之反面。一方面歌舞天堂一方面轉死地獄，這樣的局面，當然不能久長。

暴風雨來了，安祿山的兵馬打進了繁華的長安。（原稿刪去：安祿山之亂，實際上就是隱蔽在外族叛變的旗幟之下的農民暴動，否則若無農民自願地參加，安祿山的叛變，是發動不起來的。）現在我們看杜甫怎樣紀錄長安淪陷時的情景。他在往在詩中說：「往在西京日，胡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解瓦飛十里，繐帷紛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沓排鐵騎，淸旭散錦幪。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當亡陷玉座，白間剝畫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從這首詩裏我們如見長安大火，胡騎咆哮，陳希烈輩投降蠻族，妃嬪被殺，皇帝失蹤。

當此之時，「箭入昭陽殿，笳吹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送郭中丞詩）當此之時，「蠻兵淘淘入大屋，屋

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折斷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哀王孫）當此之時，大唐的天兵慘敗了，「血作陳陶澤中水，「四萬義軍同日死。」（悲陳陶）「山雪河冰野蕭瑟，青是烽烟白人骨。」（悲青坂）長安已經不是當時的景象了。杜甫在哀江頭中有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又說「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游魂歸不得。」在長安他看到「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號，日夜更望官軍至。」在長安，他看到「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貧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在長安，他看到「黃頭奚兒日向西，」「東來橐駝滿舊都。」

原稿删去以下一大段：

爲了討伐安史，唐代政府曾經發動了大規模的戰爭，在戰爭的進行中，徵兵，徵糧，民不聊生，杜甫描寫當時徵兵的情形，最爲生動逼眞。

石壕吏詩云：「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偸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安吏詩有云：「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卽見骨，天地終無情。」

垂老別詩有云：「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無家別詩有云：「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新婚別詩云「……結髮為君妻，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這些詩篇，簡直把唐代政府抓壯丁的情形，活現出來。從這些詩篇裏，我們可以看見當時的人民，被抓得雞飛狗上屋，年青的抓完了，又抓年老的，男人抓完了，竟抓女人，抓了一次的壯丁，又抓第二次。在這些詩篇里，我們也可以看到新婦送新郎從軍，母親送兒子從軍，老太婆送老頭子從軍，媳婦送婆婆從軍。並且還可以聽到這些可憐的男女牽衣頓足攔道哭的聲音。

再聽杜甫報告當時貪官污吏假借戰爭，收刮人民。

遭遇詩云「石間採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

歲晏行云「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恩忍愛還租庸。……」

客從詩云「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中，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爲血，哀今徵斂無。」

夜詩云「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夜深歸。」

夔府書懷詩云「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稅，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

驅豎子摘蒼耳詩云「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枯椶詩云「蜀門多椶樹，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椶木，使我沉歎久。」

杜甫詩中關於貪污剝削的記錄甚多，不勝枚舉，總之當時的剝削，正如他在虎牙行中所云「八荒十年防盜賊，征伐誅求寡婦哭。」而那些防盜賊的官兵，又比盜賊更壞。他有三絕句詩，其一云「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安史之亂，總算借着回紇的兵馬把他打平了，但是回紇的驕橫又還了得。杜甫洗兵馬詩中有曰：「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餧肉蒲萄宮。」好容易把回紇送走，吐蕃又攻陷長安。憶昔詩曰：「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吐蕃打退了，而「幽薊餘蛇豕，乾坤尙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又變成了藩鎭割據的世界了。打來打去，結果，會賬的還是老百姓。杜甫白帝詩曰，「戎馬不知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以上都是杜甫詩歌中所含的史料，而且這還不過是舉例而已，假使能全部纂輯，杜詩中所含的史料，一定可以給與天寶前後的歷史以新的內容。像這樣的詩歌，我稱之曰寫實主義，大概沒有什麼不妥當吧？

六　餘論

杜甫的詩，最大的特點，就是不以美辭而害意，因而字字眞切，毫無浮辭浪語。而且描寫細膩，眞實入微。例如北征詩中有一段云：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圻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顚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泄，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

意，生理焉得說。」

這一段詩，簡直把他久客初歸，見到他的妻子兒女破破爛爛，面有菜色有情景，毫不隱瞞地寫了出來。他的妻子、兒子、女兒的形象表情，都活現在紙上。又在彭衙行上有一段云：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癡女飢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草果充餱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

任何人讀了這段詩，都會覺得這位老詩人帶着他的夫人兒女，在風雨泥濘之中，餓走荒山窮谷的情景，如在目前。杜甫的詩，亦有完全描寫情緒之作，如前所引「今夜鄜州月」一詩，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外，這一類的詩，在他集子中還很多。例如他在夔州接到他兄弟的信，謂已由洛陽到了江陵，不久要來看他。他喜歡極了，作了一首詩。詩曰：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這簡直把他接到家書時內心的感動，完全記錄出來。以後又接到他兄弟馬上就要到的信，他又作詩曰：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

「待汝嗔烏鵲，抛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撚絕始星星。」

從這兩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流落在四川山谷之間的老詩人，當接到他兄弟卽到的信後，書也不看了，病也好了。他每天跑到江邊的閣子上去望着那些由江陵來的上水船，恨不得卽刻就看到他久別的兄弟從船上出現相見擁

抱，痛哭一場。然後向他打聽故鄉淪陷以後的情形，商量回家的辦法。這樣的詩，眞可以說「情見乎詞」。

關於這一類的詩，還有一首情文並茂的，這就是他聽說官軍收復了河南河北以後所作的一首詩。其詩曰：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靑春作伴好還鄉。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在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老詩人忽而哭，忽而笑，忽而拋去詩卷高歌，一種手舞足蹈的情狀，躍然紙上。他飢餓流離於四川已經三四年了，一旦聽說收復了中原，想到明年春天就可以回故鄉，這種意外的消息，當然要使他的情感激越以至飛舞瘋狂起來。

杜甫留連風景之作很少，偶爾有之，必精細入微，而且非常自然。例如江畔獨步詩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黃師塔前江水東，春花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漫興詩云：「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汚琴書內，更接飛蟲打着人。」「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靑錢，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浮雛傍母眠。」「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像以上諸詩，與今日的白話詩已經沒有很大的分別，但由於作者的文學手腕，却使讀者如歷其境。

杜甫詩中，有時毫不客氣，直陳時弊。如在憶昔詩中云：「憶昔先帝（肅宗）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史思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李輔國）壞紀綱。」有時委婉曲折，暗示己意。如

他在前出塞中有云：「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又云「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這就是反對侵略戰爭的暗示。有時諷刺。如憶昔詩中有云：「張后不樂上爲忙，」這就諷刺肅宗怕老婆。麗人行中有云：「愼勿近前丞相怒，」這就是諷刺一位繫在裙帶上的丞相。遭田父泥飲詩中云：「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這就是諷刺當時苛捐雜稅之繁多。有時公然譴責。如釋悶詩云：「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烟斷，烽火照夜屍橫縱。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淸。」又有感詩云：「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這簡直是大開其教訓了。

楊家將故事與楊業父子

一　楊家將故事的發展

楊家將的故事，在中國流傳最廣。戲劇之所演唱，稗乘之所綴輯，雖閭巷小兒，類能道之。惟劇本取材，皆截其片段；而稗乘構說；又難免附會；因之楊家將的故事，遂如曲海總目提要所云：「信者悉認爲眞，而疑者又皆以爲子虛烏有矣。」

考楊家將的故事，係以北宋名將楊業（亦作繼業）父子的史實爲中心而構成。楊業父子的史實，宋史有傳，其不爲子虛烏有，實可斷言。惟宋史本傳所載，簡略不詳，據所云云，則楊業父子，位列偏稗，不關重要。但在劇本稗乘中，則其父子，又顯然皆出現爲有聲有色的人物。因之有人以爲楊業父子的史實，卽使實有其事，亦不如劇本稗乘中所傳之甚也。換言之，卽有人以爲楊家將的故事，在傳說中被放大了。

我以爲不然，楊業父子的史實，不是在傳說中被放大；反之，而是宋史上把他縮小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楊家將傳說的構成之過程中，看得出來。

關於楊家將之最初的紀錄，是歐陽修供備副使楊君墓誌銘。銘文中有曰：

「君之伯祖繼業；……繼業有子延昭……父子皆爲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

按歐陽修所銘之楊君名琪，字寶臣，爲楊業之姪孫，故銘文中稱楊業曰「君之伯祖」。此銘作於皇祐三年，其時楊業已死六十五年，而銘文中謂「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是則當楊業父子生時，其爲當世人民所傳說，更無論矣。

楊業父子之變爲傳奇中的人物，而出現於舞台，早在南宋時代。輟耕錄載金院本名目，其中有「打樞密爨」一劇，此劇卽後來元曲中「謝金吾詐折淸風府」雜劇之藍本。劇情係敍述樞密王欽若使其壻謝金吾折毁楊業在汴京敕建之宫邸。楊延昭率其部將焦贊私離三關防地，潛回汴京，殺死謝金吾全家，因而被逮問罪。後因八賢王智之營救得免於死。由此而知上述故事，在宋代當時，已極爲流行了。

到元代，楊家的故事之編爲劇本者，究有若干，以元曲亡佚甚多，無從確考。惟據今存元曲，其中除謝金吾外，尚有昊天塔一劇。此劇係敍述楊業的靈魂，報夢其子六郎延景（宋史作延昭）謂其屍骨被契丹人吊在幽州昊天塔上，日射百回，名曰百箭會，囑六郎取回他的屍骨。六郎得夢，卽與其部將孟良前赴幽州，盜回其父屍骨。

在明代的傳奇中，有無以楊家將爲題材者，不得而知，但今存六十種曲，則無此類作品。惟近見孤本元明雜劇一書，其中有開詔救忠臣，活拿蕭天佑及破天陣三劇，則係楊家將的戲劇。開詔救忠臣一劇，內容與元曲謝金吾相同。活拿

蕭天佑一劇，係描寫焦贊生擒契丹大將蕭天佑的故事。破天陣一劇，則係描寫楊六郎擒誅漢奸韓延壽的故事。

按以上三劇，皆未著撰人，其爲元人作品，抑爲明人作品，原書無說明。但我以爲皆係明人作品，因爲在此三劇中，皆有對異族大不敬之語。例如在開詔救忠臣雜劇中有云「我直教那番兵納禮拱皇朝。」又云「量你這番賊虜寇，我將你小覷低微。」又云：「這個無禮番奴，」「罵你個番也賊波。」在活拿蕭天佑雜劇中有云：「我教那醜虜腥羶命怎熬。」又云「剿滅了腥羶太平；擒拿住潑匈奴罪難逃。」破天陣雜劇中有云：「我將那北番兵片時將捕。」又云：「穩情取平番寇。」像這樣滿紙「番賊」「番奴」「番寇」「醜虜」「腥羶」「潑匈奴」在異族統治下的元代作劇家，決不敢如此放肆，所以我斷定以上三劇，皆係明人之作。只有明人才有「活拿蕭天佑」和「調兵破天陣」的魄力。由此又知楊家將的戲劇，到明代更增加了。

大約在明之末葉，當女眞部落侵入中國之際，楊家將的故事，便有人把他纂輯起來，再加以穿插附會，寫成了一部章回小說，這就是今日流行的楊家將演義。因爲在明末，中國的局勢與宋初相同，是東北蠻族侵入的時代，當時中國也需要楊業父子這樣抵抗蠻族侵略的英雄。楊家將演義共分五十回，從宋太祖太宗征北漢，一直說到楊業的孫子征西夏得勝回朝爲止。其中大半以過去流傳的傳說爲底本，而加以若干虛構的故事以爲穿插，因而與宋史有不符之處。曲海總目提要卷三紀昊天塔云：「（楊家）父子兄弟及諸部曲，智略勇績，不盡無因，特其事蹟多在邊方，且在遼宋交界中朝不能盡知，民間見聞，亦多影響，故不免疑信相差也。楊業撞死李陵碑下，亦史傳所無。韓延壽乃以趙延壽韓延徽合爲一人。」此外傳說中之焦贊，孟良，宋史亦無其人，但不能說宋史上不錄者，遂必無其人其事。

至於清代，在京劇中楊家將的戲劇，仍然繼續發展。如李陵碑，洪羊洞，四郎探母，五台會兄，轅門斬子等皆是也。楊家將的戲劇，在清代之能繼續演出，這是因爲楊業父子的故事，雖係抵抗蠻族，但結果還是一幕失敗的悲劇。而且到清代，楊家將的戲劇，又添上了一些取悅於異族的穿插，如四郎探母，把四郎寫成一個可憐的俘虜。又如轅門斬子一劇，更加上一些滑稽的穿插，堂堂的大宋元帥楊延昭，見了他蠻族的媳婦穆桂英，便駭得發起抖來。這些，都是爲了冲淡楊家將故事中之反異族的精神。

一直到現在，楊業父子，還沒有從中國舞台上消滅，不但沒有從舞台上消滅，而且也沒有從人民的記憶中消滅。在現在我們到處都可以聽到人們在歌唱：「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不過，在今日進步的話劇中，還沒有楊家將出現。但我想不久也會要出現的，因爲目前的中國，也迫切地需要楊家將這樣抵抗異族的民族英雄呵！

以上就是楊家將的故事發展的過程。這些故事，都是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在流傳中，自然難免不有穿鑿附會之處，但主要的事實，還是有其眞實之根源的。特別是元曲中的故事，我以爲較之宋史更爲可靠。因爲元曲與宋史，同爲元人所作，元曲出於中國文學家之手，而宋史則出於異族統治者御用文人之手也。同時元曲的取材，多爲民間傳說；而宋史取材，則爲經過製造之宋代的官書。因此，關於楊家將的紀錄，我以爲不應以宋史訂正元曲，而應以元曲訂正宋史。至少，亦應視元曲與宋史是同等眞實的史料。

二　楊家將的家世

楊家將被中國人民所傳說，所歌頌，已經將近一千年了。他們從口頭的傳說，變爲傳奇中的人物，從傳奇中的人物，出現於舞台，而且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從舞台上消滅，這就證明了楊家將有不朽的理由。爲了要認識楊家將，我們先說說他們的家世。

據宋史本傳云：「楊業，幷州太原人。父信爲漢麟州刺史。」但歐陽修楊琪墓誌銘，則謂楊琪，「麟州新秦人也」。依宋史之說，則楊業爲山西人；依歐陽氏之說，則楊業爲甘肅人。我以爲楊氏先世係山西人，後以楊業之父信（歐陽修楊琪墓誌銘作宏信。）服官麟州，曾一度移家新秦，又曾以武功雄其一方，故其後裔遂以新秦爲其故鄉，歐陽修因之而銘曰：「楊氏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邊陲。」近人衞聚賢氏亦因之以爲河西人。其實宋史本傳記太宗之詔，其中已明明說楊業「挺隴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其爲山西人，實無可疑。

又按楊業之父信，演義中作楊袞，亦稱火山大王楊令公。查宋史地理志，有火山縣。地理志云：「火山軍，本嵐州之地。太平興國七年，建爲軍治，置火山縣，四年廢之。」或者火山大王之名，卽由火山縣而來？但嵐州之有火山縣，在北漢滅亡後之第三年，其時，楊宏信已死，似不能與之發生聯系。果火山大王之名，由時代之錯誤而來，則楊氏原住乃山西嵐州？

楊業弟兄幾人，宋史不載。但歐陽修楊琪墓誌銘中有云：「其曾祖諱宏信，爲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爲防禦使。」又云：「君之伯祖繼業。」據此，則楊宏信有二子，繼業爲長而重勳爲季也。後楊業之弟亦投宋，曾官「宿州刺史，保寧軍節度使，卒贈侍中。」歐陽修楊琪墓銘又謂重勳有子名光扆，「以西頭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於官。」楊琪者，卽光扆之子，「以父卒於邊，補殿侍，後……任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副使，階銀靑光祿大夫，爵原武伯。」琪有子曰畋「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後遂無聞。這是楊業之弟一支人的下落。

楊業幼時，大概隨父於麟州官次，麟州近胡，以戰射爲俗，因此他就學會了一身武藝。宋史本傳云：「業幼倜儻任俠，善騎射，好畋獵，所獲倍於人。嘗謂其從曰：『我他日爲將用兵，亦猶用鷹犬逐雉兎耳。』」

大約因爲他父親的關係，楊業在成年以後，就回到山西，在劉崇部下，做了一個軍官。當時劉崇爲漢河東節度使，開府太原。楊業在劉崇部下，屢立戰功，有無敵將軍之稱。宋本傳云：「業弱冠事劉崇，爲保衛指揮使，以驍勇屢進至建雄軍節度使。屢立戰功，所向克捷，國人號爲無敵。」

楊業妻，宋史本傳不載，但元曲及演義中皆出現爲有聲有色的人物，卽所謂老佘婆佘太君者是也。衞聚賢氏楊家將及其考證中謂佘氏宋史作折，佘太君卽折太君。此說淸人畢沅已言之。淸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中有云：「小說稱老佘婆曰佘太君，不知何本？按畢尙書沅關中金石記云：『楊業妻乃折德扆之女，世以爲折太君。』」惟查宋史折德扆傳，又不載有女嫁楊業事，因是以佘爲折又不知畢沅何所本？大概因佘折音近之故歟？

楊業有七子，卽所謂大郎二郎以至七郎者是也。關於楊業之有七子，宋史元曲及演義所載皆同，惟七子之名及其

下落，則各有異說。宋史本傳謂楊業七子，除七郎延玉與其父戰死陳家谷，其餘六子，在楊業死後，並爲朝廷所錄用，供奉宮廷。本傳云：

「業既沒，（其子延玉亦沒焉）朝廷錄其子供奉宮廷。（延）朗爲崇儀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訓，並爲供奉官，延環，延貴，延彬，並爲殿直。」

照宋史，則楊業七子，乃爲朗、浦、訓、環、貴、彬、玉。但宋史楊業傳後，有楊延昭傳，於是說者謂「延昭，本名延朗。」旣爲延朗，則應爲大郎，而宋史楊延昭傳則曰：「契丹殫之，目爲楊六郎。」是知修宋史者對楊家兄弟的行次，已不甚清楚。

元曲昊天塔雜劇中，亦曾說到楊家兄弟的名字。在這個劇本的科白中有云：

「某姓楊名景，字彥明，父親是金刀無敵大總管楊令公，母親佘太君，所生俺兄弟七人，乃是平、定、光、昭、朗、（景、）嗣、某居第六。」

在元曲中，楊家弟兄之名與宋史相同者，只有延昭、延朗，而且不是一人，而是各爲一人。其所佔行次亦與宋史不同，宋史謂楊延朗爲大郎，元曲則謂爲五郎；宋史謂延昭亦爲大郎之別名，元曲則謂爲四郎。惟關於七郎與其父同時戰死陳家谷一事，則元曲與宋史同。但亦小有差異，卽元曲謂七郎之死，不是死於敵人之手，而是死於大宋的統帥潘美的亂箭之下。此外，元曲謂五郎延朗，於楊業死後在幽州昊天寺爲僧，這與宋史所載五郎爲殿直，又不相同。

孤本元明雜劇所載楊業七子之名，與宋史元曲又不同。開詔救忠雜劇科白中有云：

「某所生七子，乃是平、定、光、輝、昭、朗、嗣。」

同劇科白中又云：

「俺（韓延壽）人馬浩大，將楊大郎長槍刺死，楊二郎短劍身亡，楊三郎馬踏爲泥；楊四郎不知所在。」

明曲係由元曲演化而來，故楊業七子之名，除將延景換上一個延輝以外，其餘皆同，但行次則有變更。如延昭在元曲中爲四郎，在明曲中則爲五郎；延朗在元曲中爲五郎，在明曲中則爲六郎。至於明曲之四郎，則改名延輝。此外在明曲中亦謂七郎被潘美害死，五郎爲僧，與元曲同。惟對於大二三郎，都戰死疆場，四郎失蹤，則爲元曲所無。

楊家將演義所載楊家七子之名，大半根據元明劇本。他把大郎之名延平，改爲淵平，以次爲定、安、輝、德、昭、嗣。在演義中，七郎五郎的下落，與元曲明曲同。惟明曲中說到四郎，只云不知所在，演義中則謂四郎被俘於契丹，將楊字拆爲木易二字，改名換姓，在番邦招了駙馬，以後並曾偷闖囘國，探視母親。

京戲劇本中關於楊業七子之名，大概是根據演義而來，如四郎名延輝，七郎名延嗣。對於他們七弟兄的下落，則綜合了以前的傳說，個個都有了歸宿。李陵碑劇詞中有云：

「金沙灘，雙龍會，一戰敗了。只殺得，宋營中，鬼哭神號。我的大郎兒，替宋主，把忠盡了；二郎兒，短劍下，命赴陰曹；楊三郎，被馬踏，尸骨難找；四郎兒，失番邦，無有下梢；五郎兒，在五台，削髮修道；七郎兒，被潘洪，射死芭蕉；只剩下，六郎兒，隨營征討。……」

四郎探母劇詞文云：

「我大哥，替宋主，盡忠赴宴；我二哥，短劍下，命喪黃泉；我三哥，馬踏泥，尸首不見；我五弟，削了髮，竟入深山；我六弟，保

宋主，三關鎮守，我七弟，雁門關，亂箭身穿。」

總括以上所述，我們對於楊業七子名字的演變，可以列表如次：

宋史楊業傳——朗、浦、訓、瓌、貴、彬、玉。（按朗亦作昭）

元曲昊天塔——平、定、光、昭、朗、景、嗣。

明曲開詔救忠臣——平、定、光、輝、昭、朗、嗣。

楊家將演義——淵平、定、安、輝、德、昭、嗣。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最成問題的是楊延昭，他在宋史上是大郎，在元曲中是四郎，在明曲中是五郎，在楊家將演義和今日尚在流行的京劇中是六郎。但是我以為比較可靠的還是元曲中的名字和行次。最不可靠的是宋史所載。演義中把延昭排為六郎，大概是因為看見宋史楊延昭傳有「目為楊六郎」之語。至於宋史謂楊業七子，只有七郎戰死，其餘均於楊業死後供奉宮廷，尤為不確，因為在宋史上，關於楊業諸子，只有延昭有傳，而延昭傳中，亦未提及其弟兄，因而我以為傳說所云楊家將兄弟或戰死，或被俘，或為僧，並非無根之說。

宋史謂楊延昭有三子，而只有一子文廣有傳。傳謂文廣字仲容。演義則謂延昭有二子，長宗保，次文廣。惟演義中所述宗保之事，與宋史中所述文廣之事同，可知是以一人而演化為二人也。其原因大概因文廣字仲容，仲之前必有伯，故宗保應運而出？

文廣之妻，宋史不載，但演義及京劇中皆謂為番邦女子穆桂英。衞聚賢氏於楊家將及其考證中謂山西保德州志

以楊文廣之妻爲慕容氏。衛氏以爲穆桂英卽慕容一音之轉頗有可能。按歐陽修楊琪墓誌銘謂「琪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琪與文廣爲堂兄弟，琪娶慕容氏，文廣亦可能娶慕容氏也。

三　戰鬥雁門關的楊業及其死

楊業的家世，略如上述，但是楊家父子之成爲傳奇中的英雄，並不是因爲他們的門第，而是因爲他們留下了不朽的功業。

說到楊家父子的功業，我們必須簡略地說說他們所處的時代。楊業父子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史上之北宋的初葉。北宋承五代之後，內則權豪割據，建號稱尊；外則契丹侵凌，威脅中國。當此之時，在大河以南，則孟昶據四川稱後蜀；劉鋹據廣東稱南漢；李煜據江南稱南唐；錢俶據閩浙稱吳越。此外高保勗據荊南，高保維據朗州，張文表據潭州；此輩皆據地自雄，袞冕巍峨。在大河以北，自石晉塘以燕雲十六州割讓契丹後，晉冀北部久已淪於異族。在山西方面，則劉繼元據太原，稱北漢。北漢者，五代時後漢之支裔。自後漢篡於後周，於是後漢河東節度使劉崇，遂倚契丹爲外援而自稱北漢，歷傳以至劉繼元。故所謂北漢者，實卽契丹之傀儡也。

趙匡胤篡周以後，經過了十六年的戰爭，總算次第削平了大河以南的中國。卽因把力量完全消耗在對內的戰爭中，所以結果雖羣雄破滅，降王滿朝，而望着大河以北，蠻騎馳逐，傀儡囂張，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據宋史所載，趙匡胤曾於

開寶二年親征北漢，其弟光義（即太宗）亦曾於太平興國元年，破兵征北漢，但均爲契丹援漢之兵所敗。北漢且不能征服，契丹更無論矣。

當此之時，楊業正是北漢的一位無敵將軍。宋史本傳云：「業弱冠事劉崇爲保衞指揮使，以驍勇屢進至建雄軍節度使。屢立戰功，所向克捷，國人號曰無敵。」這位無敵將軍，當時正掌握北漢的兵權，有左右北漢政治的力量。他可以輔佐北漢，繼續在契丹支持之下，與北宋爲敵；也可以從北漢政府內部反正效順，奉山西之土地與人民還於祖國。楊業究竟是一個愛國志士，他知道契丹之支持北漢，是利用北漢爲傀儡，以伸展其勢力於山西，從而進窺河南，征服中國。楊業也許久懷反正之心，因迫於契丹的監視，不得其間。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七年）宋太宗大舉親征北漢，契丹之援未至，因此楊業便以「保存生聚」爲理由勸其主繼元降宋。自是以後，山西三萬五千二百二十戶人民，遂得以重回祖國，而大宋北方的疆界亦因之伸展至雁門以北。

楊業反正以後，顯然使當時中國的局勢，爲之一變，這就是把契丹的勢力，從山西驅逐出去了。楊業以爲從此他可以在宋代政府領導之下，獻身於討伐契丹的戰爭，他不知道宋代政府正在推行一種極端的中央集權政治，特別對於兵權，必須完全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北宋政府對於其自己的功臣夙將，尙且要解除其兵權，對於楊業這樣的降將，當然更不放心。所以楊業反正以後，他從北宋政府所得到的任務是鄭州刺史。

當宋代政府在開封祝捷之時，契丹卻大舉進犯山西。爲了抵抗契丹的侵略，宋太宗「以業老於邊事，復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楊業還鎭代州以後，曾於太平興國五年，大敗契丹於雁門之北。宋史本傳云：「會契丹入雁

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徑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見業旗旌，即引去。」

山西爲楊業的家鄉，爲了保衛家鄉，從而保衛大宋的領土，楊業奮其忠勇，轉戰於晉北雁門一帶者六年之久，卒使契丹不敢南向而彎弓。這種輝煌的戰績，是晉北人民親眼看見的。朝廷委晉北於化外，而楊業保衛之，當然在晉北人民看來，楊業就是他們的救星。就從這一時代起，他就被人民所歌誦，所傳說，即因如此「主將戍邊者多忌之，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者。」甚至太宗對他有所賞賜，都要「密封橐裝。」楊業在勝利地打擊外敵之後，反而遭受誹謗，這如果誹謗者不是漢奸，那就是因爲楊業不是政府的嫡系軍隊。

現在要說到楊業最後的一幕，即戰死陳家谷之役。

據宋史所載，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宋代政府分軍三路，進討契丹。一路由曹彬等指揮，出雄州；一路由田重進等指揮，出飛狐；一路由潘美指揮，出雁門。當時楊業就是潘美的副將。

三路大軍同時北進。出雁門之軍，在楊業的指揮之下，連接克復了雲應寰朔四州。但是當楊業前軍進次桑乾河時，曹彬指揮的河北之軍已經大敗。河北之軍既敗，出山西的兩路大軍，亦被迫撤退，楊業之軍亦退回代州。

當此之時，政府知道孤軍深入，必然失敗，所以給潘美的命令，並不是進攻，而是保護雁門關以北的人民向關內撤退。適於此時，契丹主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氏及五押惕隱，統十餘萬大軍，進陷寰州，逼近雁門。

依據當時形勢，三路大軍，兩路已退，雁門之軍，勢成孤軍。而況契丹主力軍已移晉北，敵我形勢，甚爲懸殊。楊業熟

知晉北地理形勢和敵人虛實，所以他不主張冒險出擊。但監軍王侁却堅持要楊業出擊，（按宋之監軍，其職權同於今日之政治部主任），所以結果楊業敗死陳家谷。

宋史本傳記楊業與潘美王侁的對話中可以看出。當時楊業謂潘美等曰：

「今遼兵益盛，不可與戰。朝廷只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候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卽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

王侁沮其議曰：

「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

業曰：

「不可！此必敗之勢也。」

王侁曰：

「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

業曰：

「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

將行，又泣謂潘美曰：

「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俟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

因指陳家谷曰：

「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

由以上的對話，我們可以看出勒令楊業孤軍出擊者並非主帥潘美，而是監軍王侁。至於楊業之慨然走上戰場，是明知必死而不得不死。不過他總不希望全軍覆沒，所以臨行時要求潘美於陳家谷設步兵伏弩，以爲援應。楊業出擊後潘美確曾設伏，至於後來之撤退伏兵也不是潘美，又是監軍王侁。楊業傳云：

「美與侁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台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麾兵卻走。業力戰，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卽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奸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由此足證致楊業於死者，非潘美乃監軍王侁也。王侁何以要迫使楊業去打不有把握的敗仗，我頗疑其與契丹有勾結，據王侁傳云「契丹使來貢，詔侁送於境上。」又云「侁一歲中數往來西邊，多奏便宜。」從這裏便可以找出他暗通敵國的蛛絲馬跡。後來又領蔚州刺史，蔚州近契丹，更有暗通之機會。

但據元曲所載，則頗有差異。元曲昊天塔有云：

「老夫，楊令公是也。因與北番韓延壽交戰，後被圍在虎口交牙峪，裏無糧草，外無救軍。這個是我第七個孩兒楊延嗣，他爲搭救我，被潘仁美攢箭射死，老夫不能得脫，撞李陵碑而亡。」

又云：

「只恨那潘仁美這個奸賊，逼的俺父子並喪番地。」

由宋史之說，則潘美曾經設伏，以後王侁撤伏，潘美不能制。由元曲之說，則潘美不但未設伏，且七郎突圍求救，亦將其殺害，而援兵始終不出；至於說到楊業的死，宋史謂被俘不食死，元曲則謂撞李陵碑而死，總之不論潘美曾否設伏，而楊業之死，則誠如他自己所云，實爲「奸臣所迫」而死。王侁一則謂其「畏懦如此，」再則責其「逗撓不戰，」甚至疑其有「他志」而必令其在「時有未利」的情形之下孤軍出擊，既出，而又撤去援兵，如此用心，其爲假手外敵，以消滅異己，實甚顯然。此種陰謀，後來宋代朝廷似乎也知道了，太宗追悼楊業的詔書中有云：「業方提貔虎之師，以效邊陲之用，而羣帥敗約，援兵不前，獨以孤軍陷於沙漠。勁果猋厲，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以後並將潘美降級三秩，監軍王侁劉文裕除名。雖然如此，亦無補於雁門之敗矣。

宋史本傳曰：「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艱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爲之用。朔州之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皆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皆感泣不肯去，……無一生還者，聞者皆流涕。」像這樣一個「忠烈武勇有智謀，」而又能「與士卒同艱苦」的大將，當強敵壓境之時，竟死於排除異己的奸臣之手，豈不爲親者所

痛而爲仇者所快耶？此宋太宗所以有「聞鼓鞞而思將帥」之慨也。

四　戰鬥河北平原的楊延昭及其子

宋史於楊業諸子只有延昭傳，已於前述。同時，元曲亦不及其諸子。自明以來，劇本小說，皆謂大郎二郎三郎七郎並死於陳家谷之役，四郎失蹤，或云被俘，五郎在五台爲僧，只有六郎未死，後來奉命鎮守三關。據元曲昊天塔云，三關者，梁州遂成關，霸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之總稱，其地均在今日河北保定以南。證之宋史，延昭曾被命知定遠軍，徙保州緣邊都巡檢使，並以守遂城有功，拜莫州刺史。與元曲所傳六郎之事，適相符合，然則延昭或爲六郎？而楊業亦唯此一子獨存也。

延昭當眞宗之世，當時契丹勢力日益南漸，河北山西，屢遭侵略。同時，陝北綏遠一帶，又出現了一個西夏王國，與契丹相結，侵擾西北。當此之時，大河以北，東自山東，西迄陝北，幾乎完全淪於異族統治或威脅之中。至於宋代政府的內部，則五鬼專政，五鬼者，即王欽若，丁謂，陳彭年，馬知節，劉承珪也。因爲他們相互勾結，蹤跡詭秘，故詩人號曰五鬼。即因五鬼之徒，充塞朝廷，正人君子如寇準等均被排斥。他們當大敵壓境之時，不惟不積極選將練兵，以救河朔生靈，反而引導眞宗今日封泰山，明日祠老子，天書符瑞鬧得烏煙瘴氣。他們說「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這些敗類，顯然是隱藏在政府中的一羣漢奸。

元曲中謝金吾詐拆淸風府一劇，即係描寫當楊延昭鎮守三關，與契丹相抗之時，王欽若命其婿拆毀楊家在京城之敕建的官邸之故事。據元曲謝金吾雜劇中所傳淸風府，是「先帝（太宗）與他家（楊家）造下的一座門樓，題曰『淸風無佞樓。』至今樓上有三朝天子御筆勅書，大小朝官過者都要下馬，天子春秋降香。」果如此說，則淸風府，不僅是一座楊家的官邸，簡直是一座烈士祠。而王欽若公然敢於拆毀，足見當時漢奸之橫行與對抗戰將領之痛恨。

王欽若在宋史中說他是中國人，但元曲則說他是契丹派到中國政府中來作奸細的。謝金吾雜劇中云：

「下官姓王名欽若，字昭吉。方今大宋眞宗皇帝即位，改元景德元年，下官現爲東廳樞密使。這裏也無人，下官本是番邦蕭太后心腹之人，原名賀驢兒。爲下官能通四夷之語，善曉六番書籍，以此遣下官直到南朝作個細作。臨行時，蕭太后恐下官戀着南朝富貴，忘了北番之恩，在我這左脚底板上，以硃砂刺『賀驢兒』三個大字。又有兩行小字道：『寧反南朝，不背北朝。』下官自入中原，正値眞宗皇帝爲東宮時，選文學之士，下官因此得進。今聖人即位，寵用下官，陞拜樞密之職，掌着文武重任，言聽計從，好不權勢。只有一事不能稱心，現今有一員名將，乃楊令公之子，姓楊名景，字彥明（即延昭）更兼他手下有二十四個指揮使，人人勇猛，個個英雄，天下軍民皆呼他爲楊六郎。……那楊景鎮守着瓦橋三關，所以北番不能得其尺寸之地。近來蕭太后使人將書來見下官之罪，說我忘了前言。我今無計可施，想來蕭太后連年不能取勝，皆因懼怕楊景，不敢興兵。若得殺了楊景一個，雖有二十四個指揮使，所謂蛇無頭而不行，也就不怕他了。那時等我蕭太后盡取河北之地，易如反掌，豈不稱了上官平生願。」

由此看來，王欽若等五鬼通敵賣國，殘害抵抗契丹的將領的漢奸行爲，已爲當時人民所共知共見，並且轉相傳說，流

傳民間，所以到南宋便以打樞密爨而出現於金院本，到元代，便以謝金吾而出現於元雜曲。遯溪逸史讀曲隨筆有曰：

「余讀元曲至謝金吾詐拆清風府一劇，而深有慨夫宋代奸逆之橫行也。王欽若以堂堂大宋密樞，朝廷之所畀倚，蒼生之所託命，不思奮其忠貞，整軍經武，北伐中原，驅除醜虜，復禹域於戎狄，救斯民於火水；乃寧反南朝，不背北朝，通敵賣國，媚外求榮，眞狗彘之不若矣。雖然，當時朝廷之中，如賀驢兒其人者，又豈少矣哉，此宋之所以南渡也。」

楊延昭正當滿朝漢奸橫行之時，出鎮三關。當時三關，實爲與契丹最接近之前線，亦可以說是淪陷區，因當時契丹勢力已越保定而南，進迫大名。因此，楊延昭的任務，實至爲艱巨。若委以重兵，尙可拒守，但據宋史本傳云：「時眞宗駐大名，傅潛握重兵頓中山，延昭與楊嗣石普屢請益兵以戰，潛不許。」由此足證前線統帥與王欽若等，也是同一鼻孔出氣。

雖然如此，楊延昭仍能以少數孤軍，與契丹相抗於河北前線。宋史本傳曰：「及潛抵罪，召延昭赴行在，屢得對，訪以邊要。帝甚悅，指示諸王曰：『延昭父業，爲前朝名將，延昭治兵護塞有父風，深可嘉也。』」

不僅如此，而昭曾一度大敗契丹之軍，但却因此而使朝中漢奸，大爲忌恨，蓋如此則契丹不能有逞於河北，而賀驢兒之流，無以報命於蕭太后也。宋史本傳云：「是冬，契丹南侵，延昭伏銳兵於羊山西，自北掩擊，且戰且退，及山西伏發，契丹衆大敗，獲其將函首以獻。進本州團練使，與保州楊嗣並命。帝謂宰相曰：嗣及延昭，並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衆，朕力保庇，以至於此。」

果然咸平五年，楊延昭小有挫敗，朝中漢奸，即欲致之於死。後來還是眞宗說「嗣輩素以勇聞，將收其後效，卽宥

之。」

咸平六年，契丹復侵望都，復以延昭爲都巡檢使。當此之時，延昭屢上防秋之策，均不爲政府採用。直至景德元年，延昭之兵才滿萬人。是年，契丹南侵，眞宗親征，駐營澶州（大名）不久契丹進薄澶州。當時，延昭上書，主張與契丹一戰。書云：

「契丹屯澶淵，去北境千里，人馬俱乏，雖衆易敗。凡有剽掠，皆在馬上，願飭諸軍，扼其要路，衆可殲焉。卽幽易數州，可襲而取。」

楊延昭的建議，沒有被採納，結果還是與敵人作城下之盟，卽所謂澶淵之盟者是也。

以後楊延昭仍知保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又進本州防禦使，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在屯所九年，卒於大中祥符七年，年五十七。當其靈櫬南返，「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

延昭子文廣，曾從狄青南征，做過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累遷至左藏庫使。治平中，又擢升成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興州防禦使，秦鳳副都總管。後奉命築篳篥城，因擊西夏有功，令知涇州鎭戎軍，爲定州路副都總管，遷步兵都虞侯。曾獻收復北河之策，未報而卒。賜同州觀察使。自文廣以後，楊氏遂無聞。

五　結語

總觀以上所述，我們因知楊家二門，父子祖孫，在北宋初葉，確係震動一世的人物。如業楊奉山西之土地與人民，從契丹控制之中還諸中國。以後鎮守晉北，轉戰雁門，所向克捷，有無敵將軍之稱。可惜，後來竟死於排除異己者之手。楊延昭鎮守三關，轉戰河北平原，以孤軍而屢挫強寇，「契丹震怖，目爲六郎，」可惜扼於朝中漢奸不得展布。至於楊文廣，亦曾南征北伐，爲宋代保衛疆土，可惜亦以收復河北之議不行，鬱抑而死。楊家祖孫三代，皆爲宋代保衛疆土與外寇奮戰於山西河北陝西一帶，其忠勇之精神，壯烈之犧牲，悲慘之遭遇，實爲當時人民所共見共聞，同聲婉惜者也。所以對於楊家將的事蹟，宋史雖有意無意紀錄不詳，但人民是最公平的歷史家，他們却用傳說把這些民族英雄的偉蹟，很眞實而生動的紀錄下來了。由此而知只要是眞正爲國家爲民族而鬥爭的英雄，他決不會從人民的歷史讀本上消滅。反之，若潘美、王侁、王欽若之流，正史雖爲之掩飾，但在人民的傳說中，却現出了敗類和漢奸的原形。

一　「沒有個人敢咳嗽」的時代

自從一二七六年的春天，韃靼的蠻騎，闖進了南宋的首都臨安（今杭州）以後，於是當時中國最後的一座文化神殿，也就墮爲灰燼。跟着而來的，是韃靼征服者野蠻的刀劍統治，在這種統治之下，中國的文化，遂走進了一個瘟疫時代。當此之時，韃靼的統治者，雙脚踏在中國文化的胸膛上。中國的文化，正像一個重創的戰士，氣息奄奄，躺在血泊之中。中國的智識份子，則成羣地被屠殺、被幽囚、被奴虜，其幸而苟全性命者，也正如馬致遠所云：

「似箭穿着雁口，沒有個人敢咳嗽。」——漢宮秋

當此之時，若是回想過去「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的時代，眞有隔世之感。雖然如此，中國的文化，仍然沒有在異族的刀劍之前，停止其發展。並且不久便以嬉笑怒罵的形態，開始對文化剿滅者的反攻，而這就表現於元代戲劇之空前的發展。

文化本是社會經濟生活的「氣化」，只要蒸發社會經濟的「聖火」（生產力）沒有熄滅，他必然也會被繼續揮

發出來，我們知道韃靼的統治者，雖然一面封閉了蒸汽的出口，但同時却加大了聖火的燃燒，所以結果中國的文化，就像蒸汽一樣，以更集中的力量，從封條的縫隙中放射出來。至於不表現爲其他的文化而表現爲戲劇者，則以戲劇是比較軟性的文化。他可以指桑說柳，可以倚雞罵狗，因而在沒有中國文化修養的韃靼統治者面前，便可以領到文化的通行證。

二　錄鬼簿中的元代戲劇作家

在韃靼統治中國的九十年間，中國的戲劇作家一時羣起，接踵輩出，作家之多，實爲前古所未有。據鍾嗣成錄鬼簿所載，當時作家之有姓名可考者，計有一百十六人，其作品不著姓名而署「無名氏」者以及作家的姓名與作品俱佚者，尙不在內。由此可以想見當時劇曲創作繁榮之一斑。

鍾氏在錄鬼簿中，把他所著錄的一百十七個作家，依其出身的先後，別爲三個時期：第一期，爲已死的前輩；第二期，爲方今已死者；第三期，爲其同輩。王國維氏於其所著宋元戲曲史中，對鍾氏的分期曾加以時代的考訂。謂鍾氏所謂第一期，係蒙古時代（自忽必烈取中原以後至一統之初，卽一二三四——一二七九年）第二期，係一統時代（自至元至至順後至正間，卽一三四〇年以前）第三期，係至正時代（卽一三四一——一三六七年。）由此可知終元之世，中國戲劇的發展，未嘗稍歇。

惟據錄鬼簿所載，第一期作家爲五十七人，第二期爲三十六人，第三期爲二十五人。此種數字似乎指示元代戲劇，自元初以後，卽有漸趨衰弱之傾向。我以爲或不盡然，蓋第一期爲元曲的開創時期，而第二三期則爲其發展時期，以理推之，第二三期的作家，似不應少於第一期。至錄鬼簿所載之相反的數字，或係作者對於二三期的作家，著錄較少。實際上錄鬼簿所著錄的作家，都是鍾氏認爲「名公才人」者，其未成名者，則拼而不錄。且鍾氏之書，其所敍述之時代，僅及於一三四五年，而元之亡，則在一三六七年，此後二十餘年中的作家當然不能見於鍾氏之書，因此我們並不能根據錄鬼簿的著錄而遂謂元代的戲劇自元初以後卽走向衰落的過程。

元代的戲劇作家，除李直夫一人是女眞人，其餘都是漢人。由此則知今日所見之元曲，乃是當時中國智識份子的聰明才力之積蘊，亦卽十三世紀中國文學的總結晶。

在漢人之中，第一期的作家，全爲北人；第二三期，則南人多而北人少。據錄鬼簿所載，元代第一期的作家五十七人，都是北人。在北人中，大都（今北平）一地有十九人，佔三分之一。到第二期作家三十八人中，北方七人，其餘除籍貫不明者五人外，都是江浙一帶的人。而且北方的七個作家中，有五個作家（曾瑞、喬吉甫、李顯卿、鄭光祖、趙良弼）都在江浙一帶做官或僑居。到第三期則二十五個作家中，北方只有一人（高君瑞），其餘除籍貫不明者九人外，都是江浙一帶的人，而江浙的作家，又大半屬于杭州。大都和杭州之所以成爲當時戲劇作家集中之地，是非常自然的，因爲大都爲韃靼統治者首腦部所在之地，而杭州則爲南宋的舊都。中國作劇家的中心，由大都移轉到杭州，也是很自然的，因爲這就指明了當時作家漸漸從韃靼統治者的御用之中解散出來的事實。

元代的戲劇作家大半都是布衣之士。其中亦有少數曾爲元代的省椽令史之官。如馬致遠、尙仲賢、戴善甫，均曾爲江浙行省務官。姚守中曾爲平江路吏。李文蔚曾爲江州路瑞昌縣尹。趙天錫曾爲鎭江府判。張壽卿曾爲浙江省椽史。鄭光祖曾任杭州路吏。金仁傑曾任建康崇甯務官。張國賓曾任教坊勾管。李壽卿曾任縣丞。惟有楊梓一人曾仕元爲顯宦，他曾任元代招撫爪哇等處的宣慰司官，在韃靼征服爪哇以後，他又任駐爪哇的安撫總使，官至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又如關漢卿曾仕金爲太醫尹，白朴曾仕金爲禮儀院大卿，但此二人在元代皆未做官。此外，則皆布衣之士。由此可知當時十分之九的戲劇作家，都是不肯投降異族的。

三　元代戲劇作家留下來的作品

元代的戲劇作家，留下了不少的作品。據李開先作張小山樂府序云：「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千七百本賜之。」此尙就明代宮廷所搜集者而言，其散在民間者不在其內。但甯獻王權太和正音譜卷一，著錄元人雜劇，僅五百三十五本，加以明初人所作，亦僅五百六十六種。又錄鬼簿所著錄，亦僅四百五十八本。因而王國維氏疑元曲數量，不如李開先所說之多。

元曲數量，究有多少？固不得而確知。但各家著錄之有缺漏，實所不免。例如以錄鬼簿之著錄而言，對於第二期作家二十六人，即有十八人的作品未錄；對於第三期作家二十五人，即有十四人的作品未錄。又如對於大多數的作

家，皆僅錄其作品之一二。但當時作家既被鍾氏稱爲「名公才人」，則決不致無一作品，或僅有一二作品。例如，作家曾瑞卿死時，弔者千餘人，當然不僅只寫留鞋記一劇，就可以發生如此重大的社會影響。此外如錄鬼簿所著錄之關漢卿的作品爲五十八種，而據今日所知者，則爲六十三種：同樣對於高文秀、馬致遠、尙仲賢、武漢臣、李壽卿、張國賓等之作品的數目，皆少於今之所知者。錄鬼簿如此，其他的著錄，亦難免不如此，因此我以爲明初人所見之元曲有一千餘種，實爲可信之事。

至於臧晉叔選元曲的時代，已到明萬曆年間，此時南曲已盛行。臧氏元曲選自序云：「今南曲盛行，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由此而知當時元人雜劇，已爲南曲所代替，當時的元曲，不過爲少數藏書家當作文學的遺產，加以搜藏而已。臧氏元曲選自序又云：「余家藏雜劇多祕本，頃過黃（州）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云錄之御戲監，與坊間本不同，因爲參伍校訂，謫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由此而知當臧氏撰元曲選時，坊間流行的元曲，已不甚多。但同時，又知臧氏撰元曲選時，並未將其手邊所有的元曲，盡數編入，而僅「謫其佳者。」王國維氏因見元曲選中所撰元曲僅九十四種，加以明人的作品六種（兒女團圓、金安壽、城南柳、誤入桃源、對玉梳、蕭淑蘭）始足成百種之數，遂疑當時元曲已不滿百。這是一個錯誤。

關於此點，我們從其他的方面也可以得到證明。如與臧氏同時刊行之元曲，尙有無名氏之元人雜劇選及海甯陳與郊之古名家雜劇。此二書今雖僅存其目，但從其目錄上，也可以看出前者所撰的元曲，其不見於元曲選者有四種：（馬致遠踏雪尋梅、羅貫中龍虎風雲會、無名氏九世同居、符金錠。）後者所撰的元曲，其不見於元曲選者，則有八種。

總計兩書所撰的元曲，其出於元曲選者，共有十二種。此外據王國維氏自云：「錢遵王也是園藏曲，則目錄具存，其中確爲元人作者一四一種。」又謂：黃丕烈所藏元刻古今雜劇，其乙篇今已發現，有乙篇必有甲篇，假使甲篇種數同于乙篇，則其所藏元曲當有六十種。「今甲篇存佚不可知，僅就乙篇而言三十種中，爲元曲選所無者，已有十七種。」由此又知元曲之散失而不傳於世者甚多，將來一定還能繼續有所發現。

雖然我們今日所得而見的元曲，則僅有元曲選中的九十四種，與西廂五劇及元刻古今雜劇乙篇中之十七種，合爲一百十六種，而這就是我們今日藉以研究元曲的資料。

四　元代的戲劇爲甚麼這樣發展

元代的劇曲創作，何以如此發展？沈德符萬曆野獲錄編及臧晉叔元曲選序均謂：「元取士有塡詞科，」一般才人，以此爲進取功名之路，故爾發展起來。關於沈臧二氏的說法，王國維氏曾予以批判。王氏於宋元戲曲史中云：「至蒙古滅金，而科目之廢垂八十年，爲自有科目以來未有之事。故文章之士，非刀筆吏無以進身，則雜劇之多爲椽史，固不足怪也，沈德符萬曆野獲錄編（卷二十五）及臧懋循（卽晉叔）元曲選序均謂蒙古時代，曾以詞曲取士，其說固荒妄不足道。余則謂元代之廢科目，則爲雜劇發達之因，蓋自宋元以來，士之競於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廢之，彼其才力無所用，而一於詞曲發之。且金時科目之學，最爲淺陋，此種人士，一旦失所業，固不能爲學術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

其所素習也。適雜劇之新體出，遂多從事於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於其間，充其才力，而元劇之作，遂爲千古獨絕之文字。」

王氏之言自較沈臧二氏爲正確，但我以爲元曲之所以展開突出的發展，進而成爲一種時代的精神尙不僅如王氏所云，只是由於「一二天才」的迸裂，主要的還是由於城市經濟的發展。中國自北宋以來，城市經濟，便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到元代，由於韃靼人之世界征服，打通了歐亞的水陸交通，城市經濟，更臻於繁榮。因之，自宋代起，一般城市自由商人和手工業的老闆，他們漸漸成長起來，成爲一種新的歷史階層。他們掌握了足夠的物質條件，因而也就要求藝術享樂。但這種新興的歷史人物，他們出身寒微，沒有深厚的文學修養，對於古典的貴族文學，不能感到興趣，他們要求文學的通俗化，這就是比唐詩更爲通俗的宋詞之所以出現的歷史原理。不僅如此，他們對於那種作爲文學欣賞之酒後一曲的彈詞，不能感興趣，他們要求文學的具象化，因而在宋代便出了由若干詞曲結合而構成的一種故事的眞正戲劇。宋崇文總目（卷一）已有周優人詞曲二卷。夢粱錄（卷二十）亦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而武林舊事（卷十）所載「官本雜劇段數，多至二百八十本。」由此而知戲劇在兩宋時代，已有很高的發展。到元代，一般韃靼的統治者，色目商人，他們都在中國大發橫財，在唯飽了物之後，也就想唯幾分鐘的心，但是這些外國貴族、官僚和商人，他們對於中國的文學，更是一竅不通。他們不能從文學方面去欣賞中國的戲劇；只能從情節的穿插以至劇人的姿態中去欣賞。因此，他們要求戲劇的通俗化，所以在元曲的賓白中便插進一些外國人所能懂得的俗語，比如在楊顯之風雪酷寒亭中便有這樣一句：「舉一句燕京厮罵，入沒娘老大小西瓜。」由此看

來，戲劇的發展，是城市經濟發展之一種必然的產物，所以早在宋代，中國的戲劇，就已經由宮廷走到市場。接着在韃靼人的文化抑壓中，中國文化除戲劇以外，無路可走，又更加強化幷集中了他的發展。

誠然，中國的戲劇，在韃靼人的壓迫之下，獲得了更集中的發展，形成了中國戲劇發展史中的高潮。但是即使沒有韃靼人的壓迫，中國的戲劇，也會隨着城市經濟之發展，慢慢前進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元曲發展的淵源中，可以看得出來。

首先，元曲中所使用的曲牌，大半都是承襲着唐宋的古曲。元人所使用的曲牌，據周德清中原音韻所錄，共爲三百三十五章；陶九成輟耕錄所錄，爲二百三十章。據王國維氏考證，在這些曲牌中，其出於大曲者十一，出於唐宋詞者七十五，出於諸宮調者二十八。如此則在三百三十五章中，出於古曲者一百一十，已佔全數三分之一。此外，曲名不見於古曲而知其非元人創造者，又有十種（六國朝、憨郭郎、叫聲、快活三、鮑老兒、四邊靜、喬捉蛇、撥不斷、太平令。）由此而知元曲的本體，實由唐宋古曲發展而來，甚爲明瞭。

不僅如此，據王國維氏攷證，元代雜劇的故事結構，其脫胎於金人院本者，共有二十種；其脫胎於宋官本雜劇者，十一種，而金人院本，又多脫胎於宋官本雜劇。準此而論，則元人雜劇，可以說是中國戲劇自身發展之必然的形式。

五　所有的元曲只是描寫五種典型人物

元曲是十三世紀中國的時代精神，他當然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歷來學者，沒有一個人不讚嘆元曲的文采風流，詞藻富麗，是千古的絕調。王國維也曾這樣說過：「元曲之妙，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出其口是也。」

我以為「元曲之妙」，尚不僅「在其文章，」而尤其在於其「思想結構。」蓋所謂「文章」無論如何優美，只是一種文學的技術，而「思想結構，」則為文學的本體。前者是用以表現內容的形式，而後者則是被表現的內容。元曲之妙，固然也在於其文學技術之熟練，在於其具有優美的形式，但是尤其在於其思想結構之深刻，在於其具有豐富的內容。假如元曲只是具有優美的形式，而沒有豐富的內容則這樣的劇曲，不論在文學上或藝術上，都是沒有價值的東西。正因為元曲是有內容的有靈魂的文學，所以他才能從當時的人民當中，喚出回響；才能從幾百年以後的讀者的心靈中，喚出感應。

固然，元曲在反映現實的方面，還是十分地不夠。比如我們在元曲中找不到一個劇本敢於大胆的描寫十三世紀韃靼人所捲起的震撼世界的大活劇，敢於大胆地描寫韃靼人屠滅中國人民的戰爭，敢於在空前的浩劫中發出一聲反韃靼的戰鬥的呼號。甚至他們對於戰場上遺留下來的幾百萬具漢人的腐屍，對於遺留於戰後的幾千萬無告的孤兒寡婦，和一個淪為瓦礫的世界，都不敢發出一聲惋惜的悲嘆。

但是我們應該原諒元代的戲劇作家，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空前黑暗，絕頂恐怖的時代。他們隨時隨地，都有被投入牢獄，被割去舌頭，被砍掉腦袋的危險。沉重的歷史壓力，使他們失去思想馳騁的自由，殘酷的現實生活，使他們不

敢正面的接觸政治問題，乃至人間世界的問題。照當時的環境而言，他們似乎只有一個題才可寫，這就是「大汗萬歲。」

然而元代的作家，并沒有如此的下流，去替韃靼殺人者作卑鄙的祝福；反之，而能運用其文學的天才，藝術的手腕，傍敲側擊，假設反襯，委婉曲折，盡情極致，從各個側面，各個角度，暴露出當時社會的陰暗面，用生動而鮮明的線條劃出活動於黑暗時代中的形形色色的鬼影。他們雖然不曾描繪出一幅韃靼殺人者的連環畫，但是假使把元代戲劇作家所描繪的一個一個的鬼影，拚合起來，那就可以使我們看出十三世紀中國社會的具體形像。因此，我以為元代的戲劇作家，並沒有放棄他們的藝術使命。

固然有一部分作家，也在這個大恐怖之前，被嚇退了，他們逃避現實而沉溺於幻想。但是，在當時，再也找不到一個安樂的象牙塔，讓作家們過渡其靜恬幽閒的生活。殘酷的現實，緊緊追隨着作家的踪跡，教他們無可逃，無可避。因而他們除非不寫作，要寫作，現實的生活便自然而然侵透在他們的作品之中。

暴力抓住了作家的頭髮，但並不能抓住作家的心靈。思維，是最善於找到自己的出路的。你不准他談政治，他就談戀愛；你不准他談人間，他就談天上；你不准他談現在，他就談過去；反正他總要找條出路。因此，當時的元代戲劇作家，他們都能很巧妙地寫出當時社會的現實形象。很明顯地，一百十七個元劇，雖然各個劇本，都有其自己之故事的結構，但在根本的命意上，只是五種典型人物之描寫：即墮落者、逃避者、控訴者、譴責者和叛逆者之描寫。這些典型人物之出現於當時的舞台，決不是元代戲劇作家的幻想，而正是當時現實社會之深刻的反映，因為當時確實有這五種類型的人

物之存在。

六　墮落者的典型——才子佳人

首先我們說到墮落者的典型。打開元曲一看，我們到處可以碰見的，是才子佳人。例如關漢卿之玉鏡台、謝天香、金線池、望江亭。白仁甫之梧桐雨、牆頭馬上。喬孟符之揚州夢、金錢記。鄭德輝之㑳梅香、倩女離魂。曾瑞卿之留鞋記。武漢臣之玉壺春。石君寶之曲江池。張壽卿之紅梨花。石子章之竹塢聽琴以及無名氏之碧桃花、鴛鴦被、百花亭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作品。

在這一類的作品中所描寫的故事，不是「韓壽偷香，」便是「杜牧病酒；」不是「司馬青衫」便是「倩女離魂；」不是「章台走馬，」便是「閨閣調情。」在這些故事中描寫的人物，都是「嬌帽輕衫小小郎，繡披香車楚楚娘；」「沒門敗戶的婆娘，多愁多病的倩才郎。」「洛陽女兒」「長安年少；」「風流色鬼」「歡喜寃家。」這些男女一個個都是「色胆大於天，酒腸寬如海。」他們躭心的，都是恐怕「空誤了幽期密約，虛過了月夕花朝。」除了情人以外無人類，除了巫山以外無世界，這就是所謂「佳人才子。」

在這些戲劇中也有成功和失敗，但與社會無關。這裏的成功與失敗，是指色情的已遂與未遂。例如在這些劇本中說：那些已遂的，則「翡翠紗窗，鴛鴦碧瓦，孔雀金屏，芙蓉繡榻，幕捲輕綃，香焚睡鴨；燈上上，簾下下，這的是南首尚書，東床

駙馬。」（玉鏡台）

那些未遂的，則「月溶溶，梨花庭院；風淡淡，楊柳樓台，霧濛濛，芳草池塘；如此好天良夜，淑女才郎。相將意廝投，門廝對，斤廝當，成就了隻凰孤凰。這一個夜月南樓；那一個窺覷東牆。」（㑳梅香）

結果，不是「人歸陽台雲歸楚峽」「雲飛雨散，夢斷魂銷；」便是「夫婦結髮，人月團圓」。

像這一類的作品，最容易引起讀者的誤會，以爲元代的戲劇作家，已經墮落到娛樂遊宴者的「歌人之藝術」，以爲他們專門在替韃靼統治者創一些羅曼斯或肉感的文學。但是事實上，這種「佳人才子」的出現，正是體現當時社會「墮落者」的生活。體現這種現實的人物，是在戰後出生的「公子哥兒」。他們既沒有看到戰爭的殘酷，而又擁有富厚的資財，同時在政治上又沒有出路，於是放縱情慾，墮落到無絲毫精神生活而成爲肉慾之奴役者。這正如石子章所云：「那秀才每，識後生，奸色精，一個個害的是傳槽病症。」（竹塢聽琴）這一類墮落的青年，他們睡眠在「時代的後院」做着甜蜜的美夢，毀着那殘酷的現實，在他們面前咆哮而過，好像沒有看見。元曲中關於才子佳人的戲劇，只是把這些失掉了種族意識的墮落青年請上舞台而已。

七　逃避者的典型——神仙道人

在元曲中，我們又到處可以碰到神仙道士爲主角的戲劇。這些神仙道士，就是逃避者的典型，如馬致遠的岳陽樓、

黃粱夢、任風子、陳摶高臥。岳伯川的鐵拐李。范子安的竹葉舟。吳昌齡的東坡夢。楊景賢的劉行首。鄭廷玉的忍字記。張壽卿的紅梨花。尙仲賢的柳毅傳書、張生煮海。喬孟符的兩世姻緣。以及無名氏的度柳翠、盆兒鬼、柳花女、張天師、來生債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作品。這一類的戲劇，都是描寫人類社會的痛苦神仙世界的快樂，於是呂洞賓等慈悲爲懷的仙人便出現爲救苦救難的主角，他們接引世人超凡入聖，成仙成佛。

在這些劇本中所描寫的神仙世界，在那裏有極其優美的風景。「朱頂鶴獻花鹿，唳野猿嘯風虎；雲滿窗月滿戶；花滿蹊，酒滿壺風滿簾，香滿爐。」（任風子）在那裏有極其幽閒的生活。「看讀玄元道德書習學淸虛莊列術。」（任風子）「身安靜宇蟬初蛻夢繞南華蝶正飛，臥一榻淸風，看一輪明月，蓋一白片雲，枕一塊頑石，直睡的陵遷谷變，石爛松枯，斗換星移。」（陳摶高臥）在那裏，有「小小茅屋是可居，春夏秋冬總不殊；春景園林賞花木，夏日山間避炎暑，秋天籬邊玩松菊，冬雪檐前看梅竹。皓月淸風爲伴侶，酒又不飽色又無，財又不貪氣不出。」（任風子）在那裏，有形形色色的幽閒人物、「這一個倒騎驢，疾如下坡；這一個，吹鐵笛，韻美聲和；這一個，鬢蓬鬆鐵拐橫拖；這一個藍關前，將文公度脫；這一個，綠羅衫拍板長歌。」（竹葉舟）在那裏，「出離了生死，死死和別死。」（度柳翠）「興亡不管，生死無憂。」「困來那一眠，閒來那一醉，一任漁樵說是非，笑殺兒曹走南料北，空嘆英雄爭高爭低。」「草菴內談玄妙，蒲團上講道德，萬事休題。」（劉行首）

這一類的戲劇之出現，很鮮明地，是由於當時的作家，已經沒有觸及人間問題的允許，而只能選擇此種與人間社會絕不相關的題材。但同時也反映出當時人類對新世界新社會之渴望。他們沉痛地感到現存的社會，已經變成了一

個魔鬼世界，而又沒有勇氣驅除這些魔鬼，所以就幻想一個神仙世界，作爲精神的避難所。實際上當韃靼征服中國之後，當時確實有一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遁入深山，逃向海外。柳毅傳書及張生煮海的故事，就正是暗示當時有人逃向海外荒島的事實。這些逃避者，他們以爲「光陰似過隙的白駒，世人似舞甕醯雞，」縱得一階半職，結果還是「雲陽市，血染朝衣」「死無葬身之地。」所以不如「居林下，絕名利，自不會到下山來惹是非。」(陳摶高臥)像這一類「全不管人間甲子，單則守洞裏庚申」的逃避者，較之墮落者，當然略勝一籌，但也是失了民族解放自信的一羣。

八　控訴者的典型——清官

在元曲中我們常常看到以包文拯這一類清官爲主角的劇戲。這一類的清官就是爲控訴者而設的假定法庭、如關漢清的竇娥冤、蝴蝶夢、魯齋郎，鄭廷玉的後庭花，孟漢卿的磨合羅，張國賓的合汗衫，以及無名氏的陳州糶米、勘頭巾、冤家債主、馮玉蘭、硃砂担、灰闌記等都是這一種的作品。

這些清官，特別是包文拯，他不僅可以接受活人的控訴，而且還能接受那冤魂冤鬼的控訴。當時的作家之所以把這一類清官請上舞台，其目的是要在一個假設的法庭之前，替那些無告的冤人和冤鬼作一種公開的控訴，用以暴露韃靼殺人者的罪行。這樣，他們就可以把許多貪污者刼奪者殺人者一個個逮捕到法庭之前加以國法的審判。在作家的法庭之前，貪污者出現了。

「小官劉衙內的兒子小衙內，同着這妹夫楊金吾兩個，到這陳州開倉糶米，父親的言語，着俺二八糶米。本是五兩銀子一石，改做十兩一石，米裏摻上泥土糠粃，則還他個數兒，斗是八升小斗，稱是加三大稱，若百姓們不服，可也不怕，放着有那欽賜的紫金鎚哩。」（陳州糶米）

「我做斗子十多歲，覓些倉米養老婆，也非成担偷得去，只在斗裏打雞窩。」（同上）

「只今個賊倉官享富貴，全不管衆百姓受熬煎。一刻的在青樓纏戀，那廝們不依欽定私自加添（加添米價。）盜糴了倉米，乾沒了官錢，都送與潑煙花，潑煙花玉粉蓮。」（同上）

「我想這做屠戶的雖是殺身害命，還強似俺做吏的瞞心昧己，欺天害人也。他退毛湯，不熱如俺濃研的墨；他殺狗刀，不快如俺完成的筆。他雖是殺生害命為家計，這惡業休提，俺請受了人幾文錢，改是成非，似這般所為，慘可可的活取民心髓，抵多少豬肝豬蹄。」（鐵拐李）

「減一筆，教當刑的責斷；添一筆，教為從的該敵；一管扭曲作直的取狀筆，更狠似圖財致命的殺人刀。出來的都闕來節去，私多公少，可曾有一件兒合天道，他們都指山賣磨，替百姓畫地為牢。」（同上）

再看高利貸者也出現了。竇娥冤、鴛鴦被等劇，都是描寫父親借錢女兒抵賬的故實。

「只為那舉債文書是我畫的有親筆跡，因此上，被強勒為妻室。」（鴛鴦被）

再看殺人賊也出現了。

「眼見得王文用在明晃晃刀頭上遭危難；王從道在黑洞洞井底何時旦；還將他花朵般媳婦兒，只待要強姦；有這

許多罪犯。哎喲！天那！……一步步行到枉死地。」（硃砂担）

「依舊有青天白日，則不見幼子嬌妻。」（鐵拐李）

諸如此類的黑暗事件，不可勝舉，以上不過略示其例而已。

九 譴責者的典型——有氣節的文人

在元曲中，有許多以有氣節的文人為主角的戲劇，如宮大用的范張雞黍，馬致遠的漢宮秋，鄭德輝的王粲登樓，無名氏的凍蘇秦、漁樵記等，都是屬於描寫譴責者的典型的作品。這種作品的出現，就表現了當時有一部分倔強的智識份子，他們公然地對當時社會，發出了不滿的呼聲。

比如他們譴責當時的文化剿滅者曰：

「孔子道千古欽尊，孟子時空將性善說諄諄；怎知道，歷齊梁，無個能相信。到嬴秦，儒風已滅，從此後，聖學湮淪。想高皇本亭長區區泗水濱；將諸侯西入秦，不五年，掃清四海絕烽塵；他道是功成馬上無多遜，公然把詩書撇下無聲問。雖則是儒不坑，雖則是經不焚，直到孝文朝，挾書律蠲除盡，才知道天未絕斯文。」（范張雞黍）

他們譴責韃靼統治者不用漢人曰：

「我堪恨那夥老「喬民」（外國人）用這等小猢猻，但學得些裝點皮膚，子曰詩云。本待要借路兒圖一個出

身，他每（即他們）現今如都齊了行，不用別人（漢人）。」

「將鳳凰池攔了前路；麒麟閣頂殺後門；便有那漢相如獻賦難求進；賈長沙痛哭誰偢問；董仲舒對策無公論。便有那公孫弘，撞不開昭文館內虎牢關；司馬遷打不破編修院里長蛇陣。」

他們譴責那般毫無智識的韃靼官僚曰：

「您子父每輪替着當朝貴，倒班兒居要津，則欺瞞着帝子王孫；猛力如輪，詭計如神，誰識您那一夥害軍民聚斂之臣。現如今那棟梁材平地上剛三寸；你說波，怎支撑那萬里乾坤！都是些裝肥羊法酒『人皮囤』一個個智無四兩，肉重千斤。」

「口邊廂奶腥也猶未落，頂門上胎髮也尚自存，生下來便落在爺羹娘飯長生運，正行着兄先弟後財帛運，又交着夫榮妻貴催官運，你大拚着十年家富小兒嬌，也少不的一朝馬死黃金盡。」

「這一夥魔軍，又無甚功勳，却着他畫戟朱門，列鼎重裀，赤金白銀，翠袖紅裙，花酒盈樽，羊馬成羣。有一日天打算衣盡祿絕，下場頭少不的吊脊抽筋。小子白身，樂道安貧。覷此輩何足云云。」（同上）

他們遣責漢奸曰：

「恁也丹墀裏頭，枉被着金章紫綬；恁也朱門裏頭，都寵着歌衫舞袖；恐怕邊關透漏，央及家人奔驟；似箭穿着雁口，沒有個人敢咳嗽。吾當僝僽他也他也紅妝年幼，無人搭救。昭君共你們有甚麼殺父母怨仇，休休！少不的滿朝中都做了毛延壽，我啊：空掌着文武三千隊，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鴻溝，陡恁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我道你文臣安社稷，武將定戈矛，你只會文武班頭，山呼萬歲，舞蹈揚塵，道那聲『誠惶頓首』。」（漢宮秋）

他們譴責那些唯利是圖的韃靼富豪曰：

「他道那下着的（雪）是國家祥瑞，則是與那富家每（們）添助，他向那紅爐的這暖閣，一壁廂添上獸炭，他把那羊羔來淺注。門外又雪飄飄，耳邊廂風颯颯，把那氈簾來低簌。一壁廂有刺刺象板敲，聽波，那悠悠佳人唱，醉了後，還只待笑吟吟美酒沽。哎！哥也，他們端的怎知道漁樵們受苦。」（漁樵記）

「他則待人前賣弄些好粧梳，扮一個峨冠的士大夫，……可正是天降人皮包草軀，學料嘴，不讀書。」（同上）

他們譴責韃靼統治者糟蹋中國智識分子曰：

「他他他滄海將升斗傾，泰山將等秤稱，鰲魚向池中養，鳳凰在籠內盛。我如今眼睜睜，捱盡十分蹭蹬。待要去做莊農，又怕誤了九經；欲經商，又沒個本領。往前去，賺入坑；往後來，退入阱。」（凍蘇秦）

「嘆書生，我這裏便嘆書生，……我要吃也無那珍饈百味；要衣啊也無那羅錦千箱。這生涯，都在長街上。我可也又無甚資本，又不會做經商；止不過腕掛着灰罐，手執毛錐，指萬物，走筆成章。有那等不曉事的，倒將我呸搶。剗地來，着我凍剝剝，靠這賣文爲活。窮滴滴幾時能勾氣昂昂。」（同上）

「則這斷簡殘編，孔聖書，常則是養蠹魚。我去這六經中，枉下死工夫。凍殺我也，論語篇，孟子解，毛詩註；饑殺我也，尚書云，周易傳，春秋疏。」（半夜雷轟薦福碑）

「常言道，七貧七害，我便似阮籍般依舊，依舊窮途。我住着半間兒草舍，再誰承望三顧茅廬。」（同上）

十　叛逆者的典型——草莽英雄

在元曲中有以梁山泊上的草莽英雄爲主角的戲劇，如李文蔚的燕青搏魚，康進之的李逵負荆，無名氏的爭報恩、雙獻功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作品。

梁山泊上的草莽英雄，當然是典型的叛逆。這種輪廓分明的叛逆人物之公然地武裝登台，並不是作家追懷過去，而正是歌頌當時爲了祖國的解放而鬥爭的「彌勒白蓮教匪」和「江南羣盜」之反韃靼的英勇鬥爭。所以當時的作家歌頌這種叛逆的行爲，是「替天行道救民生。」祝福這些叛逆的英雄，「願天下好男子不遭牢獄之災。」

這些叛逆英雄之出現，決非偶然，元代的作家們，他們對統治者的韃靼的生活，曾經作如次的描寫：

大汗則「有披鱗帶角相隨從，深居富貴水晶宮。」（張生煑海）「今日個宴羣公，光祿寺醞江釀酒；尙食局，炮鳳烹龍；教坊司，趨蹌妓女；仙音院，整理絲桐；都一時向御院來供奉，恰便似衆星拱北，萬水朝東。」（麗春堂）

韃靼的貴族們，則「衲襖子繡搜絨兎鶻，磤玉玲瓏，一個個躍馬揚鞭，插箭彎弓，他每那祖宗，是斑斕的大蟲。」（同上）

韃靼的虎頭萬戶們，則一個個「腰橫轆轤劍，身披鷫鸘裘。」（虎頭牌）到處「坑人財，陷人物，吃人腦，剝人皮。」（玉壺春）「怕不的貲財足備，孳畜成羣。……如今欲待去消愁悶，則除是飛鷹走犬逐逝追奔。」（虎頭牌）他們

的軍隊，「不害生靈麼？六十萬！」他們的畜羣，「不傷禾稼麼？八百里！」（柳毅傳書）

韃靼的官僚們，則「擎鞭壯士驅前立，捧臂佳人閣內行，沈醉早筵方欲散，耳邊猶有管絃聲。」（勘頭巾）

韃靼和色目的商人們，則「以資本爲商賈，趨利息，衝州撞府。」他們「黑的是心，白的是財。」（還牢末）「積趲下，高北斗殺身的錢，」「聾聾兒做財主。」（來生債）這些「不知名的胡先生，」（岳陽樓）「倚仗財物奪人妻女。」（玉壺春）

韃靼的僧侶則「拿着一串數珠，是嚇子弟降魔印；輪着一條柱杖，是打鴛鴦無情棍。」（金線池）

在個別的描寫以後，於是元代的作家總結一句曰：「這都是剝民脂膏養的能豪旺。」

在韃靼統治者的壓榨之下，當時中國人民的生活怎樣呢？元代的作家也描寫得非常生動。他們說：

一部份中國士大夫則墮落到「翠紅堆」「花衚衕」，做了「風月的元戎將，」「拚死在鶯花寨。」（玉壺春）

另一部份士大夫則逃避在「深山窮谷里」「白雲天盡頭。」(岳陽樓)做了「蓬萊尋樂客，商嶺採芝人，」「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陳摶高臥）

那些貧苦的人民呢？

「（他們）囊篋消乏，又值着米糧增價，憂愁殺，一日三衙，幾度添白髮。」（趙禮讓肥）

「眼睜睜俺母子各天涯，想起來我心如刀割，題起來我淚似懸痲。餓殺人也，無米無柴，腹內饑痛殺人也，好兒好女眼前花；恢恢天網，漫黃沙，我一身饑死，四海無家。」（同上）

「想他每富家殺羊那宰馬，每日裏笑哈哈。飛觥也那盃斝，俺百姓每痛殺，無根椽片瓦，那裏有調和五味全，但得過充饑罷。母子每苦痛哎，天那！」（同上）

「他可也忒矜誇，忒豪華，爭知俺少米無柴怎地存扎。子母每，看看的餓殺，天那！則虧着俺這百姓人家。」（同上）

「餓的這民饑色，看看的如蠟渣。他們都家家上樹，把這嫩芽掐；他們都村村沿道，將榆皮剮；他們都人人繞戶，將糧食化。……不由的我淚不住行兒下。」（同上）

「可憐我也萬苦千辛度命咱，現如今，心似油煎肉似鈎搭，死是七八，那個提拔。似這般淒淒涼涼波波涤涤今夜宿誰家，多管在茅簷下。……不凍殺，多應餓殺，眼見的山間林下，可憐身死野人家。」（同上）

這樣的情形之下，當然會出現了叛逆的英雄。現在看元代的作家怎樣描寫這些叛逆的英雄。

「（他們）家住梁山泊，平生不種田；刀磨風刃快，斧蘸月痕圓；強劫機謀廣，潛偸胆力全；兄弟三十六，個個敢爭先。」（爭報恩）

「（他們）戴着紅茜巾，白氊帽；手裏拿着麁檀棍，長朴刀；身上穿着香綿衲襖。」（爭報恩）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同上）

「風高敢放連天火，月黑提刀去殺人。」（雙獻功）

「（他們的命令是）遇官軍須殺退，若經商便將拏住。」（燕青搏魚）

「贏了時，捨性命大道上趕官軍；若輸呵！蘆葦中潛身，抹不着我影。」（爭報恩）

「俺也會，那草坡前把濫官拏，則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須不比桃源洞裏方臘；從今日綽着經過眼齊眉的棗子棍，依舊到殺人放火𠮷兒洼，須認的俺狠那吒。」（燕青搏魚）

「便看那千千丈陷虎池，萬萬丈牢龍井，我和你便待擺手去橫行，管教他扶着我無乾淨。」（雙獻功）

「放心阿！我和那該死的官軍拚。」

桃花扇底看南朝

一 作者孔尚任

桃花扇是清初一部有名的劇本。作者孔尚任氏，山東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孫。孔氏字季重，號東塘，又號岸堂。因爲他曾讀書石門山中，石門山古名雲山，「雲」字古文作「云」，故又號云亭山人。他在清初，與洪昇同爲最有名的戲劇作家，在當時的劇壇上，有南洪北孔之稱。

孔尚任生於清順治五年（註一）九月十七日，（註二）死於何年，不得而考。但桃花扇上，有他戊子三月一序，按戊子爲康熙四十七年，其時孔氏年已六十一，是知他的年壽，至少超過六十。

（註一）據孔尚任出山異數記所載，康熙二十三年（西紀一六八四年），即康熙首次南巡之年，孔尚任年三十七歲。由此上推，因知孔氏生於順治五年（西紀一六四八。）

（註二）桃花扇末齣餘韻，老贊禮白云「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我到神祠祭賽。」又同齣神弦曲歌詞中有云：「新歷數，順治朝，五年戊子，九月秋，十七日，嘉會良時。……我與爾較生辰，同月同日。」按桃花扇中的老贊禮，是孔尚任自己現身說法，老贊禮的生辰，就是孔尚任的生辰，所以知道他是生於九月十七日。

孔尙任在三十四歲以前還是古雲山的一個隱逸之士。他在古雲山中「誅茅壘石，結廬其中有年，」享受這裏的「淸泉佳木溪壑」之盛(出山記)。桃花扇第三十九齣棲眞中有幾段詞曲正是描寫他自己的隱居生活。如云：「避了干戈橫縱，聽颼颼一路，澗水松風，……石牆蘿戶，忙尋鍊翁；鹿柴鶴徑，急呼道童仙家那曉浮生慟。」又云：「採藥深山古洞，任芒鞋竹杖，踏遍芳叢，落照蒼涼樹玲瓏，林中筍蕨充淸供。俺善才遲暮，羞入舊宮；龜年疏懶，難隨妙工；僻家竟把仙籙誦。」我們讀了這些詞曲可以看出他在三十四歲以前，還抱着一種濃厚的出世之想，大有「恥食周粟」之慨。

到三十四歲，衍聖公孔毓圻請他出山編著孔子世家譜，經過三年成「家譜」十卷。「家譜」中，述漢以來孔家傳記譜牒甚詳，取材亦極嚴謹。凡讖緯僞家語及僞孔叢子上的資料皆摒而不錄，卽對史記、孔子世家上的資料，亦有所訂正。在攷據學未發達之前，而有如此嚴謹的治學態度，實爲難得。

「家譜」脫稿以後，他想囘山，但衍聖公又留他「董督工師，重造樂器及祭器，」並「選鄒魯子弟七百人，」請他「教以禮樂」。當時他眼看滿淸定鼎中國，用夷變夏，中國的禮樂將陷於淪亡，於是毅然答應了。桃花扇第一齣老贊禮白有云：「可詠可歌，正雅頌豈無庭訓。」這正是他自述制禮作樂的事實。

正當孔氏制禮作樂的時候，康熙的御駕東謁孔林。衍聖公以孔尙任博學多聞，請他襄助祀典。爲了能給中國的士大夫，尊孔崇儒是歷來外族統治者的不二法門。當時康熙深明此道，所以在祭畢之後，卽命「在孔氏子弟中，選取博學能讀書人員，撰次應講經義進呈。」孔尙任卽於此時被族人薦舉。因爲他撰講稱旨，康熙授以國子監博士，時康熙二十三年事也。桃花扇首齣先聲中題曰：「今乃康熙二十三年，」這正是點穿他自己服官之始。

嗣後，他由國子監博士轉戶部主事，康熙二十七年，又升戶部員外郎。他在戶部時，曾著有人瑞錄一書，這是一部長壽老人的統計錄，也可以說是一部明代遺民錄（此書收入昭代叢書中。）從桃花扇始末漫述（以後簡稱漫述）知道他是以康熙三十九年（西紀一七〇〇年）棄官時年五十二歲。總計他服官的時期，前後凡十五年。

孔尚任雖然服官十五年，但他對於升官發財，並不熱中。他既得到康熙的知遇，本可以攀龍附鳳，青雲直上；然而他沒有那樣無恥，仍然自甘淡泊。據他自己所述：「（他在北京時）僑寓在海波巷裏，掃淨了小小草堂，藤床木椅，窗外見竹影蘿陰，濃翠如滴，偏映着瀟灑葛裙白紵衣，雨歇後，湘簾捲起，受用些清風到枕，涼月當階。」（孔著小忽雷傳奇卷首題詞）又說：「（他）喜的是殘書卷，愛的是古鼎彝，月俸錢支來不夠一朝揮」（同上）由此足見他雖升沈在惡濁的宦海中，仍然是一位古色古香的書生。

孔尚任第一部戲劇作品是小忽雷，小忽雷者，相傳爲唐代樂器之名，類似琵琶，又名二絃琵琶 。桂未谷晚學集云：「唐文宗朝，韓滉伐蜀得奇木，製爲胡琴二，名曰大小忽雷。」據傳說，大小忽雷，遺失民間，並未破滅，八百餘年後，孔氏忽得之於北平，這對於這位愛好古樂的學者，當然是如獲至寶。因爲看見了小忽雷，就想起了唐朝的歷史，於是他就以小忽雷爲標題，寫了一個歷史劇（此劇宣統二年劉葱石收入其所編之暖紅室傳奇彙刻）。這部歷史劇，以梁厚本與鄭盈盈二人的因緣爲線索，把元和長慶太和間的大事，如平淮蔡，甘露之變等一齊貫串起來。把許多歷史人物，如權德輿、裴度、李訓、鄭注、白居易、元稹、劉夢得、柳宗元以及宦官梁守謙、仇士良、歌妓杜秋娘等，都拉上舞台。從小忽雷的體裁，我們可以看出孔尚任是一位歷史戲劇家，而且他寫歷史劇，不喜取材於小說，專好把歷史上的實人實物加以點染穿插成劇

。這種作風，他在小忽雷中初試其鋒，到桃花扇中，便完全成功了。

二　全劇結構及寫作動機

桃花扇傳奇，是孔尚任第二部戲劇作品，也是他最後的一部戲劇作品。這個劇本，是以明淸之際的史實爲背境，寫成的一部可歌可泣的歌劇。

桃花扇全劇，共分四十齣，前有先聲，後有餘韻。在第二十齣之後，以閒話作爲頓歇，謂之閏二十齣；在第二十一齣之前，又以孤吟作爲承轉，謂之加二十一齣。全劇的結構，皆係以復社名士侯朝宗（註三）與秦淮歌妓李香君（註四）的兒女私情爲線索，將明淸之際的史實，如明末的文社活動，崇禎殉國，福王建號，閹黨復活，史可法被放，黨禍再興，四鎮互

（註三）侯朝宗，名方域，河南商丘人也。祖執蒲，爲明太常寺卿，父恂爲明戶部尙書，皆係東林黨人。朝宗在明爲諸生，順治七年辛卯舉副貢。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卒于淸順治十一年甲午，年三十七。著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其事蹟詳賈開魯田蘭芳所作傳，及侯洵所作年譜。採年譜：「崇禎十二年，方域二十二歲，入南雍應南京試，交陳公子定生吳秀才次尾及南中諸名士主盟復社。」宋犖雪園五哀詩序云：「往余鄉有雪苑社，即江南之復社也。」即因主盟復社，遂以四大公子之一聞於當時。四公子者，卽桐城方密之（以智）陽羨陳定生（貞慧）如皐冒辟疆（襄）並朝宗爲四人。

（註四）板橋雜記云：「李香君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侯朝宗善，閹人兒棨者（阮大鋮）欲納交朝宗，香君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不往。一

閔，以至左良玉叛變，福王政府滅亡等史實，都貫串起來，寫成一部有聲有色的明代亡國痛史。他把許多歷史人物，皇帝如弘光帝，忠臣如史可法，奸佞如馬士英，復社名士如陳定生，吳次尾，閹黨餘孽如阮大鋮，將軍如左良玉、黃得功、袁應咸、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田雄，官僚如楊龍友、沈公憲、張燕筑；歌人如柳敬亭、蘇崑生、丁繼之，妓女如寇白門、鄭妥娘、李貞麗；畫家如藍田叔，書賈如蔡益所等，一個個都請上舞台。並且自己也粉墨登場，而出現爲劇中之老贊禮。在這個劇本中，他把福王政府中的君臣將相，乃至當時的在野名流，歌人妓女的忠奸邪正，都寫得人人活現，個個傳神。至於其詞曲之美，則其餘事也。誠如作者所云：「（讀桃花扇後便知明代）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他又說，這部傳奇雖係小道，「而義則春秋」「蓋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以懲創人心，爲末世之一救矣。」（見桃花扇自序）

據作者在桃花扇漫述中云：「予未仕時，（三十六歲以前）每擬作此傳奇，恐見聞未廣，有乖信史，寤歌之餘，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藻采也。……又十餘年乃挑燈填詞……凡三易稿而成，蓋己卯（康熙三十八年，西紀一六九九年）之六月也。」由此足見孔尙任之欲將明代亡國痛史寫成劇本，早在靑年時代，卽在計劃之中。而其所以未能完成者，則「恐見聞未廣，有乖信史」也。他後來之所以積極地完成此傳奇，乃是受了他舅父的影響。漫述中說：「族兄方訓公，崇禎末爲南部曹，予舅翁秦光儀先生，其姻婭也。避亂依之，羈留三年，得弘光遺事甚悉。旋里後，數數爲予言之。證以諸家稗記，無弗同者，蓋實錄也。獨香姬面血濺扇，楊龍友以筆點之，此則龍友小史言於方訓公者，雖不見諸別籍，其事則新奇可傳，桃花扇一劇，感此而作也。南朝興亡，遂繫之桃花扇底。」

香姬面血濺扇，有無其事，自然還是問題，但是孔尚任卻假託一個妓女不嫁閹黨餘孽，以致碎首出血的故事，把明代亡國的責任，說得明明白白。故其着重點，並不在有無桃花扇，而在於妓女亦不肯嫁閹黨餘孽。作者在後序上說：「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於權奸者也；權奸者，魏閹（忠賢）之餘孽也；餘孽者，進聲色，羅貨利，結黨復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帝基不存，權奸安在？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嘖嘖在口，歷歷在目，此則事之不奇而奇，不必傳而傳者也。」由此可知桃花扇之作，非所以傳兒女之私情，蓋所以誅奸佞，悲亡國也。

顧天石桃花扇序言有云：「當明之末際，偉人欲扶世祚而權不在己，宵人能覆鼎餗而溺於宴安，扼腕時艱者，徒屬之席帽青鞋之士；時露熱血者，或反在優伶口技之中；斯乾坤何等時耶！既無龍門昌黎之文，以淋漓而發揮之；又無太白杜陵之詩，以長歌而痛哭之。何意六十年後，云亭山人……撰出桃花扇一書……可以當長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弔零香斷粉，可以悲華屋山坵」豈非「有甚慨於青蓋黃旗之末」而為「狡童離黍」之寄也耶！

桃源老人讀桃花扇跋語有言曰：

「夫明季史實，中國史上之一頁痛史也。弘光隆武永曆之間，蓋有不少可歌可泣之事，令人觸目驚心。誠以當時歷史之迭遭，固非僅朱氏九廟，墮為丘墟，抑亦黃炎華胄之淪於夷狄也。當時明代遺臣故老，身親亡國滅種之變，自有山河故國之感，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遭，心之所感，悲憤抑鬱之所集結，有不能已於言者，則著之為紀錄，發而為文章，此人之情也。以是當時著作之多，汗牛充棟，此等著作，類皆充溢悲憤激昂，憤時嫉世之聲。云亭山人生當明

清之際，雖不及見弘光殄祀，隆武就誅，但親見桂王『翠華奔播於崖巓，黃屋飄零於瘴雨，』棲遲山谷，流離異國，卒至文武屠滅，血濺蓬萊。不覺故國之感，油然而興，此桃花扇之所由作也。當作者寫著桃花扇時，悲傷之感，充溢紙上，孤吟之詞有曰：『難尋吳宮舊舞茵，問開元遺事，白頭人盡。云亭詞客，閣筆幾度酸辛。聲傳皓齒曲未終，淚滴紅盤蠟已寸……』嗟夫，讀『白頭人盡』『紅盤蠟淚』之句，至今猶有餘哀也。」

跋語又曰：

「嗟夫，焚書坑儒，何代無之，但從未有如滿清之烈者也。在清初，一語可以殺身，一字可以成獄，至若述古爲史紀實爲錄，與夫詠懷感世而爲詩者，則更無論矣。如莊廷鑨之明史獄，戴名世之南山集獄，沈天甫之逆詩獄，查嗣庭之試題獄，株連所及，動輒數百千人。一字之嫌，緹騎四出，血肉狼藉，牢獄爲滿。百年之內，滅家夷族，斬棺戮屍者，不知幾何人；焚書削版，燬稿燔刊者，不知幾何書。當此之時，朝廷以此考績，官僚以此邀功，漢奸敗類以此獻媚售奸，而豪紳劣棍譸張爲幻之徒，且以此詐財尋仇無休止矣。充其所極，當時除『聖諭廣訓』以外，天下蓋無書非逆，無書不禁矣。然而桃花扇傳奇終能免於焚燔之刼者何耶？此則不能不謂非作者文字運用之妙也。蓋作者不從朝廷大政，而從幾輩老名士，老歌人，老倡婦，飲嘯談諸禍患離合終始之跡，以寄國家興亡，君子小人，成敗死生之故；不用史漢體裁，而獨借管弦拍板，寫其悲感纏綿之致。此其所以幸存也。卽以此故，是以『桃花扇本成，王公薦紳莫不借抄，時有紙貴之譽。』桃花扇雖委曲其詞，但仍具有豐富之民族情緒。漫述有曰：『當時長安之演桃花扇者，歲無虛日……名公鉅卿，墨客騷人，駢集者座不容膝。……然笙歌靡曼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燈籠酒闌，唏噓而散。』蓋

『當時眞是戲』而『今日戲如眞』也。」

三　金粉南朝

桃花扇自第一齣至第十三齣，都是描寫崇禎十六年的南都。當時正值明亡的前夕，一方面，滿淸的軍隊，已迫近山海關，威脅着明代的首都；另一方面，農民的起義，已由西北擴大到西南及中原一帶，震撼了大明的天下。然而據桃花扇所述，當時的南京，却是一座紙醉金迷的城市。據作者云：

當時，「孫楚樓邊，莫愁湖上，又添幾樹垂楊。偏是江山勝處，酒賣斜陽。勾引遊人醉賞，學金粉六朝模樣。」（聽稗）當時「長板橋（的）垂楊細，絲絲牽惹遊人意。」「鶯顛燕狂，」家家戶戶「不把紅樓閉。」當時的平康，在鳳城東。在這裏，「千門綠楊，一路紫絲韁。引遊郎，誰家乳燕雙雙。隔春波，碧煙染窗；倚晴天，紅杏窺牆；一帶板橋長，聽聲聲賣花忙。」（訪翠）在這裏，「樓台花顫簾櫳風抖，」「家家燈影紗紅透。」（眠香）「纏頭錦，百寶箱，珠圍翠繞流蘇帳，銀燭籠紗通宵亮，金杯勸酒合席唱。」（卻奩）在這裏，有多少南國佳人，他們本來「家住蕊珠宮，恨無端業海風，把人輕向煙花送，喉尖唱腫，裙腰舞鬆，一生魂在巫山洞。」（寄扇）他們或則「匆匆挽箇抛家髻」便把「那新詞且記」「學就曉風殘月墜，緩拍紅牙，奪了宜春翠，門前繫住王孫轡。」（傳歌）或則「短短春衫雙捲袖，調箏花裏迷樓。」家家「全把繡簾鈎，不教金線柳，遮斷木蘭舟。」（眠香）

當時秦淮河裏「龍舟並畫槳分，菱華蒲葉泛金尊；朱樓密，紫障勻，吹簫打鼓入層雲。」一陣陣的笙歌簫鼓，一船船的烏紗紅裙。「燈船來了，」「你看這樣富麗，都是公侯勳衛之家。」「燈船又來了，」「這是些富商大賈，衙門書辦，卻也熱鬧。」燈船又來了「你看，船上吃酒的都是翰林部院老先生們。」這正是「秦淮十里水盈盈，夜半春帆送美人。」（鬧榭）

不僅官僚商人如此，當時的風流才子，他們也是「齊梁詞賦，陳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不是「貪花福分生來有，」便是「秀才渴病急須救。」不是「飛來捧觴，密約在蓉錦帳，」便是「誤走到巫峯上，添了些行雲想。」不是「青衫假倚，今番小杜揚州，」便是「尋思描黛，指點吹簫，從此春入手。」「纏頭擲錦，攜手傾杯，」有多少「催婚豔句，」有多少「迎婚油壁。」這正是「江南花發水悠悠，人到秦淮盡解愁，不管烽煙家萬里，五更懷裏囀歌喉。」（眠香）

至於當時的中原，則「豺虎亂如麻，都窺伺着龍樓鳳闕帝王家，有何人勤王報主，肯把義旗拏。那督師無老將，選士皆嬌娃……正騰騰殺氣，（準備剿滅「流寇」）這軍糧又早缺乏。（那些士兵們）一陣陣拍手喧嘩，一陣陣拍手喧嘩：……好一似薨薨白晝鬧蜂衙。」（撫兵）縱有那「活騎人飛食肉」的將軍也只得「望眼巴巴，望眼巴巴，」「候軍糧飛下。」（撫兵）

當此之時，到處都是：「狐狸縱橫虎咆哮，」因而到處都是：「雞犬寂寥人煙慘淡，市井蕭條，」百姓們雖然沒有飯吃，都還要「把豺狼餵飽。」又加之以「鞞鼓聲雄，鐵馬嘶驕。」那些官兵們雖然都是「天朝犬馬，」但沒有一個肯「把良心拍打。」當時的情形是「賊凶少棄囊，民逃剩空房，官窮不開倉，千兵無一餉，」因而當時的官兵「殺賊拾賊囊，救

民佔民房，當差領官餉，一兵吃三糧。」在這樣情形之下，當時的百姓就「大抵非逃即盜」了。（投轄）

一方面是貪污腐化，荒淫無恥，一方面是飢寒交迫，流離死亡；這正是明代亡國前夕的社會之一裏一面。在這樣不協調的社會中，而閹黨餘孽皖人阮大鋮者，避居白門，以民變逼皖東南震撼，乃談兵說劍，招納遊俠，企圖乘天下之敝再握政權。但當時南京為復社諸生文酒集會之中心，而復社諸生之領導人物又皆東林先烈之子孫，對於閹黨餘孽素抱不共戴天之仇。見阮大鋮以「漏網餘生，不肯退藏」「蓄養聲妓，結納朝紳」於是復社名士吳應箕、陳貞慧、侯朝宗、黃宗羲，沈壽民等，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公討其罪。自是以後，復社諸生與閹黨餘孽遂為水火。桃花扇的作者，因有甚慨於過去魏閹之禍國以致釀成亡國之因；又有深恨於後來魏閹餘孽之起以致演成亡國之變；於是對於閹黨餘孽，不覺破口大罵。他把一羣「低品走狗奴才隊」寫得不僅為士大夫所不齒，而且為歌人所笑罵，為妓女所鄙視。於是而有傳歌，於是而有鬧丁、偵戲、閙榭，於是而有却奩、拒媒、罵筵諸幕之穿插。

作者在鬧丁一幕中罵阮大鋮曰：

「你的心跡，待我替你說來。」

「魏家乾又是客家乾，（註五）一處處兒字難免。同氣崔田，（註六）同氣崔田，熱兄弟糞爭嘗，癰同吮。東林裏丟飛

（註五）天啓朝宦官魏忠賢，保母客氏，朋比擅權，當時趨炎附勢者，多寄身於兩家，稱乾兒。據明史所載魏忠賢的私黨有「左右擁護」「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阮大鋮其乾兒之一也。

（註六）崔田者，崔呈秀，田爾耕也，皆閹黨之兒孫者。

箭，西廠（註七）裏牽長線，怎掩旁人眼。笑冰山消化，鐵柱翻掀。」

「闖兒瑺子，闖兒瑺子，那許你拜文宣。辱人賤行，玷庠序，愧班聯，急將吾黨鳴鼓傳。攻之必遠，屏荒服，不與同州縣；投豺虎，只當閒豬犬。」

這正是「黨人逆案鐵同堅，當年勢焰掀天轉，今日奔逃亦可憐，儒冠打扁歸家應自焚筆硯。」

又在偵戲一幕中說：

「他說老爺呵！是南國秀，東林彥，玉堂班，」「爲何投崔魏，自摧殘，呼親父，稱乾子，忝羞顏，也不過仗人勢，狗一般。」

又在却奩中借妓女香君之口大罵阮大鋮曰：

「阮大鋮趨附權奸，廉恥喪盡，婦人女子，無不唾罵。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處於何等也。……官人之意不過因他助我妝奩，便要徇私廢公，那知道幾件釵釧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於是作者曰「平康巷，他能將名節講，偏是咱學校朝堂，偏是咱學校朝堂，混賢奸，不問青黃。」

又在鬧榭一幕中借復社名士之口，大罵阮大鋮曰：

「好大膽的老奴才，這貢院之前也許他來遊耍嗎？」陳于玉題桃花扇詩曰「公子豪華盡妙才，秦淮燈舫一時

（註七）明代有東廠、西廠及內廠皆係不屬於刑部之黑獄。當時東廠西廠番役橫行，日以快私仇，行傾陷爲事，致匿告密日夜未已，凡所緝捕，無論虛實，輒糜爛，當時正人君子多被其毒。

開，千金置酒渾閒事，不許閣兒入社來。」

卽因如此，所以阮大鋮便痛恨復社諸生，不久遂造作謠言，說侯朝宗暗通左良玉要反到南京來，於是政府信以爲眞，遂逋緝侯朝宗，因而作者又寫出辭院一幕。其中有曰：

「這冤怎伸，硬疊成曾參殺人；這恨怎吞，強書爲陳恆弑君。」

四　「迎立爲上」

「三月桃花四月葉」（顧亭林詩）正是南京城裏鶯顛燕狂之時，就在這個時候，大夥的流民在李自成的領導之下，攻破了居庸關，焚燬了十三陵，圍困了北京城。當此之時，一位抱着安內攘外之「大志」的崇禎皇帝「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奴才肯叛了主人，宦官打開了城門，成羣的餓鬼闖進了神京。在三月十九日的淸晨，太陽還沒有出來，外城縱起了大火，禁城中敲出了緊急的鐘聲。就在這個時候「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傷心煞煤山私幸，獨殉了社稷蒼生，獨殉了社稷蒼生。」「宮車出，社稷傾。（這眞是）養文臣帷幄無謀，豢武夫疆場不猛。到今日，山殘水賸。對大江，月明浪明，滿樓頭，呼聲哭聲。」（哭主）

與李自成之打進北京同時，靑年的吳三桂將軍也就打開了山海關的門，六軍縞素迎降滿淸。在明淸聯軍壓迫之下，李自成退出了北京。一切都沒有改變，只是在中國皇帝的寶座，換了一位外族的「龍種」，這就是順治皇帝。

當時明代遺臣故老見滿清「撫定燕京，」「建號稱尊，」「乘我蒙難，」「規此幅員，」於是相議立新君重組政府。當時權奸馬士英等以「一旦神京失守中原逐鹿交走」（迎駕）於是主張迎立福王以圖擁立之功。據作者說：

「福邸藩王，神宗驕子，母妃鄭氏淫邪，若無調護良臣，幾將神器奪竊。驕奢盈裝滿載分封去，把內府金錢偷竭。還君德全虧盡喪，怎圖皇業。」（阻奸）

但是「馬中丞（士英）當先出頭，衆公卿，誰敢逗留。」（迎駕）於是迎駕的官員出發了。我們看：

「趁斜陽，南山雨收，控青驄煙驛水郵；金鞭急抽，金鞭急抽，早見浦江雲氣，楚尾吳頭。應運英雄虎赴龍投。恨不的雙翅颼颼，銀燈下拜冕旒。」（迎駕）

這正是「江山雲氣晚悠悠，馬走平川似水流，莫學防風隨後到，塗山明日會諸侯。」（同上）

五月初一日，福王謁孝陵，初二日，羣臣勸進，稱監國。（註八）我們看「宮門殿閣，重重初敞，滿目飛騰新紫氣，倚着鍾山千丈。……雲消簾捲，東南煙景雄壯。」（設朝）「開朗，中興氣像，見罘罳瑞靄祥雲，王業重創。」那管他「豺虎縱橫」「中原板蕩」「兵燹難消，松楸多恙，鼎湖弓劍無人葬。」且「垂旒止冕受賀當陽。」（同上）這正是「一朵黃雲捧御牀，醒來魂夢自彷徨，中興不用親征戰，纔洗塵顏著袞裳。」（同上）

（註八）南都初建大事日表：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以迎立福王告於廟。四月二十九日，徐弘基等迎王於江浦。五月初一日王謁孝陵畢，駐蹕內守備府。初二日，衆臣勸進，王辭讓，稱監國。

現在，開始組織政府。我們聽，福王在訓話，他說：「職掌，先設將相，論麒麟書閣功勞，迎立爲上。」（設朝）於是馬士英等奸黨也與史可法、姜曰廣、高弘圖等忠臣同時做了東閣大學士（註九）現在「舊黃扉新丞相，」一個個「趾高氣揚，」都是「二十四考中書模樣。」而魏閹乾兒阮大鋮「也步金階抱笏囊，」「新參知政氣昂昂」了。（設朝）

當福王即位之時，清軍尙不過佔有河北山東。太行以西大河以南之廣大領土，完全爲中國所有。而且福王政府尙擁有龐大的軍隊。在江北有四鎮之軍，在江南有閩軍，在武漢有左良玉三十六營，在江西有袁應咸的贛軍，在湖南有何騰蛟的湘軍。此外兩廣滇黔之軍也有一部分開到了江西。總計當時的兵力，當在二百萬以上。同時，李自成尙盤據山陝，大有捲土西秦之勢；張獻忠佔有四川，非無捲旗北伐之心。地非不廣，兵非不多，人非不衆，物資資源非不豐富。假使福王政府能顧念國家危機，朝野上下，團結一致，刷新內政，重整軍備，並進而招輯流亡，使其來歸，共抗滿淸，則收回河北，恢復北京，非不可能也。

但是，可惜福王政府爲奸黨馬士英阮大鋮等所把持（註十）他們不此之圖，而夢想與滿淸戮力同心，連兵西討闖賊，

（註九）南都初建大事日表：初五日，以史可法，高弘圖爲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爲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軍務。初七日，以姜曰廣王鐸爲大學士，入閣辦事，曰廣辭，以呂大器爲吏部左侍郎，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復官。初八日，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淸、劉良佐、高傑分統之。傑駐徐州，良佐駐壽州，澤淸駐淮安，得功駐廬州，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鎮。初九日，馬士英率兵入朝。十一日，羣臣勸進箋三上，王許之。十二日，史可法自請督師江北，許之。十五日王即位，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註十）南都初建大事日表云：十六日，馬士英入閣辦事，仍掌兵部尙書事。

秦中。於是一面放逐忠臣史可法劉周宗等，(註十二)企圖轉移政治的方向；一面派遣左懋弟等，恭詣清廷，請命鴻裁，企圖與滿清妥協。另一面則令左良玉的百萬大軍，扼守武漢，防止李自成南竄，阻截張獻忠東下，展開與滿清夾攻「流寇」的形勢。這誠如多爾袞致史可法書所云「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潰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敗之數，無待蓍龜矣。」

五　「敵國在蕭牆」

一切都安排妥當，現在南朝的君臣，開始了驕奢淫侈的生活。據作者說：

當時，弘光皇帝發佈了徵歌選舞的命令。「鳳紙僉名喚樂工，南朝天子春心動。」「傳鳳詔，選蛾眉，把鬘絲，騎驛馬催花使亂擁。」那些閹黨餘孽阮大鋮之流，為了承奉聖意「恨不能腮描粉墨，也情願懷抱琵琶，但博得歌筵前垂一顧，舞袖邊受寸賞，御酒龍茶三生僥倖，萬世榮華。這便是為臣經濟，報主功勛。」他們手捧着皇帝的詔令，把一羣羣青春美女「硬選入秋宮院門。」只顧着自己「遷舊秩，壯新猷」「拜相與封侯」那管他「歌殘舞罷鎖長門，臥氍毹夜夜傷神。」

現在，「舊吳宮重開館娃；新揚州初教瘦馬；淮陽鼓，崑山弦索；無錫口，姑蘇嬌娃。一件件，鬧春風，吹煖響，門晴煙，飄冷

(註十一)史可法陛辭出京，督師揚州。

袖，宮女如麻。紅樓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無愁天子，語笑喧嘩。」(選優)這正是「創業選聲容，後庭花，又添幾種。」(罵筵)

當時的官僚，「堂堂列公，半邊南朝。」(罵筵)「乾兒義子，重新用，絕不了魏家種。」(同上)馬士英加個阮大鋮，便恰似「趙文華陪着嚴嵩，抹粉臉，席前趨奉，醜腔惡態，演出眞鳴鳳。」(同上)他們五夜徵歌，千金買笑，「拆散夫妻，驚魂迸，割開母子，鮮血湧，比那流賊還猛，做啞裝聾，罵着不知惶恐。」(同上)

不僅如此，他們又興黨獄，收捕復社諸生，摧毀文化，箝制輿論。「傳緹騎，重興獄囚，笑楊(漣)左(光斗)，今番又休。」(逮社)他們放出一羣羣「吠神仙，朱門犬」「兒兒的縲絏在手，忙忙的捉人飛走，小復社，沒箇東林，救新馬阮，接着崔田後，堪憂昏君亂相，爲別人公報私仇。」

現在，在南朝的法庭前，「一個是定生兄，藝苑豪；一個是主騷壇，吳次老。」還有侯朝宗，也「池魚堂燕一時燒。」(歸山)現在，法官在說話。他說：

「爲甚的，冶長無罪拘縲絏，俺怎肯禍興黨錮推又敲。大錦衣，權自操；黑獄中，白日照；莫教名士清流買禍含冤也，把中興文運凋。」(歸山)

「俺正要省約法，畫獄牢；那知他鑄刑書，加炮烙，莫不是清流欲向濁流抛。莫不是黨碑又刻元祐號。這法網，人怎逃，這威令，誰敢拗；眼見復社東林，盡入囹圄也，試新刑，搜汝曹。」(歸山)

現在，「囹圄裏，竟是瀛洲翰苑。」(會獄)「却也似武陵桃洞，有避亂秦人，同話漁船。」(同上)

怎樣說：當時四鎮的將軍們，他們爲了爭奪揚州，未曾出師先內亂。把一位督師史可法，弄得一籌莫展。我們聽，史可法在

「四鎮堂堂氣象豪，倚仗着恢復北朝，看您挨肩雁序，恰似好同胞。爲甚的爭坐位，失了同心好，鬥齒牙，變了協恭貌。一個眼睜睜，同室操戈盾，一個怒冲冲，平地起波濤。沒有陣上逞威風，早已窩裏相爭鬧。笑中興封了一夥小兒曹。」（爭位）

「俺只道寨馬南來，把戰挑，殺聲漸高，却是咱兵自鏖，這時候協力同心還少，怎當的鬩牆鼓譟，起了個離間根苗。這才是將難調，北賊易討。」（同上）這才是「國仇猶可恕，私怨最難消。」（同上）

「這情形何待瞧，那事業全丟了。」「你（高傑）占住繁華廿四橋，竹西明月夜吹簫；他也想隋堤柳下安營巢，不教你，蕃釐觀獨誇瓊花少，誰不羨揚州鶴背飄。妬殺你腰纏十萬好，怕明日殺聲咽斷廣陵濤。」（同上）

這正是「局已變，勢難支，躊躇中夜少眠時，自嘆經綸空滿紙，三百年事，是何人掀翻到此！隻手兒怎擎青天，却萊兵總仗虛詞。煙塵滿眼野橫屍，只倚揚州兵一枝。」（移防）

總之，當此之時「京中事，似霧昏，朝朝報仇殺黨人。」「小阮思報前仇，老馬沒分寸，三山街，緹騎狠，驟飛來，似鷹隼。」「朝廷上，用逆臣，公然棄妃四嗣君，報仇翻案紛紛，正士皆逃遁，尋冶容，教艷品，寶官爵筆難盡。」（草檄）至於四鎮的將軍，他們只知爭揚州，打內戰，「何須問江北戎馬，南朝舊例盡風流，只愁春色無價。」（拜壇）

像這樣的情形，當然是亡國的現象。「眼看他命運差，河北新房一半塌，承繼個兒郎貪戲耍，不報冤仇不掙家窩里

財，奴亂抓。」（同上）

好夢難長，不到一年，爲了爭奪政權，左良玉反了。舳艫千里，殺向南京而來。他宣言要討伐「替奸臣，復私仇的桀紂，媚昏君，上排場的花醜，投北朝，學叩馬的夷齊，吠唐堯，聽使喚的三家狗。」（截磯）左良玉雖然到九江就病死了，他的兒子左夢庚還是繼續揮軍東下。這個消息，傳到南京，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餘孽，慌了手脚。於是盡撤江北的國防軍隊南調長江，進行內戰。但是當時清兵發動了兩路攻勢，一路由山西入陝西，掃蕩李自成；一路由河南入安徽，南征福王政府。馬阮也明知江北的軍隊一撤，則無異開門迎敵。所以當他們調兵之前，馬士英與阮大鋮曾作如次的商量：

「馬——倘若北兵渡河，叫誰迎敵？

阮——北兵一到，還要迎敵嗎？

馬——不迎敵，更有何法？

阮——（作搊衣介）跑，（又作跪地介）降。

馬——說的也是大丈夫烈烈轟轟，寧可叩北兵之馬，不可試南賊之刀，吾主意已決，卽發兵符，調取三鎭便了。」

（拜壇）

於是「發兵符，乘飛馬，過江速勸黃劉，駕舟同濟，舵同拏，才保得性命身家。」這正是：「暗放北兵，」「明棄淮揚，」「調鎭移防，」「敵國在蕭牆」。

六 「拉不住黃袍北上」

「鷸蚌持，漁人候，旁觀將利收。英雄舉動，要看前和後。」（截磯）果然，滿清的大軍，乘虛而入，渡淮河，逼揚州。當時守揚州的殘兵，都是「降字兒橫胸，守字兒難成。」史可法雖然想死守這座危城，「奈人心瓦解，協力少良朋，同心無弟兄，都想逃生，漫不關情，讓江山倒像設著筵席請。」但是史可法是一個至死不投降的民族英雄，他仍然指揮他的軍隊與敵人死戰。他下令曰：「上陣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戰；巷戰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盡。」（誓師）然終以衆寡不敵，揚州陷落，史可法以身殉國。這正是：「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

揚州一破，滿清的大軍，遂乘勝南下，陷六合，逼蕪湖，克鎮江，迫南京。現在南朝的君臣，停了內戰，歇了歌舞，開始逃亡的生活了。

首先開跑的是弘光帝。你看他：「聽三更漏催，聽三更漏催，馬蹄輕快，風吹蠟淚宮門外。趁天街寂靜，趁天街寂靜，飛下鳳凰台，難撇鴛鴦債。似明駝出塞，似明駝出塞，琵琶在懷，珍珠偸灑。」（逃難）

其次是馬士英，他「看長江鎖開，看長江鎖開，石頭將壞，高官賤賣沒人買。」於是「快微服蚤度，快微服早度，走出雞鵝街，隄防仇人害。要隨身緊帶，要隨身緊帶，殉棺貨財，貼皮恩愛。」（同上）

現在的阮大鋮也顧不得這「防江美差，防江美差，殺來誰代，兵符擲向空江瀨。」他以前「受千人笑罵，受千人笑

罵，積得些金帛娶了些嬌艾，」到今日，「歎十分狼狽，歎十分狼狽，村拳共捱，雞肋同壞。」（同上）

那些宮女們，「正清歌滿台，正清歌滿台，水裙風帶，三更未歇輕盈態。」現在也只有把「這笙歌另賣，這笙歌另賣。」「笑臨春結綺笑臨春結綺，擒虎馬嘶來，排着管絃待。」（同上）

那些妓女們，「捨煙花舊寨，捨煙花舊寨，情苗愛胎，一時消敗。」「望荒山野道，望荒山野道，」「便天涯海崖，便天涯海崖，」「鉄鞋踏破三千界，」「行路難時淚滿腮。」（同上）

那些書生們，「整琴書襆被，整琴書襆被，換布襪靑鞋，一隻扁舟載。」（同上）

牢獄打開了「衆囚徒四散，衆囚徒四散。」到今日，才「網開三面」。

「看逃亡滿街，看逃亡滿街，失迷君宰，百忙難出江關外。」（同上）

「望煙塵一派，望煙塵一派，拋妻棄孩，團圓難再。」（同上）

「這情形緊迫，各人自裁，誰能攜帶。」（同上）

現在滿清的大軍逼近了城門，那些來不及逃亡的官僚的，他們「望風便生降，望風便生降，好似波斯樣，職貢朝天，思將奇貨（弘光帝）擎雙掌，倒戈却君，爭功邀賞，頓喪心，全反面，眞賊黨。」（刼寶）這正是「空教鉄鎖沈江底，多少降旗出石頭。」

滿清的大軍在迎降的隊伍中，走進了繁華的南京。而福王也被俘北狩了。黃得功將軍，雖然「平生驍勇無人擋，拉不住黃袍北上，笑斷江東父老腸。」（同上）

現在的南京啊！已經不是當時的情境了。我們看：

在這裏「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着夕陽道。」（餘韻）

望明陵「野火頻燒，護墓長楸多半焦。山羊羣跑，守陵阿監幾時逃，鴿翎蝠糞滿堂抛，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同上）

當時的宮殿，到現在「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琉璃瓦片多；爛翡翠窗欞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同上）

「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目斷消魂，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白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個人瞧。」（同上）

「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同上）

「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哰哰，無非是枯井頹巢，不過些磚苔砌草。手種的花條柳梢，儘意兒採樵。這黑灰，是誰家廚竈？」（同上）

想當年「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讌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眼看他興黨獄，眼看他起內閧；眼看他逃跑了。）」（同上）現在「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眞，舊境丟難找。」（同上）胡騎馳逐「輿圖換稾」漢奸橫行，洪承疇來了。這正是：

「前一番後一遭，正人邪黨，南朝接北朝。」

南明史上的弘光時代

一　燕京淪陷以後

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北京，崇禎死難。當時明代駐守山海關的將軍吳三桂縞素投淸，開關延敵，與滿淸聯兵，共同進攻中國的人民。李自成的隊伍，在明淸聯軍壓迫之下，退去了北京，自是滿淸遂定鼎燕京。隨着李自成的大軍向山陝退却，滿淸侵略者便追踪前進，於是太行以東，大河之北，遂非復爲中國所有。而這就是多爾袞所謂「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者是也。

當此之時，明代的遺臣故老和殘餘的將領，以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福王由崧於南京。福王以五月十五日即位，改明年爲弘光元年，是爲南明第一個政府。

當弘光之世，大明的天下，雖已在內亂與外患交逼並乘之中陷於崩潰決裂，但衡量大局，並非不可挽救。以言物力，則當時大河以南，尙全爲中國所有，以淮揚之繁富，江南之殷盛，東南沿海之魚鹽，西南半壁之土產，供應軍需，實不成問題。以言兵力，則江北四鎭，分布淮泗，不下數十萬人；鄭芝龍、及鄭采的閩軍，分屯沿江沿海，亦不下數十萬人；左良玉的三

十六營，雄據武漢，號稱百萬；此外袁繼咸的贛軍，何騰蛟的湘軍，以及粵桂黔滇之軍，總計當有數百萬人，至用於圍剿流寇的川軍尚不在內。以掌握如此龐大之人力與物力的弘光政府，假使發奮爲雄，抗清第一，則據河南以規復河北，進而克復北京非不可能。卽不然，劃江而守，亦足以如東晉南宋，偏安江南，與異族成南北對峙之局。但是事實的演變，却出人意料之外，不期年而弘光殄祀，福王政府幾如曇花一現，遂爾萎謝，這「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二　福王政府的成立與閹黨再起

說到弘光之敗，不能不首先說到福王之立，因爲後來的一切問題，都從這裏伸引出來。假如弘光的歷史是一幕悲劇，則福王之立，便是這幕悲劇的楔子。

按福王名由崧，係神宗次子福王常洵之子。神宗有五子，長常洛，是爲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常潤，次桂王常瀛。光宗早死，福王常洵亦死於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之役，其存者僅瑞惠桂三王。但當北都淪陷之時，瑞惠桂三王，皆遠在藩封。適於此時，福王由崧，潞王常淓，則以避亂，繫舟淮安。如依皇家倫次，則潞王爲疎而福王爲親。如依賢不肖，則潞王精明仁厚，爲當時人望所屬，福王驕奢荒淫，爲當時物議所譏。因此當擁立之時，曾發生倫序與立賢之爭。

陳貞慧過江七事之「計擁立」篇，對於當時擁立之爭議，紀錄甚詳。據所云云，大概當時南中大臣中的忠貞份子，

如史可法、姜曰廣、劉宗周輩，皆主張立賢，擁戴潞王監國。而以馬士英爲首之奸佞份子，則借口序倫，主張迎立福王，以邀擁立之功。結果奸佞份子因有江北四鎮的實力派爲後盾，得了勝利，福王於是乎卽位於南京。

福王政府雖爲奸佞份子所擁立，但當時國難嚴重，所有忠誠救國的元老重臣也都犧牲成見，參加這個政府。據史載，「弘光元年，用史可法、姜曰廣、高弘圖爲閣臣，從物望也。當是時，可法實秉中樞，高姜居中票擬，張愼言爲大冢宰；劉宗周爲總憲，九列大臣，各得其任。」但同時，奸佞份子，如馬士英、王鐸，皆任爲大學士，士英因定策有功，而王鐸則爲福王藩邸舊人。所以當福王政府成立之初，雖奸忠並列，而榮枯已有別了。

這樣的局面，並不長久，不久馬士英擁兵入朝，遂開始從中央政府中，排除忠貞份子的工作，企圖以此轉變政權的性質，卽由抗戰轉向妥協。首先被排除的是史可法。三餘氏南明野史云：「旣而士英擁兵入朝，假援中宮，請留輔政，於是有內外均勢之議。可法請督師江北，而士英專國。」

關於史可法被馬士英排出中央，督師江北之事，應喜臣青燐屑記之甚詳。其中有云：「朝議旣定，以史公督師揚州，蘇州吳縣廩膳生盧渭，率大學生抗疏爭之，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等語，朝野傳誦，以爲名言，時人比之陳東云。」

馬士英一面排除忠貞的元老重臣，一面又引用無恥小人，以爲黨羽。第一個被引用的便是阮大鋮。阮大鋮，是魏忠賢閹黨的餘孽，爲士君子所不齒，而且名列逆案，天下共知。當魏閹敗死，阮大鋮曾一時匿跡皖省故鄉，後因迫於流寇之亂，又逃寓南京。當時正值崇禎末年，天下蕭蕭，不可終日。於是阮大鋮遂談兵說劍，企圖再起。當時阮大鋮自署其

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由此可以想見其懷抱。後經復社諸名士顧杲、候朝宗、陳定生、吳應箕等，聯名發表留都防亂揭帖，痛加聲討，又才稍稍斂跡。福王政府成立，阮大鋮適在南都，因厚結馬士英，以求復用，故有推荐之事。關於阮大鋮史實，錢秉鐙藏山閣文存卷六「皖髯事實」中載之甚詳，這裏不及瑣述。像這樣一個人物，一旦提出，當然要使得舉朝大駭，一倡百和，輿論譁然。三餘氏南明野史曾錄當時朝中士大夫反對之言，其中如：

高弘圖曰「臣非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乃于大鋮更光明。」

姜曰廣曰「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凄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郭維經曰「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鋮對照，則顯顯令旨，未免少愆，並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

呂大器曰「先帝血肉未寒，爰書凜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鋮，不惟視吏部為芻狗，抑且視陛上為弁髦。」

王孫蕃曰「樞府以大鋮為知兵乎，則燕子箋春燈謎，枕上之陰符，而床頭之黃石也。」

雖然舉朝反對，但阮大鋮仍然做了兵部尚書。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自阮大鋮掌兵部以後，當時忠誠謀國的元老重臣，如張慎言、姜曰廣、高弘圖、劉宗周、黃道周、陳子龍等都被排擠而先後退歸田里，同時魏閹餘黨，如張捷、楊維垣、虞廷陛一流的小人，都彈冠相慶，走進了朝堂。像錢謙益那樣無恥的文人，也因巴結阮大鋮，起復了原官。南朝野史記錢謙

益之下流有云：

「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爲妻者柳，如是自隨。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咸笑之。謙益以彌縫大鋮得進用，乃出其妾柳氏爲阮奉酒。阮贈一珠冠，値千金，謙命柳姬謝，且移席近阮，聞者絕倒。」

錢謙益的故事，亦見夏允彝幸存錄，當係事實。雖然，如錢謙益者，不過醜聲外播者而已。實際上，當馬阮專國以後，在福王政府中其以獻妻獻妾而蟒玉加身者，正不知有多少。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福王政府，不過是一羣閹黨餘孽和無恥之徒的政府。這個政府不但與當時中國的人民沒有關係，而且與中國的士大夫也沒有關係。

三　妥協政策的執行

馬士英、阮大鋮把政權轉移到自己手中以後，第一件事，便是企圖與滿清謀妥協，不久派赴清廷的使節便出發北上了。當時派遣的使節是左懋第、馬紹愉和陳洪範三人。陳洪範曾著北行紀略紀述奉使北行的經過。其中有云：

「忽接禮部劄付，奉旨召對，始知爲吳三桂借（夷）破賊，顧大宗伯薦往北使，蒙皇上囘（命）（召）對。國事多艱，惟命所之，義不敢辭。但使（命）甚重，非武臣可以專任，必得文臣同往。部儀兵部侍郎左懋第、太僕卿馬紹愉（偕）行。以銀十萬兩，金一千兩，緞絹一萬疋爲酬（夷）之（儀）。因以祭告祖陵，奠安先帝后，封吳三桂爲薊國公。本鎮恐（夷）情甚狡，事難（遙）度，就中機宜，必奉廟算，乃可以行，共疏（上）請（示）復蒙皇（上）召對，親切……」

從陳洪範的紀載看來，當時派赴清廷使節的主要使命，是爲了答謝清軍替明朝打退了李自成的農民軍，並因便祭告祖陵奠安崇禎皇帝同時封拜開關延敵之吳三桂將軍 。很顯然地在三位使臣之中，陳洪範在「召對親切」之時，已面奉祕密「機宜」，這就是要他通過吳三桂的關係，與滿清謀妥協。不料當時滿清氣勢方盛，黃金白銀並不足以滿其貪欲，聯兵西討亦不足以激其義憤；他根本不承認福王政府的合法地位。關於這一點從多爾袞致史可法書中可以看出，書中有云：「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這雖然是漢奸的手筆，但確是滿清侵略者的意思。因此，對福王的使節，便毫無禮貌。同時吳三桂又已經「外假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也不與福王的使節見面，接受他們帶來的封爵。陳洪範看見情勢不佳，爲了脫身，就把南朝的虛實，完全報告清廷，所以後來左懋第、馬紹愉在回來的路上被清廷截回，皆不屈而死，獨陳洪範安然南返。夏完淳續幸存錄云：「洪範與虜合謀，貪夜逃歸，遂成秦檜之奸計。」北行紀略一書，乃是陳洪範爲自己洗刷而作。

北行的使節，顯然是失敗了，吳偉業鹿樵紀聞云：「陳洪範還，和議已無成矣。」但這種結果是出乎馬阮意料之外的，而且這樣的消息傳到南都也是後來的事。當北行使節出發以後，在馬阮等想來，滿清政府，充其量也不過如「契丹和宋，只歲輸以金帛，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而且正準備與滿清聯兵西討，問罪秦中，企圖假借外力收復失地，完成其武力統一之迷夢。

當時馬、阮乃至南朝大多數的士大夫，都有一種錯見，他們總以爲滿清也和他們一樣，對李自成的農民軍，亦有不共

戴天之仇。以爲滿淸的入關，眞如多爾袞所云「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以報爾君父之仇。」只有史可法知道滿淸是「乘我蒙難，規此幅員。」「實際上，滿淸之入關，不自此次始，其欲闖進中原已非一日，當崇禎之世，滿淸胡騎之屢犯冀魯，果何爲乎？爲「報爾君父之仇」耶？則崇禎尙高據寶座也。

誠然，在福王政府看來李自成，確爲大逆不道；但在滿淸侵略者看來，則「闖賊但爲明朝寇患，未嘗得罪於國家。」反之，他們正要利用中國內部的矛盾，揮遊刃以戳其要害。站在滿淸政府的立場，福王政府與李自成同爲中國人，亦卽同爲他的仇敵，固無所謂誰爲正誰爲逆也。多爾袞說得明白，他說「今君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復爲勍敵，予將簡西征之銳卒，轉旗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又說：如果福王政府投降，則將「遣將東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爾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總之，他對於福王政府與李自成，蓋一視同仁，並無親疏厚薄之分，同在剿滅的預算之內。所以多爾袞說：「兵行在卽，可東可西。」

自然，滿淸侵略者，也想誘降一個打擊一個。但他知道誘降政策，對李自成的集團是不可能的。因爲李自成一直退到陝西以後，對滿淸侵略者的答復，還是六十萬大軍，在潼關的反擊。明紀福王紀云：「大淸兵攻潼關，僞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迎戰。」卽因李自成不能誘降，所以他又轉而誘降福王政府中的將領。他深知福王政府中，除史可法外，都是一些無能之輩，只要史可法投降，江北四鎭失其統馭，則福王政府卽歸瓦解。所以他寫了一封信給史可法，要他勸福王政府投降。其中有云：

「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虞賓，盛承禮物。帶礪山河，

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之初心也。至於南州諸君子，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吳三桂）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利圖之。」

但是史可法的回答是「鞠躬致命，克盡臣節。」

滿清誘降史可法失敗，又曾誘降高傑。南明野史云：「先是清朝副將唐起隆，其父唐虞時，致書於傑，勸以早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世茅土』之語。傑皆不聽。」以後清肅王又致書高傑誘降，但因高傑出身「流寇」，富有愛國之心，終不爲動。

以上情形，馬阮並非完全不知，然而總以爲江淮不能飛渡，妥協尚有希望，因爲當時北行使節死難的消息，尚未傳至南都也。

四 文恬武嬉的局面

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餘孽所執行的政策，顯然是內除忠臣，外謀妥協，以求偏安江左的政策。因此，一切中興大計，皆置之度外，而日以排除異己，援引私黨爲務。當時應天府丞郭維經曾上書曰：

「聖明御極將二旬，一切雪恥除凶，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今僞官縱橫於鳳泗，悍卒搶攘於爪儀，焚戮剽掠之慘，漸偪江南。而廊廟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務，盈庭而議。乞令內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

私，及恩怨報復故事，一以辦賊復仇爲事。」

給事中陳子龍亦上書曰：

「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致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爲之寒心也。」

由此看來，當時並非無明達之士，見危知懼，惜官卑職小，其言不足以聳聽聞。以當時之形勢而論，福王政府之首要任務，應該是致全力於軍事措置，以準備迎擊滿清之攻勢。首先應將江北四鎮的軍隊，扼河而守，據淮爲陣，以進窺河北之勢，作退守中原之計。其次應將閩軍開赴蘇皖沿江，以扼長江之險，作保衞南都之備。再次，應將左良玉駐屯武漢之三十六營，調赴河南，北伐中原，以大張中國之聲勢。盡調何騰蛟之湘軍，出屯武漢，與袁繼咸之贛軍，相爲犄角，以鞏固長江上游之防守。再次則應調集粵桂黔滇之軍，北向中原，以爲後續的部隊。最後則應號召淪陷區域的人民，武裝起義，從敵人的後方發動戰爭，以響應祖國的攻守。最好是能進一步招撫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使其捲土西秦，東出關陝。如此，則敵以傾國來，我亦以傾國赴，天下爲清爲明，尚未可量也。

但是當時馬士英等閹黨，正玩弄妥協的陰謀，他們特別強調國家的仇敵，不是滿清，而是「流寇」，企圖以此緩和滿清之進攻。所以左良玉的百萬大軍，始終不令其離武漢一步。而其任務，則爲阻止李自成由陝西南竄，與張獻忠由四川東下。因而在客觀上，形成與清軍夾擊農民軍的形勢。明紀福王紀云：「李自成之敗於關門也，左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王進左良玉寧南侯，以上流之事專委之。」所謂「上流之事」，即堵截李張之事也。

卽因左良玉之軍不出而中原遂空虛無備。卽因以「上流之事」專委左良玉，湘贛之軍，遂不能前進，西南各省幾不知有滿淸入關之事。

說到江北四鎭早已驕橫放縱，毗睢殺人，攔路刼貨如盜賊。應喜臣靑燐屑有云：「四鎭各私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晝分地。商賈褁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係正供。東平（劉澤淸）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高傑）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兇橫掠民，民不聊生。」由此可以想見一般。

史可法之督師江北，原係馬士英之政治陰謀，並非一種有計劃的軍事佈置。但史可法到揚州後，却想把四鎭的兵力，引用於抵抗外敵。他首先指定四鎭的防地，規定其兵額，確定其糧餉。南明野史云：「（可法）以總兵劉澤淸轄淮海，駐淮北，海邳贛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靈、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穎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爲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路。每鎭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同時並奏請政府晉封黃得功靖南侯，高傑興平伯，劉澤淸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以獎勵之。

史可法的分防計劃，並沒有順利實現。因爲高傑以徐州苦寒，欲據揚州。當時揚州富甲天下，有新舊二城，城外列肆，子女瓌寶累萬萬。但揚州乃係史可法督師所駐之地。而高傑悍然不顧，竟攻入揚州，放手剽掠，屠胎日以百數，並將史可法拘於善慶庵（續幸存錄謂史困於福緣庵）後可法化裝爲道士，始得脫險。但以史可法之忠誠，不久高傑亦爲感化，由跋扈一變而爲忠勇之良將。不幸之事，層出不窮，以後劉良佐亦不願調廬州，將與高傑爭揚州。二鎭水火，至演

成士橋的火併。好容易高傑之軍開赴歸德防地，而又爲許定國刼殺於睢州。可法聞而大哭曰「中原不可復圖乎？」

至於闖軍，除鄭鴻逵一部開抵鎮江一帶，其餘大部份皆未出動。至於號召義軍，雖史可法曾一度建議，如明紀福王紀所云：「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召四方才智。」亦未實行。

當時明達之士，深感局勢危急，無不紛紛上書切言時弊。劉宗周上書有曰：「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尤以史可法慷慨陳辭，不僅一次。其一疏有云：

「自三月以來，大讎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士紳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

此外，章正宸亦上疏云：

「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鞶矣，不聞獻俘；武臣私鬥矣，不聞公戰；老臣引退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進取爲第一義……」

但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

五　貪污腐化的政治

馬士英阮大鋮等以北使既出，則淸兵不致南下；左良玉專主上游，則「流寇」不致東竄，因而以爲從此可以偏安江左，千秋萬世。於是賣官鬻爵，貪汚腐化，福王政府的政治，逐不堪問了。

當時的貪汚腐化，是從上而下，一貫到底的。福王本人就是一個貪汚腐敗的頭子。據南明野史云：

「時太后來自河南，帝諭戶工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給賞賜。……又諭選內員及宮女，閭巷騷然。」

吳偉業鹿樵紀聞云：

「是時又將大婚，內府造皇后禮冠，需貓睛石，祖田綠及珠，白一錢以上者百十顆，商人估價數十萬。」

關於選宮女事，明紀福王紀云：

「庚辰，命選淑女，隱匿者鄰里連坐，陳子龍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采訪，民間嫁娶一空。」

又吳偉業鹿樵紀聞云：

「丁未，選淑女黃氏郭氏入宮，仍命再選，有母女自盡者。」

據續幸存錄云：當時福王「端拱宮中，後宮女子以千計。」又據孔尙任桃花扇所傳，福王不但選淑女，而且把當時秦淮河的歌妓，也選了不少在宮廷中，組織了一個戲班。所以南明野史有云「帝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大酒，雜伶官演戲爲樂。巷談里唱，流入內廷。黎園子弟，教坊樂人，出入殿陛，諸大臣呼爲老神仙。」福王常住的宮殿，曾有一聯云：

「萬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

但是福王還感到聲色不足以恣其淫樂，表示不滿。同上書云：「除夕福王在興寧宮，色忽不怡。韓贊周言新宮宜權。福王曰：『黎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當時馬士英阮大鋮等則賣官鬻爵，公行賄賂。南明野史云：「士英請免府州縣童子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又詔行納貢例，廩納銀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百兩。」是貪汚已經侵入文化教育了。

至於各級官職，都有定價。南明野史云：「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官有高低，價有大小，也許還有黑市。即因官可以買，所以當時百姓少而官僚多。時人爲之語曰：

「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廕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又有諺云：

「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祇受錢，皇帝但吃酒。」

又青燐屑載當時有人書西江月一首於演武場云：

「有福自然輪着，無錢不用安排。滿街都督沒人抬，偏地職方無賴。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財。門前懸掛虎頭牌，大小官兒出賣。」

夏完淳曰：「朝事徵諸野，太史陳風，時事可知矣。」

除公開的買賣以外，還有黑市交易。南明野史載有曾降張獻忠之明朝都督劉僑，即因賄馬士英而復職。其禮物

爲「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士英接到禮物後笑曰：「此物足以釋西伯。」

馬士英專有一人司理賊物。同上書云「士英方黷貨無厭，賄賂千名百品，日令門下僧利根，次其高下。」同樣，阮大鋮的貪污也不在馬士英之下。因此當時的人民痛恨馬阮，比之「闖賊。」南明野史載當時有人署馬士英之門曰：

「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爲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

青燐屑載當時有人署司馬門曰：

「闖賊無門（馬）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阮）一人獨亂中原。」

在上者如此，下必有甚焉。於是軍官也做起買賣來了。青燐屑有云：「揚州爲高傑藩汛地，隔礙不行，復以周某爲理餉總兵，與販米豆官私夾帶，上下爲奸，利之所入不全在官。」至於四鎮將官則白晝行劫，毫無忌憚。這眞是乘火打劫，混水捉魚，利用國難大家發財。

當時福王又大興土木，修興寧宮、慈禧殿及賞賜宴樂，皆不以節。因此而國用匱乏，苛捐雜稅，乃乘時而出。據南明野史云：「佃練湖，放洋船，瓜議製，蘆洲升課，稅及酒家，每觔錢一文。」

馬士英等一心搜括，不問別事。黃金白銀，賄賂如山，翠袖紅裙，歌舞徹夜，如有閑暇，則鬥蟋蟀。南明野史云：「時羽書倉皇，士英猶與門下僧談禪鬥蟋蟀，人號蟋蟀相公。」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不但大小名流相繼告罷，即宦官之有人心者如韓贊周，四十疏乞休，盧九德殿前痛哭。而羣小盈朝，專飽私囊，置軍費於不管如故也。當時史可法曾屢次上疏，勸告福王俯念人民艱難，勿忘恢復大業，一切從儉，以所

有的人力物力用於戰爭。他說：

「陛下踐祚，初謁孝陵，哭泣盡哀，若恭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並見明紀與南明野史）

又說：

「夫我卽卑宮菲食，臥薪嘗胆，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沈舟，尙虞無救。以臣視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兵行討賊，最苦無糧，似宜將內庫本折，槪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工役，可以繁費，一切報罷。朝夕宴衎，左右獻諛，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廢，亦宜槪從儉約。乞陛下念念思祖宗之洪業，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倂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救，天意尙可回耳。」（同上）

疏入，不報。

六　黨獄繁興

像這樣貪污無能置中興事業於不顧的新政府，當然要引起當時士大夫的風議，特別是東林遺老和復社諸生，他們看到閹黨逆案中的乾兒義子，又做了當代的要人，更是憤憤不平。

爲了鎮壓士大夫的風議，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餘孽，乃恢復東廠緝事的組織，並翻刻三朝要典，更立「順案。」「東

廠緝事」者，以現代語譯之就是今日法西斯國家中的特務隊。「順案」者是以李自成的國號爲名；因爲復社的名士周鍾曾爲李自成起草過登極的詔書，這完全是用以對付復社諸君子所指摘之逆案的。其意抑若曰，我們不過做過逆閣的乾兒而你們之中，却有李自成的黨羽。

「順案」成立了，首先被捕的就是周鍾之弟周鑣和雷演祚，以後逮捕的範圍，擴大到一切愛國的士大夫乃至七郡清流。大敵當前而黨獄再起矣。朱一是可堂集周雷賜死始末云：

「阮大鋮居金陵，諸生顧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以示鑣，鑣力任，大鋮以故恨鑣。會馬士英以逮治從逆之周鍾並及鑣，大鋮復羅致鑣與演祚曾主立潞王，爲姜曰廣之私黨。於是朱統鑽疏刻曰廣，並及二人。而演祚以劾范志完周延儒等，廷臣交忌之，遂有是逮。」

同書又云：

「大鋮遂謀殺周雷，乘間潛告士英曰：「檢相君者，史同謀也，周雷實主之，日夜謀不利於相君。不擊南昌（姜曰廣）無以殺周雷，不殺周雷無以遏諸生之橫議，而東林禍君未有已也。」士英心動，風奸人朱統鑽攻南昌姜相曰廣去；次周雷，又次士大夫及七郡清流，如黃道周、楊廷麟、吳甡、劉宗周、周孝廉、茂才楊廷樞、顧杲、吳夢笙、沈壽民、沈士桂、白夢鼎、夢鼐等七十二人皆不免。大指謂謀立疏藩，別圖擁戴，於是騷騎遍七郡，而周雷投獄刑部矣。」

雖然如此，仍然不足以洩馬士英阮大鋮的深仇夙恨，於是又再製造一個僧大悲的案子，企圖利用僧大悲的口供，把南中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加他們一頂東林或復社的帽子，一網打盡。僧大悲的案子，是南朝三疑案之一，因爲此外還有

僞太子，僞妃二案合稱三疑案。關於僧大悲案，錢秉鐙藏山閣集卷六南渡三疑案云：

「申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悲，蹤跡頗異，至石城門，爲邏者所執，下錦衣獄。（非法監獄）據供稱先帝時封齊王，又云吳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又言見過潞王，其語似瘋似狂。詞連申紹芳、錢謙益等，於是阮大鋮楊維垣等，令張振窮治之，欲借此以興大獄，羅織清流，遂造爲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名，如徐石麟、徐汧、陳子龍、祁彪佳等皆將不免。東林復社，計一網打盡之……謙益紹芳各具疏辯，士英亦不欲窮治其事，遂以弘光元年三月，棄大悲於市。」

阮大鋮又想借僞太子案，陷害東林復社的君子。據徐才鼎小腆紀年所載：「大鋮又選續蝗蝻錄蓋以東林爲蝗、復社爲蝻，諸從和者爲蠅爲蚋。」他想把這些蝗蝻蠅蚋，和僞太子連係起來。但審判的結果僞太子不是東林也不是復社，而是故駙馬都尉王昺的姪孫王之明。

關於僞皇后的事也是大大的疑案。福王既立，有婦人童氏，聲言爲福王之妃，但福王堅不承認，雖欲一見而不許，並投之牢獄，說是僞妃。即因童氏的出現，明代當時的人，遂有懷疑福王本人，不是老福王的兒子，因爲當李自成陷洛陽，福王父子，都被李自成作了福祿酒，福王的世子早已死了。後來做了弘光帝的福王是馬士英隨便找來做傀儡的。錢秉鐙說：「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詣闕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黃宗羲也如此說，大概有些道理，不然何以不敢見面呢？

總之，弘光時代的南京，不僅是貪污的淵藪，也是殺人犯的巢穴。那些閹黨餘孽，他們不敢打滿清，也剿不平流寇，但

他們有本領來屠殺赤手空拳的正人君子、士大夫。在這個時候，人民所看見的不是大軍北伐抵抗滿清的侵略，而是緹騎四出搜捕愛國的志士。不是嚴懲漢奸降將以整肅民族戰爭的陣容，而是羅織「順案」強調內部的矛盾，在大亂當前之時，而黑獄緊興寃號載道，這樣倒行逆施，當然天怒人怨還說甚麼中興大業呢？當時御史祁彪佳曾上疏曰：

「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系錦衣獄，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功，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權奴之鷹狗，口辭從追勒而來，罪案聽指揮而定，即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寃？……迨後東廠設立，始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罔刑章，飛誣多及善良，赤棍立致巨萬，招承皆出於吊拷，怨憤充塞於京畿。……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之刑……蓋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即卹錄隨頒，而魂驚骨削矣。」（南明野史）

但是祁彪佳的忠諫，並未發生効力。以後禮科袁彭年也上疏請廢廠衞。其疏有云：

「夫即廠衞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任廠衞訪緝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故漏網之方，即從密網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以行。……刁風所煽，長官不能行法於胥吏，徒隸可以迫其尊上，不可不革。」（同上）

疏上，貶浙江按察司照磨。

七　內戰爆發

福王政府本爲馬士英等少數閹黨餘孽所包辦，他們「外假復仇之虛名，」陰通敵國，殘殺正士引用奸邪，剝削人民，可以說無惡不做，當時的士大夫雖然眼見就有亡國之禍，但迫於馬士英等的淫威，或被屠殺，或被囚禁，或被放逐，已經無力挽救危亡了。惟當時尙有一有力之人物，這就是巍然雄據於武漢的左良玉。他看到羣小盈朝，早已不滿，曾一度派遣黃澍何志孔入朝，彈劾馬士英。黃澍有疏曰：

「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於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時之才情博辯，誤信小人使黨羽旣豐禍患驟至。」（南明野史）

又云：

「正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輦轂之下，貪污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同上）

黃澍等的疏奏當然不能被採納。以後爲僞太子案，左良玉又上書，請保全東宮。其言有曰：「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不忍劇加刑害。何致一家反視爲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陛下忘烏屋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陛下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左良玉的疏奏亦未被採納。

四月初四日左良玉反了。他捧着僞太子的血詔，爲壇而哭，灑血誓師。一面部署三十六營，沿江而下；一面傳檄江西，檄袁繼咸聯兵同淸君側。同時並發布了討馬士英的檄文，號召天下。其檄文云：

「蓋聞大義之垂，秉如星日；無禮之逐，嚴於鷹鸇。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死之罪，業已僑妾作奴，削髮爲僧。徒爾狐窟白門，狼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爵數之歸，爲私家擕贈之物。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譬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祗矯誣聖德；初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願，何由奠麗民生。

「幻蜃蔽天，妖蟇障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檇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使爾殺人；北斗有朝慧之星，謂英名實應圖讖。除誥命贈廕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爲，何其亟也。

「而乃冰山發焰，鱷水興波，羣小充斥於朝端，賢良竄逐於崖谷。同已者，性倖豺虎，行列豬猳，如阮大鋮某某等數十臣憨，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已者，德並蘇黃，才媲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數十大賢皆誣爲朋黨，以快如蛇如虺之狠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盡竹，罄此之罪，豈有極歟？」「又况皇嗣幽囚，烈祖悲恫，海內懷忠之士，誰不願食其肉，……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是用厲兵秣馬，討罪興師。當鄭畋討賊之軍，憶裴度閑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

左良玉的軍隊，很快就由武漢到了九江，袁繼咸的部將郝效忠郭雲等見左軍入境逐大掠九江，左良玉的軍隊也加入搶掠，九江大火，左良玉在船上看見大火，頓足嘔血而死。左良玉雖死，但他的兒子左夢庚還是刼袁繼咸揮兵東下，破安慶，進迫采石。

當時南京的羣小見左兵漸逼，首都起了恐慌，於是馬士英不管清軍南下與否，內戰第一，竟從江北國防前線上調回黃得功、劉良佐的隊伍，並派遣劉孔昭、阮大鋮、方國安、朱大典一齊出馬，指揮內戰。從來沒有提過軍事的兵部尚書阮大鋮，這次却告了奮勇，他「衣素蟒，圍碧玉」親自督師江上，雖見者駭爲「梨園裝束」，但他演的却是一幕眞槍眞刀的活劇。夏完淳說得好：「大兵大禮，皆倡優排演之場，欲國之不亡，安可得哉！」（幸存錄）

自黃得功、劉良佐的隊伍南撤以後，劉澤清亦藉口勤王，率兵大掠而南，徐邳、楊泗，秩序大亂。當時史可法以清兵正大舉南進，淮揚吃緊，接連上疏請停撤江北之軍。但福王的回答是「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史可法又上疏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爲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意朦蔽至此！」

其時朝中稍有國家觀念的官吏如姚之孝、尙寶卿、李之椿、吳希哲等都請準備迎擊外敵，但馬士英厲聲指諸臣曰：

「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於清，不可死於良玉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斬！」」（見南明野史）

阮大鋮也說：

「與其左兵之來，不若清師之來，我且用清師以敵左氏。」（同上）

八　滅亡

當福王政府進行內戰最熱烈的時候，滿清的統帥多鐸，已攻陷西安，擊潰李自成的農民軍，李自成已走死於九宮山。二月己未，多鐸奉命移師進取江南。三月，多鐸出兵虎牢關，並分遣固山額眞出龍門關，尙書韓岱由南陽進軍，三路同趨歸德。當時四鎭之兵，都在南京附近，從事內戰，江淮之間空虛無一兵一卒。清兵至歸德，許定國殺高傑，與李際遇先後迎降，約爲鄉導。於是清兵遂破泗州，渡淮而南，進迫揚州。

史可法聞清兵大擧南下，一面向政府告警請派援兵；一面率其所部進至滸口，迎擊清軍。後因援兵不至，遂又馳還揚州，閉城死守。多鐸屢次致書史可法，招其投降，史可法都置之不理。當時守揚州的軍隊，僅總兵劉肇基等兵二萬人，又無後援，結果城陷，史可法殉國。關於史可法守揚州事，青燐屑載之甚詳。史可法孤軍抗戰至死不屈的精神，眞是替中國後來的兒女，留下了最好的榜樣。

清兵破揚州，屠城十日，關於這一段慘絕人寰的史實，明王秀楚揚州十日記寫得很詳細。王秀楚是揚州人，曾身遭其難，其所述清軍在揚州之燒殺姦淫，皆親見之事。

清軍屠揚州十日，繼續南進。五月初，進抵至長江北岸，當時福王方面守鎭江的是鄭鴻逵的閩軍，當清軍迫鎭江北岸時，鄭鴻逵並無絲毫防禦，每天只是捕殺從江北潰退下來的自己的敗兵，一共殺了一萬多人，殺得以後敗兵不敢南渡，

大部份都投降了滿清。但是鄭鴻逵冒指所殺自己的潰卒爲清軍，上表告捷。南明野史云：

「高傑潰卒之渡江也，鄭鴻逵掩而殺之，不下萬人，餘卒北走降清，鴻逵乃露草告捷，璽書褒封靖虜伯，世襲。賜蟒衣金幣。京口民皆祝，且爲建寺峙碑。自前月二十五日至是月之朔日報虛捷，軍門鼓角，將士凱歌，聲沸江濱。鴻逵乃開落京口，民爭以牛酒犒師。」

鎭江軍中鼓樂喧闐，福王也演戲祝捷，並下令求蝦蟆爲房中藥。南明野史云：「午日，百官進賀，帝以演戲不視朝，忽有中旨命乞子捕蝦蟆爲房中藥，時目爲蝦蟆天子。」

正當南朝君臣祝捷之時，滿清的軍隊，已乘着大霧，渡過長江，襲破了鎭江。南明野史云：「清師旣破揚州，沿江問渡，初七日，鴻逵軍中大晏歌舞喧闐，而清師編筏張燈向京口，而別由上游大寧洲老鸛河渡。黎明，盡抵南岸，遂襲破鎭江。鄭兵盡棄軍實揚帆東遁。」向浙江福建潰退。

清軍旣克鎭江，遂轉旗而西，連陷丹陽句容，直迫南京。時天子已無心求蝦蟆，相公亦無興鬥蟋蟀，大家都要準備逃亡了。關於清軍陷南京的情形，明佚名氏著江南見聞錄逐日紀載記之甚詳。據云初十日，都門晝閉，大風猛雨，三鼓，福王從通濟門出，所攜惟太后一妃及內相數人。是夜，士英入朝，見帝已逃，亦以黔兵二千人爲衞走浙江。十一日早晨宮門洞啓，妃嬪雜走，百官爭竄。「百姓男女，蜂擁出門，扶老攜幼，不可勝數。間有嬌媚少艾，金蓮躑躅，跬步難行，見者心惻。旣去而復返，十有八九，以路上兵多也。已而閉門，欲返而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終矣。」這樣的情形，是何等混亂啊！

就在十一日，百姓打開了闖黨的黑獄，釋放了政治犯，擁僞太子監國，並毒打奸臣王鐸，刼其家。

十四日清軍薄城，忻城伯趙之龍縋城而出迎降清軍。滿街滿巷，都貼出了清兵安民的告示。

十五日，趙之龍擁僞太子王之明出玄武門，到清營投降。

十六日，清軍進南京。

十七日，百姓遞職名到清營，趙之龍令百姓設香案，俱用黃紙書「大清國皇帝萬歲萬萬歲」及「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和「順民」等字樣。

十八日「文武官員及鄉保甲長等，送帛幣、牲醴、米麵、熟食、茶葉、糖果、煙酒等物於營，絡繹塞道，舉國若狂。」漢奸趙之龍又送了十五個戲班，進營演戲，慶祝敵人的勝利。

二十四日，清豫王在迎降的隊伍中進入南京。「豫王穿紅錦箭衣，乘馬入洪武門。官員紅素不等分班兩旁迎賀。預（前）一日禮部紅榜偏貼城市，故無不至。」

現在，內戰不打了，皇軍也好，叛軍也好，大家都把武器交給滿清。據史載，當福王從南京逃到蕪湖黃得功軍中時，劉澤清已入海，劉良佐已降清，阮大鋮在逃亡的路上被清兵所俘，投降了清朝，同時左夢庚三十六營也降了滿清。而且劉良佐奉滿清之命，追擒福王。十五日黃得功戰死，福王被俘，弘光亡。

是時李自成已在明清兩軍夾攻之中敗死。這誠如桂王致吳三桂書中所云：「逆賊授首以後，而江南一帶土宇亦非復本朝有也。」

南明史上的永曆時代

一 一般的形勢

一六四六年（順治三年）中國的歷史，走進了一個空前的危急時代。當時，滿清侵略者，已經奠定河北，削平中原，西入隴蜀，南下閩浙。且繼續利用中國的人力與物力，驅使中國的漢奸與敗類，以壓到之勢，長驅而入西南。企圖一擊而下荊楚，再擊而踐粵桂，三擊而入黔滇，以完成其對中國之最後的征服。

在這一時代，中國方面，李自成張獻忠已先後敗沒，弘光隆武已接踵覆亡，中國人民反抗滿清的鬥爭，遭受了極大的挫折。但歷史的挫折，並不能消滅中國人民反抗滿清的鬥爭，反而作了這個鬥爭走向新的階段之槓杆，不久，新的反清政府，又在中國西南出現了。

順治三年十月，明代的遺臣夙將，瞿式耜、丁魁楚、何騰蛟、王大澄、呂大器、嚴起恆以及李自成的殘部李赤心高必正等，他們鑑於民族國家的滅亡，迫在眉睫，不能不樹起反抗滿清之最後的旗幟，保衛中國的大西南，因相與推戴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重組政府，繼續抗清鬥爭。這個政府，是爲桂王政府，他是南明第三個政府，也是南明最後的一個政府。

桂王政府成立以後，改元永曆，詔誥天下，獎勵文武兵民同仇恢復。在新政府的政治號召之下，中國西南的人民，無不慷慨激昂奮袂而起，在湖南、江西、兩廣，最後在雲貴展開了反抗滿清野蠻侵略之最殘酷的武裝鬥爭。中國的人民曾把這個鬥爭支持了十六年之久（一六四七年——一六六二年）因而終順治之世，在中國的西南還有一個「自由中國」的存生。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永曆時代的客觀環境，較之弘光隆武時代，都要惡劣得多。以統治地域而論，當時控制在中國政府之下的領土只有湖南、兩廣、雲貴五省及川南和鄂西之一小部分。而且在此等地域內，當時亦有漢奸頭子洪承疇所領導的敵僞政治和軍事的祕密破壞運動，如在湖南則有江禹緒；在廣東則有吳惟華；在雲貴則有丁之龍。這些大大小小的漢奸他們在敵人驅使之下，揭起「招撫使」的旗幟，到處組織漢奸，收買軍隊，充任異族進攻祖國的鷹犬。這較之弘光時代，中國尚據有長淮以北，隆武時代中國尚掩有大江以南，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以言兵力，當時桂王政府直轄的軍隊，只有丁魁楚所部的粵軍，何騰蛟所部的湘軍。而所有的粵軍已腐化不堪，湘軍又驕橫無比。永曆實錄云：「丁魁楚制粵兩年矣，嶺北潰亂，楚猶恬安不修戎備，唯日遣水軍溯靈羊峽取硯石於老坑，至是武備單弱不能自振。」是以當李成棟進攻廣東之役，遂全軍覆沒。至於湘軍，據同書記何騰蛟語云：「湖南重兵蝟集，已復之土，棄爲青燐白骨之場，而諸將狠戾狐疑，制臣不能撫之，臣又何以輯之？唯有孤掌鳴號，誓死報國而已。」是以自孔有德進攻衡陽之役以後，湘軍十三營「皆自爲盜賊。」由是兩粵空虛，江楚騷然，而政府遂無一兵一卒。這較之弘光時代，中國尚擁有江北四鎮，左良玉三十六營，和川、湘、閩、贛之軍；隆武時代，尚擁有龐大的閩軍、浙軍以及集結在

江西的新舊軍也不可同日而語了。

以言物質資源，當時中國政權，已經退處西南山嶽地帶，這裏山林多而耕地少，土地所出，僅足自給，軍需供應，大成問題。而且這裏爲少數種族的故鄉，苗猺雜處，由於明代政府對少數種族之一貫的高壓政策，土漢的情感極爲惡劣，因之，當明代政權退到西南以後；不但不能得到少數種族的幫助，而且經常受到他們的威脅。如永曆元年九月，當清兵陷全州逼桂林之時，土司覃鳴珂即乘危攻陷柳州。又如永曆十二年十月，當清兵由廣西西犯貴陽之時，土司岑繼祿即爲清兵作嚮導。像這樣的現象，對於動員人力與物力，當然是嚴重的障礙。這較之弘光時代，中國尚擁有淮揚繁富之區，隆武時代，中國尚擁有閩浙濱海之地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然而弘光隆武皆不過一年左右，即歸覆亡，桂王政府反而能把抗清鬥爭支持到十六年之久，豈非奇蹟！或曰，此乃「天眷中國，不殄明祀。」但是我們知道，「弘光殄祀，隆武就戮，」天之殄明祀者，已一而再矣，是天命之說，不可信也。或曰，地理條件，保障了桂王的鬥爭，但是我們知道，長江大河之險，並不能保障福王於不敗；錢塘仙霞之阻，亦不能鞏固唐魯兩王於閩浙，是地利之說，亦不可信也。我以爲桂王政府在更惡劣的客觀條件下而能支持較長的時期，既非天命未絕，亦非地理保鏢，而是當時中國社會內部不協調的因素之消解，與各階層的人民最後大團結之結果。

我們知道，當弘光時代，中國社會內部，尚存在着強烈的矛盾對立，當時的政府，一面要抵抗滿清的侵略；一面又企圖和滿清「連兵西討，問罪秦中，」因之不能集中力量迎擊外敵，以致結果與李自成並倒。到隆武時代，雖由於李自成殘部之歸附，局部地緩和了內部的矛盾對立，但督剿張獻忠，仍爲當時政府主要任務之一，因之亦不能集中全力迎擊滿清，

以致結果唐魯兩王，又與張獻忠同歸於盡。到永曆時代，李自成和張獻忠的殘部，都在民族國家的危亂之前，變成了支持桂王政府的主力軍。在這一時代，桂王政府已無「寇」可剿，若謂有「寇」，則此所謂「寇」已經不是以前的「流寇」，而是大明王朝的「叛將」與「賊臣」。即因社會內部矛盾對立的消解，因之桂王政府便只有一個敵人，一個任務，即反抗滿清的侵略，收回大明的天下。

其次，我們又知道，弘光隆武兩朝的政府，完全是明代殘餘官僚和士大夫的政府，他們沒有把政權建築在廣大的人民基礎之下。所以在當時雖然出現了史可法、張煌言等這一些出類拔萃的大英雄，結果也還是敵不住馬士英、阮大鋮、鄭芝龍這一類賣國求榮的大漢奸。至於桂王政府則與以前兩個政府不同，他不是純官僚士大夫的政府，而是官僚士大夫和被稱爲「流寇」的農民軍，下至塾師、游客、卜筮、胥吏、寒士、落魄書生、江湖豪俠，以及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民大衆之政府。換言之，桂王政府是當時社會各階層的人民之「混合政府」。所以在當時士大夫金堡看來，簡直就是「匪人」的政府。即因桂王政府變質爲「混合政府」，所以他才能在更惡劣的客觀環境中，支持十六年之久。

二　政權的性質

桂王政府的改變，並非主觀的意圖，而是客觀的必然。因爲明代的抗清鬥爭，發展到永曆時代，已經經過了兩次大慘敗，在殘酷的歷史考驗之下，大多數的官僚和意識薄弱的士大夫，他們已經經不起歷史的壓力，不斷地從民族鬥爭的

戰線中叛變出去當了漢奸或是放下武器做了順民。當此之時，許多「舊朝之重鎭」如洪承疇、吳三桂、尙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之流早已搖身一變，出現爲「新朝之勳臣」。其他「世膺爵祿」的高官顯宦，「藩封外疆」的總制巡撫，到這一時代大半皆已「剃髮爲奴」「變服稱臣」了。雖然此外也還有一部份良心未死的士大夫，他們不投降滿淸，但也有勇氣參加這個最後的而又似乎是沒有希望的鬥爭。關於這一點，王船山永曆實錄有云：

「朝廷建立三四年來，搢紳衰落。呂大器、李若星、李永茂，旣以志不行，無意再起；北方久陷，寂不知有嶺海立國事。吳浙阻遠，舊臣或潛避山谷，略聞音息，終不能起，惟有南望慨嘆，賦詩寄意而已，如萬元吉、楊廷麟、劉同升、郭維經，皆旋死事。詔徵用者，文安之、王錫袞、郭維賢、李陳玉、印思奇、尹與民、劉若金，俱中道阻不得達。熊開元、倪嘉慶輩又皆披緇放蕩江湖，無復興志。閩蜀搢紳，稍有至者，率皆庸猥無長釆，或復寒士起草茅者，大用之類，皆斗筲劣瑣，自媒燥進。故任使空匱，列位多虛。嚴起恆、金堡皆以淸品竟求實材爲務，而猝不得應者。」

這段紀事，暗示出當時一般被淸軍嚇昏了的官僚和士大夫迴避鬥爭的情形。其中除少數死於國難，其餘不外如次的幾類，一類是「無意再起」，一類是「推託不知」，一類是「潛逃山谷」，一類是「放蕩江湖」，一類是「南望慨嘆」，一類是「阻不得達」。總而言之，他們都讀過聖經賢傳，記得「危邦不入」的教訓。所以桂王政府雖空懸「任使」多虛「列位」，而「不得應者」。於是王船山慨乎其言之曰「搢紳衰落」。

當「搢紳衰落」之時，亦卽民族鬥爭達到嚴重階段的頂點之時，當此之時，那些草茅寒士，却遠自閩蜀而來，足見當時道路並非阻而不達也。這些草茅寒士，雖然「庸猥無長釆」但他們却不「潛避山谷」或「放蕩江湖」而懷抱着

搶救祖國於危急中之壯志。永曆實錄云:

「及上居武岡……羣臣皆逃去莫肯扈從……於是江楚間塾師、游客、胥吏皆冒舉貢,自稱全髮起義,赴行在求仕。」

從這裏我們又可以看出當寒士們「赴行在求仕」之時,並非鬥爭的高潮時代,而是「羣臣皆逃去」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除了那些看不淸風頭的寒士,雖還來參加這個已經沒有油水了的鬥爭呢?至於他們之「冒舉貢」這又指明直至永曆時代反對滿淸的鬥爭,還是士大夫的特權,不是「舉貢」就沒有參加抗戰政府的資格。

當時寒士,大多數皆效命前線,永曆實錄云:

「江楚川黔起家紀監,率皆落魄書生,依諸將自售,遽欲得部院銜,陳乞敕印,糊口行間……干請不遂,則號哭闕下。」

即因桂王政府中,有不少的寒士參加,所以金堡慨乎其言之曰:「今日之大患,莫甚於闕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復以匪人持政柄。」誠然,當時朝廷中確有不少的「匪人」,但所謂「匪人」不一定都是寒士,大半都是官僚或士大夫中的敗類。這些「匪人」,不顧國家的危急,貪贓枉法,驕奢淫侈,不減承平時代。關於這一點,永曆實錄中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

例如進士出身的何騰吾,「銷銀爲小山,高丈餘,凡十餘所。」「素有文望,自矜名節」的蕭琦,「以賄爲命,鬻武弁劄,至十餘金而得副總兵銜,金帛鉅萬,以數艦載至象州。」將家子李元胤,「軍中有樂部,日酣歌縱酒」。歷官至都指

揮的馬吉翔，「徵歌縱酒，遙執朝政。」故御史郭子彰之孫郭承昊「挾寶石金帛鉅萬，女樂十餘人從上至武岡。」位列九卿的侯恂之弟侯性「蓄無賴健兒將百人，沿西江（自南寧）東至三水，劫掠士宦商賈。」這些人中間，沒有一個是起於草茅的寒士。

又如在將領方面，「大掠衡湘間」的是馬進忠。「各姿焚殺，屍橫五百里」的是王進才。「奪民田以耕，日與苗夷相仇殺」的是張先璧。「每月輒驅疲卒萬人，掠萍鄉永新萬載……民稍觸其怒即磔剮之」的是黃朝宣。在這些將軍中，又沒有一個是流寇出身的。

又如在封建政治體制中的宦官，直至永曆時代，也還是存在。此輩宦官，依舊盤據宮廷，作惡多端。如宦官王坤，則「弄權賣國，」侮辱大臣。宦官夏國祥，則「頻以太后旨取庫金」。像這樣的現象，稍有良心的士大夫，無不為之痛心，當時大學士李永茂曾慨乎其言之曰：

「國勢孤危至此，而猶為內豎意，繫辱大臣，吾甯死草間，不能為此輩分任亡國之罪。」

自然，宦官和士大夫中，也有高風亮節之士，如瞿式耜、張同敞，亦有捨身效命之人，如何騰蛟等，他們或主政中央，或轉戰前敵，殉國死難，臨危不苟。即在宦官中，也有一個李國輔，他在南京淪陷後，曾兩度薙髮變服，由廣西赴南京，潛祭孝陵，他在星月下登鍾山，望陵焚香，又履行周視，望見孝陵「殿垣陵甃，毀壞無餘，茅荻塞望，狐嘯蛩吟，如荒山窮澗。」這較之當時士大夫如洪承疇者，一再榜令南京諸門「非伐鍾山樹者，不准通樵薪」，眞有人獸之別。

總之，桂王政府中，確有不少寒士參加，但主持中央大政的還是官僚和士大夫，而且在官僚士大夫中，還是有不少貪

污腐朽殘民以逞的敗類。這些敗類只知在混水中摸魚，幾乎不知尙有強敵壓境。卽因他們腰纏萬貫所以性命非常要緊，每當時局吃緊，便逃匿無蹤。「百官潰散」是南明史上常有的紀載。在桂王政府中，主持大政的，雖然是官僚和士大夫，但以英勇的戰鬥支持這個政府的，却是愛國的人民。因爲桂王政府的官軍，早在卽位之次年就在三水的火併戰爭中消滅了，繼之而起以與敵人戰鬥的，是人民義勇軍，和反正的僞軍，最後是張獻忠的殘部，卽所謂流寇者是也。卽因有這些人民的力量接踵繼起，所以桂王政府，才能把抗淸鬥爭，堅持到底。但是桂王政府何以終於覆亡呢？這就因爲他沒有好好地組織這些力量，領導這些力量，發揮這些力量，使這些力量一個跟着一個被敵人消滅，因而永曆的歷史，也就不能不成爲弘光隆武之續，在中國史上，添上一幕悲劇。

三　可恥的內戰

當桂王政府成立的當時，正値淸軍兩路南犯，一路由漢奸李成棟指揮，由漳泉疾趨潮惠，進迫廣州；一路由漢奸孔有德指揮，由岳陽攻陷長沙，逼近衡陽。正當此時，中國統治者內部，却發生了轟轟烈烈的內戰，這就是桂王與唐王在三水的火併。所以桂王政府演出的第一幕是內戰。

據史載，當丁魁楚等擁立桂王之時，由江西潰退下來的一部分軍人蘇觀生等又擁立唐王聿鐭在廣州成立了另外一個政府。明紀桂王紀云：

「十一月癸卯朔，觀生與(何)鳴吾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唯道等擁唐王監國於廣州。丁未，王自立，改元紹武。就都司署爲行宮，時倉猝舉事，治宮室服御鹵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云。」

蘇觀生爲甚麼要另組政府呢？這是因爲丁、呂等排斥他，拒絕他參加桂王政府。明紀桂王紀云：

「丁魁楚等之立（桂）王也，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觀生，拒不與議，呂大器亦叱辱之。」

南明野史永曆皇帝紀亦云：

「福京舊輔蘇觀生，粵人也，督師援贛。贛破，撤兵度嶺。魁楚與觀生有隙，兼聞贛敗，倉卒與司禮監王坤趣監國走梧避之。」

當時瞿式耜看到這樣的情形，甚不以爲然。他說：

「今日之立，爲祖宗雪恥，爲生民援塗炭，正宜奮大勇以號令遠近。今強敵日迫，東人復不靖。苟自儒外棄門戶，內釁閱牆，國何以立？」

瞿式耜的調解，不發生效力，於是廣州就出現了唐王政府。唐王政府出現以後，中國的力量分裂爲二，而且丁魁楚與蘇觀生個人的對立，很快就擴大爲集團的對立，對於在大敵當前之時，展開了內戰。明紀桂王紀云：

「（觀生）遂治兵相攻，以番禺人陳際泰督師。桂王遣總督侍郎佳鼎等禦之，戰於三水。唐王兵敗，復招海盜數萬人，遣總督林察將，十二月甲戌，戰海口，斬佳鼎。」

正當內戰方酣之際，李成棟的僞軍，却由潮惠襲入廣州，內戰的英雄們一個個「拒戶自縊，」「投環而絕。」明紀

記其事曰：

「時清軍已下潮惠，長吏皆迎附，即用其印移牒廣州，報無警，觀生信之。望日，唐自視朝，百僚咸集，或報大兵已偪，觀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報，安得遽至此，妄言惑衆者斬之。』於是者三，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招兵搏戰，兵精者皆西去，倉猝不能集。觀生……扼戶自縊。……唐王……投環而絕，周鎰遼等二十四王俱被殺。」

內戰結束了，廣州已非復中國所有，假使蘇觀生自江西撤退廣東以後，桂王政府不排斥他令其疾趨潮惠以扼漳泉，則清軍何致長驅入粵，如入無人之境，即在成立廣州政府以後，假使不發生內戰，則以西扼三水的精兵保衛廣州，以內戰海口的數萬海盜作爲迎擊敵人的前鋒，則又何致清軍入城不知，即知而無兵可以應戰。吾知當蘇觀生扼門自縊之時，當知內戰實爲亡國喪身之因也。

三水的火併，不但失了廣州，而且幾乎替桂王政府做了結論。當李成棟的僞軍，佔領廣州以後，並企圖一舉而覆滅桂王政府，當時李成棟揮軍溯三水而上，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之下，佔領了肇慶。又分兵兩路，一路入雷州半島陷沿海州縣；一路西向廣西，攻陷梧州。這時桂王政府統帥丁魁楚，帶着大量的金銀，棄梧州而走。南明野史記其事曰：

「丁魁楚之去梧也，以三百餘艘載黃金二十四萬兩，白金二百四十餘萬兩。方至岑溪，成棟追及之，戰於藤江，魁楚被殺，闔門盡沒。」

梧州既失，則廣西之門戶大啓，永曆元年三月，清軍遂西陷平樂，進迫桂林。當時桂王及所有政府要人，剛從肇慶逃到桂林，又要棄桂林而逃，惟有瞿式耜反對望風而逃，主張死守桂林。他說：

「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亦速來一日，楚不可遷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遷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視粵西，則一隅似小，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

瞿式耜並不能阻止桂王及其官吏的逃亡，他們還是跑到湖南武岡去了。正當此時，孔有德等的僞軍也由寶慶而南，迫近了桂林，桂林遂陷於兩路敵軍夾攻之中，如果沒有瞿式耜孤軍苦戰，如果沒有廣東人民義勇軍襲擊廣州，則桂林早已陷落，而桂王政府也就結束了。

桂王政府可以說是以內戰揭幕，而且幾乎以內戰結束。但這種殘酷的歷史教訓，並不能使他警惕，不久在四川又發動了內戰。據明紀桂王紀所載，永曆二年正月，有明代宗室朱容藩者，自稱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據夔州，建行台，稱制封拜。當時已有堵胤錫，責以大義，曉以利害，稍散其衆，事情本可以和平解決，而桂王政府必欲發動內戰，命大學士呂大器盡督西南諸軍，會討朱容藩。內戰總算是政府方面得到了勝利，可是中國抗淸的力量却在自相殘殺中削弱了。假使桂王政府不消滅朱容藩，而命其鎮守夔府，則不但可以鞏固巴東的門戶，並且足以抵應江楚的反攻，可惜不此之圖，而自相芟夷，結果敵人乘機入川，蜀中諸將，望風而靡，抑何勇於內亂而怯於外禦其侮？

四　人民義勇軍的奮起

桂王政府的官軍首之以三水火併，繼之以敵人兩路進攻，終之以桂林保衞戰，已經完全覆沒了，繼官軍之後，奮起與敵人肉搏於淪陷區域之內者，完全爲人民義勇軍。所以桂王政府第二幕是人民義勇軍的戰鬥。

自從桂王詔誥天下，獎勵文武兵民，同仇恢復的號召發出以後，中國的人民，在廣東、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到處起義，響應桂王政府的號召。特別是廣東人民義勇軍的戰鬥，更爲壯烈。

據史載，當時廣東的義軍，一時蠭起，如陳子壯、陳子升兄弟起義於海滋，朱維四起義於海滋上游，王興起義於海南，石、馬、徐、鄭四姓的人民起義於花山島，陳邦彥起義於高明，余龍起義於甘竹灘，張家玉、韓如璜起義於東莞，陳文豹起義於新安，賴其肯起義於潮陽。他們或孤軍抗戰，或相互策應，與敵人白刃相接，恢復了高、雷、廉及其他沿海州縣。並且爲了解桂林之圍而英勇地襲擊廣州，使敵人不得不囘軍自救，因而使桂王政府轉危爲安。可惜當時桂王政府，沒有想到去組織他們，領導他們，以致結果被敵人各個擊破。關於這些人民義勇軍的戰鬥，史乘只有簡略的紀載。如云：

「陳子壯，……舉家航海，招義旅，……擁兵居海滋。已而成棟破廣州，子壯即軍中益號召，約舟師數萬，復沿海諸縣。淸遠貢生率義旅自上流應之，兵薄廣州。子壯戎服督戰，舉軍覆沒，子壯死之。」（永曆實錄）

「子壯戰沒，弟子升收其餘衆。結石、馬、徐、鄭四姓，據花山島。有楊光林者，擁兵萬餘，遙爲聯應。海南王興，號繡花針，亦擁衆數萬，互爲犄角。成棟歸附，子升釋兵入見（桂王），……端靜無所附和，不合於時，移病告歸。海上諸兵，爲成棟所摧抑，皆瓦解。王興屯雷廉間……不通朝廷。」（同上）

「余龍等聚甘竹灘爲盜，他潰卒多附，至二萬餘人。……陳邦彥起兵就龍，乘間圍廣州。已而發高明兵，由海

道入珠江與龍會。…邦彥等遂攻廣州，大清兵引而東，桂林獲全。」（明紀）「後，（漢奸）佟養甲，訪求其家，獲妾何氏幷子和尹於肇慶，厚待之，爲書招（降）邦彥，邦彥不復書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私妻子也。』」（南明野史）

「（李）成棟陷廣州，（張）家玉毀家招兵，據東莞，與陳子壯相應。」（永曆實錄）

「家玉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攻東莞，知縣鄭鋘降，乃藉前尚書李覺斯等資以犒士，奉表於王……無何，大清兵來擊，如璜戰死，家玉走西鄉。祖母陳，母黎，妹寶石，俱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死，鄉人殲焉。時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亦皆起兵。」（明紀）

「西鄉大豪陳文豹，奉家玉取新安，襲東莞，戰赤岡。未幾大清兵至，數日，家玉敗走鐵岡，文豹等皆死。李覺斯怨家玉甚，發其先壟，毀其家廟，盡滅家玉族，村市爲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同上）

「後家玉道得衆數千，取龍門、博羅、連平、長甯，遂攻惠州，克歸善。大清兵來攻，家玉走龍門，復募兵萬人。家玉好擊劍任俠，多與草澤豪士遊，所至歸附。乃分其衆爲龍虎犀象四營。」（同上）

「張家玉攻增城，冬十月，大清兵步騎萬餘來擊……大戰十日，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請潰圍出，家玉嘆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爲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人手哉！』因偏拜諸將，自投水死，年三十。」（同上）

以上史實，指出了當時廣東人民義勇軍及其領袖，是何等的不顧身家性命與敵人作決死的鬥爭。永曆實錄載陳

家玉之詩曰「異同喪狗生無賴，縱比流螢死有光。」至今讀之猶有餘哀。

與廣東的人民義勇軍同時，在湖南方面也有管嗣裘與王船山舉義兵於衡山。以後兵敗，潰走山中，「冬月負敗囊，採苦菜以食。」至永曆二年，當清兵再舉犯湘之時，湖南的義勇軍，又到處蠭起。其見於永曆實錄者，有：

「劉季鑛……聯絡江楚義旅……間道（由吉安）走衡永，所至募義者津送之。至郡縣，遂糾衆起，號召響應，旗郴、茶陵、興寧、永興、常甯諸縣。」

「周鼎瀚……翱翔郴桂間，號召義兵。」

「時有田闢者，河南人，……匿郴韶間，糾義旅。」

這不過舉例而已，實際當時江楚一帶人民，「破家起義，全髮效節」者，「日有所聞。」

在江西、福建的邊境，因爲淪陷較早，人民義勇軍的歷史也較爲悠久。永曆實錄云：

「弛光中、撫、建、汀、贛之閩王、宋三姓，據籠子洞，倚山爲寇……張肯堂、李永茂勦撫之未定。隆武元年，江西陷，（揭）重熙乃誘令反正爲義軍，以抗清兵。以事上聞，授重熙僉都御使，督江福義旅。重熙以便宜授諸渠帥劄官，遂據撫州。金聲桓反正，檄重熙解兵，重熙姑令退屯山中。南昌陷，（聲桓敗死，其部將劉）一鵬奔撫州，收餘卒，依重熙於山砦。重熙收輯之，與義軍合出攻臨川、永豐、興江，迭有收復，未能守也。」

「姜曰廣……陰結撫贛義勇，思間道入閩粵，未及行，俄而桓聲反正……時撫州王蓋八起義兵滿數萬。贛州閩王、宋諸賊，歸義效命，衆亦數萬。吉安劉季鑛所號召，西連醴郴桂，所在響應，咸聽命曰廣。曰廣欲輔令之爲聲桓援，聲

桓不從。」

此外在贛鄂邊區，還有一枝富有歷史意義的義勇軍。清鑑云：

「先是元末陳友諒遺孽，分爲柯陳二姓，盤據江西武甯湖廣興國，而居興國者尤蕃衍黠悍。迄明之亡……有柯抱冲者，與何騰蛟結連，自立爲王，以其黨陳珩玉爲帥。倚山結寨，焚劫郡縣，攻陷興國，殺（清）武昌同知張夢白，勢甚猖獗。（清）湖北總督柯永盛，遣將征剿，十日凡八戰，皆破之。擒抱冲珩玉斬之，餘黨悉平。」

根據以上的史實，因知江西的人民義勇軍，他們雖嘗爲盜賊，反對明代的政府，但一到江西淪陷，都反正爲義軍，迎擊外敵。

在湖北方面，也有不少的人民起義，但始終沒有與桂王政府取得聯系。明紀曾記楊錫儇向政府之建議曰：

「德安，北捍楚塞，爲漢新市故墟，人尚豪俠可用。應山楊主事易，忠孝世家，爲三楚望，立『蓋天營』爲國死守。豪傑遙附甚衆，恨不知朝廷所在耳。儇請號召爲漢南援應，若敵踐荊楚，儇率義旅，起擊其背，以掣之，此英布制楚法也。」

惜政府不納楊錫儇之議，因而一座孤縣德安的「蓋天營」，後來也就沒有下落，而這位請纓不遂的楊錫儇，後來遂「入南嶽老龍池，痛哭爲僧，去不知所終。」

浙江福建的愛國人民，大半都參加到鄭成功和魯王的抗清組織中，飄泊於閩浙附近的海島。此外與海軍相犄角浙東一帶，也有許多山寨，明紀云：

「先是浙東多結山寨，魯王侍郎王翊爲之主，遙應海外。會大淸兵攻取舟山，先廓淸山寨以絕其援，於是諸寨皆破……大淸兵下舟山。」

此外，華北一帶淪陷區域中也有不少愛國志士，領導反淸的武裝鬥爭，可惜他們的起義尙在組織中，卽爲敵人所發覺，那些領袖人物，都在「妖賊」的名義之下被滿淸政府屠殺了。如永曆三年，天津婦人張氏與同志王禮、張大保「私製玉印旗令，謀爲不軌。」永曆九年，朱議㴽與其同志僧人文秀、道士張應和起義。永曆十六年，拓城男子張揩化裝僧人，在河南一帶組織起義。他們都是「事覺伏誅」。其曾經揭起義旗並與淸兵戰鬥八個月，收復了七八個縣城的，只有永曆十六年山東于七的起義。

可敬的這些忠實而又英勇的愛國人民，他們當國家危急的時候，旣不知道順風轉舵而披髮入山，又不知道「南望慨嘆」而「賦詩寄意」，更不甘心認賊作父而委身爲奴爲虜，他們只知道拿起武器與敵人作生死的決鬥，保衛國家，保衛民族，生爲忠義之士，死爲壯烈之鬼。從以上的史實，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或「倚山結寨」或「入海招兵」或新起草茅而聚衆抗淸，或舊爲盜賊而反戈向敵，或連族而起，保衛家鄉，或孤軍奮戰，攻陷城邑，或父母妻子，慘遭殺戮，或祖宗邱墓，橫被發掘。這種破家起義殺身成仁的偉大精神，比之當時一般官僚和士大夫，懦怯畏縮，全軀保妻子，甚至毫無廉恥，迎拜於敵人馬首之前，甘爲奴虜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明末中國人民的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在南明史上卻留下了不朽的一頁。

五　僞軍大反正的局面

人民義勇軍消滅了，接着便到來了一個僞軍大反正的局面。所以桂王政府第三幕是反正僞軍的鬥爭。

僞軍反正，最初發動於江西，以後在廣東廣西湖南等處，到處都有僞軍反正，當此之時，長江以南幾乎又變成了大明的天下。

僞軍爲甚麼在這一時代反正呢？具體的史實指示出來，是滿清統治者對僞軍將領開始壓迫乃至凌辱的結果。金聲桓王得仁舉江西反正的原因，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南明野史有云：

「巡撫章于天至，遇諸將益倨，日從諸將索珍寶奇貨。呼聲桓曰副總，得仁曰王把總。先此二人在外，固已自稱都督，自文於偏裨，至是部曲亦駭。一日，章宴藩司，舖氈席地，坐聲桓等於氈外。酒半，嬉笑視曰：『王得仁，汝欲反耶？』是日得仁歸，大愧其從騎。聲桓亦失色，俯首韡鞭還帥府。」

像這樣的侮辱，金聲桓或可忍受，而「流賊」出身的王得仁便不能忍受了，所以不久便借追餉之事，大大地發洩了。據同書載：「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章于天遣官票追其餉三十萬。得仁大怒，搥案大呼曰：『我流賊也，大明崇禎皇帝爲我逼死，汝不知耶？語汝官，無餉可得，杠則有之。』聲如嘶吼，目睛皆出，杖其差官三十杠，曰：『寄章于天，此三十萬餉銀也。』」

侮辱尙不僅此，據永曆實錄所載，有如次難堪之事：

「董御史（成學）者按江西，得仁櫜鞬庭參，不爲起，又索其歌妓，得仁未及遣，董御史怒詈曰：『不聞大淸有借妻例耶？吾行索得仁妻侍寢，何况歌妓！』」

像這樣的事情，如果在「淫姦獻妾」的南明士大夫·錢謙益看來，正是「不甚榮幸之至；」然而在起羣盜的王得仁聽到，便按劍而起曰「王雜毛作賊二十年，然自知有男女之別，安能一日隨犬豕求活耶！」於是遂舉兵殺淸總督以下諸官，於永曆二年二月，擁金聲桓反正於南昌。舉江西附於桂王。

江西反正，則深入廣東之李成棟的僞軍，受到了壓迫，加以其養子元胤涕泣陳大義，李成棟遂有反正之意。這裏又有一個插畫，據永曆實錄云「成棟有愛妓，松江院妓也。揣知之，勸成棟尤力，成棟不語而嘆。妾曰：『公如能舉大義者，妾請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因拔刀自刎，成棟益感憤。」於是逮廣東總督佟養甲，反正於廣州，舉廣東附於桂王。

廣東反正後，廣西的僞軍，更受威脅，因而耿獻忠遂被迫反正於梧州，而廣西遂無敵蹤。

反正的浪濤，不久就波及湖南。同年八月，陳友龍反正於黎平、靖州，並收復沅州、黔陽、平溪、淸浪、鎭遠、篁子、武岡、寶慶，不到一月，收復二十餘城，湖南的局面爲之一變。

由於江西廣東的反正，深入湘桂邊境之孔有德的僞軍，不能不作戰略上的撤退。明紀云：「金聲桓李成棟之反也，大淸兵在湖南者始退。」當淸兵撤退之時，劉季鑛的人民義勇軍，又收復了湘贛邊境六七縣。同時，何騰蛟收復了全州、東安、永州、湘潭。曹志建收復了道州、郴州。馬進忠收復了常德。李赤心高必正的「忠貞營」也由巴東趨湖南，由

常德、甯鄉，進圍長沙，東復攸醴。是時，湖南的敵軍，幾乎肅清。

不約而同，在同一時候，姜瓖反正於大同，鄭成功攻佔福建沿海州縣，王祥克復川南一帶。

由於反正軍聲勢的浩大，武漢也動搖了。永曆實錄云：「聲桓復遣客至武昌勸淸督羅錦繡降，時孔有德還師去楚未遠，錦繡以為疑，然已密令僕人具冠帶袍笏矣。」

這的確是一個意外的好轉。在這種好轉的局勢之下，桂王政府的緊急任務，應該是怎樣調度這些反正的偽軍，使之打成一片，以準備迎擊必然到來之淸軍的反攻；應該是號召更多的偽軍反正，以爭取局勢之更進一步的發展。但是不幸這一意外的勝利，竟衝昏了桂王政府中袞袞諸公的頭腦，他們不此之圖，而以為天下從此可以垂手而得，於是以前潰散了的文武百官又一變而為扈蹕大臣，由南寧還囘肇慶。他們在肇慶大開慶祝會，卿公台省縱酒徵歌，官署軍營，巨燭輝煌，昏天黑地，幾不知尚有滿淸。

在這種狂歡的情形之下，政府當局對於如何援應江西的反正軍，追擊退却中的敵人，以及一切穩定勝利的設施，都不會感到興趣。他們最熱心的，是分黨分派，爭奪政權。於是吳黨楚黨鬧得烏煙瘴氣。明紀云：

「朝臣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朱天麟、堵胤錫……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傅。主楚者，都御使袁彭年，給事中丁時……皆外結瞿式耜內結錦衣指揮使李元胤……王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能解。」

像這樣的情形，自然使得反正的將領失望。永曆實錄記李成棟之語曰：「吾初歸附，禮當以元旦詣闕賀正旦。此行也，誓死嶺北，願見上一決，因與公卿議善後計，及請楚師出郴贛間相應援。乃羣小洶洶如此，吾不能剖心出血……徒

以血肉付嶺表耳……乃於除夕泊三水，馳疏稱警報迫，不得入朝，望闕大慟，沂清遠去。曰『吾不及更下此峽矣。』」

當桂王政府昏迷於局勢好轉之時，而滿清政府却對正這一變局立即執行其緊急的處置。他分遣譚泰攻江西，尙可喜耿繼茂攻廣東，孔有德攻湘桂，濟哈爾朗攻湘西，而另遣多爾袞征大同金勵、劉之源、陳錦、田雄等攻閩浙。在這樣一個有計劃的反攻之中，所有的反正軍，全被掃蕩，而江西湖南廣東復爲滿清所有。孔有德的僞軍，並於永曆四年十一月，攻陷了桂林，瞿式耜死之。同時，尚可喜的僞軍也在叛將陳邦傅的迎降之中，佔領了梧州，敵人又深入廣西了。

好轉的局面，變成了大夢一場。當此之時，桂王政府中的袞袞諸公，既沒有徵歌縱酒的雅興，也沒吳黨楚黨的紛爭了，他們倉皇由肇慶撤退，溯西江而上，逃到南甯。可是不久滿清的大軍又在陳邦傅的嚮導之下，由梧州柳州而疾越南甯。南甯勢在必失，於是桂王又不能不於五年六月由南甯向安南逃亡。從此以後，百官潰散，桂王遂棲遲於山谷之間。也是錄的作者爲之慨曰：

「成棟之師既覆，騰蛟之功不成。翠華奔播於崖疆，黃屋飄零於瘴雨，無斟鄩之餘燼可燃，無朔方之義兵可召，無海島之戰艦可航，帝至是雖有大可爲之才，亦英雄無用武之地矣。」

六　最後的支持者——張獻忠的殘部

反正軍消滅了，繼之而起支持桂王政府至十三年之久的，是張獻忠的殘部孫可望李定國等，所以桂王政府最後的

一幕，是張獻忠殘部的鬥爭。

當桂王政府成立之時，張獻忠的殘部已經由孫可望等率領，撤退黔滇。當桂王退守南甯時，孫可望等鑑於民族國家的危亡，曾遣使向桂王表示願意擁護政府，共抗滿淸，因此有請求封王之事。請求封王者，卽要求承認其合法地位。

當時政府中對孫可望請封王事，有兩種主張，寒士出身的程源、萬翔等則以「可望擧全滇土地，十萬甲兵以歸我，功在可王。」而況當時的孫可望，「封之王，不封亦王，」與其自王，不如封之。士大夫的領袖嚴起恆金堡等則謂「江粵之土，我已失之土也，滇未失之土也，金聲桓李成棟擧已失之土而效順，且不敢邀王封，而廷議亦唯祖制是守，今乃擧而授之可望，則何以謝聲桓成棟於地下，而激厲其部曲乎？」因議論不一，終罷王封。

平心而論，金李雖係擧已失之土而效順，但贛粵之失，金李實爲敵人先鋒。孫可望雖舊爲流寇，但並未投降滿淸，背叛民族，彼旣自求歸附，似不應加以拒絕。而況當時桂王政府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掩旗息鼓，宣布滅亡，便是撤退雲貴，以孫可望等的力量爲基礎，展開最後的鬥爭。但是當時桂王政府中的士大夫，似乎甯願逃亡海外，不肯撤退雲貴。明紀云：

「時大淸兵南征，勢日迫，王召諸臣，有請走海濱就李元胤者，有議入安南避亂者，有議泛海抵閩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龐天壽結可望，主赴黔。」

等到南甯淪陷，百官潰散，這時桂王才接受孫可望的擁戴。當時孫可望遣兵迎王入貴州之安隆所，改爲安龍府，奉王居之。但當時的士大夫却一則曰：「孫可望謀刼王以自重，」再則曰：「王寄虛名於羣盜之中。」

平心而論，當時孫可望雄據滇黔，遙控川湘，地方數千里，甲兵數十萬，他繼續做盜賊也可以，自己稱王稱帝也可以，再不然，舉滇黔土地而投降滿清，又何嘗不可以。他又何必「邀封」才能自尊，「刼王」才能自重？而况欲自尊則降清以後，「爾公爾侯，有平西王吳三桂之典例在；」欲自重，則與其「憑藉桂王」，又何如追隨南明士大夫之後「憑藉大國」豈不更能「狐假虎威」，以鞭笞自己的同胞嗎？退一步說，即使孫可望是「刼王自重」，但當時士大夫何以並「刼王自重」者亦無一人呢？是知當時的桂王，即使刼到手裏，亦不能自重，不能自重而「刼」之，還是士大夫之所不爲，士大夫所不爲者，而孫可望爲之，這就證明了不是爲了自重，而是爲了要繼承這一個沒有希望了的民族鬥爭。

具體的史實指示出來，當桂王入黔以後，孫可望等立刻發動了一個大規模的出擊，以迎接這個抗敵的政府。明紀云：

「（七年二月）孫可望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甯出敍州，白文選由遵義出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

這一次的大出擊，是兩路並進，一路東征湘桂，一路北伐四川，兩路都獲得了勝利，而尤以東路的勝利，在桂王政府的鬥爭中，是空前絕後的。永曆實錄云：

「定國自貴州出黎靖，馬進忠、馮雙禮副之，……合兵十萬，戰象五千。四月，馳攻黎平，克之。五月，至靖州……兩日夕馳下武岡。淸肅順公棄寶慶，定國收寶慶。遂自東安南攻孔有德於桂林……肉搏登城，王允成開城納兵，兵入，有德自焚死。執（叛將）陳邦傅，數其矯詔懷奸，叛王迎降之罪，並其子磔殺之。七月，收平樂、梧州，馬雄、線安國走廣東

遂復柳州、南甯。」

「八月舉兵出楚，復永州，遂下衡州。出馬寶軍於連陽，收曹志建部於賀縣。遣馬進忠、馮雙禮北取長沙。召張光翠出甯鄉，進復常德。十月進忠略地岳州，所至披靡。別遣軍攻永新、安福，下之，遂圍吉安。出兵凡七月，復郡十六，州二，闢地三千里，軍聲大振。

當東路軍攻復南甯時，「劉文秀出川北，亦復潼梓，攻保甯，吳三桂馳救，迎戰大敗，師退川南。」但明紀則謂劉文秀曾一度進據成都，清兵為之震動。

像這樣一個驚人的勝利，就證明了中國人民並不是沒有抵抗滿清侵略的力量，以前的失敗，只是因為沒有把這一部分力量運用起來。自從李定國把中國人民最後的旗幟舉起來以後，滿清侵略者也就驚惶失措了。

但是不幸桂王及其從官，因為不滿意孫可望的待遇，硬要分裂孫李的團結。他們一方面說孫可望虐待桂王，企圖篡竊；另一方面又說李定國恃功驕橫，準備獨立，並且一次兩次的「密勅」「血詔」召李定國還師勤王。在這樣挑撥離間之中，孫李的感情，自然惡化了。

平心而論，像孫可望那樣從農民出身的人，他當然不知道侍候皇帝的規矩，趨朝拜舞，呼萬歲，不大熟習，因而失禮之處，也許有之，但說他篡位，就未免神經過敏。例如當時御史李如月指出孫可望篡位的證據，是說「可望擅殺勛鎮，罪同操、莽。」但他所謂「勛鎮」，是替清軍當嚮導進攻南甯的陳邦傅。如果這樣的「勛鎮」亦不可殺，殺了就罪同操、莽，那就眞是不能理解了。

謠言終於分裂了孫李的關係，不久孫可望遂自貴陽帥兵出湖南，欲奪李定國兵柄。當時正值清敬謹王率三貝勒八固山兵向湖南李定國屯衡州，馬進忠、馮雙禮屯長沙，前軍下岳陽。在湖南正在醞釀大戰。正當此時，孫可望密令馮雙禮、馬進忠從長沙撤退，於是李定國遂由衡陽敗退寶慶。定國正擬死守寶慶，而可望馳召定國返武岡會議，三晝夜書七至。定國不得已棄寶慶西趨武岡。途中知可望有加害之意，遂折而南走，由永明趨平樂下梧州，進圍肇慶，欲東入粵與鄭成功連兵攻江浙。遂南入欽、雷、廉諸府，克高明陷新會。不幸爲清兵所敗，復由新會退南甯，更由南甯入滇，迎桂王入昆明。

同時孫可望亦被清兵大敗，精銳挫衂殆盡，掃興而歸。以前李定國收復之地，至是又完全喪失了。勝利變成了失敗，一個統一的力量分化爲兩個對立的力量了。繼之而來的，便是孫李的火併。在火併戰爭中，孫可望被迫投降了滿清。孫可望離開了民族鬥爭的戰線，這是失敗主義者的勝利。同時，亦即滿清侵略者的勝利。

七 在緬甸的流亡政府及其滅亡

當孫可望領導的大出擊失敗以後，滿清政府卽時對黔滇佈置了一個大包圍的陣勢。滿清派遣四川總督李國英駐保甯，經略洪承疇駐長沙，大將軍反泰及阿爾津先後駐荊州，尙可喜等駐肇慶諸州。他知道黔滇地險而諸將又皆出身流寇，身經百戰，所以不敢輕舉進犯。但並不是委黔滇於不顧，只是等待機會而已。當時高勳看清了這種危機，他說：

「今內亂雖除，外憂方大，伺我者頓刃待兩虎之斃，而我甜歌漏舟之中，熟寐𤑔薪之上，能旦夕安耶？」

果然，當孫李火併之後，清師遂三路入黔，時永曆十二年二月也。第一路由吳三桂、固山額眞侯墨爾根、李國翰統所屬清兵及漢中四川各地清兵由四川南下。第二路由趙布泰統所屬清兵，及提督線國安統所屬標兵，與湖南調發兵由廣西西進。第三路，由濟爾哈朗統領清兵及經略調取各兵，由湖南西進。此外洪承疇自率大軍出黎靖，牽制李定國之軍，以便三路大軍乘虛而入。

永曆十三年，吳三桂等由四川長驅南下，越遵義，由畢節直衝大理，分兵由建昌進搗平越，趙布泰等由廣西南丹經那地，陷獨山，進趨安隆。濟爾哈朗等由湘西陷鎮遠，進薄貴陽。當時桂王政府，也派兵遣將，分道應戰。但是劉正國則潰於三坡，白文選則敗於畢節，李定國的主力軍，也失利於獨山。同時，孫可望的舊部王自奇、關有才，以待遇不平，叛降滿清，三路外攻，叛軍內應，而貴陽遂陷。

當清兵三路會師貴陽以後，漢奸洪承疇與清信郡王多尼在龍旗飄揚之下，走進了貴陽。他們現在要進攻雲南了。爲了抵抗清軍的進攻，李定國曾經領導了一個最後的戰鬥。據明紀云「李定國與馮雙禮等守盤江，扼雞公背……遣白文選將四萬人守七星關，抵生界立營，以牽蜀師。」但以衆寡不敵，都失敗了。據明紀云：

「十一月，蜀師出遵義，由水西趨天生橋。十二月，入烏撒，文選棄關走霑益。……粵兵至盤江……入安龍，定國使懷仁侯吳子聖拒之，大敗。定國由盤江回師拒戰，爲大兵所擊破其象陣。又連敗於羅炎、涼水井、撒岩，諸將皆走。定國撤營遁歸。……清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大清兵入雲南。」

桂王政府最後的首都淪陷了，桂王及其從官衛隊四千餘人倉皇由永昌出走，經永平南走騰越。當此之時，不顧生死與敵人肉搏於玉龍關的是白文選與敵人血戰於磨盤山的是李定國，他們都是張獻忠的部將。反之，在逃亡的途中，叛變桂王的，却是他最親信的禁衛軍。也是錄云：

「正月二十四日甫下營而未炊，忽（總兵）揚武兵到，傳言後面滿淸兵隨到，各營兵士俱忙亂奔散。馬吉翔與司禮李宗這催駕卽行，遂踉蹌而奔，君臣父子夫婦兒女不復相顧。兵馬亂處，火光竟天，各營行囊皆被搶刼，上之貴人宮女，俱爲亂兵所掠。

「二十五日至鐵壁關，孫崇雅叛，肆掠行在輜重，凡文武追扈稍後者，悉爲所擄。」

桂王一行，總算到達了緬甸的邊境，但緬人要查驗國書並卸除弓矢刀兵才許入境，他們不得已在緬人的脅迫之下呈示了敕書並解除了武裝，然後才走進緬甸的國士。入緬境後，檢閱從者，僅一千四百七十八人了，因不得舟，乃分水陸兩批，前往緬京桂王等六百四十六人由水路往，餘悉陸行。陸行者至啞哇對河，卽遭緬人刼殺或被擄爲奴，但桂王等一行，則安抵緬都。

這一羣委棄了祖國，竄身蠻服的南明士大夫，他們到達了緬京以後，自以爲與世無涉，與人無爭，可以「聊借緬人以固吾圉。」於是「呼盧博塞」，「縱酒酣歌」開始了亡國大夫的生活。也是錄記其事云：

「時緬婦自相貿易，雜踏如市，諸臣恬然以爲無事，屏去禮貌，短衣跣足，闌入緬婦隊中，踞地喧笑，呼盧縱酒，雖大僚無不然者。其通事爲大理人，私語曰：『前者入關，若不棄兵器，緬王猶備遠近，今又廢盡中國禮法，異時不知何所終

也。」

「上患腿瘡，旦夕呻吟，而諸臣日以酣歌縱博爲樂。中秋之夕，馬吉翔、李國泰呼黎應祥者演戲，應祥泣應曰：『行宮在邇，上體不安，且此何時而行此忍心之事乎！雖死不敢奉命。』吉翔等大怒，令痛鞭之。時蒲纓所居，亦密邇西宮，纓大博肆，叫呼無忌，上聞而怒，令毀其居，纓仍如故。」

當時呼盧縱酒者，大半皆係腰纏厚貲的，其時亦有流離異國，三日不能舉火者。明紀桂王紀云：

「時諸臣困乏，有三日不能舉火者，馬吉翔擁厚貲不顧，請於王。王無以應，乃擲國璽於地，吉翔取而碎之，以給羣臣。」

也是錄的作者，親眼看見這種情形，於不禁爲之嘆曰：「當時諸臣好醜，蓋難枚舉，至於文武陞遷，仍由權賄，國事至此，尙可問乎！」

桂王一行，用現代語說，也算是一個「流亡政府，」因爲他們還保持着政治的組織，而且緬甸政府，也是把他們當作一個政治團體接待的。但是這個流亡政府已經忘記了他的任務，他們簡直沒有想到怎樣打回祖國這件事情。而這就表現他個拒絕與李定國等的抗清軍繼續鬥爭。

具體的史實指示出來，當清兵入滇以後，李定國並沒有放下武器，他還是與他身經百戰的弟兄，在滇緬的邊界，繼續與清軍相抗。當桂王之入緬也，李定國方與清軍苦戰於磨盤山，他沒有想到桂王會委棄祖國。即聞桂王入緬，乃急遣白文選率兵入緬，想把桂王接回。永曆紀年云：

「當是時（桂王入緬之時）李定國已遣白文選率兵迎駕，至啞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爲緬人隔絕不相聞。」以後又遣將至芒漠迎駕。」也是錄云：

「四月，芒漠來報有我兵祁信者來迎駕，請敕止之。吉翔請以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往，至五月望始還。祁兵得敕不進。吉翔復與緬官之把隘者敕一道云『朕已航閩，後有一切兵來，都與我殺了。』」

也是錄又載：

「永曆十四年七月，緬人復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天波力辭。緬使曰：「此行不似從前，可冠帶而行。」至則遇之有加禮，始知各營將臨緬城。晉王李定國率兵迎駕，有疏云：『前後具本三十餘道，未知曾達御覽否？今與緬定約，議於他處迎駕？伏候指示。』而諸臣在緬，燕雀自安，全無以出險爲念者，緬營素剌，朦朧而去。外兵久候音問俱絕，遂拔營去。」

同書又載：

「永曆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密遣緬人賚疏至，云「臣不敢速進者，恐驚萬乘，欲其慮送出關，爲上策耳。候即賜璽書，以決進止。」後五六日，文選率兵造浮橋爲迎蹕計，相去行在六七十里，緬人復斷其橋，文選候詔不得，遂撤營去。」

從這些紀載，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當時李定國等尚擁有相當的兵力，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們忠君愛國之忱，異乎尋常。他們深入緬境，兩圍阿瓦，企圖救出桂王，繼續反淸的鬥爭。可惜當時馬吉翔、李國泰等一般闒茸之徒「相與狠狽，

惟恐李定國之至。」（也是錄）因而揚言桂王已經航閩，幷囑緬官之守隘者「後有一切來兵，都與我殺了。」豈不可嘆！

最後的災難降臨了。自李定國撤兵以後，於是流亡政府的大小官吏，遂不能不飲緬人之「咒水」。明紀云：

「秋七月，（緬王）欲盡殺王文武諸臣，遣人來言曰「蠻俗貴盟詛，請與天朝諸公飲咒水。」黔國公沐天波疑有變，欲不行，王強之。馬吉翔、李國泰邀諸臣盡往，至則緬人以兵圍之，命諸臣以次外出，出輒殺之，凡殺四十二人。」

永曆十五年冬，明代的重鎮吳三桂，「不避艱險，請命遠來，窮追逆旅之身。」兵臨緬京，十二月初二日，緬王以桂王獻吳三桂軍前。永曆十六年四月初八日，吳三桂弑桂王於昆明，明亡。也是錄序言曰：

「嗚呼！國運之興衰成敗，天乎人也，人乎天也？僕每讀史至國破君亡之際，未嘗不掩卷欷歔而不忍多讀者。嗟夫！天步之艱難如此，人謀之失如彼，天人俱失，何以為國，嗚呼，痛哉！」

八　結語

桂王政府覆滅以後，滿清政府已經最終地征服了中國。當此之時，明代的勳臣重鎮，都已「爾公爾侯」，拜受異族的茅土之賜，或則制禮作樂，為新朝草朝儀。但同時大明王朝却有一個孤臣孽子，這就是張獻忠的部下李定國將軍。永曆實錄云：「當李定國聞桂王北狩之變，還兵至緬甸，已無及，因縞素發哀。定國披髮徒跣，號痛搶地，吐血數升，遂殺妻

子，焚輜重，舉兵攻緬甸而屠之，率其衆居徼外，兩年憤恚嘔血卒。」

此外還有一位至死不投降的好漢，這就是李自成的部將李來亨將軍。永曆實錄所紀，來亨曾參加湖南抗清戰爭，後自湘走蜀，據巴巫間之九蓮坪，屢挫清兵，桂王政府覆亡後，「來亨自知不能久存，會諸將飲，大哭，分遣逃散。來亨母老矣，其中表舅有爲清將者，曾招來亨降，不應。至是乃遣書以其母託之，遂舉火焚岩，與妻子親信投火中死。來亨部凡三萬餘人，來亨死，或死或逸去，就俘執者百五十人而已，餘衆散入秦蜀山中，不知所終。來亨敗沒，中原無寸土一民爲明者，唯諸鄭屯海外。」

余曾跋永曆實錄曰：

「余讀永曆諸人列傳，而深有慨夫永曆之際，孤臣孽子不出於世祿之家，儒者之林，而出於盜賊流寇與草野下士也。當永曆之初破家起義，全髮效節者，起草茅之豪傑也；舉兵反正，率士於王者，起羣盜之諸將也。即桂林既陷，百官潰散，而一迎王於南甯，再迎王於南安者，流寇部將，孫可望也。自是以後，桂王播遷黔滇，遂託命於羣盜之中，不復有衣冠之士趨承殿陛矣。李定國者，本榆林農家之子，爲張獻忠之部將，受命於危難之際，毅然奮其忠勇，誓師討清，一軍東出，縱橫湘贛粵桂之間，如入無人之境。走肅順公於寶慶，誅孔有德於桂林，出馬寶軍於連陽，收曹志建於賀縣，七月之間，復地三千餘里，可謂壯矣。惜乎禍起蕭牆，而前功盡棄，不旋踵而清兵三路入黔，貴陽不守，昆明繼淪。然而當此之時，一挫敵於玉龍關，再挫敵於磨盤山者，李定國也，即桂王被困緬京，揮兵異國，兩圍阿瓦者，亦李定國也。殆至桂王北狩，蒙難昆明，縞素發哀，披髮徒跣，號痛搶地，吐血數升，殺妻子，焚輜重，舉兵攻緬甸而屠之者，又李定國也。至若爲清軍

效命前驅，攻閩粵，踐湘桂，使桂王奔播於山谷之間者，則爲明代之夙將孔有德、尙可喜、耿仲明也。陷貴陽，入昆明，遠征緬甸，破巢取子，使桂王竄身蠻服，卒至血濺蓬萊者，又明代之勳鎮吳三桂也。余讀史至此，不覺慨然而嘆曰，嗟夫！夫果誰爲順而誰爲逆；誰爲忠而誰爲奸，又誰爲孤臣孽子，而誰爲盜賊流寇也。」

論中日甲午之戰

一 戰爭的醞釀及其爆發

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甲午之戰，到現在，已經五十年了。在五十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由朝鮮渡鴨綠江而北，深入遼東，其別軍由花園港登陸，已經攻陷大連旅順。當此之時，首都爲之震撼，淸室爲之動搖。高據廟堂的達官顯宦，寓居京津的豪商巨富，都在準備遷家移眷，向着安全的地方逃命，貧窮的小民則惶惶不知所措，「怎麽辦？」之聲，揚溢乎道路。這眞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緊急的時代。

幸而當時的統治者還有最後的一着棋，這就是對日投降。不久投降的使者李鴻章，到達了日本的廣島，簽訂了有名的馬關條約，這一個歷史上的緊急時代，就算度過了。

五十年的時間飛速地過去了，假如我們不是又在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誰也不會再想到一八九五年春天的緊急。可是我們偏偏在五十年後，又在與五十年前的敵人作戰，而且我們今日所遭遇的歷史危難，較之五十年前我們前輩之所遭遇，何只百倍千倍！（當時日軍逼近貴陽重慶緊張，）因此便不覺撫今追昔，想起中日甲午之戰。

我記得當甲午之戰結束以後，當時泰晤士報曾有這樣的評論。他說：「中國若仍抱殘守缺，不求進步，一二世後，將爲日本之印度矣」（甲午中日戰輯二六〇頁。）甚至敵相伊藤博文也說：「中國若不力求進步，採行西法，而空談復仇，於日本何害」（同上二三〇頁。）五十年來，中國究竟有些甚麼進步，這是我們應該自我反省的。

甲午之戰，已經成了過去，但現在再翻閱這一頁歷史，還是如在目前。溫故知新，再談談這次戰爭，也是好的。

首先，說到甲午之戰的爆發。這個戰爭的爆發，是以朝鮮「東學黨」的暴動爲導火線，但「東學黨」的暴動之所以成爲中日戰爭的導火線，則是由於日本已經在朝鮮埋藏了戰爭的火藥。同時，也是因爲有一個腐敗的中國，望着日本侵略自己的藩屬而視若無覩。

早在東學黨的暴動之前二十年，（一八七五年）日本的兵艦，就已經駛入朝鮮的釜山，日本的大砲，就已經轟擊朝鮮的江華島，脅迫中國允許日本和朝鮮通商。當時中國的政權，掌握在以慈禧爲首的保守派手裏，這一羣保守派，昏庸、懦怯，腐敗透頂，爲了拒絕日本的要求，竟向日本宣稱：「朝鮮雖屬我藩屬，而內政外交，聽其自主，我朝向不與聞。」這就無異向日本聲明，朝鮮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因此，日本便根據這個宣言，壓迫朝鮮和他訂立了日韓商約。這個商約中的第一條，就是承認朝鮮爲獨立自主的國家。這樣就取消了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同時日本並脅迫朝鮮政府與日本互派使臣，建立直接的外交關係，又迫其開放元山仁川爲商埠，允許日艦隨時測量朝鮮的海岸。這樣就奠定了日本進出朝鮮的基礎。

一八八二年，朝鮮爆發了以李昰應爲首的保守派的政變。李昰應是當時朝鮮國王李熙之父，當李熙幼時，李昰應

主持國政，號大院君。後來李熙年長，其妃閔氏專政，李昰應遂不得與聞國事。李昰應旣蓄怨於閔氏，又痛恨政府對日本的屈服，遂利用兵變，刧殺執政，幽閉國王，焚燒日本使館，誅殺日本派往朝鮮的軍事教官。這次政變，顯然是對日本侵略者的一個武裝囘答。政變發生之後，淸政府派兵至朝鮮靖亂，日本的軍隊也藉口開進了朝鮮。但是結果中國所得到的，是一個俘虜大院君，而日本所得到的，却是駐兵朝鮮首都的特權。這樣，日本軍隊的刺刀，便漸漸靠近朝鮮政府的大門了。

一八八四年，朝鮮又爆發了所謂「維新黨」的叛亂，實則所謂「維新黨」不過是一些親日份子，而其叛亂，則爲日本侵略者所導演。當時朝鮮的親日份子金玉均、洪英植、朴詠孝、徐光範、徐載弼等，與日本的朝鮮駐軍勾結，在首都發難，打進王宮，刼持國王，殺戮大臣，放逐反日份子，並且自署官銜，組織政府，企圖一舉而使朝鮮脫離中國的關係。這個陰謀，雖然被中國的武裝擊破了，但是日本却藉此而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他要求中日兩國駐朝鮮之兵，同時撤退，而且以後兩國如派兵至朝鮮，須事前互相通知。這樣日本對朝鮮便儼然以主人自命了。

日本資本主義的侵略，就這樣一步一步向朝鮮發展。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正忙着剿捻平囘以及鎭壓哥老會的暴動，以全力對付國內的人民。同時，他們又仗着祖宗的遺產甚多，可以讓他們揮霍，人民的脂膏未盡，可以供他們搜刮，所以對於日本之侵略朝鮮，並不十分關心。因而日本遂得得寸進尺，以至喧賓奪主。卽至東學黨的事變發生，中日戰爭，遂不能避免。所以我說，中日甲午之戰，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因爲有一個腐敗落後的中國。

「維新黨」的叛亂之後十年，朝鮮爆發了「東學黨」的事變。「東學黨」的組織，由來已久，據說在同治年間，就有這種組織，其創始人名崔福成，其黨義，係剌取儒家佛老各種學說。這種組織，是朝鮮人民反政府的組織，他的產生，是朝鮮暴政的反映，至其發展為叛亂，則是資本主義侵略的刺激。關於這次叛亂觸發的動因，據說是「東學黨」人為了他們一個在同治四年被冤殺的同志舉行訟冤的請願，在請願時，他們的領袖數人，又被政府屠殺，於是他們就號召人民，在全羅道的古阜縣暴動起來。

對付這個暴動，朝鮮政府，立即發動大軍，前往進剿，但是剿滅人民的大軍，却反而被人民剿滅了。白山一戰，朝鮮的官軍，幾乎全軍覆沒。因此暴動不久便由全羅擴大到忠淸兩道，大有直搗首都之勢。朝鮮的統治者在暴動之前駭昏了，於是羽檄飛馳，求援於中國。中國的統治者，對於日本之侵略朝鮮，可以不管，但對於鎮壓朝鮮人民的暴動，是非常熱心的。當朝鮮告急文書到達中國時，慈禧的助手——李鴻章，立即派遣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東渡，參加朝鮮政府屠殺人民的戰爭。但當淸庭軍隊開抵牙山之時，「東學黨」的暴動，已告平息。

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一面要在朝鮮人民面前，耀武揚威；一面又畏日如虎，不敢忘記在出兵朝鮮之前，通知日本。所以當中國軍隊到達牙山之時，日本軍隊也就在大鳥圭介的統率之下，開進了朝鮮的首都漢城。

「東學黨」的暴動，已經平息，中國通知日本同時撤兵，但日本却藉口要改革朝鮮的內政，堅持不肯撤兵。這樣中日兩軍，在朝鮮便展開了敵對的形勢。當時日本政府已經準備與中國一戰，掃除中國在朝鮮的勢力。當時中國駐朝鮮的總辦袁世凱，已看出日本有戰爭的準備，屢次電請李鴻章速發艦隊至仁川，並增派陸軍駐守馬坡，以戒備非常的事

變。但是當時中國妥協派的巨頭李鴻章不但不增兵備戰，而且還要撤退牙山的駐軍，以緩和日本的敵氣，如果不是光緒皇帝的反對，日本簡直可以不戰而得朝鮮。

當中國的妥協派還以爲和平尙未絕望時，而日軍已在朝鮮開始戰爭的行動。他們一面遍布水雷於漢江之口，以堵塞中國海軍的進路；一面竟闖進朝鮮王宮，逮捕朝鮮國王及反日份子，組織以大院君爲領袖的傀儡政府。這樣的消息，傳到中國，朝野上下，無不憤慨，彈劾李鴻章的奏摺雪片飛來。當時，以光緒與翁同龢爲首的主戰派，也極力主張與日本一戰。李鴻章在擧國上下的督責之下，才勉強備戰。

依照當時的緊急形勢，中國的當局，應該立即派遣北洋艦隊，以最快的速度，運兵朝鮮，以援牙山之孤軍。但是李鴻章總以爲和平尙未絕望，恐因此而爆發戰爭，因而他所派遣的軍隊如衛汝貴、豐伸阿、馬玉琨、左寶貴等各軍，皆命其由遼東陸路，迂迴前進。同時爲了虛應故事，才以英船高陞和操江運艦速送少數陸軍和軍械由渤海東航，以援牙山之軍。但是這兩隻船行至中途，便遇着日艦的襲擊，操江降敵，高陞沉沒。同時，駐漢城的日軍也開始向牙山的中國駐軍進攻。直至此時，妥協派的首領慈禧太后，還沒有與日本作戰的意思，只說：「不受辱」，但是朝野上下，都在一致呼籲戰爭，這樣才於七月初一日發布了對日宣戰的上諭。

由此看來，中日甲午之戰，乃是當時統治者中的妥協派最不願意的一個戰爭，也是全國人民逼出來的一個戰爭。即因中國妥協派對戰爭的猶豫，所以提供日本以準備戰爭之充分時間，並爭取到戰略的主動。甚矣！「誤國之罪，同於賣國」，豈不然耶？

二　戰爭的進行及其失敗

在宣戰以前，日軍就向牙山的中國駐軍進攻。沒有對壘的戰爭，僅僅在成歡有幾次前哨的接觸，中國的駐軍，就在牙山守將葉志超、聶士成的指揮之下，棄城而逃。葉志超一面潰退，一面向政府謊報「成歡的大捷，」於是葉志超以敗軍之將，而拜受總統諸軍之榮命。

葉志超自牙山北奔平壤。時中國大軍皆聚平壤，牙山的殘軍，遂得與大軍會合。平壤爲朝鮮舊京，負山阻河，形勢險要；而當地人民，又素親中國，當中國軍隊開抵平壤之時，當地人民爭奉牛酒，熱烈歡迎，正如古書所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是中國軍隊在平壤，既據地利，又得人和，戰爭的條件非常優越。

同時，中國政府亦知平壤的得失，關係中日戰爭的勝敗，已派遣後續部隊，增援平壤。時四川提督宋慶，以毅軍發旅順，提督劉盛休，以銘軍發大連，將軍依克唐阿，以鎮邊等軍發黑龍江，皆奉命會師於九連城。是平壤之軍，又有大批援軍以爲後盾。

平壤之戰，中國方面若能指揮得宜，或攻或守，皆可立於不敗之地。但是統帥葉志超，懦庸無能，不能督率諸將，部署軍隊。諸將則環砲自守，每天置酒高會。而士兵，特別是衞汝貴的盛軍，則到處搶刼財物，奴役壯丁，姦淫婦女。因而地利無用，人和盡失，戰爭的優勢，已完全失去。

戰爭在平壤展開。九月十五日，日本第一軍在其大將山縣有朋的指揮之下，開始了對平壤的總攻，一戰而攻佔北門要塞，再戰而平壤遂樹降旗。即於當日之夜，統帥葉志超竟率諸軍棄城而逃，日軍跟踪追擊，中國的敗軍，潰於山隘，回旋不得出，自相踐踏，日軍乘勢猛擊，中國的敗軍人仰馬翻，死者兩千餘人，被俘者數百，軍儲器械，公文密碼，皆委之日軍。葉志超率殘軍萬餘人，狼狽北退，過安州定州，皆棄而不守，狂奔五百里，渡過鴨綠江，才敢駐營。投降潰退，這就是所謂平壤之戰。自平壤失守，中國的軍隊，遂不復再出現於朝鮮境內了。

平壤失守的後兩天，海上也發生了戰爭。說到海上的戰爭，那就更無光彩。本來當這次變亂發生之初，李鴻章就應該下令出動北洋艦隊，控制朝鮮海面，以保持海上的交通。但他却要保存海軍實力，僅派濟遠兵艦一艘，率揚威平遠，往護朝鮮。及日軍大集，濟遠管帶方柏謙，竟以濟遠逃歸。不但如此，當時李鴻章還在幻想和平，遂盡召諸艦囘國。等到日軍俘虜朝鮮國王，又才再命濟遠、威遠、廣乙，先後駛至牙山。而當時朝鮮海面已被日艦控制了，所以中國兵艦，行至中途，即遇日艦襲擊，廣乙受傷而逃，濟遠繼之，日艦吉野速浪追濟遠，方柏謙豎白旗，再樹日本旗，日艦仍追不已，有水兵發砲中日艦，方柏謙得生還，遂告大捷，以後海軍即逃匿不出。

即至牙山失守，中國大軍集平壤，中日大戰，迫在眉睫，這時李鴻章才派海軍提督丁汝昌率艦隊前往應援。其時日本海軍，已經雄據朝鮮海面，所以當中國艦隊行至鴨綠江口大東溝附近海面時，便遇着日艦的攻擊，因而發生戰爭。

這一次中國方面參戰的兵艦，計有鐵甲艦二、快船十、共三萬五千餘噸，此外並有水雷艇四艘。日本方面參戰的兵艦，有十二艘，約四萬噸，此外有改裝之商船西京丸一艘。從量的方面說，雙方勢均力敵。又中國的鐵甲艦大於日本，中

國各艦之砲，亦重於日本，惟日艦的速率，大於中國，艦上之砲，亦較中國為輕便。故從質的方面看，雙方亦互有優劣。最與質均相伯仲，因而勝敗之數，只有決定於戰鬥技術。換言之，若中國海軍統帥指揮得宜，則這一次的海上戰爭實無敗於日本的理由。

可惜中國的海軍提督丁汝昌，原係陸軍將領，不知海戰為何事。丁係淮人，而海軍官兵，則十之九皆係閩人，以是威令不行。說到海軍官佐，左右翼總兵以下，在平時都帶着家眷住在陸上。至於海軍士兵，亦多離船陸居，視兵艦為衙門，只有照例點卯領餉，才回到兵艦。每當北洋封凍，海軍照例南巡，官兵淫賭於上海香港，留連忘返。以這樣的海軍官兵和日本的海軍作戰，勝敗之數，已可預見。

戰爭終於被迫展開了，中國的艦隊，列陣作人字形，張兩翼以待敵艦。日艦初作一字形，以後相機變化，爭取有利的形勢，而中國艦隊則以不變應日本之萬變，最初是人字形，以後也是人字形，最後還是人字陣。

在戰鬥中，惟定遠（中國的旗艦）鎮遠超勇最奮戰，而超勇被日艦擊沉，致遠彈盡。當此之時，其他各艦，多作壁上觀。定遠管帶劉步蟾竟至震悚失次，幸有洋員漢納根代為指揮，才沒有被俘。方謙伯首先率濟遠逃，轉舵時誤撞自己的揚威艦，日艦乘機擊沉揚威。致遠亦中水雷而沉。自是諸艦紛紛逃竄，人字陣也亂了。

戰爭歷四小時，中國艦隊大敗，一共喪失五隻兵艦，其一（經遠）被俘，其四（致遠、超勇、揚威、廣丙）擊沉，剩下來的，只有七隻兵艦（定遠、鎮遠、來遠、靖遠、濟遠、平遠、廣甲）已經不能成軍了。從此以後，中國的兵艦，遂深藏於旅順，不復再見於朝鮮海上了。

陸軍既大敗於平壤，海軍又繼敗於大東溝，中國的失敗，於此實已決定。王炳耀甲午中日戰輯慨乎其言之曰：

「奈何兵衅既開，邊烽迭起，牙山則先遁，高陞則被燬，操江則就擒，猶可曰，勝敗兵家常事耳。更奈何統帶戰艦，不能得力者厥有海軍提督丁汝昌臨敵退縮，致潰全軍；尅扣軍餉，縱兵搶掠者，厥有統帶盛軍之寧夏衛汝貴。於是海戰則喪師失律於大東溝，陸戰則又避敵偷生於平壤，此猶得諉為無罪乎！」

自平壤失守，而日軍的前鋒，遂進至鴨綠江南岸，中國的大軍則蝟集九連城。為了督勵將帥，振奮士氣，以圖扭轉戰爭的頹勢，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下令撤葉志超衛汝貴逮問，另派宋慶總統諸軍。

宋慶雖忠勇敢戰，但胸無韜略，亦非統帥之才。且資歷甚淺，與諸行輩相若，驟稟節度，諸將多不服約束。故當時九連城諸將雖有七十餘營，而無法調度。

以當時情勢而論，應以重兵扼守鴨綠江沿岸，阻止敵人渡江。但宋慶却僅以少數哨兵遊弋於江岸，而大兵皆集九連城。一切攻守計劃皆無佈置，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敵人進攻。

十月二十五日，日軍一切進攻準備皆已完成，遂以砲隊掩護強渡鴨綠江。宋慶棄九連城，北趨鳳凰城。又以鳳凰城不可守，再退摩天嶺，以守遼陽州，日軍遂佔鳳凰城。

同時，日軍的另一支隊已由義州渡江，向西北進擊，連陷安東、岫巖、析木城，最後進陷海城，截斷了摩天嶺與後方的交通。

繼第一軍之後，日第二軍又在其大將大山巖的統率之下向中國出發。當時中國的海軍，已逃匿無蹤，故日第二軍

得以安全到達中國海岸。

十月二十四日，這一支日軍，在花園港貔子窩登陸，運輸馬礮十二日，而中國海陸軍，似乎都不知道。因而他們得以從容展開其對大連旅順的攻勢。

當時中國駐守大連和旅順的軍隊已由守將宋慶、劉盛休率領增援九連城，鎮防旅順的是提督姜桂題、程允和所募的新兵，鎮防大連的，是總兵徐邦道，銘軍分統趙懷益所募的新兵。當日軍向金州進發之時，徐邦道力言金州失，則大連旅順不守，請諸將分兵迎擊，但當時旅大諸將，各不相屬，都不肯發兵守金州。

十一月六日，日軍攻金州，徐邦道自率所部迎擊，趙懷益的部下，有請援金州者，趙說：「吾奉命守旅順礮台，不聞赴後路備敵也。」徐邦道兵力單薄，金州將不守，電趙懷益告急，而趙正督率部屬運輜重，作渡海逃亡的準備工作，並不派兵，金州遂失。

七日，日軍三路南搗大連，趙懷益捲款逃旅順，而大連的大礮一百二十尊，彈藥槍械，全數送給敵人了。日軍在大連休戰十日，至二十二日。日軍海陸並進，夾攻旅順。

當日軍進攻旅順之前，旅順諸將，已將糧餉運送煙台，作逃亡之計。營務處的道員龔照璵，聽到金州失陷，陸路斷絕，就由旅順南渡煙台，一口氣跑到天津去了。自從這位道員逃走以後，旅順人心惶惶，船塢工人的工錢，也無着落，遂羣起掠奪庫款，各自散去了。

旅順的六個統領，原不相轄，至是，共推姜桂題為主，而姜愚闇，惶惶然不知所措。只有徐邦道是一員勇將，他以少數

之兵，迎擊敵人於土城子，給敵人的前哨以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日軍大隊繼至，徐邦道孤軍無援，也敗退下來了。

日軍益迫近，趙懷益等遂率部搶掠奪民船飽載而逃。敵軍未至，而旅順已成廢墟。

以後徐邦道孤軍再戰，士兵幾乎死傷殆盡，而日艦又已縱橫海面，陸軍則分據礮台，旅順已無可挽救，乃與姜桂題、程允和、張光前雜亂軍中逃去，旅順遂陷。

王炳耀甲午中日戰輯有言曰：

「牙山不守，平壤又失，安州城尚有遠戍之師，鴨綠江遽返清流之櫂，是華軍之救韓者，虛有其名。韓王之累華者，竟釀成實有其事也。九連鳳凰諸城，相繼淪陷，揚威超勇諸艦，一戰沉沒，於是日本之陸軍，鷹瞵於發祥之地，日本之水卒，鯨戲於渤海之濤，是朝鮮之亂不暇謀，中國之亂大可懼也。守旅順口者，文則如龔革道（照璵）武則如衞革提（汝成、）黃革提（仕林、）姜革鎮（桂題、）程革鎮（允和）等，以監司提鎮之尊，當金城湯池之固，又有天險之足恃，地利之足憑，乃鏖戰不過數點鐘，斃命不過數百輩，忽焉而土崩瓦解，鼠竄狼奔。嗚乎噫嘻！中國之亂，匪朝鮮累之也，亦匪日本擾之也，直貪生畏死，天良喪盡之徒始之也。」

戰爭節節失敗，局勢日益嚴重，政府以淮軍不可依靠，改用湘軍，起用故湘軍舊將魏光燾、陳湜、李光久等，令皆募兵北上。召兩江總督劉坤一授欽差大臣，督辦征東事務，以湖南巡撫吳大澂及宋慶副之。這時的李鴻章已經拔去了三眼花翎，褫去了黃馬褂，並且受了革職留任的處分，但仍然掌握海陸軍事的實權。

不久湘軍將領，率軍出關，但是魏光燾敗於牛莊，李光久棄軍而逃，吳大澂棄田台莊夜奔入關，湘軍又潰。日軍乘勝

追逐，進陷營口，自是遼河以東，遂非復中國所有。

淮軍湘軍，相繼敗潰於遼東，中國的陸軍已零落不堪，但中國殘餘的艦隊，尙逃匿於威海衞。爲了澈底地殲滅中國的艦隊，日軍又發動了對威海衞的進攻。

日軍之襲威海衞，係用聲東擊西的戰略，明攻登州，暗襲榮城。當中國軍隊往救登州之時，而日軍二萬人已自榮城登陸，由榮城西擊，以拊威海衞之背。

日軍於一月十日（一八九五年）登陸，三十日攻陷威海衞的砲台。同時日艦二十五艘，包圍威海衞的海口，於是海陸兩軍，夾攻停泊於劉公島的中國兵艦。不久，定遠來遠兩艦中魚雷沉沒，靖遠爲砲擊沉，魚雷艇十二艘，亦爲日艦俘虜，餘艦已不能動彈。於是水兵登陸，鳴槍過市，挾丁汝昌投降。

當威海衞失守以後，丁汝昌從德員瑞乃爾之言，命諸將沉船，徒手投降，諸將不從。又命諸艦突圍而出，亦不從。汝昌乃入艙仰藥自殺，諸艦遂降日。自是以後，中國遂無海軍。（參看羅惇曧威海衞熸師記）

王炳耀劉公島降敵雜記云：

「據字林西報言，威海衞之降日者，一曰定遠……二曰鎭遠……三曰平遠鐵艦，四曰濟遠鋼帶艦，皆尙完善。五曰靖遠鋼帶艦，六曰來遠艦，皆被擊沉沒。七曰威遠木質船，八曰廣丙木質水雷船，九曰康濟木質水雷棧房船，十曰湄雲木質小兵船。又有蚊子船四號，曰鎭北、鎭邊、鎭西、鎭中，又有水雷船五號，砲船三號，皆未傷，另有寶發一船，亦已沉沒。統計劉公島灣內，或傷或沈之船共大小三十艘，悉爲日本所有，惟逃出之水雷艇十三號，孑然海上（作者按後亦

爲日本所虜。）嗚呼噫嘻，天歟人歟！又查鴨綠江之戰，超勇、揚威、致遠、廣乙，先已或沉或燬。牙山之戰，廣甲擱淺焚燬，操江小艦被虜。旅順之役被虜者輪船三，夾板船二。大連之役被虜輪船一，小砲船二曰運春，曰漢江。蓋前後所喪失者不下五十餘艘矣。靜言思之，可勝浩嘆！」

戰爭發展至此，中日兩國已開始停戰議和的談判。但在和議的進行時，日本的艦隊又攻佔澎湖羣島，進窺台灣，不過澎湖之役，已是戰爭的尾聲了。

總結這次戰爭，中國方面人的傷亡，並不很多，即因人的傷亡不多，物質之委而資敵者，其數量就甚爲浩大。關於甲午戰爭中中國方面之人的傷亡和資敵的物資，當時日本某報曾有如次的統計：

「牙山之戰，死約二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三十五，傷六十。）平壤各戰，死約二千餘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一百八十二，傷五百二。）九連城各戰，死約五百人，傷約一千人。（日兵死三十三，傷一百一十。）金州各戰，死約四百人，傷二十人。（日兵死二十，傷五十。）旅順各戰，死一千五百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四十，傷二百七十）豐島之戰，死一千二百人，傷者不知細數。（日兵傷三人。）鴨綠江之戰，死約六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八十，傷一百八十六。）草河口之戰，死二十人，傷約一百人。（日兵死十一，傷四十一。）金家窩子之戰，死約一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五，傷二五人。）海城之戰，死四十人，傷約百人。（日兵死五，傷六。）瓦崗寨之戰，死約百人，傷約五百人。（日兵死十二，傷三百五十七。）都計自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九日日本大島混成團由仁川登陸以迄旅順之戰，其間凡大戰七十次，華軍死者約共六千六百六十八人（日兵死者約共四百十三。）傷者約共九千六百八人（日兵傷者

約共一千七百十二人）此外被俘者尚有一千一百六十四人。」（甲午中日戰輯一四〇—一四一頁）

「自中日開戰，以至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日軍刦得華軍各物，共値日銀七百三十一萬二千圓。內計：

大砲——在牙山刦得八尊，平壤四十八尊，九連城七十八尊，鳳凰城五尊，金州及大連灣一百二十九尊，旅順口三百三十尊，岫巖州五尊，海城四尊，共六百零七尊。

洋槍——在牙山刦得八十三支，平壤一千一百六十五支，大連城四千三百九十五支，金州及大連灣六百二十二支，旅順口一千零八十支，金家窩子五十支，共七千三百九十四支。

砲彈——在平壤刦得八百四十顆，旅順口九萬六千三百七顆，金州及大連灣二百四十六萬八千二百顆，九連城五萬六千三百七十四顆，共二百六十萬一千七百廿一顆。

槍彈——在平壤刦得五十二萬粒，九連城四千三百萬六百六十粒，金州三千三百八十一萬四千粒，旅順口八萬四千一百二十五粒，共七千七百四十五萬八千七百八十五粒。

米穀——在牙山刦得日量二萬谷古（每谷古合華權二百二十五斤）平壤四千六百谷古，九連城四千十五谷古，鳳凰城五千五百三十七谷古，金州及大連灣二千六百谷古，旅順無米，大奇共三萬六千一百五十七谷古。

馬——在平壤刦得二百五十匹，金州八十五匹，旅順三十三匹，共三百六十八匹。

金銀銅錢——在平壤刦得金二十五貫目三百五十刃（一貫目合華權一百兩，一刃卽一錢）銀一百十三貫目九百十刃，零物四貫目六百刃，高麗錢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千文，日本錢鈔五千九百九十五圓，九連城鳳凰城，制錢二萬一千

九十千文，金州及大連灣，銀錢六十圓，共合日本銀錢約一百萬元。

行帳——在平壤刼得一千八百頂，九連城四百一頂，旅順口一百二十一頂，共二千三百二十二頂。

旗——在牙山刼得三十三面，平壤三百面，金州及半島一百四十四面，共四百七十七面。

船——在花園口刼得民船十五艘，大連灣刼得三十噸小輪一艘，旅順口刼得小火輪一艘帆船二艘，雲程、海鏡兵船二艘，在豐島刼得操江兵艦一艘。

此外尙有鼓、劍、刀、槍、號筒、車輛、工作具、鋸、鍋、地雷、水雷、火藥、傘、快靴、衣服、電線等不計其數」（同上書一三八——一四〇頁）

以上數字，威海衛及澎湖兩役的人物傷亡，尙不在內，威海衛一役。中國海軍投降，軍艦擄數被俘，已於前述，至士兵傷亡，則不知其數。澎湖之役，死傷人數，亦無數字可查，惟物質之被刼者，則日報曾載有一個統計。東報云：「澎湖之役，日本虜獲車砲山砲共二十尊，來復槍一千九百四十六枝，藥彈一千九百八十二匣，格林砲彈六萬八千九百枚，鉛彈六十二萬二千八百枚，火藥三千九百七十包，米九百一十袋，刀槍等一百三十枝，鼓十九面，帳篷五十座，鐵銑一百八十隻，鋤八十個，其餘小件甚多」（同上書二三二——二三三頁。）

以上所記不過是戰爭中的直接損失之有數可稽者，此外因戰爭而被敵人屠殺之人民，以旅順一地而論，即有二千餘人。因戰爭而間接遭受之物質損失如商務之所阻滯，農事之荒廢，則更不可以數計了。所以中日戰輯的作者王炳耀氏爲之慨曰：

「噫！中國竭數十年之精力，萃二十一省之菁華，始得壯其軍容，備玆利器，乃一旦鄰邦釁啓，竟至不能抵禦，悉數委之敵人。藉寇兵而齎盜糧，能不痛恨於敗兵之懦將哉！」（同上書一四〇頁）

中日甲午之戰終於以對日投降結束了。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鴻章在日本廣島簽訂了馬關條約。馬關條約中最喪權辱國的有五款：一、中國承認朝鮮爲完全獨立自主國。二、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羣島。三、賠款二萬萬元。四、開放蘇州、杭州、沙市、重慶爲商埠。五、允許日軍駐紮威海衞。後來雖由俄德法三國之共同干涉：日本放棄了遼東半島，但台灣、澎湖羣島，從此就劃入日本的領土了。

三　失敗的原因

甲午之戰，中國一開始就是失敗，以後也是失敗，最後，還是失敗，這是什麽原因呢？非常明白，最主最的原因就是因爲中國落後腐敗。

我們知道，在甲午戰爭以前的世界，早已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民主主義的政治，自由主義的文化，是當時世界史的主流。在這個歷史主流之前，不動的推起走落後的被淸算，反動的被掃蕩，這是歷史的命定。在世界史的主流之前只有順應潮流，才有出路，誰要企圖玩弄倒轉歷史的遊戲，誰就滅亡。具體地說，不自動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就要淪爲殖民地。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後，地主資產階級卽聯合一致，實行自上而下的產業革命，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追上了世界的潮流，到甲午戰爭時，日本的維新已經二十餘年了，這時日本精力飽滿，正是資本主義的青春時代。

中國雖然早在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先後受到殘酷的歷史教訓，但這些教訓對於當時中國麻木不仁的統治階級，並沒有發生教育作用。從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其間將近半個世紀，他們都把時間和國力浪費在剿滅中國人民的戰爭之中，所以一直到甲午之戰的時候，他們還是落後腐敗，不異過去。

當着整個世界走向資本主義的時候，而當時中國的統治者，還在夢想在這資本主義的世界中，劃出一塊特殊的地盤，來保持他們最喜愛的封建專制主義。在這裏，讓他們繼續進行手工業的生產，獨裁的政治，中世紀的文化。一言以蔽之，讓他們利用社會的落後，人民的無知，來關着大門做皇帝。但是他們不知道，這就是上帝的兒子，也是做不到的。因為世界史發展的規律，不是全體遷就局部，而是局部服從全體。不是倒退，而是前進。

甲午之戰，從表面上看，是中日戰爭；但從本質上看，則是日本資本主義對中國殘餘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清算。而這就是中國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是中國統治者內部對和戰的主張不一致。當時以光緒、翁同龢等為首的維新派，極力主張對日抗戰，以慈禧、李鴻章等為首的保守派，則始終主張妥協，而當時掌握國家大政，海陸軍權的，則是主張妥協的保守派。

保守派自始就想迴避這個戰爭，用妥協方法，解決朝鮮問題。當日本陸軍已經開進朝鮮首都時，而李鴻章還主張撤兵回國，避免衝突。後來光緒下了兩道嚴厲的上諭，不許撤兵，並且進一步要李鴻章備戰，才沒有撤回牙山的駐軍。

光緒的上諭之一云「彼頓兵不動，我先撤退，既先示弱，且將來進剿，枉勞往返，殊屬非計。現在和商之議，迄無成就，恐大擧致討，即在指顧。」

其二有云「懔遵前旨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迅速覆奏。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至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李鴻章接到光緒的上諭之後，因有慈禧的靠山，並不把他當回事，仍然電告總督與日使小村協商中國撤兵之事。

直至日軍已開始進攻牙山的中國駐軍之時，而慈禧仍不欲宣戰，儘曰「不受辱。」後來因爲羣情憤激，宣戰之議，才被迫決定。即因保守派對戰爭之猶豫搖擺，所以日本便爭取了戰爭的主動。

宣戰以後，保守派雖然稍微斂跡，但是戰爭的最高指揮者還是妥協派的領袖李鴻章。以妥協派的領袖而主持戰爭，當然對戰爭不會有誠意。所以當戰爭發生以後，既不以陸軍增援牙山，又不令海軍捍衛朝鮮海面，因而使牙山不守，平壤繼敗。這即使不是有意進行失敗主義，也是對戰爭的不積極。

妥協派當然不會忘記投降。所以每當戰爭一有失利，和平運動便勃然高漲。早在平壤之敗，李鴻章便企圖中止戰爭，與日本談判和議，但以當時民氣方張，不克如願，即至旅順失守，首都震撼，於是和議運動，遂一發而不可中止。

當敵人在旅順屠殺中國人民之時，中國的投降使節，却在上海待船出發。當敵人砲轟威海衛之時，而李鴻章却在馬關與伊藤博文握手言歡。

一個人是戰爭的最高指揮者，同時又是投降的全權代表，這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一面要前線的將士去抗戰，一面又公然去投降，這個戰爭怎樣不失敗？妥協與戰爭的平行發展，是這次戰爭失敗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是沒有動員全國的人力與物力，使這個戰爭變成全面的戰爭，人民的戰爭。

以常理而論，當戰爭發生之初，政府就應號召全國的人民，武裝全國的人民，使他們爲着保衛祖國而鬥爭。但是我們從宣戰的上諭中，早看到「在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員，整飭戎行」的命令，沒有看到一個號召人民的字。所以儘管遼東戰事嚴重，儘管首都吃緊，而「其他各省，農守於野，商藏於市，工居於肆，甚至官吏偃息於牀頭，師旅逍遙於河上，晏然不知有兵革禍也。」（中日甲午戰輯）

卽因沒有整個的動員計劃，所以募兵，則到處綑綁，籌餉，則臨時攤派。以募兵而論，淮軍已潰，然後才募湘軍；湘軍再潰，遂曰無兵。而且當時淮湘兩軍雖潰，尚可收聚，如果日人之統計大致不錯，則截至旅順淪陷。中國軍隊死者不過六千餘人，傷者不及一萬，是關外之兵，並未消滅。卽使掃數消滅，中國豈遂無人乎？

以籌款而論，庫款將盡，然後才商借洋債，洋債年息太高，遂曰無餉。實則當時地方稅尚未移作軍費，洋債亦非不可舉借，卽使盡所有的稅收而亦不足以應國家之急，乃至洋債亦不能借到，而當時皇家貴族達官地主豪商，尚未爲國家拔一毛，中國豈遂無餉乎？

以戰爭形勢而論，九連鳳凰兩城雖失而遼瀋猶在；旅順大連兩港雖失，而威海猶在；牛莊營口兩地雖失，而榆關猶在；然而戰爭至此，遂曰無險可據。實則卽使榆關不守，遼瀋全陷，威海亦失，山東沉淪，乃至日軍入關，首都失守，中國豈竟無險可據乎？

有廣大之人力而不知動員，有豐富之物力而不知徵發，有遼闊無比之領土而不知利用，而竟以淮湘兩軍之潰，洋債

利息之高，旅順大連之失，遂曰中國無兵無餉無險可以持續戰爭，遂自認中國已被敵人按倒在地，中止戰爭，決心投降，中國豈眞被敵人按倒在地乎？曰，未也，被敵人按倒在地的，不是中國的人民，而是毫無廉恥的妥協派的政府。

當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泰晤士報曾有一評論曰：

「中國如海蜇然，任人擇肥而割，他省仍膜不相關。假如歐洲亦有如旅順口者，猝爲敵兵所奪，則全國丁男子女，無不引爲已憂。反是以觀，華人誠蠢拙之至矣。」

泰晤士報的評論，可以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當旅順失守以後，中國的人民，何嘗不思奮起，殺敵報國，但當時中國的人民，已被妥協派的政府按倒在地，不能動彈。妥協派的政府害怕人民，比害怕敵人還要厲害。他們以爲如果把武器交給人民以後，比交給敵人更爲危險，敵人所要求者，土地與金錢，他們多的是祖宗的遺產，有的是人民的膏血；反之人民一旦拿起武器，則有革命的可能，革命一起，他們根本要滾下寶座，所以自始至終不肯動員人民。若人民自動抗戰，那便是土匪，格殺勿論。因此當時中國的人民，只有望着無能的統治者天天打敗仗，好在「日蹙國百里」古亦有之，古亦有之者，即不妨今亦有之。

雖然如此，中國的人民，自始就反對投降，以後也是反對投降，最後還是反對投降。當中國投降使臣出發之時，上海人民反對投降的標語，貼滿街巷。當投降使臣既發之後，全國的輿論，一致抨擊議和的失策。當賣國的馬關條約簽定以後，在北京皇宮之前，出現了以康有爲爲首的幾千人的反投降的大請願。而且台灣的人民，竟至宣佈獨立，拿起武器與敵人戰鬥，直至彈盡而後已，這都是事實。所以李鴻章當與伊藤博文痛飲櫻花之酒時，不覺說出了這句眞話，他說：

「和局既成之後，中國必須辦理善後事宜，在在需款，即如遣散兵勇，皆成游手，搶刼生事，國家自必設法彈壓。且百姓不以國家之屈志求和爲然，亦必憤而思亂，國家辦事，必更棘手。不但新添之稅難收，且恐原有之稅旋失。」

從這裏，可知當時妥協派一面投降，一面並未忘記鎮壓因投降而引起的人民之反抗。所以我說不是中國人民不抗戰，而是政府不准他們抗戰。不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把戰爭堅持到底，這是失敗的第三個原因。

第四、是軍隊的腐敗。這種腐敗，首先表現於自上而下的貪污。如以海軍經費移作頤和園的建築，致使艦隊的設備不全，乃至以石子代替彈藥。皇家如此，等而下之，則無不貪污。當時太晤士報評曰：

「中國當承平之際，人不論文武，官不論大小，半皆狗私而忘公。旅順威海既設砲台，其安置於台上之砲，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經購之人，尙儼然顯宦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爲利。假如一砲也，報銷千金，經手者侵蝕二三百金，售主則僅以值五六百金之砲應命，皆不問其可用否也。」（甲午戰輯一三四頁）

又王炳耀朝鮮紀亂四亦云：

「平壤華軍所執之洋槍，係專於牟利，不顧喪師辱國之監司大員所轉購，藥不配彈，子不對槍。」

以上不過舉例而已，由此已可推想一切。此外，扣餉吃缺，以軍餉而飽私囊者又爲普遍之情形。如「衞汝貴西報謂其私運餉銀八百兩回籍，以致軍心潰散，臨陣先降」（同上書七八頁。）「台莊營參將陳佑和，缺短防兵額數，尅扣口糧」（同上書一四五頁。）這也不過是一二例子。軍械不可用，軍隊吃不飽，而將官則腰纏累累，怎樣不打敗仗？

至於士兵，除淮軍外，皆係新募之兵，「急於成軍，不暇選擇，乞丐無賴，混雜其中」（同上書二八七頁。）既無軍事

訓練，更無政治教育。「湘楚各軍，尚有以大旗刀矛為戰具者，並有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法者」（同上書二八六頁。）至於為甚麼打仗，為誰打仗，兵士更不知道。而海軍又經常陸居，只知嫖賭，亦無訓練。像這樣的軍隊，以之應敵，又怎樣不打敗仗？

當時的軍官，事先一無培植，一聞招募，各營皆以鑽謀為能事，不以韜略為實政，是兵官先不知戰，安望教兵以戰？」（同上書二八六頁）而且「若補署一缺，委留一差，先自較量肥瘠，絕不計利國利民之事。」（同上書一三四頁）所以當時的將官皆為升官發財而來，並非為赴敵死國而起。因而大抵皆臨陣脫逃，捲款私遁。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云：

「衛汝貴治淮軍久，以貪謟至提督，援朝鮮時年六十矣。其妻貽書曰『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頤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為計，勿當前敵。』汝貴守婦誡，亟避敵軍。敗逃後，日人獲其書，後引諸教科書，以戒國人。」

像衛汝貴這樣的將領，當時豈少也哉？不過他們的家信，未為日人所獲而已。像這樣的將領而以之指揮戰事，又怎樣不打敗仗？

又如「海軍提督丁汝昌，本係淮軍陸將，水師學問，毫無根底，平素各兵官本輕視之，一旦臨陣，無論其不知水師之法，即知亦安能號令各船。」（中日戰輯二八八頁）像這樣的海軍司令，又怎樣不全軍覆沒？

同時，軍紀廢弛，軍行所至，到處擾害百姓，以致軍隊與人民，不但不能合作，而且人民視軍隊如寇仇。茲據中日戰輯所錄當時上諭，略示其例：「上諭，直隸山東一帶，師行所至，仍不免擾害地方。民間畏懼兵差，至有拋棄車馬，乘間竄匿情事。」「吳大澂奏湘軍虎字營哨官都司石雲峯，經過靜海地方，強索驛馬，凶毆傷人。」「衛汝貴統帶盛軍，有尅扣軍

餉，縱兵搶掠情事」（二八一二九頁。）

此外，在後方辦理兵役者，亦無不擾害人民。中日戰輯云：「山東平度州知州茅思綬於應付兵差車輛，藉端苛派」（一四四頁。）「廣東候補守備宋鵬飛，經李鴻章派令前往皖江，招勇赴粵，路過江西贛縣，及南康大庾等縣，縱令勇丁，沿途捉船毆人，強搶號馬，種種騷擾，該守備並有揑搶訛索情事。」（一四二頁）像這樣的軍紀，又怎樣不打敗仗？

不但將不知兵，兵不知戰，而且指揮又不統一，因而海陸兩軍不相配合。以海軍司令而命令不能行於各艦，以陸軍統帥，而指揮不能及於諸軍。一旦臨戰，自然攻守不應，呼應不靈，或陸軍奮戰而海軍不動，或海軍出擊而陸軍不知，或前軍進攻而後軍逃遁，或後軍扼守而前軍潰退，甚至自相攻戰，不辨敵我。像這樣指揮不統一的軍隊，又怎樣不打敗仗？

即因以上種種的原因，所以「每遇戰事，官先逃，兵亦散，一若日人有三頭六臂者也。」（中日戰輯一九五頁。）陸軍如此，海軍亦然。當時中國的兵艦，甚至「有遙見本國軍艦之煙，即已倉皇逃遁者。」（同上一三七。）這誠如當時西報所云「中國至今日孱弱已極，其砲如木彫成，其人如紙糊老虎。」其所以如此，都是軍隊腐敗所致。

當戰爭失敗以後，泰晤士報有一評論曰：

「吾輩向所望於中國者，至此皆爽然若失。嗚呼，惜哉！其水陸各兵，皆不知戰陣爲何事。誠使早延西人爲之訓練，餉銀則毫不尅扣，兵器則悉屬精良，吾知必有能專心力戰者。今乃有兵之名，而無兵之實，問以行陣之分合，而未練者不知也，問以槍砲之利鈍，而幾成徒手也，即有，亦不能用也。問以糧餉之多少，而幾盡枵腹也，即發亦必扣成也。職此之故，彼當兵者，無不心灰意懶，但冀有可搶劫財物之處，則惟肆其搶刼而已。爲之將者，驅使赴敵，幾如逼之至行

刑之地，其誰肯用命乎！有不知而竟去者，然亦不過殺之云爾，於戰事豈有助乎？至於戰敗之後，或竟被殺於敵，或則四散逃生，無人照管，遂如流離載道之乞丐，其悍者遂相率而爲盜，民間亦幾不聊生，豈不大可哀乎！」（中日戰輯一三五頁。）

這一段評語，我們今天讀起來，猶覺毛髮悚然。

總之，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不外以上所述各端。以上各端，有其一、已足以失敗而有餘，況兼而有之，又怎樣不敗？當戰爭失敗以後，當時的統治者，明白了一點，即自己的軍隊不行，於是積極購買新式武器，訓練新式陸軍，但是他們不知道新式的武器，如果不配合新的政治和文化，還是不能發揮他的威力，所以不久又有八國聯軍之敗。而且這一羣握有新式武裝的腐敗東西，終於在辛亥革命中被掃除了。

甲午戰爭，以割地賠款結束了，但由此而引致的後果，却是非常嚴重。因爲在這次戰爭中澈底地暴露了中國統治者的無能。固然，鴉片戰爭與中法戰爭，都以中國的失敗而結束，但前者尚可以說中國當時有革命；後者也可以說在戰爭的進行中，互有勝負。而且戰爭對方，都是大國。甲午之戰，中國既無內亂，而竟敗於蕞爾三島之日本，並且自始至終，沒有打過一次勝仗，如果說有，那就是揑造捷報，欺騙人民。

因爲甲午之敗，歐美列强便看穿了當時中國統治階級，原來是一羣毫無能力的頑固東西，於是紛起要求租借土地，承認特權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進而高唱瓜分豆剖之說。而中國之半殖民地位，亦即從此決定了。因爲甲午之敗，英國看到中國的統治者無能，也一變其原來聯華制俄的政策，轉而聯合日本以制俄國。也是因爲甲午之敗，俄國也看到

中國統治者的無能，也積極地侵略遼東，以致引起一九〇四年的日俄之戰，一言以蔽之，甲午之戰，是中國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戰爭，這一戰敗下來，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常德桃源淪陷記

一　常德桃源——從平靜到戰爭

桃源，這個具有神奇傳說的地方，是我的家鄉，在這裏我度過了我的幼年時代。沒有什麽神奇的「桃花源」，也沒有什麽不死的秦人之世外的村落。和其他的地方一樣，同是暴政橫行的地方。

桃源的縣城，是一個很小的城市，沒有城牆，也沒有很大的商店，狹窄的街道，矮小的房屋，還保持着一種中世紀的風味。

常德，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這裏，我度過了我的中學時代。靜靜的沅水，灰色的城牆，古舊的廟宇，舊式門面的商店，各種各式的手工業作坊，用石板鋪成的大街小巷，自有這個城市以來也許沒有什麽改變。如果說，這裏也有些近代的裝璜，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鐘樓，聳立在這個古城的天空。

常德、桃源相距六十里，是湖南西部的門戶。自從十七世紀中葉經過清兵的一度蹂躪以後，三百年來，這裏的居民，

沒有看見過外國的軍隊。

平靜的時代很快的就過去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歷史的颶風，吹到中國，跟着武漢失守，成千成萬的難民，卽湧進這兩座古城。和難民的湧進同時，敵人的轟炸機羣也出現於這兩座古城的天空。從此以後，警報的悲鳴，炸彈的巨響，打破了這裏三百年來的沈寂。

常德、桃源，特別是常德。對於敵人，是一個具有誘惑性的地方。因爲這裏是洞庭湖西岸物資吐納的地方，特別是糧食和棉花。爲了獲得這些東西，敵人曾經在洞庭湖沿岸發動好幾次大規模的掠奪，但每一次的掠奪都沒有深入到常德桃源。

歷史的災難終於降臨了。一九四四年的秋收，召來了日寇大規模的進攻。在敵駐漢口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的指揮之下，大批敵軍，向洞庭湖西推進。據說，這次敵人所用的兵力有八個師團（第三十三、三四、三九、四〇、五八、六八、一〇六）一個獨立旅團（十七），三十六個聯隊，五個獨立大隊，共十餘萬人，此外，還有僞軍四師。但這些敵軍，並不是完全用以攻常德和桃源，而是分散在洞庭湖西廣大的區域中，進行糧食的掠奪。

敵人的攻勢，迅速展開，當時敵軍三路並進，同趨常德。一路以華容爲根據，於十二月二日，開始西進，三日陷南縣，六日陷安鄉，十五日陷漢壽，十八日進迫常德的近郊。另一路，以石首爲根據，連陷公安、澧州、臨澧，直趨常德。又一路由澧州而西，連陷石門、慈利。十一月十九日由漆家河侵入桃源境內的陬市——我的家鄉，二十日晨，那時被稱爲世外的桃源，遂被敵人佔領。敵人佔領桃源以後，又分道東進，轉攻常德。不到半月，湘西九縣十萬方公里的土地，變了顏色。三

百萬以上的居民，淪爲奴虜。

二　巷戰——從十一月十八日到十二月三日

從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戰爭在常德城外展開，當時我方駐守常德的軍隊，是五十七師，只有五千人，而圍攻常德的日軍則有六萬人左右。因爲敵我力量的懸殊，戰爭一步步逼近城市。

十一月二十六日，敵人竄入常德城內，常德變成了血和火的城市。但是戰爭並沒因爲敵人之攻入城市而結束，只是由野戰轉爲巷戰。關於巷戰的情形，中央社常德保衛戰中的英勇事蹟一文中曾有這樣的敍述：

「敵方二十六日開始攻進南城，佔據河街高於城牆之常德商場與瑞記洋行，我軍以竹竿撐手榴彈向之投擲，當將該敵撲滅。

「二十八日以後，敵即由東北兩角攻入，首先以飛機大砲及噴嚏性瓦斯開路，攻之不下，兩次縱火燒房，火勢逼我退入市中心區。

「我軍在中央銀行及慈善堂與縣黨部等據點，各被敵衝鋒達二十餘次。

「守軍因傷亡過重，最後師長當排長校尉雜役當兵用，傷兵則祇有戰死而後已。

「有時雙方在同一建築中，爲爭一個窗口做鎗眼，爭一個洞做出路，常白刃格鬥，一兵打衝鋒，一官守碉堡，更比比

皆是。」

美國記者愛拍斯坦（Epstein）常德之戰一文中也說：

「（在常德城內）每一條街，每一個地點，都有他的故事。關於這些，我由幾個身經百戰的老兵士，和沒有撤退過的老百姓，聽到許多。

「南門城面對着寬廣急流的流水，曾有一星期以上的激戰。而最後，伙夫，担架兵，利用敵人的步鎗，也參與作戰，磚頭、石塊、竹竿，都被中國軍隊採用做武器，以阻止敵人強渡登陸。

「一百個中國士兵，堅守着圍繞城市的五個古式的鐘形碉堡，直至敵人的砲火不見發出爲止。

「城的東門，被敵軍以長距離轟擊的七五糎大砲破開。（敵軍就從這裏進城。）

「靠近西門城的中國砲兵團一位指揮官告訴我說：他們的兄弟當砲彈發完以後，都變成了步兵，同時三次衝擊中，犧牲他們的團副。

「全城的防禦只有五十七師的五千人馬，而抗着來犯的六萬敵人兵力，反使他們蒙受了百分之九十的損失。」

從這些紀錄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保衞常德的戰爭中，五十七師的士兵曾經表現了他們最大的英勇，他們雖然知道等待援軍的接應是沒有希望的，但仍然戰鬥到底，作沒有希望的等待。

「十二月三日」是一個可恥的日子，這一天，常德淪陷了。

常德的淪陷，其責任，並不在五十七師的士兵，而是由於在洞庭西岸沒有必要的軍事防禦，替敵人留下了一個進攻

的缺口。

三　淪陷以後——姦淫擄掠屠殺

戰爭的失敗，替常桃的人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但這種災難，並不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假使政府在事前有計劃地撤退了戰區的人民。

關於常桃人民所受的災難，大公報記者高集在其劫後常德一文中曾有如次的敍述：

「在常德被包圍之前，城中的十四萬居民都疏散到鄉間，大部分是渡江到南站，再轉向黃石港、裴家碼頭、河洑一帶，不幸恰被從滸家河渡江之敵包抄了，於是便演出了大規模的搶、殺、姦。

「敵人對付難民的第一步就是搜身，五十元，一百元的鈔票一齊搶去，五十元以下的小鈔就撕碎，然後往高處一拋，看着那片片飛舞的紙鈔作樂。有時候聚集一二百難民在一處，喊他們把鈔票飾物往地下丟，聚成一堆後，一齊拿走。

「在永竹山，三個敵兵在一所草棚裏搜尋出一個藏躲的難民，喊他脫去衣服，因爲在張慌中脫得太快，便被一刺刀刺死。敵兵摸了摸屍體，搜走衣服內所帶的兩張五十元和一張一百元的鈔票。

「留在城裏未及逃出的難民，在敵人進城後，全被驅進一間大房子裏，一把火燒了這間房子，房子中的難民便隨

房子一同葬身在熾烈的火燄中。

「在三義湖，三個敵兵用機槍射死一百三十九個難胞。在鄉間，三個或兩個一起的難胞，都是被敵兵用刺刀殺死的。觀音湖的一位五十幾歲的劉百生老者，被幾個敵兵用槍托打死後，還敲斷他的大腿。所有的被拉伕的伕子，年青的或年老的，一不如意便被一脚踢進河裏或穿心一刀刺死。

「伕子是老幼皆拉，最老的有六七十歲老頭，最年青的有十四五歲的小孩。年老的被殺死的最多，因爲他們既挑不動，又走不快，稍一躭擱或憩脚，就被殺戮！

「每一村莊鄉鎮，都是一把火燒得一乾二淨。畜生都拉去佐了餐，鷄是要剝皮吃，米和棉衣，一無幸免，都被搶走。被褥拿去給馬用，或用以塡平泥濘的道路。質料好一點的棉衣，被撕成碎條，圍在頸間取暖。毛線衣最喜愛，卽使是沾了血跡的也都抓走。剩餘的米糧，或丟進水裏，或撒在糞坑裏，……爲敵兵作嚮導的奸細說，這是『破壞主義。』

「遇上了敵兵的婦女，一無倖免，都遭了獸行的蹂躪，稍有姿色的，敵兵自己下手，年老或不合眼的便強迫伕子強姦，他們旁觀作樂。在黃石港一個王姓女子被二十幾個敵兵輪姦至死。陸山的一位姓楊的老者，被敵兵逼迫着姦他的幼女，事後，父女一齊撞牆死了。大部分婦女被姦死後，還剝去他們的衣服飾物，赤身裸體的曝屍野外……

「……在桃源，我們被所看到和所聽到同樣的事實所驚倒，桃源的景像完完全全是常德的一個翻版。」

不僅中國的人民遭受了這樣巨大的災難，就是西班牙籍的教士，也難逃日寇的刼奪和侮辱。愛伯斯坦常德之戰

有云：

「日本軍隊曾毆打五十九歲的老牧師王德純（Vecitacion）同時搶刦了他的米糧、銀匙，教服和金十字架，他們還想奸汚修道姑瑪提利慈百利托、佛朗可，當他們進入欲圖傷害那些避難的婦孺時，牧師和道姑沙濱洛諾同加阻擋，他們用刀背扣打他倆，在道姑的頭上還擊成了一道深痕，牧師們前後被扣打過四次，牧師王德純，是一位西班牙的主教，最初對於日軍的侵犯，尚無若何反感，現在慘痛的事實，叫他一再發覺和認識敵人的侵略行爲，他召集了避難回城的一個五千民衆大集會，他說：『日本人確非人類的行爲，我親見人民被殘殺，被姦汚，我自己也遭搶刦，毆打和侮辱。……』」

四　損失的數字——所謂「常德大捷」

十二月九日，我軍克復常德，各報皆載「常德大捷」，就在祝捷聲中，中央社發表這樣一個賬單。

「此次常德爭奪戰……我民衆所受之損害，目前尚無精密統計，僅就常德、桃源、慈利、石門、臨澧、澧縣、安鄉、南縣、華容等九縣而言，居民在三百萬以上，各縣受災民衆，據估計當在三十萬至四十萬之間。

「就常德一隅言，被毀民房一萬棟，值十四萬萬元。稻谷二十五萬石，約一萬萬元。雜糧四萬二千担，約三千七百八十萬元。耕牛一萬二千頭，約四千八百萬元，農具十一萬件，約三百三十萬元，商家七千餘戶，其貨物損失約二千萬

元。公物損失約萬八千五十萬元。公務員一萬二千戶之損失約七千二百萬元。人民衣物四萬九千戶之損失約值九萬八千萬元，棉花六千石，約四千八百萬元，肥豬四萬頭約十二萬萬元。雞鴨四萬隻約二萬四千萬元總計當在四十七萬萬五千七百六十萬元以上。

「據此間軍政機關依據各檢報告估計常德爭奪戰中被敵殘害人民約二千三百人，被姦婦女約五千零八十人，因姦致死婦女約一百八十人，被擄男子約三千四百人被擄兒童約三百二十名，總計一萬四百六十人」（十二月二十二日常德電）接着掃蕩報又發表了一個比較詳細的統計:

「常德——死一二、三〇〇人，傷三、八六〇人，被姦婦女五、〇八〇人。姦斃婦女五五〇人，擄去一、三、九〇〇人，焚屋一五、〇〇〇棟，損失糧食一、〇九一、〇〇〇石，損失耕牛一五、〇〇〇頭，受災鄉鎮三十二個，該縣損失財產在五十三萬萬元以上。

「桃源——死八、〇五〇人，傷一、八五五人，被姦婦女二、三〇〇人，姦斃六〇〇人，擄去一二、〇〇〇人，焚屋一一、四五〇棟，損失糧食八九六、一四〇石。損失耕牛一二、〇〇〇頭，受災鄉鎮二十五個。

「慈利——死二、三五五人，傷一、一八八人，被姦婦女一、二九三人，姦斃婦女一二八人，擄去二、〇二〇人，焚屋五四二棟，損失糧食一〇四、六〇〇石，損失耕牛三、八七四頭，受災鄉鎮二十個。

「石門——死三、三四〇人，傷一、二九六人，被姦婦女一、五六一人，姦斃一三七人，擄去二、四七九人，焚屋六〇三棟，損糧一一二、四三五石，損失耕牛四、二二四頭，受災鄉鎮十六個。

「南縣——死五、四六〇人，傷一、五六七人，被姦婦女三、五七〇人，姦斃三二七人，擄去六、五八〇人，焚屋一二四棟，損糧九二五、四六〇石，損失耕牛一五、六四〇頭，受災鄉鎮十一個。

「澧縣——死六、一八四人，傷一、七四〇人，被姦婦女二、三七三人，姦死四一四人，擄去七、八八〇人，焚屋九三〇棟。損糧九三五、四七八石，損失耕牛一八、九〇二頭，受災鄉鎮二十八個。

「安鄉——死四、一五〇人，傷九〇〇人，被姦二六九〇人，姦斃二八四人，擄去五、二四三人，焚屋五二〇棟，損糧一、八一四、六〇〇石，損失耕牛四、〇〇〇頭，受災鄉鎮十六個。

「臨澧——死三、四三〇人，傷一、二二四人，被姦一、九五二人，姦斃二六三人，擄去三、五四〇人，焚屋七二〇棟，損糧六五、四六〇石，損失耕牛四、七八六頭，受災鄉鎮十三個。

「漢壽——死一、五六八人，傷五六八人，被姦六二五人，姦斃一〇一人，擄去五六四人，焚屋一八六棟，損糧一二五、六八〇石，損失耕牛二二六頭，受災鄉鎮十六個。

「華容——死一二、二四七人，傷五、九五九人，被姦九、六二四人，姦斃三五人，擄去九、八二五人，焚屋二四、六九〇棟，損糧二一、六二八、七一八石，損失耕牛八九三頭，受災鄉鎮二十個。

「沅江——死五、七七人，傷一五八人，被姦一〇五人，姦斃四十五人，擄去一八六人，焚屋一五六棟，損糧七四、四〇三石，損失耕牛一二八頭，受災鄉鎮三個。」

從以上的數字，我們可以看見在這一戰役中，中國的人民有十三萬一千九百人被殺死，三萬八千零八十五人受了

傷，三萬五千一百八十五個婦女被姦汚，四千二百三十七個婦女姦汚致死，八萬三千四百九十七人被擄去。在物質方面，燒毀房屋七萬三千三百八十三棟，搶去糧食一千六百五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四石，損失耕牛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二頭。此外還有三百萬以上無家可歸的難民，所以有人說，常德之戰，不是「大捷」而是「大刦」，因爲在這次戰爭中所得到的，是不應該失掉的土地，而所失掉的，則是將近二十萬人的生命和將近兩千萬石的糧食及其他。

五　廢墟的憑弔——只剩一座天主教堂

常德已經克復了，但是他再也不能被稱爲城市。他實在已經變成一個廢墟。愛柏斯坦常德之戰有云：

「……這一座古老的城鎮，這曾經有十六萬居民的城市，中國偉大洞庭湖西岸的棉米豐富中心，現在僅存兩所有屋頂的建築；那是屬於西班牙的天主教堂，爲這次戰爭中碩果僅存的遺物，因爲它聳然獨立，由是才能獲得幸免的機會。

「常德城並不是脆弱的建築，它有十四英寸長的磚頭和大的石塊，現刻不僅是屋頂飛去，就是昔日的磚牆石壁，也只是頹垣廢瓦了。……

「木板小屋成了少數部隊的發火物，房屋塌倒，千穿百孔的牆壁，炸毀的建築，從破垣殘壁已築成了交通路線，屍臭到處可聞。」

中央社記者胡定芬訪問刼後常德有云：

「進了東門以後，這個漢唐以來卽居重鎭的名城，盡是滿目瘡痍，一片廢墟，昔日燈光耀煌的大慶街，已成瓦礫之場！歷史上有名的春申君墓，變爲一溝血水！在城中央和四週，偶而存留幾所殘破不全的平房，祇算大海中的孤島，叢山中的古刹，使人異樣感覺寥落凋零。我們看到成千累萬歸還城區的同胞，從廢墟上辨不出自己故居的位置，找不到自己親切的骨肉，而在瓦礫場中仰天徘徊，一種無家可歸孑然一身的慘痛情景，更爲之潸然落淚。」

大公報記者高集刼後常德有云：

「常德的整個面貌是不能辨認了，像是剛被發掘出的古老廢城。沒有一所完整的房屋，一堵整齊的牆，歸來的難民在瓦礫堆中躑躅、徘徊，想尋出舊居的痕跡；然而，他們大半是悵然若失地含着兩眶淚水緩慢地走了——他們再度離開這城市。

「……德山的乾明寺，是一座雄偉的廟宇，綠瓦紅牆，由山麓一層層向山巔盤旋。山巔的佛殿已頂上露天，四壁殘破，地下是幾寸厚的瓦礫，佛台下的佛像，依然是一臉慈藹的笑容，但陪伴她的已不是往日繚繞的香火，和明亮的燭台，而是一片刼後的凄涼。她的右半身已經殘缺了，心口被挖開了一個洞……

「這一帶敵軍曾佔領過，德山的乾明寺一度做過敵人的司令部，如今敵人被驅走了，留下的只是佛像臉上的慈藹而永恆的笑容。

「在戰壕裏，掃蕩報的記者曾揀起一掛被血跡污染了的佛珠，然而帶佛珠的人呢；我們却一個也沒看見。你不

難想像在這聖潔的佛堂裏，敵人曾是怎樣瘋狂的以血汚的手寫下他們的罪行。」

關於桃源的情形，沒有人紀錄，但我從家書上知道，桃源也和常德一樣變成了一個瓦礫之場，南街東街北街西街，再找不出一棟完整的房子。

常德桃源毀滅了。但在我的頭腦中，他們還是像過去一樣的完整。靜靜的流水，灰色的城牆，古舊的廟宇商店手工業作坊……沒有城牆，狹窄的街道，矮小的房屋……。

貪污列傳序

貪污之出現於中國史，由來已久，自殷周以降，跟着私有財產制度和階級國家的成立，貪污遂成爲統治階級的職業。縱觀史乘，歷代以來的統治者，上自皇帝貴族官僚，下至郡縣小吏，鄉曲豪紳，無不以貪污爲發財之本。一部文明時代的中國史，就是貪官污吏剝奪人民的歷史。司馬遷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貪污雖爲中國的歷史傳統，但從來沒有像我們今日這樣的猖獗普遍和公然的橫行。抗戰以前無論矣，自抗戰以來，中國的貪官污吏，風起雲蒸，盈天下皆是也。他們利用民族國家的危機，利用廣大人民的苦難，利用官僚政治的權力，特別是利用抗日戰爭的大旗，在徵發專賣，賦稅，兵役等一切可以榨取人民的機會中，肆行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特別在兵役行政中，買賣壯丁，虐待壯丁，幾乎復活了古代的奴隸制度。此外，爲了貪污，於是而浮徵暴斂，勒索強派，乾沒盜竊，尅扣侵吞，囤積居奇，通敵走私，無所不用其極。一言以蔽之，用盡一切無廉恥而下流的方法，去剝奪人民。抗戰八年來，由貪污暴發而爲百萬，千萬萬萬，千百萬萬，乃至必須以天文數字方可計算之巨富者，不可勝數也。新史氏曰：「孰實爲之，孰令致之，孰使貪污至於此極也。」

據新蜀報載，晉省人民在五個月內檢舉之貪污案件，其數達三千五百十七件，（三三八、一七）平均每月在七百件

以上。而此所謂山西，尚係指未淪陷之山西，亦即十分之一的山西，若全部山西，皆未淪陷，則貪污案件，必十倍於此，其數當在七千件以上。山西如此，後方各省無不如此，報紙所載可以復案。若合而計之，當十倍百倍於山西，即以十倍計，後方各省之貪污案件，每月亦當有十萬件左右。此所謂十萬件，尚係以被人民舉發之貪污案件的數字爲基數而計算，其未經人民檢舉者，又當十倍百倍於十萬，即以十倍計，其數亦當在百萬件左右。此所謂百萬，尚係指貪污案件而言。而每一案件所包括之罪犯，少則一人數人，多則數十人不等，以數人計，則出現於大後方之貪官污吏，每月至少亦有數百萬人。像這樣駭人的貪污，不但在中國史上添上了可恥的一頁，即在世界史上也是一個奇蹟。

這以百萬計的貪官污吏或濫汙中央或橫行地方。論其官階，則自保甲鄉鎮長縣長行政專員以至等而上之，無所不有。論其職掌，則自民政、財政、軍政、役政、交通運輸以致文化教育無所不掌。此輩貪污之徒，無不滿口「仁義道德禮義廉恥。」而反道敗德寡廉鮮恥自若也。無不滿口「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而殘民利己傾國肥家自若也。無不滿口「軍事第一，勝利第一」而吃缺吞餉資敵圖利自若也。用這樣的官吏來統治人民，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然而直至現在，此輩貪污之徒，仍然在民族解放戰爭的血海中，掛起滿帆，飽風，作追逐黃金的競賽。人民的赤血，變成獻納，獻納化作黃金，黃金轉爲外匯。紅的變成黃的，公的變成私的，你的變成我的，死的變成活的。血在迸流，金在飛騰，飛到美國，飛到巴西，飛到南美諸國的銀行裏。在這裏，中國人民的鮮血，化爲少數強盜，超強盜，騙子，超騙子存款摺上的圈圈，化爲洋樓，別墅，汽車，牛乳，香檳，並且也化爲這些罪犯最寵愛的女人。

黃金，眞是一種令人驚異的東西，誰有他，誰就能實現他所欲的一切——連人在內。哥侖布說「有了它，就是要把靈魂送上天堂也是可以做到的。」沙士比亞說：「有了它，黑的會變白，醜的會變美，邪的會變正，賤的會變貴，老的會變少，怯的會變勇，……這黃色的奴隸會向被咒咀者祝福，會使白癩者變爲高人，揖盜賊入座，給他地位，給他跪拜，給他名譽……會使悲泣絕望的寡婦願意再嫁……哼！你這個該死的東西，你這個人類共同的娼婦！」

追逐這該死的娼婦啊！就是抗戰以來的政治，在這個娼婦的卵翼之下，有多少白癩變爲高人，多少盜賊，受人跪拜，多少被咒咀者接受別人的祝福。這一類白癩，盜賊，和被咒咀者，若令其懷財而死，沒世無聞，那是歷史家的罪過，作貪污列傳。

我的氏姓我的故鄉

我的氏姓，不見於中國史乘，亦不見於歷代所撰的氏族譜，其果從何而來？見者多以爲奇。

如果我要妄據經典冒充華胄，我也可以說我的氏姓是出於周禮秋官司寇中的「翦氏」之官。如此，則不但可以附會淵源，而且也可以自矜閥閱。

但是我查閱我的族譜，我的氏姓與周禮「翦氏」之官，毫無關係，而是明代皇帝的賜姓；我的族人，也並不是所謂「黃帝」的子孫，或是大漢族的一個宗族，而是來自新疆，所謂西夷之人也。因此，我不敢拉扯經典妄承先哲以邀「黃帝」子孫的榮寵而冒充大漢族的宗族，致陷於劉知幾「慮引他邦，以爲己邑」「諂祭非鬼」「致敬他親」的譏笑。而寧願承認我的氏姓與周禮「翦氏」之官無關，我的族屬是來自西夷之邦。

在我的族譜中，第一篇便是「回部世系源流。」在這一篇中，對於我的族屬的來歷，得姓的經過，以及南遷湖南的時代，都有紀述。其中有云：

「翦氏本姓哈，其先出自西域回部，宋時爲西域回部望族。元太祖之西征，回部附之，屢從征伐，有哈勒者，嘗從太祖征西夏部落，屢戰克捷，以軍功封折衝將軍。自是族屬東徙，世仕元代，是爲翦氏先世東徙之始。

「明興，其裔八十，佐明太祖征伐。八十勇武有韜略，屢著戰功，太祖嘉之，以其翦除寇盜，賜之姓曰翦，更其名八十

曰八士，是爲翦氏得姓之始。

「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太祖封八士爲荆襄都督，鎮南定國將軍，加太子太保銜，命其鎮守辰常一帶。是年湖廣辰州四十九洞及九溪衞、九渡、水坪、散毛、苽溪等洞蠻夷，連結作亂，侵掠旁郡。八士奉旨討之，凡克四十八洞。後又攻銅鼓、五開、曹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蠻，平之。洪武十四年五月，武溪蠻復叛，八士又奉旨進討，諸蠻望見『翦』字旌旗，皆竄逃無蹤。自是諸蠻懾服而五溪以安。洪武十六年，論平蠻功晉封八士爲太子太傅，誥授光祿大夫。洪武二十二年（一三八九年）卒於軍，奉旨勅葬常德關外黃龍岡。是爲翦氏南遷湖廣之始。

「八士有子曰拜著，原任荆襄都督府總兵，自幼隨父征討，習於攻戰。八士卒，拜著襲其官。洪武十八年夏四月，奉旨討五開、曹滴諸洞蠻，克之。洪武二十二年，又奉旨進討雲貴諸蠻，屢奏膚功。論功晉封靖遊將軍，加太子太傅銜，誥授光祿大夫。其後亦卒於軍。奉旨仍葬常德東關外黃龍岡。

「朝廷以八士父子平蠻有功，又念其同死邊疆，乃命其子孫世襲常德衞正指揮使，仍率『翦旗營』營兵屯田常德桃源，戍守武陵。並勅建『建功樓』於桃源陬市屯戍之地，以昭忠烈。

「拜著生二子，長曰常蒲，次曰常黎。拜著卒，常蒲襲職爲常德衞正指揮使，常蒲旋辭官北歸西域囘部，八士之副將，亦多隨從囘籍。惟常黎樂常桃之山水，遂家焉。自是翦氏之族或在夷狄，或在中國，而常黎者，實爲湖廣翦氏之始祖。

「常黎生原狄，原狄生成，成生湃，湃生錠，仍世襲常德衞正指揮使。錠生柯，改授洞庭守備。自常黎以後五世誥

勅盈館，榮戟臨門，赫然爲世祿之家。以後失其官爵，遂爲黎庶，自前明迄今，子孫繁衍，分居湖廣廣西等省，或力田爲農，或服賈爲商，皆聚族而居，尊奉回教。雖亦漸習漢人文書，然至今不與漢人通婚姻。至其勇敢好鬥，則猶有先人之遺風焉。」

這篇回部世系源流，是我的十六世祖山勝寫的，其寫作的時代，爲清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山勝恐怕是我族第一個有漢文修養的人，他是嶽麓書院的學生。他之撰著此文，決非憑空杜撰，而是根據回文的世系紀錄和明代的許多詔勅寫成的。這些回文的世系紀錄和明代的許多詔勅，原來是保存在「建功樓」中的，現在已經失散了，但還存有一個目錄。大概山勝還及見此類史料。又關於翦氏的淵源，在順治四年所修的桃源縣志，也有同樣的紀載，足證回部世系源流一文所紀，皆係實錄。桃源縣志有云：

「翦氏得姓，由始祖八士公，以回族從戎，佐明太祖平五溪蠻有功，賜翦姓，封鎮南將軍，鎮常德，卒於疆。七世祖拜著，封靖邊將軍，襲父職，又卒於疆，詔賜劍葬。其後世襲常德指揮使。」

或曰，八士、拜著在明初可謂赫赫師尹，其事蹟何以不著明史？我以爲這如果不是檔案散亡，便是採訪不周。因爲在元明之際，與明清之際，都不僅是朝代的更替，而是種族的遞嬗，其間兵戈擾攘，政府播遷，許多檔案，大抵都蕩然無存。同時，元史草草成書，掛一漏萬，人名地名，訛誤百出。明史雖較費斟酌，然亦不及博採郡縣志書，更不曾詳徵氏族譜諜。所以八士與拜著的史料，雖保存於「建功樓」著錄於桃源縣志，而修纂明史者並未採入，這不能不說是史官的疏略。因爲翦氏的南徙，不僅是種族的移動，同時對於明代政府之開拓西南，亦實有不可抹殺的勞績。

雖然，嘗考元明史籍，其中與我族譜中所載者，頗相契合。我的族譜中說，翺氏先世姓哈，在宋時爲西域回部望族。元太祖之西征，回部附之，屢從征伐，而哈勒卽於其時隨元軍東征西夏，遂入中土。案宋時西域回部，統屬於高昌國。據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所紀，高昌國居畏兀兒之地，故高昌國者，實卽畏兀兒所組織的一個國家。當時畏兀兒所佔的疆土，北兼別失八里（今孚遠縣）以阿尢河爲界，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而臣屬於契丹（卽西遼。）宋寧宗嘉定二年（一二〇九年）聞成吉斯汗興於蒙古，遂殺契丹人所派來的監國等官，欲通款於韃靼人。適成吉斯汗遣使至其國，畏兀兒酋長大喜，卽遣使效順。自是以後，畏兀兒遂脫離契丹之羈絆，而轉屬於韃靼。其後嗣屢從韃靼出征，伐西域，滅西夏，滅金，滅宋，無役不從。哈勒大概就是成吉斯汗統率下的一支伊斯蘭軍的首領。他是否是畏兀兒族，我不敢斷定，他之發跡於新疆的回部，卽古高昌國，是可以斷言的。哈勒之族，何時東徙中國本部，我現在不能說出年代，但他曾經參加韃靼攻滅西夏的戰爭。考韃靼之滅西夏，在宋理宗寶慶三年（一二二七年）是哈勒之族，在一二二七年業已東徙於甘肅東北一帶，又可斷言。哈勒的子孫在元代究竟是替韃靼統治者防守西北邊疆，抑或供職大都，史無明文，無從考證，但在元代有許多西域諸種族的人在中國帶兵或參政，因而哈勒的子孫世襲將軍，又是可能的。

哈勒之裔八士何以又投到明太祖的旗下呢？我的族譜中沒有說明，但這個理由是很容易想到的。因爲當明太祖驅逐韃靼之時，爲了集中力量，不得不對回教諸種族，採取拉攏的政策。同時，八士所統率的一支伊斯蘭教的子弟兵，也許不是明太祖所能消滅的。因此明太祖就不得不採用懷柔手段，賜之以漢姓，寵之以爵位，於是我的始祖遂成爲明太祖開疆闢土的先鋒。但是八士所統率的伊斯蘭軍究竟與韃靼統治者有着歷史的關係；爲了防微杜漸，所以明太祖

不能不把這支兵隊調到南方，以隔離其與韃靼的來往。適逢當時西南諸少數種族發生變亂，因而明太祖就給這支伊斯蘭軍一個剿滅西南少數種族的任務，以執行以夷制夷的政策。

關於平蠻之事，我族譜中所載亦與正史契合。族譜謂八十平蠻兩次，其一次爲洪武五年，又一次爲洪武十四年。拜著亦平蠻兩次，其一次爲洪武十八年，又一次爲洪武二十二年。考之明史，以上四年確有命將平蠻之事。如洪武五年，命鄧愈討湖南廣西蠻。洪武十四年，命周德興討五溪蠻。洪武十八年，命湯和周德興從楚王楨討思州諸洞蠻。洪武二十二年，命傅友德討雲貴諸蠻。在這幾次戰役中，我的始祖八十和二世祖拜著所率領的伊斯蘭軍，都曾經參加過，而且還是這幾次戰爭中的主力軍。至於湯和、周德興、傅有德等，不過是明代政府派來的監軍而已。關於這一點，從明代政府頒給八十和拜著的詔書，可以看得出來。但是在明史上却看不見這兩位伊斯蘭軍統帥的名字。假如史官不是因爲史料缺失，而是因爲他們是外族，遂不予紀錄，那便是對歷史的不忠實。但是從「命將士於諸洞分屯戍守」一類的話看來，又似乎是不知道屯戍將士的名字。

拜著之子常浦率領八十的一些部將，辭官北返回部，族譜不詳其原因，但這一支人之回到新疆，則係事實。至留居常桃的一支，當明代初葉，確曾世顯功名，他們的官爵，至今還銘刻在墓碑之上。

現在，勅建的「建功樓」早已崩塌了，但這個建築物的遺址，至今還可以依稀辨認。御賜的甲冑弓矢及其他衣物，早已散失了，但至今還能從族譜中看到一張清單。屯戍的遺蹟，早已消滅了，但至今我們聚族而居的地方，還是叫做「翦旗營。」世襲的鎮南將軍，早已取消了，但至今我們的族人，還是家家寫着「鎮南堂」的堂名，武裝的伊斯蘭軍的

騎士，早已看不見了，但至今我們的族人，還記得可蘭經上「不自由，便戰鬥」的教訓。

歷史上有些突然發生的事情，眞是令人想不到的。當我的遠祖住在塔里木盆地的時候，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會東徙中國本部。但是十三世紀初韃靼人的世界征服，正像一陣狂風暴雨，橫掃世界而過，許多弱小種族的人民，便像沙礫一樣，被這歷史上的暴風雨，捲上天空，又落到他們自己想不到的地方。我的遠祖哈勤就在這暴風雨的時代中，不自主地離開了他的故鄉，徙向中國的內地。但在元代，中國與西北的交通，非常便利，驛使往還，萬里信宿，在當時，我的族人，一定還是和故鄉保持着密切的關係。誰知到十四世紀中葉，歷史上又再飄起一陣狂風，把韃靼征服者掃去了中國。在這一歷史的風暴中，我的始祖八十，遂又像沙礫一樣，被捲到湖南。他們雖到湖南，但也並沒有預備居留下去，所以我的三世祖常浦，還是寧願辭官不做，回到故鄉去了。想不到常浦的兄弟常黎，他却願意留在湖南，這完全是一種偶然的事情。從此以後，這原住新疆的一個哈姓的氏族，被歷史上兩陣狂風接力吹送，便變成了湖南翦氏了。

像這樣以外族而改稱漢姓的，不僅翦氏爲然，在中國史上，其例甚多。如魏書官氏志所列一百二十個外族的姓氏，未改漢姓的，僅有宇文、慕容、吐谷渾、賀若、那、庾六姓，其餘一百十四姓，皆改爲漢姓，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雖後來也有恢復原姓的，但不見得一百十四姓都完全恢復。這些以外族而改稱漢姓的，當其子孫追述世系的時候，又無不妄據經典，冒充漢人。鄭樵通志氏族序曰：「姓氏之事，最盛於唐，而國姓無定論。」國姓何以無定論呢？這就是因爲李淵的氏姓，是否爲眞漢姓，抑或還是外族改稱的漢姓，尙有問題。同時，在相反的方面，漢人之改姓外族的姓氏者，亦往往而有。例如西魏時漢人之賜姓爲拓跋、宇文、獨孤、尉遲、賀蘭等外族氏姓者，不知多少。此等改稱外族氏姓者，其子孫又往往襲

以爲其族屬異的出自外族，而不知乃其祖先媚外求榮的權宜之計。一般地說來，大抵在歷史上當種族交錯的時代，氏姓的更易，是常有的事情。如見複姓則指爲夷狄之裔，見單姓則自矜神明華胄，有時恐適得其反。劉知幾曰「夫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我希望這些自誇世族者，還是要謹愼一點，以免過寄祖先，承祧他人。

自哈勒之東徙中土，到現在已經七百年了，自八士之再徙湖南，到現在也有五百多年了。歷時旣久，我們的族人，已經忘記了自己的語言文字，但在伊斯蘭教的禮拜寺中，還可以聽到用士耳其系的言語誦讀可蘭經的聲音。照現在的法律，我們總可以算是湖南人了。但我們的族人都還記得在十四世紀末，我們有一支同族，囘到新疆故鄉。這一支同族的人，後來也許恢復了原來的氏姓，說着自己的言語。幾百年來，他們備受女眞人的壓迫，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到種族的自由，甚至還不承認他們種族的存在，但我希望總有一天，而且不遠，他們能夠粉粹「種族奴隸」的鎖鍊。